

# 在孤独中消殒的高贵生命

白永康

1957年重庆五一技校体育教师



我身体不行了，就这几年垮下来，耳聋，手又抖。前些年我身体好得很，在长寿湖和监牢里练的。好在我现在头脑还清楚，只是表达有些吃力。

我是四川自贡人，1928年生，父亲是个大盐商，富甲一方，在自贡城里的房产就占了一条半街。我10岁那年，父亲病故，家产大部分被人骗走，红红火火的家业从此衰落。我与12岁的姐姐相依为命。

1951年，我考入了成都西南体育学院（后改为四川体育学院）。那时，我思想进步，性格活跃，喜欢写作。1952年，我当选为校第一届学生会主席，成都市学联执委，一直任职到毕业。毕业后，我被作为德才兼备的高材生送到中央体委，担任《新体育》杂志社的记者兼编辑。那时，我身强体健，能文能武，一切都很顺。

但是，我很想念我的女朋友李松筠。

李松筠是我大学的同学，云南大理来的少女。她不仅能歌善舞，颇有艺术天才，而且模样淳朴漂亮，我一看见她就堕入了情网。

我们学生会组织了一个京剧组，李松筠嗓子好，善表演，是剧组的骨干演员。我们排演京剧《打鱼杀家》、《玉堂春》，她扮演剧中的肖桂英和苏三。我以学生会主席的身份经常去剧组查看，同李松筠频频接触，一来二往，自然花前月下，眉目传情。越接触我越喜欢她，毕业时我要求把我们分在一起。

可是，学校坚决反对我俩好，说我是学生会主席，是党正在培养的对象，而李松筠出身资产阶级家庭，不能选择她。

其实我也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呀！

我在北京干了一、两年，身边当然不乏才貌双全，政治上也“般配”的姑娘。但我死活摆不脱李松筠的音容笑貌——我一辈子都没摆脱。

1956年，我已经28岁，我向领导提出把李松筠调到北京，领导不干，于是我说，那就放我，我调云南。嗨，这一下惹得领导勃然大怒，他指着我的鼻子骂，骂我把个人利益放在革命利益之上，还说我以调动来要挟组织，这绝对不允许。

我年轻气盛，一气之下甩手就走，工作、北京，不要了！

我一口气跑回重庆。为啥是重庆，不是云南？唉，当时顾脸面，不愿像个流浪汉似的出现在李松筠面前，我打算先找个工作，安顿下来，挣点钱，再去找她。

当时大学生不多，我本来功底就扎实，所以，顺顺当当通过了市劳动局的招考，进

入重庆市五一技校当了一名教师。

进校不久，还没来得及去云南寻访，大鸣大放就开始了。学校搞得火热，党支部书记崔振杰同教务科长王开泰、办公室主任李恩章有矛盾，运动中就分成两派。教师中，崔书记对我比较器重，把我看作是他那一派的人，拉我作为教师代表进入鸣放领导小组（8人组成）。

进入小组后，我发现“对立派”王开泰、李恩章等人的意见和作法是正确的，他们坚持正义，为人也很正直，而崔书记等人却不磊落，处心积虑想整人。我一旦看清是非后，感情就倾向“对立派”。我把崔书记悄悄将王、李整为右派，已将材料上报的绝密消息透露给他们。我知道这样做的后果，但我十分讨厌那些成天搞阴谋、整人的人。1957年时我已经对这个国家，这个政权鼓动人斗的作法极其反感。在北京报社时，内部也是你争我夺，两派互相斗。我感到中国没有希望，我气闷，想反叛，想把自己毁灭掉。我从小深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影响，认为一个人活在世上就应当舍生取义。

崔书记用右派帽子把王开泰、李恩章等“外部敌人”清理出去，也用同样的帽子收拾了我这个“内部叛徒”。我同李恩章在长寿湖成了难友，王开泰整成极右，抓到峨边劳改。

在长寿湖我不多言语，仗着身体好，一阵猛干，劳动上没说的，但是我精神上非常苦闷，我仍然思念李松筠，想得心痛。还有，我异常敏感地关注国家大事，在那天荒地老的岛子上，我思绪飞得很远很远。

我没有家，唯一的一个姐姐（也就是解放前父亲病故后与我相依为命的姐姐）是党员，她害怕我染上她，不再同我往来，饥荒年我饿得快死了她都没理我。那些年，我唯一的“亲人”是日记本，我把我心里的话和心里的感情朝日记本倾吐，到1969年东窗事发，我已经密密麻麻记了三大本。当然是偷偷记，很多是诗，没人知道。

1969年，红卫兵进岛来打、砸、抢。我正在外面劳动，听说红卫兵抄家，我脸刷地一下子白了。我本能地产生一个念头——逃跑！但是，往哪里逃，没钱、没粮、没户口、没证件，又能逃多远？

被抓之后我万念俱灰，那几大本日记白纸黑字，有好几首诗骂毛泽东是暴君，是独夫。这是死罪，我不抱希望。

我没上任何法庭，没经过任何审判。在一个万人公判大会上，我被五花大绑，胸前挂一块“现行反革命分子白永康”的牌子，同其他各类“分子”站在一起。我身旁绑的几个人，一个个被点名、宣读罪状之后，吼一声：“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然后是结束语：“判处XXXX分子死刑，立即执行”。每判一个，台下群众都是一阵口号和欢呼。

轮到我了，我不害怕，心如死灰，一动不动地等待那个“结束语”。

“判处现行反革命分子白永康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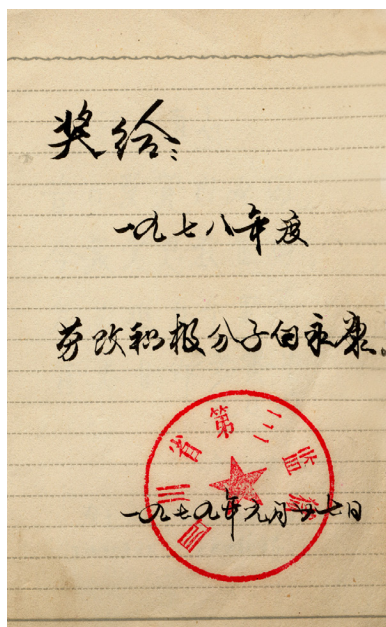
我以为我听错了，是不是自己潜意识里渴望活命，产生了“缓期两年”的幻觉。但我没被拖走，这是真的！

至于为啥没马上杀我，我好久都没搞懂。后来得知，是他们认为日记本没有扩散，骂毛的诗没有外传。否则，我必死无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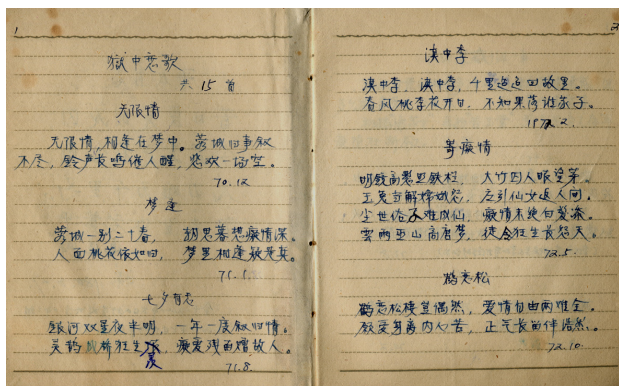
公判大会后，我被押到四川大足县四川省第三监狱服刑。其实，长寿湖也相当于判刑，

只是没有铁窗、高墙。

我被分配到第二中队劳动改造。第三监狱共关了长刑犯（死缓与无期）一千多人，分为五个中队，两个中队刷麻纱，织麻布，一个中队搞工业上的产品，一个中队搞基建工作，一个中队搞农业，每个中队下分20个小组，每个小组约15人左右，每3个犯人编为一个监督组，不管解大小便都要一起行动互相监督（省三监狱只关押男犯人，全狱没有一个女犯）。每两个小组共住一个大室，每室一排通铺，睡觉时一人头向墙，第二人则脚抵墙，大小便晚上解在一个大桶内，白天轮流抬出抬进。我在狱中遇到了胡风，我们各在一个组，同住一间大室，一天除劳动外，基本上都是生活在一起，但我们从来没有交谈过。监狱规定各个监督组严格互相监督，不许互谈案情。其实我认出了他，当时没人知道他是胡风，人们叫他张光人。我认出他是因为1955年我看过一幅《百丑图》，上面有胡风的画像，印象很深。胡风那个组是特殊组，不准与任何人交谈。所以，我与胡风关在一间牢房里，有30多人，3年多都没说过一句话。胡风那个组人数较少，只有七、八个人，只负责每天供应刷麻犯人需用的浆糊。1971年9·13事件发生后，胡风产生了自杀的念头，在出工之后他拣了一块砖头砸自己的天灵盖，砸得血流满面，但没死。事情闹出来，大家才晓得张光人就是胡风。从此胡破格升为特殊犯人，关押在一栋有四间平房的小院内（这是供省、军级以上干部犯罪后用的，面积有一两百平方米，院内还栽有果树几十株，生活也是开小灶，经常供应罐头等高级食品。）1979年三中全会后，北京派来了小车把胡风接回了北京。两年后，我因劳动积极，改为无期徒刑，担任了学习记录员。



监狱奖给白永康塑料笔记本的扉页，后来白永康用这个笔记本写下了2万字的诗歌。



白永康手迹

就是在监牢里默写的，我记在脑子里，十年后出狱，一字不忘。

1979年的一天，监狱长找我谈话，说根据文件精神，可以改正我的右派冤案。这个

在监牢里不能写日记和写诗，我最大的精神寄托和精神抚慰就是夜深人静时思念李松筠。我细细回想我们在蓉城武侯祠一块漫步，一块交谈的情景，回想她演出时的表情，她的一举一动。想象她此时此刻在干啥。我闭着眼，不看那个铁窗，在心底默默构思怀念她的诗句，在脑子里修改，一遍一遍地背。我几十年间（到今年初止），共写了两百多首怀念她的诗，其中几十首

时候我对平不平反，出不出狱已经麻木了。我无家无室，无形中把监狱当成了家。我对监狱长说：“你们觉得可以平反就平，不平也无所谓，我就在监狱里呆一辈子”。

（注：不可思议的是，在监狱和长寿湖之间，白永康宁愿选择监狱！几十年后，70多岁的白永康老人提到这一点时言辞和情绪都非常激烈。）

那个长寿湖在好多方面比监狱还凶！天天人整人，天天学习会、批斗会，你要想摘帽，想探亲，想请假看病，想减轻一点劳动，你就得先去整别人。搞得相互间你整我，我整你，勾心斗角，彼此揭发，用右派斗右派，把人整变了形。在监狱里劳动就劳动，没那些斗争会，没那些思想改造。我在监狱里精神比长寿湖还轻松！

（注：1980年，白永康走出了四川省第三监狱的铁门，回到了阔别23年的校园。当年身强力壮的体育教师，此时已是年过半百的老头子。唯一相同的是，他依然单身。还有一点相同的是，崔书记仍然是校领导。当然，他早已儿孙满堂。）

出狱后，我不打算成家，我心头一直装着李松筠。我千方百计打听她的下落，托旧时的同学，找云南大理体委，都没有结果。1981年，我专程去云南，从昆明到大理一路寻去，还是一无所获。当然，我知道再也找不回成都武侯祠的那个少女，我只是想见她一面，我太想她了。二十多年来她从未离开过我，在我最孤独、最痛苦的时候，在我等待死刑宣判的时候，她都守着我。我想见她一面，我想知道她好，她的儿女好。我只见她一面，就安心了，死而无怨。

现在又过了二十年，还是没找到她，我只有不停地写，写日记，写诗。这成了我一生唯一的渲泄，也是唯一的安慰。心里实在憋得慌，要发狂，不吐不快，就写日记。监狱里没纸笔，就在脑子里写。我把生死看得很淡，就是死也要写。我写毛泽东是暴君，差点送命，但不悔。毛泽东这个人，今后必须清算，他是专制体制里必然要出现的人物，是中国躲不开的劫难。我进监后，曾暗暗许下三个愿望：一、要争取活下来，看见毛泽东死亡，共产党垮台，专制帝国崩溃；二、若获得自由，要游遍祖国山山水水，要找到李松筠；三、能看到中国走上自由民主的道路。

现在第一个愿望实现了一半，另一半我看也快了。第二个愿望也实现了一半，遗憾的是至今没找到李松筠。第三个愿望我想也一定能实现，只是我可能看不到了。中国非要走民主自由的道路，无论怎样艰难曲折，都一定要往那个方向走。搞一党独裁，搞法西斯专制，中国没有希望。我老了，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我在自贡读高中时萌生的强烈的追求自由民主的愿望仍然在，我希望出一批新人，继续我们年轻时的那种追求。现在中国有一些民主斗士在监狱里，有一些，如魏京生等在国外，他们是中国民主的希望。

采访时间：2001年5月15日、6月7日，地点：重庆市五一技校

## 采访后记

白永康家里没电话，我在一幢陈旧杂乱的宿舍楼前打听到他的住处。我彬彬有礼地扣门，没反应。

“你要大声点，他耳聋，听不见。”邻居说。

我“啪啪”拍门，仍不应，改用拳头，“咚咚”，“咚咚”。整幢楼都有了反应，除了这扇破破烂烂的木门。

“你还要用劲，”邻居说，“他肯定在。”

我于是使出当年红卫兵的赫赫武功。

十分钟后，门开了，一位老人怔怔地看着我，他衣衫零乱，双手颤抖，一道深深的伤痕从左眼角一直斜伸到左上唇，上唇因而向上歪扯，露出几颗残存的黄牙。

步入卧室兼客厅兼饭厅兼“卫生间”，一股异味扑鼻而来，乱糟糟的床前，安放着一个支在木架上的大尿盆，盆边唯一的靠背椅上，胡乱堆着几件脏衣服。

我冲着他左耳高声报出家门，他万分热情地把那张最舒适的椅子收拾出来让我坐。

他目光单纯而友善，不速之客的打扰给他带来的仿佛是意外欣喜。他微微佝偻身子，吐出含混不清的声音，我收回游移不定的目光，在浑浊的声音中寻觅一位老人深深浅浅的足印。

从残缺的唇齿间，缓缓流出一段段清晰的人生，一股股回肠荡气的真情。我渐渐忘记了他陋室所呈现的一切，只有一个活灵灵的人，在五十年风雨苍黄中沉浮。

两个小时过去了，我问老人可有当年的照片或文字。他说，覆巢之下无完卵，出狱之前早已片瓦无存。但1980年“改正”后又写了一些诗文。说着，他走到床边，从枕头旁拖出一个尼龙编织袋，打开一把小锁，拉开拉丝，从里面掏出两个破旧的塑料日记本，五本《红梅》笔记本。

笔记本上标题是“《道德经》注解新语”。里面字迹纤细工整，密密麻麻大约有十余万字，日记本主要是诗，也是密密麻麻。

“我几乎每天都写，这是我唯一的寄托。可惜现在手抖得利害——前两年跌倒受了伤。你拿去吧。”

我惊讶地望着他。拿去？把自己多年的心血和内心秘密交给一个初次见面的人？

“我这辈子写得多，不是被收缴了，就是送朋友了，都没变成铅字。现在只剩这点，你拿去，我老了，没有用了。”

老人颤颤颠颠走到床头，从席子下摸出一个钱包，“你就在这儿吃饭，我去买点烧腊。”

我慌忙站起来，连声说不用。老人目光切切地望着我，“你不要客气，难得有人来，我想请你吃饭，现在能够聚一次算一次。”

我蓦地感到十分悲哀。

我想起长寿湖另一个独身右派欧文定，他死在家中，一个多星期无人知晓。我建议老人进敬老院，并表示愿意帮助他。

老人笑了笑说：“算了，这辈子都是独身一人，剩下这点日子还是一个人过。我生日是7月1日，不寂寞，年年有人庆祝……”

共产党老了，它的一生麻麻密密，有蝗虫般的文字。

白永康也老了，他脸上深深的伤痕，一定要变成“铅字”！

## 白永康因这首诗被判为死缓——

### 《白云囚歌》

身囚白云学鲁班，杰士志难效补天。石破天惊大厦倾，神州生灵堪涂怜。  
霸君一纸万民动，沽名钓誉胜三山，十二铜人回头笑，孤魂欲强赢政权。  
全民炼钢枉费心，人民公社众难平。妇孺老幼俱疲命，披星戴月苦群黎。  
拔苗助长气逞强，回光返照智已昏。神州重见光明日，暴君无处再容身。

白永康自注：此诗成于1958年冬。1958年初，重庆市工业系统和劳动局系统的右派分子集中到南川县的乐村山区劳动改造，余被分配到基建队。1958年大跃进，土法炼钢蔚然成风，农民砸破自家的锅灶，办起了大食堂。农场也响应号召，大办炼钢。白云乡是由南川到武隆县公路上的一小乡，盛产适用于建炉的耐高温的白泡石，乐村农场场部立即组成白云采石大队，调了一些年轻力壮的右派分子学习开山取石的技术，余被调至白云采石队劳动，直至乐村农场解散，重回城内再分配到长寿湖农场劳动改造。在学石工期间，亲眼目睹了白云乡的农民们，不论男女老幼都投入了大办钢铁的行列，不分黑夜白天都在运石料修建高炉，以致在秋收到来无法分出人力抢收土内的红苕，以致大量红苕烂在土内，余见之有感，故有此诗之成。1959年转入长寿湖农场，曾记于《白泉诗集》之中，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出成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的严重罪证之一，被判为死缓送到四川省三监狱劳动改造。

白永康于2002年春节大年初一去世，五一技校工会在第二天将遗体送到石桥铺火葬场火化。

白永康孤身一人走完一生，走时，没有任何亲人和朋友为他送行。

白永康去世对我影响很大，好几个月我悲愤而狂躁，一不冷静，我把写他的那部份传到国外（英国和瑞士）我的两个朋友处，这引起了已经在监控我的国安局的严重不安。

我写了一篇纪念他的文章（未完），后来被国安局抄走。下面是朋友王康写的一首悼念他的诗《大年初一的早上》：



2002年2月20日，长寿湖部分难友聚集五一技校李恩章家，悼念白永康（右一为谭松）

## 大年初一的早上

——悼白永康先生

（二〇〇二年元宵节晚十二时）

大年初一  
大年初一的早上  
你独自一人，出走  
去赴一个神秘的约会  
只穿一件白袍  
谁也没有觉察  
谁也无需相告

那片山岩上  
坟冢巍峨的骷髅地上  
云翳阴沉长夜无涯  
穿白衣的使者  
怀揣含泪的地址  
伫立在床前  
把屋顶的灯拉亮

你用最后的生命  
凝视  
谛听  
微笑，真是她  
洪荒时代就出发的使者  
一生一世相约的阳光，终于  
明晃了门窗

你起身，下床，跨步  
多么陌生啊  
又多么熟悉  
多么熟悉啊  
又多么陌生  
你止步，转身，回望  
热泪盈眶

你闭目，屏息，关门  
你把自己关在  
鱼肚白的惨淡的  
浮嚣喧腾的，曾经也是你的  
大年初一之外，纵然

寒光刺目的钢刃戳过  
腥气扑鼻的血帚刷过  
你的布袍依然洁白，因为  
这是你的大年初一  
你的唯一的  
大年初一的早上

白鹤早已飞走  
万里不回头  
五千言的天书  
是遗世的绝殇  
这般抄录的滔滔逝者  
已是另番惊悸的狂思  
纤细如蝶斑的恋诗  
多少高塘苦情，望穿了  
多少秋水  
请便将肢体凌迟到底

无非是痴心柔柔  
浩气堂堂

看哪，万籁俱寂中  
箫声如虹  
东君如仪  
白衣天使簇拥你  
欢度并庆贺  
你的大年初一  
你的阖家安康

星云黯淡  
晨光熹微  
天门洞开，看哪  
我们的慈母正用  
弥天飘拂的襁褓  
垂泪裹护又一名  
遍体鳞伤的圣婴  
在这大年初一的早上



王康自注：去年夏天，我曾在长寿湖幸存右派分子一次聚会上远远地见到白永康先生，他那孤独的目光和紧闭的嘴唇，那只有经历了漫长苦难的中国老人的特有形象，令我心痛，令我肃然起敬。白先生是一首诗，作为对共产极权罪恶的控诉和高贵人性的坚守，将长留于霄壤之间。



2001年9月16日白永康（前排右四）最后一次参加长寿湖幸存右派聚会  
（前排右一为王康、右二为谭松）

#### 补记：

2001年9月16日，我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白永康。那天，长寿湖幸存右派一年一度聚会，我去五一技校接他。他特意梳理了一番，头发整洁衬衣雪白。他站在操场上等我，一眼望去，白先生散发出一种独特的气宇和风骨。我没有料到，此时，他的生命只剩下四个半月了。

我是在大年初二的下午得到他去世的消息，后来得知，此时，白永康已经被火化了。

他走得非常孤独，没有任何亲人朋友为他送行。他有一个姐姐，是他唯一的亲人，但他们早已不往来。白永康曾告诉我，他姐姐是中共党员，姐夫是国家干部，他们害怕受影响，在饥荒年他饿得要死时都没理他。

白永康去世，她没来，说是身体不好。

五一技校工会主席刘中华告诉我，校方还是对得住他，给他换了一身新衣服。

白永康总算有一点安慰了？呵？！穿了一身新衣服上路！感谢党啊！妈妈！

“黑暗从地底升起，遮住了明亮的天空”。那位卧轨自杀的诗人海子，你为什么这么绝望？！

长寿湖的一些难友们，为未能向白永康辞行感到不安。10多天后，他们聚集在五一技校另一位长寿湖右派李恩章家里，为白永康举行了一个不是追悼会的追悼会。

李恩章声泪俱下地向大家谈起了白永康生前的最后日子。

在春节前一个多月，由于长期营养不良，缺钙，白永康已经迈不动腿。他挣扎着最后一次来到李恩章家，很愤怒地说，学校对他不公，在“改正”时，就压低他的工资，

二十年了，现在他才知道。

他离开李恩章下楼时，已经支持不住身子。李恩章不敢去扶他。“我已经 80 多岁了，自己下楼都困难，怎么扶得动。我回家拿了一根拖把递给他，他一手拄拐杖，一手扶拖把，颤颤巍巍往下走。突然他大叫一声：‘共产党要把我气死！’”

春节前十多天，李恩章给白永康送去 20 个热饺子。白永康大喜，一个接一个，一口气把饺子吃得精光。

这是白永康在人世最后一顿丰盛的晚餐。

白永康告诉李恩章，除了四个人，他不想见任何人。这四个人是刘钊、李恩章、周西平、谭松。

刘钊和周西平没有参加“追悼会”。周西平不在重庆。我给刘钊打电话，他声音悲凉：“我下床都困难，否则，我爬也要爬去送他……我离他的路不远了。”

白永康为什么提到我呢？我只见了他三次，谈了两次话，总共不过十多个小时？

蓦地，我明白了。也明白了为什么他会把记录自己心路历程的笔记本托付给我这样一个“陌生人”。

他分明已经感觉到自己来日不多！

他凭直觉得我是可以托付的人。

由于 2001 年太忙（包括采访百余名《重庆大轰炸》幸存者），我未能细读他的笔记、诗词。他去世后，我才捧起来读。越读，越感到老人灵魂的高贵、心灵的淳朴、情感的丰富、爱憎的炽烈。他忧虑——渴盼祖国尽快走上民主自由之路而又不得不面对岁月流逝世风日下的现实；他矛盾——想从道教中寻求解脱而又不能根除内心深处丰富的世俗情怀。当读到他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情人节里所写的 14 首诗时，我泪流满面。

这位一辈子从未享受过性爱的孤独老人，在生命的最后残光里，是那么热烈地渴盼着爱情和家庭啊！

我想起采访他的那一幕，不禁悔愧交加。

那天采访完后已近中午 12 点。老人再三留我吃饭，我不肯。他从席子下掏出一个黑乎乎的小钱包，说：“我去买点烧腊（卤菜），叫上李恩章，大家聚一聚”。我还是要走，他很恳切地说：“难得有人来看我，现在聚一次算一次”。我编了个谎话，说女儿中午要回家吃饭。

老人听了这话，眼中马上露出理解的神情，不再坚持了。

我执意要走，原因是老人那间卧室兼客厅兼饭厅兼厕所的小屋里有一股十分难闻的气味，几个小时采访下来，我有些想呕，急急地想走到外面去。

我拒绝了老人生前对我提出的唯一的一次请求。

我反反复复想起老人手捧钱包时的目光——真切、孤独、渴盼。

我在这永远逝去的目光里连连自责，悔愧万分。

能在他的坟前为他烧一炷香吗？他的坟墓在哪儿呢？火焰熊熊，把一个高贵的灵魂，连同对爱情的渴慕、自由的追求、民主的企盼，统统化作一缕青烟，消匿在你东风浩荡，血红万里的长天里。

只剩一把骨灰，洒在这个充满了罪恶和谎言的世界上。

王康在《咏而归》中写道：“倘若世界充满了黑暗，死亡，便是通向光明的唯一途径”。如此，让我为你祝福吧，白永康老人。香烟袅袅升起，经幡猎猎低鸣，我捧一掬黄土，洒一杯老酒——

——啼血长歌，祭望天涯……

2003年7月

白永康1970年6月入狱，1980年6月出狱，十年间，默默在脑子里“写”了大量怀念李松筠的诗，出狱后凭记忆抄写在日记本上，以下三首选自《狱中恋歌》（共15首）

### (1) 鹤恋松

鹤恋松筠岂偶然，爱情自由两难全。  
愿受身离内心苦，正气长留伴浩然。

1972.10

### (2) 忆蓉城

鹤恋松筠遭身囚，牺牲爱情，贵在争自由。花落情长无限意，托与东流。  
月里嫦娥当思归，“桂英”、“苏三”，曾否记心头；纵使镜破难重合，武侯祠前情长留。

（肖桂英、苏三都是恋人李松筠扮演京剧中人物。1973.8）

### (3) 忆知音

天涯沦落忆知音，儿女情长误半生。  
铁窗身囚心已碎，孤鹤不鸣为松筠。

1979.10

二、白永康出狱半年后，在第一个假期（寒假）时，专程去云南寻找李松筠，从昆明到大理，一路寻去，半月后无功而返，写下滇中行二十一首，以下选二首：

#### (1) 访松筠

旧情永难忘，春城千里行。痴心一片滇池诉，梦中见玉人。半生右派怨，十载铁窗凌。  
鸿雁虽断琴音在，蚕老丝尤存。

1981.元29日 昆明

#### (2) 寻李松筠不遇

离昆大理行，流水空有情。鹤飞千里只为旧，不见意中人。  
“玉堂春”何在？琴音今犹存。天公有意岂折磨？孤身回山城。

1981. 2. 11 于下关市

三、白永康 1980 年出狱到 2002 年 2 月去世，22 年间，写下大量怀念李松筠的诗，以下选五首：

(1) 桂东夜梦松筠

桂东深夜梦玉人，默默不语带羞情。  
风花水月俱幻境，醒来床头灯光明。

1981. 8. 27 日于桂东（此为白永康寒假游桂林时所作）

(2) 水调歌头

月明独斟酒，含怨向苍天，蓉城犹存，迄今三十年。青春似水早逝，白发频生双鬓，孤身不胜寒，琴音又八年，梦声留心间。

滇中行，大理返，长失眠。天公作弄，一别容易再见难。铁窗身囚无罪，鸣雁失音息断，镜破岂复全？遥寄词一首，祝筠长婵娟。

1984. 4. 21 日于五一技校。

(3) 夜梦蓉城旧事有感

蓉城花落年复年，音信渺无两茫茫。  
一曲高山知音少，生死未明梦魂连。  
生不逢时一生遯，四海为家高歌啸。  
终身难忘蓉城事，鹰击长空愿出鞘。

1985. 5. 10 日五一技校

(4) 夜思（三首之二）

举杯欲醉复罢杯，心事茫茫有谁知。  
孤身傲骨天涯落，魂断蓉城梦依稀。

(5) 除夕

不求名利存人间，誓为自由作先鞭。  
恋筠甘受独身苦，此情长留照云天。



## 一个“起义右派”和 一个“内划右派”

陈祖翼

1957年重庆六中教导主任



我是民盟会员，还是民盟六中支部的副主委。1957年注定要挨刀——全国民盟从中央主席、副主席到下面一般会员，一半多人成了右派，劫难，跑不脱。

解放前，1948年，我毕业于东北大学，我曾是校学生会主席，思想进步，搞学运，反内战，反饥饿，闹得欢。为这事我在沈阳被国民党关了100天。解放后共产党一直追问、调查这事，生怕我是特务。

1957年，校长（一个老处女）找了个不是理由的理由，说我是资产阶级右派。我也不申辩，不抗争——反正都要抓民盟。还有，我真心认为，我是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多少都有资产阶级的东西，需要批判，需要改造，没说的。

1957年暑假，教师在市一中集中学习，主持人是宣传部文教部的部长陈孟汀，他在会上宣讲政策：凡是自己承认自己是右派的，就不斗，不划右，算作“起义右派”，一律宽大处理。我是那次学习班的“起义右派”，果然没挨斗。

半年之后，教师们又集中在三中办寒假学习班，主持人是宣传部长张文澄。（陈孟汀在主持完暑假学习班后，自己当了右派。）这次来势汹汹，“起义右派”照样整斗，照样划右，根本不顾当初我们“起义”。这也不怪上面说话不算数，当时，整个社会认为右派越来越反动，是凶恶的阶级敌人，要夺共产党的权。所以，不仅处理越来越重，而且打击面越来越广（主持人张文澄在寒假学习班之后，步了陈孟汀的后尘）。1958年打击面扩大到中学生身上。六中一批高中生，还有其他中学的学生，被集中起来办学习班，要他们讲想法，提意见，向党交心。这些学生都是各学校品学兼优的人物，学生干部，本来一个个积极上进。但是，他们已经看见前面那些人的下场，知道是要抓右派，一个个死活不开口。其实不开口也没用，要完成任务，总要弄些人出来。我有个学生叫周焕坤，一直逼他谈看法，他咬紧牙关不开口。最后问他，你觉得粮食够不够吃，他认为答这个问题没风险，就说：“肚皮大的可能不够，肚皮小的够了。”就这句话，断送了他一生。当年他参加高考名列前茅，但不准他升大学，把他下放到长寿湖。他在长寿湖拼命干，争取上进，但总升不上去，而且，一有风吹草动，就要把他整一下。他不知什么原因，直到文革造反，冲进档案室，看到自己的档案，上面记着：周焕坤，内划右派。罪名是“反对国家粮食政策”。他当时差点气疯了。那一批人中不止是他，我当班主任时认识的就有五、六个，如韩可宝、周碧云（女）等。统统下放长寿湖，说起来我们算是长寿湖的“师生右派”。

我们六中划了十几个右派，先下放南桐。半路上，我校教化学的杨先庚逃跑了，他后来被抓，关进成都一个劳改农场，不知生死。杨老师是我校最好的化学老师，市里也有名气，很可惜。解放前颇有名气的求精中学（五十年代改为六中）经历一次又一次运动，元气大伤，到了1971年的“净化运动”——即把市委周边学校里“有问题”的教师全部清除——六中已经远远落在一中、南开之后。

在南桐，我校的数学教师赵师明饿死了。死前他全身浮肿，嘴里塞满了豆食（豆豉）——他饿慌了，把咸豆豉整斤整斤地吞。他死时不到40岁。

1960年我们全体转到长寿湖，我在长寿湖劳动15年，你问感受最深的是啥，是劳动！长寿湖劳动强度原本就很大，我自己诚心诚意接受“劳动改造思想”，背煤炭、挖鱼池、下雪天下河、除夕夜加班，没哪样我不是拼命！说来我的悲剧正在这儿，我认为共产党要改造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思想是正确的，我主动配合，诚心诚意改变自己。直到文革我才觉得不对头。现在想起来，还有啥说的，两个字：荒唐！

采访时间：2001年12月11日，地点：重庆市大坪

## 采访后记

今晚，2001年12月13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披露，甘肃岷县堡子乡党委书记、副书记（加上派出所）在全乡强制推行评选“劣迹人”运动，每个村必须选出“劣迹人”10余人，“劣迹人”的标准包括“不交税款、罚款”、“穿奇装异服”、“留长头”等等。

一些村民无法填选或拒绝填选，书记刀法很简单，一、打，二、罚（200元），三、你自己去当“劣迹人”。

如此，全乡共“选”出“劣迹人”120人，最大者68岁，最小者14岁（他是顶替父母去开会，因没填写选表而“当选”）。

“选”出的“劣迹人”集中乡场强迫学习、劳动。

这一幕太眼熟了！只要把党委书记改为毛泽东，“劣迹人”改为“右派”，堡子乡改为中国，派出所改为公安局、法院，乡场改为右派劳改农场——活鲜鲜又一场“反右运动”！

谁说1957年已经成为历史？谁说定“坏人”指标的发明已经作古？

水晶棺材里的“龙体”没有僵硬，保存完好的肌肉很有弹性，哪一天日光西出，阴风冷起，广阔的土地到处是死灰待燃的温床！

面对镜头，岷县县委书记总结教训说：发生这种伤害群众感情的事，主要是乡干部没有学好江泽民总书记的“三讲”（讲政治、讲学习、讲正气）。

当然，时代毕竟不同了，堡子乡也有与1957年不同的刀法——凡不积极评选者，罚款200元，乡党委因此创收近2万元。

这是时代的“进步”。

补记：陈祖翼先生于2008年12月去世。

## “孤岛风雨夜，凄然囚徒心”

向光棣

1957年北碚兼善中学语文教师

1916年生



我从小喜欢写作，初中时开始在报上发表文章，在当地小有名气。1949年，我的朋友，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萧蔓若，邀请我到西师中文系任教。我于是放弃了在南京边疆语言研究所的研究工作，来到了重庆。到重庆后，我没去西师，我更喜欢教中学，于是选择了西师旁边那所由卢作孚创办的著名中学——北碚兼善中学。

1957年，学校开始鸣放，我接到南京朋友的信，告诫我，千万不要提任何意见！南京要搞得早一点，已经有提意见的人被整。朋友知道我爱说话，所以一再告诫。那时我对共产党已经有了一些了解，因此打定主意不发言。一开会我就跑，躲着不见。我本来可以躲过那场劫难，但我是民盟，民盟的会我不能躲，会上每个人也要发言。我心想，在民盟内部发言可能关系不大，于是，我谈了几点，一是我对储安平说的“党天下”有同感。我举例说，西师的正院长谢远辉是民主人士，副院长张永清是中共党员，没过几天，上面就把他俩位置调换——党要主管一切。二是我认为肃反冤枉了一些好人，例如我在江苏一所学校当教研组长的朋友汪肖环被无故关押半年多。西师一个系主任同胡风关系好也被关押半年多。三是我对学校的工作提了点意见。我只谈了十几分钟。哪晓得民盟里面的“积极分子”将我的发言整理成材料交给学校党支部，党支部根据这份材料，把我打成右派。

二十年后，我获得“改正”，民盟来找我，希望我重新加入，我坚决拒绝。

我先到重庆南桐矿区农村监督劳动，发18元生活费。我两个女儿，日子很苦，每月每人只有几块钱。下去时，校长对我说：“下去一年半载，回来再教书。”

1960年，我从南桐农村转到长寿湖。在长寿湖，我最大的痛苦一是想念妻子和两个女儿，二是因为这种思念三天两头被斗。

我是一个放不下家庭的人，平日劳动要思念，独自看守庄稼要思念，白日里要思念，睡梦中要思念，节假日和妻女生日更要思念。思念得太苦，便要写几行诗词。我在《窝棚夜雨》中写道：“孤岛风雨夜，凄然囚徒心，



向光棣 1954年结婚照

日与山作伴，夜与鬼为邻，有家归未得，无人问死生，安得山中酒，窝棚强自斟。”  
（自注：某年初夏，于长寿湖豌豆寨看守庄稼，独卧窝棚，夜雨无眠，念及妻女，倍感凄怆，赋此以歌代哭。）

在《除夕有感》中我写道：“世乱于今又一年，别妻抛女有谁怜。”  
在《忆江南》中我写：“别离恨，恨到几时休？梦魂昨夜妻和女，无言相对泪长流，怎不教人愁。”

写了许多，难免不被人发现，被发现，难免不被汇报，汇报后，难免不被斗。同寝一位姓谢的右派发现了我写的《忆江南》，上交给学习班负责人胡某。胡某组织其他右派，把我一阵狠斗。一位叫XXX的右派，站起来批判我：“向光棣说‘恨到几时休？’他对谁这么仇恨？他为什么这么仇恨？我看他是要恨到蒋介石反攻大陆时才罢休……”

XXX至今没有向我道过歉，他自己也写过思念妻子的诗。

你问起长寿湖的批斗会，我告诉你，这是最折磨人的手段之一。每天劳动回来，晚上组织所谓的“学习”（批斗），先读毛主席语录，然后把要斗的人一个个抓来站起，下面开始揭发，如你今天又说了什么“反动”话等等。接着要你承认，要你交待。有一次我们开会斗右派欧文定，反反复复的斗，我在下面悄悄写了一首打油诗“今日我斗人，他日人斗我，为人宜宽厚，何苦太过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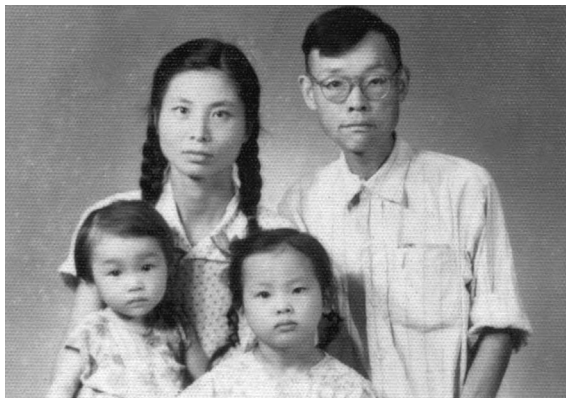
打油诗被坐在我旁边的右派XXX看见了，他一把抓去，汇报给指导员。我马上就被抓上去，这一家伙，连续斗我三个晚上！第三个晚上，我站不住了，头昏昏沉沉，身子有些晃荡，脚在地上动。XXX马上站起来说：“报告，向光棣不老实，用脚在地上画0。”指导员没懂他的意思，问：“画0干啥？”谢说：“他是不接受改造，表示你们斗我等于0。”

“改正”后我为啥很少说话，即便说话也十分小心，并且尽量避免同人接触，有原因的。

最多，我独自写点诗，以歌代哭。 “

（注：2000年11月5日，84岁高龄的向光棣写了一篇文章《写于夜深人静时》，发表于企业文学2001年1期，该文在结尾时有这么一段话：）

小时候，我曾多次听吃斋念佛的祖母摆谈过：说每一个人都有“今生”和“来世”。今生多行善，来世就会多福多寿，儿孙满堂；反之，今生多作恶，来世就会变牛变马，供人驱使。我想，行善得有经济基础，我乃穷措大一个，所以，我未行过什么“善”，这是事实；但我扪心自问，我苟活于人世至今，年已八十有四，确实也从未作过什么“恶”，这也是事实。即使在四十多年前的所谓要使右派分子脱胎换骨，改造成为新人的二十年



“1958年到南桐矿区农村改造，当时，每半年可以回家探亲一次。这张照片拍于1959年夏。下农村不到一年，同1954年的结婚照对照来看，‘神光’尽退。”——向光棣



的监督劳动过程中，我也决不为了要想早日摘掉头上这顶资产阶级右派帽子，就不惜诬陷在一起改造的相同命运的人。我对那些专向管理右派的头头打小报告的无耻之徒，作了一首打油诗劝他们。诗曰：“今日我斗人，他日人斗我；为人宜忠厚，何苦太过火。”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写这二十个字的小纸条儿，却被同寝室的人拿去交给管理右派的最高领导人：指导员。为此，我又被批斗了三个晚上。

祖母宣扬的佛教轮回之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想，如果把“行善”的范围扩大一点儿，比如说，一个右派分子改造过程中，不出卖自己的良心，不像疯狗一样乱咬同样命运的可怜者，也算是行善的表现，那么，在将近二十年的改造苦难岁月中，我也算得上是在“行善”了。

采访时间：2001年6月19日，地点：重庆市北碚区兼善中学

## 采访后记

在校园内寻找向光禄的家时，看到一尊铜像——著名实业家卢作孚先生的铜像。

兼善中学是卢先生二十世纪40年代初创办的一所中学，这所中学培养了大量的人才。

小时，听大人提起过民生公司，也提到过卢作孚，但不知他是怎么一个人，宣传品中读不到关于他的任何东西。

二十世纪80年代，开始有了对他的介绍。前年我办一期关于抗战陪都的专刊时，细细读了卢作孚先生，后来拍《重庆大轰炸》又采访了当年民生公司的职员。

家住渝中区的陈代六老人，曾任卢先生的秘书，一提起卢作孚，马上肃然起敬；家住江北区的杜仁杰老人（民生公司职员）提到卢作孚，立马也是肃然起敬。



谭松在卢作孚铜像旁（2003年9月）

“成者为王”的伟大人物说：历史证明，改良主义道路走不通，实业救国的道路也走不通。救中国的，只有社会主义——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

同晏阳初一样，实实在在干事，走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之路的卢作孚，一进入“新社会”，路就到头了。果然，1952年，卢作孚在绝望中吞金自杀。

我第二次到陈代六家时，老人在反反复复“考察”我之后，交出了一份他写的卢作孚之死的真实过程，他希望我找地方发表——一个卢作孚当年的部属，想在他残留的岁月里，为他一辈子敬仰的人作一点事。

我接过那沉甸甸的稿子，很认真地向我最熟悉的几家杂志推荐。但是，一一被退回。我长叹一声：卢先生你为什么要在“新中国”里自杀呢？

卢先生的铜像默默地立在校园内，一言不发地注视着这所他创办的、现在飘扬着五星红旗的学校。

幸亏，他大彻大悟走得早，没有看见校园内向光棣老师、谢德全老师、李岑西老师、张大开老师一个个被打成右派；没有看见他们的妻儿、老母、儿女一个个失魂落魄的样子；没有看见她的学生熊莞君文革惨死；没有看见学校早已变成一个政治洗脑的机器，疯狂敛财的产业，否则，先生作为这所学校的开创者，会有什么感受呢？

采访过向光棣老人后，便同他保持了联系。在接触中感到老人心地非常善良，非常厚道，有时甚至感觉到他单纯朴实得像个没长大的孩子。

2002年6月，他以86岁高龄，支着手杖，颤颤巍巍地重游长寿湖。

我知道这很可能是他最后一次重返这块土地，于是跑前跟后为他拍照。向老师怕我累着，很不安，眼里充满了关切和慈爱。

可惜那些照片还没来得及寄出，就被国安局抄家时抄得一干二净。

出狱后，我收到向老师寄来的信和50年代的老照片，还有好几次电话。国庆前他来信邀我到北碚，要陪我游缙云山，请我吃饭，玩完后还要送我回城。

让一个86岁的老人来陪伴我，安慰我？

我“出事”后，好些人都很小心，怕同我往来，向光棣老人则逆“道”而行。

向老师太单纯了，长不大，学中文一辈子，劳改二十年，永远读不懂这个社会最时髦的字眼：“识时务者为俊杰”、“面对现实”、“明哲保身”。

他在信中还说，他请了他的好朋友陈英一块来作陪。

陈英，我永远记得他的坚守：“竹子有节不能卖”！

面对向光棣、陈英这样的老人，我回信说：“你们站在前面，我仰望着你们，于是，我知道自己该如何做人。”

补记：向光棣老人于2008年8月去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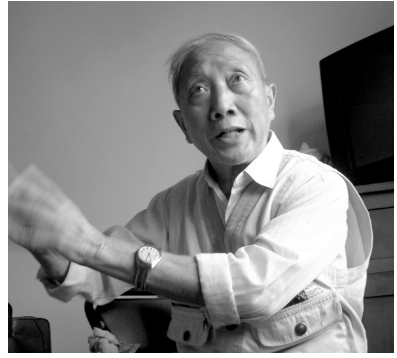
“1951年末秋末来校任教，1952年7月思想改造。后排右二是我。”——向光棣

# 早知如此，我就跟国民党走了

曾永臧

1957年重庆第一师范学校教师

1925年生



我1945年在成都师范学校毕业，当了一个乡村小学的校长，不久到成都教书，参加了抗议国民党的罢教活动。1946年到重庆大学，又参加反抗国民党专制的革命活动，随后在北碚考入晏阳初创办的中国乡村教育学院教育系，解放前夕毕业。

1951年，我在担任重庆实验小学校长时，传来消息，家里被划成地主！我又惊又怕，惊的是，全家18口人，共25亩地，人均一亩多，怎么划地主？怕的是，一旦定为地主出身，当这个校长树大招风，不会有好结果。

我想，与其被人灰溜溜地掀下台，不如自己拍屁股走人。我离开实验小学，到第一师范当了一名普通教员，教心理学和教育学。

1957年我既没发言提意见，也没有写大字报，本来可以平安。

一天，我在路上遇到校党支部书记王幼群，他抱怨说，实在太忙了，太累了，什么事都找到他，连一个职工的窗子坏了也要找他。我对他说，你之所以忙，是党、政没有分开，以党代了政。党本应是领导者，监督者，鼓舞者，应当抓大事，把握主要的方针政策，不一定非要管具体的行政琐事。王书记听得直点头，还向我表示感谢。

下半年反右，王书记将我抛出来，说我攻击共产党，认为共产党不能以党代政。我就这样当了右派。王书记本人对我没有个人恩怨，他也不是故意要整我。他把我抛出来，是上面有指示，要重点整民盟的人，我是民盟，他只得拿我下手。

在几个民主党派中，民盟不仅敢说敢言敢写，而且说得有水平，写得有力度。毛泽东解放前十分赞赏民盟的骨气和水平，解放后他又最恨这两点，非整民盟不可。1957年的反右运动，民盟遭到了灭顶之灾。从中央主席到下面一般成员，一多半的人被打成了右派。我们学校共划六个右派，五个是民盟。

我们六个人既不呼冤，也不鸣屈，除了一个叫姚家骏的教师觉得实在冤枉，作了一点争辩之外，没有一句反抗的声音。

我为啥马上低头认“罪”，不吭声？原因是我对共产党已经有了了解。

我有两个舅子是公安局的，他们对我说，只要被抛出来，就算定案了，即便整错了，也要错下去。我结合自己那些年的观察，到1957年已经明白了一个道理：共产党若要整你，你就毫无办法了。不是死也是死，越辩解越喊冤整得越重越惨。所以，不如早点承认，少受点罪。我小时看过一个戏，说一个将军叛国，将军据理力争，将法官辩得哑口无言。法官最后一拍桌子说：老子就是要杀你，你再有理，老子也要杀你！我认为共产党毛泽

东就是那个法官，无理可讲。认清了这一点，我就有了对策。绝不花力气去讲道理去上告，党说什么我就承认什么。这一招还灵得很，我后来在长寿湖少受了很多罪都归功于我这个宝贵认识。共产党说某右派顽固不化，在某种意义上说，真还说对了，有些“顽固不化”的右派就是一直看不清这点，不断辩解，不断上告，结果一层一层往下打，直到打入十八层地狱，吃了大亏。

在毛泽东死之前，有哪个右派是因为辩解，因为上告得到改正的？

由于学校六个右派都老老实实认罪服法，因此，书记很高兴，他说：“我们学校任务完成得很好。但是，运动没有完，市八中有几个右派死不认错，一直在顽抗，接上级指示，我们要去支援八中。我们学校的右派，要去批判八中的右派。”

最好笑的是，在我们出发去“支援”之前，上面有人来给我们讲共产党的政策。他说：“我们共产党是最讲道理的，只要说得脱就走得脱，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我听到这话，暗暗好笑。

我到长寿湖后，活得比较“潇洒”。我毫无负罪感，没有心理负担。我的精神支柱是：我曾永臧没有做一件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民族、对不起人民的事，历史将判我无罪。历史将宣判我有罪的人有罪！

到1957年，我对这个新社会已经有了两点深刻的认识。第一点是这个社会已经被统治成铁板一块，作为个体的人已经无处可逃。解放前在国民党统治下，个人要自由得多，既没有城乡之间的鸿沟，也没有行政单位的束缚，没得户口制度，更没有“粮食关系”（没粮票，你动一步试试，饿死你！）。拿我来说，我毕业后到乡村教书，不愿意了就转到成都市，在成都闹事（抗议国民党）后我又跑到重庆大学。在重庆大学搞了一阵革命活动又自由自在地来到北碚读书。总之，感觉到那个社会自由度相当大，到处是眼子。到了“解放后”的新社会，个人的自由被剥夺得干干净净，每个人都被变成了“螺丝钉”，被固定在那架庞大的机器上，一旦离开那架“机器”便难以生存。1957年八中那几个“顽固右派”教师，就是没看清这一点，他们选择自谋出路，其结局比我们服从国家安排，下长寿湖监督劳动更惨，没有有关单位的证明，他们不可能找到任何工作，连去拉板车，或者摆个老荫茶摊，都要经过街道办事处的同意。没有户口，你就是“黑人”，要被抓，没有粮食关系，你就领不到粮票，吃不上饭。你还敢随便动弹？而运动一来，被斗、被打更是家常便饭。旧社会还可以出“白毛女”，逃到山上，新社会你想当白毛女都不行。

第二点感叹是，在“解放后”的新社会，任何一个行政单位（包括学校）都可以拥有审判和宣判一个人的司法大权，可以随便把人抓来关起（名曰隔离审查）。单位的领导，或者是党组织，可以整一个人的材料，罗列，甚至编造罪名，把自己的职工、干部、教师送去劳改，或者送进监狱。很多人被关了十几年二十年，没有经过任何司法程序，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犯了什么罪。如果这叫无产阶级专政，那实在是中国历史上的空前创举，也实在是前所未有的恐怖。

对言论的限制更是可怕。我在长寿湖，唱一首歌颂社会主义的歌曲，“马儿哪，你慢些走”，被抓出来斗，说：“社会主义就是要快步走，你这个右派分子，为什么要唱慢些走？”右派练冰梧在一次扫厕所的劳动中顺口说，厕所另有几种叫法：松活堂、东池、毛尸（茅厕）。被抓出来斗，说他影射毛泽东。总之，我们知识分子遇到共产党，实实

在在是秀才遇到兵。

1979年，我结束了20年的劳动改造，回到学校。重新执教后，有学生问，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我反问学生，有的学生说：是“实事求是”，有的说：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的结合。等等。我在课堂上差点脱口而出：毛泽东思想就是在马列主义的神圣外衣下的暴君、专制、独裁思想。

说到这儿，我不得不说，对毛泽东这样一个暴君、刽子手，至今仍将他的画像挂在天安门城楼上，这是对全中国人民的一种侮辱、一种讽刺。我感到悲哀的是，毛泽东造成的灾难我们几代人都难以肃清。

我获得“改正”后，当年整我的书记王幼群一再向我道歉，甚至赔罪。他算是有良心的人，至少后来良心发现。我对他说，你不用向我赔罪了，个人的苦难我不再去计较，你同我探讨一下中国怎么办？中国走什么路才好？说起来这又回到中国知识分子上世纪前半叶的探讨和追求。

现在社会问题堆积如山，官僚腐败盛况空前。仅说师范教育：解放前在兵荒马乱的情况下，国民党办的师范学校都不收费。我读成都师范和资中师范，一分钱都不要，我哥哥读成都师范时，还发他四个大洋。他给家里交两个，自己零用两个。现在共产党在和平年代治国五十年，说是综合国力大增，但师范收费越来越高，教育收费越来越狠，不仅穷家子弟读不起书，连“小康”之家也喊遭不住。现在中国的教育现状是：一方面学校收费猛增，一方面教育水准每况愈下，我作为一个学师范，搞了一辈子教育（中间有20年劳改）的知识分子，看到这种现状，很着急：中国的教育像这样走下去，怎么得了！

我们的学生去参观了白公馆，渣滓洞后回来说：“江姐如果看到现在这么腐败，一定不愿去受竹签子的苦刑。”现在，我们用什么去教育学生？学校已经变成一个唯利是图的，一心搞创收的产业了！

前些年有人动员我加入共产党。我回答：其它不说，仅是要求党员作党的驯服工具我就做不到。要一个活灵灵的高贵生命去做工具？！只有野蛮的奴隶社会才会如此要求。我不愿意当工具——那怕仅仅是口头上这样说我都反感。

最后想说的是：中国必须赶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今后不管谁上台，如果抛弃了民主自由，中国不会走向真正的繁荣富强，也不会真正融入世界主潮流。

采访完后，曾永臧送我出门，告诉我一件事：

1957年全北碚中小学教师集中在一师学习。有人揭发一位教师XXX（曾永臧回忆不起名字），说他提过，他解放前坐过飞机。XXX被马上被勒令交待问题。（当时认为，解放前能坐飞机的人一定是官僚或有钱人）他肯定历史上有重大问题没交待。XXX被斗时说，他从没坐过飞机，是对同事吹牛，想炫耀。但没人相信，说他不老实，继续斗。XXX在一个夜晚爬上一师的教学楼，从四楼跳下，气绝身亡。

采访时间：2001年6月19日，地点：重庆市北碚区

采访后记

采访完曾永臧，已经是下午5点多钟，云暗天低，大雨滂沱，曾永臧冒雨带我去看那幢教学楼。

一师干净、整洁、绿荫满目。曾永臧指着一幢四层楼的房子说：“我记不起名字的那位教师就是从那儿跳下来的。”

雨，哗啦啦地越下越大，举目不见任何人踪。44年过去了，雨水早已冲洗了一切，只有一点记忆，残留在曾永臧的脑海深处。待曾永臧也走向永恒的命定，又一段冤屈便彻底洗尽。

76岁的曾永臧老人想必早已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我来采访，他连连说：“好哇，好哇，这是功德无量的事。”

告别曾永臧，从北碚赶回杨家坪，雨打在车窗上，我感到世界一片宁静，宁静中便胡思乱想：从四楼往下跳，“飞”在空中是种什么感觉呢？那个同事为什么要为这么一点事站出来揭发？是什么把每一个人都变成监视别人的密探，或者看成可疑的“潜伏特务”？我们的后代读不读得懂那一段历史，相不相信我们的文明史上有那么一段不可思议。还有，那个揭发XXX的人现在在那儿呢？他看到XXX血淋淋的尸体会会有什么感受？我一路胡思乱想，在黄昏的雨中湿淋淋地前行……



谭松与长寿湖三个教师右派陈英、向光棣、曾永臧  
合影于北碚兼善中学（2003年9月）

# 长寿湖是人间地狱！

余洪洲

1957年重庆42中语文老师

1924年生



我1942年毕业于涪陵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后当小学教师。1947年来到重庆，想在大城市里谋个发展。解放后我在菜园坝小学当老师，由于教书教得好，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1955年把我提升一级，进42中当了中学教师。

1958年，学校的右派一个个都抓出来了，没有我。当年7月份，学校又组织一次学习班，凡是解放前毕业、解放前参加工作的人都要进学习班。干啥？交待解放前的历史。这种事以前干过多次，比如，“向党交心”运动、“忠诚老实”运动等等。我没啥可交待的，从学校到学校。但是，1947年我刚到重庆时，没找到工作，别人介绍我到枣子岚垭的一个单位去当过工友，我去后才发现，那是国民党中统局在重庆的分部。我在大门口当收发员，总共干了两个月，找到工作后（江北寸滩一个小学当教师），我就离开了枣子岚垭。那两个月我除了干点收发，没干任何其他事，更没有加入任何组织。

我根本没把这事放在心上，两个月收发员，算啥？

上面反复叫我们把解放前的根根底底都抖出来，向党交心。我想了半天，要抖，只有抖这事。我没做什么，以为没关系。还有，我以为共产党真的像他说的那样，主动交待，既往不咎。

我太老实了！我一辈子都为这事后悔。老实，老实毁了我一辈子，毁了我全家！我不说屁事没有，打两个月零工，哪个晓得？一交待，脱不到手，纠缠我几十年！

主持学习的那些人高兴得很，挖出了一个中统特务！

两个月后，我被赶出学校，发18元生活费，下放南桐农村监督劳动，没有给我宣布任何处分，也没戴任何帽子，只叫我走人。

我这一走再没回到42中。1979年“改正”后，也没向我宣布，只是不再劳动，准许我教书——在长寿湖回龙中学。

所以，我体会，一个人一生的生生死死，共产党随口一句话。

在南桐，教师死得多，尤其是岁数大点的，多半活不出来。有个叫周远达的教师右派（哪个学校的想不起了），他年龄大了，又累又饿，拖不起，我和他一起从山上劳动回来，刚坐在桌子边，他身子突然一歪，倒在地上就死了。

我幸亏年轻，身体好。

1960年，我们转到长寿湖，我到的高峰岛。这里并不比南桐好，而且，长寿湖极左，整人整得凶，根本不把我们当人。

我在重庆有个家，母亲、老婆、一儿一女，我只有18元生活费，为了保命，家里所有东西卖得精光。还是不行，1960年先是我母亲饿死，接着是我大儿子病死。家里发电报来，农场卡住不通知我，他们死了好久我都不晓得，长寿湖没得人性！

但是，老婆寄来一纸离婚书，农场通知得飞快，立马送给我，要我签字。

这对我是晴天霹雳！我根本没想到她会离开我。她是我从涪陵家乡带出来的农村姑娘，我教她文化，培养她学习。她没工作，我一直养着她到1958年（1958年后她才找了个工作）。在她最困难的时候，是我帮她，改变了她一生，但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她甩手就走。走得突然、绝情，不吭一声，毫无商量，陡然一纸离婚书寄来让我签字！

我知道她日子很难，但我们是患难夫妻，要离，也该打个商量，要走，也该让我见一眼女儿，所以，我不原谅她。现在我回重庆见女儿，与她近在咫尺，但就是不见面。

1960年，母亲饿死，儿子病死，老婆离婚，女儿被带走，我在高峰岛孤零零，束手无策。

那一年的苦难还多。我在高峰岛上的难友，一个接一个水肿，死的死，亡的亡。我也水肿，家庭保不住，自身也难保。一个叫罗宇的教师右派，饿得乱吃东西，连树叶都放在嘴里嚼，搞得拉肚子。岛上没药，没医生，没人管，他拉得死去活来，痛得在地上打滚。我眼睁睁看着他乱抓乱啃，蓬头垢面，枯瘦如柴。他落那口气呀，惨！

我们把他拖出去草草埋了，没棺材，更没有亲人为他哭，他还不到三十岁。他的死对我打击非常大，长寿湖在我眼里是个恐怖的世界，一个到了尽头，马上就要毁灭的世界。

我想到自己，觉得自己生命也到了尽头。我们这群人，不是人，没人把我们当人，没有徒刑，但遥遥无期。劳动有你的，死活没人管，罗宇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我真的绝望了。

从南桐起，与我一起劳动的，好些人一个个倒下去，我哪一天步他们后尘，不奇怪。

1960年，我作好了死的准备。

.....

1963年，市教育局把我们这些下放教师全体开除公职，老家在农村的发回老家。我已经没有家了，留在农场。生活费从18元降到16元，扣除四元给女儿，我每月只有12元。1979年“改正”，我进了长寿湖边的回龙中学，站了半年讲台就退休。

在长寿湖，由于我一直属于未摘帽的分子（当初根本没戴帽），所以，最重最累的活都是我干。还有一项任务，埋死人！凡是死了人，不管是自杀、病死、打死、饿死都叫我去埋，连文革中武斗打死一个“造反派”，都是我埋的。

长寿湖边，有好多孤魂野鬼！你们说长寿湖风光美，我看到的处处是死人惨白的脸。我最后给你说一句话，长寿湖是人间地狱！！



余洪洲在高峰岛前（2003年6月，谭松摄）

采访时间：2001年12月13日、2003年6月14日

地点：重庆大坪、长寿湖



## 采访后记

余洪洲是几个永远留在了长寿湖的分子之一，他后来同一个农村妇女（寡妇）结了婚。2003年6月，我在长寿湖谷黄村一个偏僻的农家土屋里找到了余洪洲。79岁的老人，身材修长、五官端正、动作敏捷，其气宇、其风度与周围的环境形成很大的反差。从他居住的山坡上，可以远远地望见高峰岛，望见那风光秀丽的“人间地狱”。

老人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在高峰岛，最恐惧的世界是高峰岛。

高峰岛，长寿湖中一个风光旖旎的旅游胜地。岛上树林葱郁，曲径通幽。有水波涟涟的池塘，年代古远的寨门，浑然天成的草坪，翻飞欢叫的水鸟。每天，有“龙凤呈祥”的彩色游船，满载红男绿女，来岛上觅幽探胜。



“人间地狱”高峰岛（谭松摄）

2001年10月24日，我们一行人登上高峰岛。正是金秋风高日朗的季节，空气中一尘不染。秋阳暖烘烘透过树林，斑斑驳驳，洒在铺满金黄落叶的小径上。清风从湖面吹来，万叶颤动，飒飒簌簌。登高临远，秋水长天，飞鸟低翔，俨然一幅宋元山水画。同行的四川美术学院教授王晓剑、岛子扬言，一定要带学生来写生。

高峰岛会是人间地狱？！

一个人，要绝望到何种程度，才会把这儿看作是“最恐怖的世界”。

长寿湖的“守墓人”——当年的右派李宁熙——指着一棵大黄楠树说，那些年右派们就住在树旁。

顺眼望去，那儿真是一处疗养胜地。满地绿茵，一泓碧水。

时光倒退回去，这儿是什么景象？

一群“怪物”，脸泛青光，全身浮肿。

一尘不染的空气能吃吗？美丽的黄叶能吃吗？

“扑通”，一个蓬头垢面倒下去了，  
“扑通”，一个全身浮肿倒下去了……

右派罗宇在地上翻滚挣扎，生命的残光在湖畔“宋元山水画”中一点点消逝。

埋他的余洪洲老人也找不到他的尸骨了，他只有对一个聆听者说：“长寿湖是人间地狱……”

高峰岛依然美丽，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又一船红男绿女来了，欢声笑语与湖光山色交融成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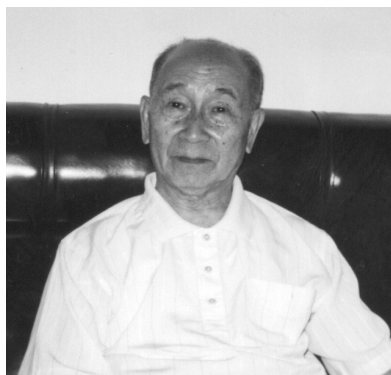
谭松第五次到高峰岛（2005年9月）

# 竹子有节不能卖

余洪洲

1957年重庆市城建校语文教师

1926年生



解放前母亲怕我被国民党抓，成天提心吊胆，1949年她放心了，说：“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你安全了。”1957年我被打成右派，押往农村监督劳动，妈妈眼睛都哭坏了，她说：“现在是坏人整好人，但这不是毛主席，毛主席不会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是下面的坏人干的。你要去找毛主席！去找毛主席！”

我出生在江南农村，抗战时就读于迁到四川万县的上海法学院，在该院的新闻专业毕业。毕业后我在重庆《新民报》和《武汉时报》当记者、编辑。国共和谈时，曾在重庆七星岗中苏文化协会采访过毛泽东、周恩来，在武汉采访过周恩来与国民党的郑介民、美国的白鲁特的行辕谈判。1946年，又进入复旦大学新闻系读了两年。毕业后到上海《民国日报》当记者，1949年初该报派我到重庆采访，在四川一直呆到解放。

解放前，我思想很“左”倾，虽然没加入共产党，但同地下党联系密切，我到凉山去采写揭露国民党92军的劣行就是受地下党的指派。解放前夕，我被特务追踪，跑到了万县，我在那儿按地下党的指示办了一份《中国民主报》，解放军入城那一天散发到大街小巷。《中国民主报》是我迎接新社会到来献上的第一份礼物。我高兴得不得了，我妈妈也放心了。她一直担心我被国民党抓，提心吊胆。她说：“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好了好了，你安全了。”

解放后我到重庆市工商局工作。1955年反胡风，突然宣布我是胡风反革命分子，而且在万人大会上当众宣布。原因是我以前在武汉见过胡风一面，向他约过稿。半年后又突然说我不是胡风分子，几个人口头通知一声就算完事。我要求也要在大会上当众宣布，没人理睬。我由此萌生去意。

正好这时市委宣传部的张文澄搞了个招聘委员会，我去报了名，想那个窝。我的名字被我当年在《新民报》的同事姚江屏看见，他任重庆城建校副校长（没有正校长），主管教学。他力邀我到城建校任教，于是我进校当了语文教师。

1957年，上面来人请姚江屏给党提意见。姚说，我是民盟，管总务的副校长是共产党员，对内对外很多事都找他，我工作起来不大方便。

第二天，重庆日报刊出：城建校的姚江屏说，民主党派有职无权。

姚校长因此被打成右派，而且是极右，押到四川峨边劳改，现已去世。

学校党支部书记找上门来，三番五次要我揭发姚江屏。他说：只要揭发一点、两点

就行了。当时，我对党发动的那场运动是百分之百的支持，不要说是朋友，就是亲人，我也不会庇护。同样，我只要认为他没问题，决不会乱说半句。党支部书记警告我：“你如果揭发他，你还是我们的同志，否则，我们只能按同情右派对待你，你必须认真考虑。”我回答说：“我没有什么可揭发的。”他们又动员我妻子来作我工作，非要我就范。我妻子了解我的为人，况且她也不愿意我乱咬人，诬良为盗。最后他们竟诱逼我妻子在会上揭发我，要她大义灭亲。妻子是党的积极分子，对党一片忠诚，既然党反复要求她，她不能不听党的话。于是，她揭发了我三条，其中最严重的一条是“反对合作社”。

起因是这样的，她同我去合作社买蚊香，去了几次都缺货，我说了一句：“这么热的天没蚊香卖，合作社太不负责任。”这便成了“反对合作社”。我看到妻子在会场上非常为难，为了减轻她的精神压力，我当场表示：“我承认自己是右派，行了吧？”

但是，承认是右派容易，要交待反党罪行很难。当时我对党一片赤诚，实在没有罪行可交待。

党支部书记和党员副校长还找了我两条“罪状”。

一天我去上课，学生们嚷着要我讲解当天发表的毛泽东《蝶恋花·答李淑一》。我说，我还没看，怎么好讲。学生把报纸递上来，一定要我先粗略讲一下。一个同学问：“‘蝶恋花’是什么意思？”我说，这是词牌名，大致相当于今天一首歌的曲子，比如《东方红》这首歌的曲子，我们在歌颂党和领袖时可以填上“东方红，太阳升”的词，如果要揭露帝国主义的腐朽没落，也可以填上“西方黑，太阳落”的词。下课后，一个学生马上跑到那个党员副校长处，说我在课堂上攻击毛泽东思想。

另一条是攻击政治教员。有一次几个教师在一起发牢骚，说，政治课为什么非要党团员才能教，这是宗派主义。我正好从旁边经过，便说：“哪个党都要抓政治。解放前教公民课、三民主义课的还不都是国民党员、三青团员。”他们听了相视而笑，我知道是笑我“左”，但口头上表示“深受教益”。反右斗争开始后，他们怕我揭发他们，便串通起来检举我，说我攻击政治教师，把共产党的政治教师同国民党的公民教员相提并论。

我当右派有了三条罪状：“反对合作社”、“攻击毛泽东思想”和“攻击党的政治教员”。

1958年4月5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主持反右斗争的总务副校长最后一次找我谈话。也是给我最后一个机会：只要认错，就可以从轻发落。我不识相，仍然一条条辩解，比如我说，批评合作社基层门市在夏天不供应蚊香怎么是攻击合作社制度？他们不仅是对消费者不负责，也是对合作社本身的效益不负责。批评这种渎职行为成了罪行，起碼的是非观点都没有了。副校长说：“你的问题确实不大，完全可以从轻处理，你要承认了，（右派）帽子都不戴。但是，你态度太恶劣，始终不认罪……”我听到这儿，打断他的话说：“校长，随便组织上怎么处理我都接受，包括坐牢，但说我‘态度恶劣’，我不能苟同。打个比方说，我如果偷了你的东西不承认，那是恶劣；如果没偷却认帐了，也是恶劣。我认为我是属于后一种。把一个正常人的理智行为说成‘太恶劣’，我无法理解。”

我逐条反驳他，气得他双眼发红。他说：“你是新闻记者出身，你这张嘴我说不赢。”就这样，我失去了最后“悬崖勒马”的机会。

突然，他对我大吼一声：“听到！我代表党组织宣读处分决定：……撤职，送农村监督劳动！——你接不接受？”

“接受！”我回答得很干脆。

“好，你现在回去，把家里事安排一下，明天由丁书记送你们去南桐农村。”

当天下午我回到家，妻子看见我很高兴，叫我到床上去看刚出世 20 多天的儿子。我一见到幼儿的脸，眼泪就流出来。

“爸爸，你哭啥？”四个女儿（我共五个子女）呆呆地望着我。

我抹掉眼泪，告诉妻子我要到农村劳动改造。

妻子脸色发白，但她没有哭。她竭力想安慰我：“到这个地步，只好认命。你不要太难过。我确实没料到，我被骗了，我对不起你。”

我问她：“你说被骗了，被谁骗了？”

“被丁书记。他肯定说你没有右派问题，揭发你是为了帮助你在运动中克服小资产阶级的通病，以便日后更好地为党工作。他再三劝说，我才找了些话，哪晓得会是这样……”

那一夜，是我有生以来最悲酸的一夜。我想到母亲、妻子和五个儿女。我再也没有钱供养他们了。他们是无辜的啊，为什么平白无故遭此劫难！这场斗争中全国有多少受牵连的母亲，妻子和儿女？我母亲为我的事，后来眼睛都哭坏了。但是她说：“现在是坏人整好人，这不是毛主席，毛主席不会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是下面的坏人干的。你要去找毛主席，去找毛主席！”

那一夜我一直在流泪，彻夜未眠。为了不让妻子发现，我一点声都不敢出。时钟敲了五响，我悄悄起床。

妻子突然一把拉住我说：“还早，再躺一会。”

原来她也是通宵没入睡。

我起床逐一看熟睡的儿女，泪水忍不住又要流下来。我对妻子说：“我这一走，不晓得好久能回来，只有偏劳你把孩子带好。”

妻子到厨房给我做吃的，我说用不着，我吃不下。她坚持要做。

天刚露出鱼肚白，孩子们还在熟睡，妻子送我出门，我看她要哭，赶紧扭头……

我必须要说一下我妻子左世兰。

我与她是 1948 年在南京协助地下党援救被捕的进步作家骆宾基的过程中相爱的。1949 年我俩在重庆结婚，当时她在国立女子师范学校教舞蹈和体育。1956 年我到城建校后她也调到该校。我当右派后只有 12 元生活费，我母亲和五个儿女全靠她每月 62 元工资生活，家里经常没钱买菜，逼得我母亲 60 多岁了还出去打工。我同妻子感情很好，虽然她在丁书记诱骗下揭发了我，但我当右派后她坚决不同我离婚。那些年除了经济上，她政治上的压力也很大。

1961 年，我大女儿报考外语学校，因为父亲是右派，政审不合格，被拒之门外。妻子和大女儿很伤心。1963 年，二女儿小学毕业，眼看着又可能升不了学，妻子很担忧，给我写信来，征求我的意见：为了儿女们的前途，可不可以离婚。我回信同意。于是，1963 年我们离婚了。

我妻子本是一个性格开朗、能歌善舞、身体很棒的人，



陈英妻子左世兰

1957年让她整个人生变了样，她太劳累、太焦虑，吃得又差，身体迅速垮了。在文革开始那年，她终因积劳成疾去世。那时，她才38岁。

多年来，我一直觉得对不起她，如果不是因为我，她绝不会去得那么早，也绝不会去得那么悲凉，那么凄惨。

我的五个儿女现在都不大同我往来，感情很生疏。我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反而给他们带来无穷的灾难。我四个儿女下农村当知青，留下一个有病的小女儿在家，无依无靠。那些日子，不堪回首。

采访时间：2001年7月22日，地点：重庆市工业学校

## 采访后记

陈英不肯违心地揭发别人，弄得家破人亡。

2001年7月22日，我坐在陈英老人那间简陋的房间里，面对孤独老人问道：“你当年只要揭发一、两点，整个人生和家庭就是另一个模样，你后不后悔？”

老人斩钉截铁地回答：“不！”

接着，老人讲了一段往事：

我小时候家里很穷，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有一年春天，奶奶带我到自家的竹林去挖竹笋充饥。我看见别人在田里耕种，就问奶奶为什么我们没有田。奶奶说，以前我们也有田，后来家庭困难卖了。我说，现在家也困难，为啥不把竹林卖了？奶奶告诉我，爷爷说过，竹子有节不能卖。这是祖宗留传下来唯一不能卖的东西。当时我太小，不懂得什么叫“竹子有节不能卖”。后来我读书，读到苏武牧羊，明白了一点。毕业后我回老家，一个私塾先生对我说：“你爷爷很有气节，日本人用刺刀逼他出来当会长，他坚决不干，日本人一刀杀下去，血溅出来，他立着不倒，还是不干。”

那一瞬间，我豁然明白了什么叫“节”，懂得了为什么我的祖宗一直不卖竹林。

这片“竹林”不能在我手中卖掉。

从位于化龙桥半山腰的陈英家出来，山城火辣辣的太阳当空毒照。我不知道该不该买瓶饮料，前几天报上说，据抽查，47%的饮料不合格。

在“唯物主义”五十年火辣阳光毒照下，什么“气”，什么“节”都蒸发完了，辽阔广袤的土地上，只沉淀了功利，只留下了假大空的话语系统，以及这个假话系统的物质体现形态——铺天盖地的假冒伪劣产品。

陈英老人在1949年前受到的教育已经后继无人。什么叫“竹子有节不能卖”？“气节”是个什么东西？

在“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滚滚热浪中，“有节的竹子”枯萎凋零。

陈英老人已经76岁了，在他走向命定的归宿之后，“竹子有节不能卖”这个祖传的家产，会不会从此失传？

# 从“洋买办”到“6835”

汤儒君

1957年重庆工农速成中学总务干部

1926年生



我这条命是捡来的，活到今天算我命大。

我出身在一个富豪之家，解放前家大业大，有房产，有工厂，有土地，现在朝天门街道办事处那幢房子以前就是我家的私产。1947年我在东北财经学院（抗战时迁到重庆市中区，现外科医院）工商管理系毕业后，在南岸西湖中学当过教师，管理过我家在唐家沱和市中区的工厂。

那是我一生中最风光的时期。大学毕业，银子大大的有，头发梳得油亮，西装穿得笔挺，皮鞋是专门定做，连拴狗的链子都是银子做的。

唯一不顺心的是家里给我包办的婚姻。我去相亲，一眼看见一个漂漂亮亮的姑娘，我心中大喜，正要眉来眼去，家里人说，错了，错了，不是她，是她妹妹，旁边那个。我定睛一看，哇，我的妈，一个十五、六岁的黄毛丫头，还没长成熟。我不干，想要她姐姐。一打听，漂亮姐姐已经嫁人了！我这个人性子烈，在学校就爱打架，想逼我成亲，没门！我一气之下逃到湖南，在那儿打了一大架。你看我左下颚这条伤疤就是那时留下的。

解放后，我家的所有财产被收缴得干干净净。记得退押时我父亲叫人挑了满满两担票子清退。多的干脆不要了，全部上交。我父亲这个人一辈子仗义疏财，交得起租就交，交不起就拉倒，从来不逼。所以，解放后虽然被划作“工商业兼地主”的成份，但那些租户都不恨他，更没有人起来斗他打他。再加上父亲干脆，所有财产你共产党全拿去，竹筒倒豆子，一点不剩。这可能是父亲没挨什么整的原因。

刚解放时，一位在大西南广告社当社长的朋友买了一所学校，请我去当教务长。没多久学校被收为国有，把我安排到位于小泉的“革命大学”学习。在那儿读了四个月报纸，就算毕业，分配我到四公里的工农速成中学搞总务。

我犯了一个错误，把旧社会的一些习惯带到了新社会。一是我口无遮拦，喜欢提意见，而且还要幽默，搞点笑。二是我注重服饰仪表，一向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针对这两点，学校的人给我取了两个外号：“汤大炮”和“洋买办”。

但是，学校又离不开我。我口齿伶俐，善长交际，精通财务，无论是对内管理，还是对外交往都是一把好手。所以，虽然“大炮”、“买办”惹人嫌，但在1957年大运动到来前，我还是相安无事。

反右时，学校党支部书记刘炎本来不想打右派，他对市委说，我们学校都是工农学员，没右派。市里批评他，说全国都反右，工农速成中学怎么会没有右派。市里就把刘炎和

校团支部书记暗定为右派。刘炎见势不妙，赶紧抓。第一个被抓出来的是学校的出纳李华伟，他没有任何言论，只因为解放前在罗广文部队当过司务长，所以挨了头刀。接着抓会计刘景向，还抓了一个学生会主席。我是最后一个。

说来算我运气不好，也怪我头脑发热。当时党号召提意见，要我争取入党。我想入党，当然就要表现，要积极。我冲书记放了一炮，说他不顾工作，跑去给娃儿买结婚礼物。这一下惹翻了书记，本来学校划右派已经结束，我这一炮惹火烧身，书记立马把我补了进去。

那个时候只要把人一点名，抓出来就是一阵狂轰乱“打”——“打”不是文革那种打，而是拍桌子，呼口号，骂，贴大字报。谁吼得越凶，斗得越狠，揭发越多，谁就是争取进步的积极分子，就能入党、升官。当年揭发我最积极的一个工人后来一路升迁，竟然当了一个学校的校长。

给我定了两条罪：一、攻击人民电影——在一次放电影时我当众放了一炮：“现在的电影艺术性的东西少，政治性的东西多”。二、攻击粮食政策——我看见打饭时人们争先恐后往食堂跑，顺口说了一句：“呸，粮食不够吃了吗？”

但是没有宣布我是右派，只是一切待遇与右派相同。教育系统的“分子”下放到南桐矿区，带队的是我们学校的总务主任江渭滨。在南桐，由于饥饿和强劳动，教师们一个接一个倒。我亲眼看见一个老师从山坡上回来，走着走着——头栽下去断了气。还有一个人，名字我忘了，我看他耳朵慢慢变干了，我问他怎么回事，没想到第三天他就咽了气。

队长江渭滨沉不住气了，他从180多人中选了50多名进行救治，最虚弱的送回重庆治疗（其中包括你采访过的张元任）。重庆市教育局知道这事后把江渭滨找去一顿臭骂：“才死这么点人就把你吓倒了？！这些都是些坏分子，死有余辜！赶快把这些人弄回去！”

江渭滨不敢违抗，立马通知返回。这一整，又活活整死了些人。

1960年，由于南桐死人太多，教育系统的“分子”全体转移到长寿湖。我在长寿湖那几年还没吃过大亏，江渭滨照顾我，让我到伙食团煮饭。

我要是一直呆在长寿湖就好了。可惜，不！可恨，1963年市教育局把我们全体辞职，清除出教育系统，我被放回原籍——江北农村。我不干，市教育局来了一个干部，逼得我签字。莫法，我领了200多元辞职费，成了农民。

我没有家，回到农村——江北东方红人民公社三大队，一无所有。不仅没有房子，连床都没有，只得同一个侄子挤着睡。因为是“分子”，队里整我，全劳力一天10个工分，我只拿8分，年终结算只发我70%，剩余部分当成是“五类分子”对国家的义务。我一天做到黑，不够吃饭。

还有政治上的歧视，人格上的侮辱，分分秒秒压迫你。他们强迫我在胸前戴一个牌子，上面注明“黑五类”三个字。一个小孩子都可以叫我站住，向我扔石头。我去看电影，不准我进门。去买东西，人们不同我站在一起，像躲传染病。一次，我的公债券到期（那也是强迫我买的），我去银行取。那位职员把钱数好了，正要递给我，一眼看见我胸前的牌子，马上把手缩回去，说“分子”不能取。眼睁睁看到我的90块钱——那在当时是个大数目——又被放回去。后来我托一个人去取，他取后再也没给我。不是怪我老实，不敢把牌子取下来，万一熟人看见，汇报上去肯定是一顿暴打。

其实，我还是没逃脱那顿暴打。

文革时，我那破破烂烂的家被反反复复抄了三次，什么都没有，他们不甘心，总想搞点成果出来，便拿我的私人信件做文章。

我在长寿湖认识了一个华侨学生张志荣，我同他有信件往来。但我们说好，只谈生活不谈政治。嗨，要整人，白开水都可以毒死人。他们从张志荣给我的信件中找到这么几句话：“这几天生活有改善，今天中午我们吃了黄瓜炒花生米，很好吃。今后有钱了，冰糖蒸肘子，好吃得很”。不晓得那些人是咋搞的，一口咬定这是暗语，是我要同张志荣投敌叛国的暗语。

他们把我抓到大队部，用麻袋把我头罩起，吊我一个鸭儿凫水，操起扁担噼噼啪啪一阵乱打，我受不了，嚎叫，连连说：“我承认，我承认。”他们把我放下来，我一喘过劲，马上翻供。又吊上去，又是一阵噼噼啪啪。我又承认，又放下来。如此反复三次，从下午4点一直吊打到晚上6点，我终于挺不住，昏死过去。

他们用扁担戳，我一点反应都没有。他们认定我死了，叫两个红卫兵晚上10点钟把我拖出去埋了。为啥当时不埋？可能有点心虚，想等天黑。我命不该绝，那天晚上8点，长安厂搞武斗，两派之间打得也是噼噼啪啪。两个红卫兵忍不住跑出去看，这一去去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早上，两个红卫兵回来打开门，一看，咦，死人怎么翻了个身？我原来是脸朝下趴在地上。他们再仔细一看，我眼睛虽然紧闭，但鼻孔还有一丝气。

活人不能埋，他们把我侄儿找来，用一架板车把我拖回生产队。

我不知那天晚上长安厂武斗打死人没有，反正我是因为那晚上的武斗才捡了一条命。

几个月之后，我被抓到江北华新街看守所，在那儿我见到了张志荣，他也因为那句“暗语”被抓进来。

1968年3月5号，公判大会上宣判：汤儒君，现行反革命，十五年徒刑。

五花大绑游街示众之后，我被押到永川一个劳改农场服刑。

囚犯不叫名字，只叫号码，我的号码是6835——我被判刑的日子。这个号码一叫就叫了十几年。所以，解放后我有好多个“绰号”：汤大炮、洋买卖、右派分子、黑五类、现行反革命、6835。

监牢里收拾人又有一套办法，其中绳索捆绑是一绝。那绳子不长，大约两米，中间打个扣，从脖子上捆下来，双手反剪后死命往上提，提得犯人杀猪般叫。捆好后往地上一扔，几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不理不睬。说来你不相信，一些犯人就on这样被捆死了。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一个犯人，被捆翻在地上后，用头咚咚咚死劲撞篮球架，想撞死。还有一个高中生囚犯，学习时说了一句：“读毛主席著作，我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还了得？！那时，“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高中生被暴打一顿，接着把他捆翻在地。我亲眼看见，一上绳之后，他脸色就大变，口中直吐白沫。可想那种捆绑的利害！

（2003年9月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捆绑——恐怖年代的回忆》，其中有这么一段描写：

最常见的捆绑招式据说是从苏联学来的“俄罗斯绑缚法”，此法是将二、三米长



的绳索在中间打一个结，预留一个绳扣，然后将绳扣置于受虐者后颈下，再从左右两边分别缠绕双臂至腕部，将双手反剪交合，两端绳索合一，再将绳头向上穿过后颈预留的绳扣，将反剪的双手拼命向绳扣靠近。此法伤害极大，有时可立即致人手骨脱臼，大约是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的时候，这种残忍的“俄罗斯绑缚法”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起传到中国的。一到中国，这种方法便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得到了普遍运用。

我曾无数次日睹打手们捆人的场面。他们一般都是先脱掉受虐者的厚衣服，从后面将其轰然一声猛推在地——他们称为“狗啃屎”，用麻绳一圈一圈地将受虐者手臂捆紧，双手反剪，从地上拉起来，用膝盖抵住受虐者的腰部，再使劲将反剪的双手往上提，有经验的打手会将绳子反扛到自己肩上，猛一使劲，让受虐者双脚悬空，从而使绳索迅速上收，受虐者无一例外都要发出杀猪般的惨叫声。

捆绑成一团的人血液不能流动，一会儿就脸色苍白，全身沁出一层白蒙蒙的细汗，打手们把这种汗称为“白毛汗”，这是痛到极致的一种生理反应，如果能将人捆出“白毛汗”，就证明这个打手捆人技术已经到家了。

原载 [www.secrechina.com](http://www.secrechina.com) 【看中国报道】2003年9月21日，后得知，该文作者竟是我的好朋友陈仁德。）

还有关小号石头禁闭室。那禁闭室终日不见阳光，只有一个小小的门洞，犯人在里面站不起身，只能蹲坐，时间一久，不死也得疯。有一个少年犯逃跑，抓回来后关在那个禁闭室，不知关了多少天，打开门时已经是一具尸体。

（笔者按：被割断喉咙的张志新也蹲过这种小号禁闭室，她的神志就是在那种禁闭室里错乱的。我因采写长寿湖被抓进看守所后，我那间囚室的铁窗，正对着一间小号禁闭室，我听见里面传出声声惨叫，那种恐怖，终生难忘。）

我在进牢前已经吃过各种苦头，学乖了，晓得绝不能乱说乱动，只能千方百计讨好当官的。我服服贴贴，察言观色，监管人员很快就对我有了好感。我有文化，算里面的“高级知识分子”，所以，叫我担任学习记录。后来，又让我负责煮饭——这绝对是个美差，无论是在长寿湖还是在永川都如此。我利用煮饭的“权力”，巴结指导员。指导员生了七个女儿，非要生个儿子，第八个如愿以偿。但这样一来弄得他家吃饭的人口太多。我嘛，在厨房里干活，当然懂得投其所需。嘿，到后来，我在永川劳改队过得比在江北农村还好，其他犯人还得看我的脸色！

12年过去了，1980年，上面来了政策，我被提前释放。我回到重庆，无家无业，原来的工农速成校早就撤销了，我只好去找教育局。教育局落实政策办公室一个姓马的人不理不睬，既不安排住处，也不给饭吃，他说，你从哪儿来，回哪儿去。我没法，只好又回劳改队。劳改队的人比教育局的人热情，安排我住招待所，给饭吃。但他们说，我们不能留你，留你是违反政策，你最好还是回去。他们给我出了一个手续，让我拿着再去找教育局。

这次教育局总算开恩，把我安排到教育学院。

1980年是我人生的转折点。一、出了狱；二、有了个单位；三、结了婚。

我妻子王富琴的前夫因病去世，她有两个孩子，我一结婚就当爸爸。当然，我年龄

不小了，那一年我已经 54 岁。

妻子和两个孩子对我都很好，1992 年我遇车祸，昏迷 40 多天，妻子和孩子日夜守护，没有他们，我肯定活不下来。

**王富琴：**老汤这个人性格非常开朗，淡泊名利，所以他能活下来。

**汤儒君：**回想这一辈子，比起那些一个个死去的人，我算幸运的，因为，我活下来了。

采访时间：2001 年 11 月 20 日，地 点：重庆 XXXX 研究所东楼

## 采访后记

汤先生头上那一堆“绰号”，好像很有“学术”价值。从“洋买卖”到“6835”，每一个“绰号”下面都是值得挖掘的“新中国特产”。

一个鲜鲜活活的人，从一个“绰号”到另一个“绰号”，层层递进，待步入“6835”岁月，当年性子刚烈、幽默潇洒、敢逃婚、爱打架的汤儒君消失不见了，换成几个阿拉伯符号，符号的后面，一个跪着的灵魂，手握饭勺……

在“非人化”社会中，灵魂的长跪，是不是“活下来”的前提？

毛泽东头上也有一堆“绰号”：从“舵手”到“统帅”，从“大救星”到“红太阳”，每一个“绰号”也都是新中国的特产，挖下去，一定是一长串森森白骨。

“红太阳”是非人，“6835”也是非人，前者升天变作神，后者入狱成为鬼（牛鬼蛇神）。

神的威力雷霆万钧，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亿万芸芸小民，按照“神”的“最高指示”，一次又一次地以 5%、10% 的比例变作“牛鬼蛇神”。

“红太阳”坠落了，水晶棺材还在；“6835”取消了，捆人绳索尚存。非人化的“人肉宴席”，神光点点，鬼气森森，腥味正浓！



“中国人民，我站起来了！”

# “铁马冰河入梦来”

常青

1957年重庆市第七中学地理教师

1932年生



我1954年毕业于广州华南师范学院，1957年在重庆七中教书。那年底，上面组织我们学习，其中谈到学校的中心工作。他们说，应当以政治为中心。我说，应当以教学为中心。我们争了起来。当时，我除了地理专业外，还读了很多教育学方面的书，我把一些理论书籍一一摊在桌子上，引经据典地同他们争辩。他们搬出毛主席的话驳我：“学校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思想”。我仍然不服，说，那是毛主席在抗大说的话，那是战争期间，现在是和平建设时期，学校就要以教学为中心，就像工厂要以生产为中心。

这次争辩，改变了我的一生。

他们组织了三个学校的人来斗争我，说我反党、反人民、反新中国，是典型右派等等。那种态度非常横蛮，像街上的无赖。现在的孩子看到红卫兵的行动，觉得不可思议，其实反右时也是一样。共产党在国民党社会里，理直气壮，敢说敢骂，有文化的人哪个不佩服。可是当权后，就一点不讲道理，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用莫须有的罪名把你打倒，又绝不让你申辩。什么是道理和真理，“强权就是真理”！这句名言，1957年我真正体会到了。可是知识分子受不得冤枉，不是强盗，说我是强盗我就不服。我想，我同你们讲不通道理，我去找市领导任白戈，我相信共产党的话“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现在想起来当然很幼稚。接待我的正好是我的一个亲戚。我很激动，说着说着竟哭了起来。我亲戚话没听完，吓得赶快躲开，就像我有瘟疫。那个年代你不懂，他要是同情我也要遭殃。

1958年1月1、2号，我永远记得，那两天重庆下大雪，特别冷，我准备死，方法是撞车，“砰”的一声，送他们一个新年礼物，士可杀，不可辱。

是我妻子救了我，是她的一句话：“娃儿不能没有爸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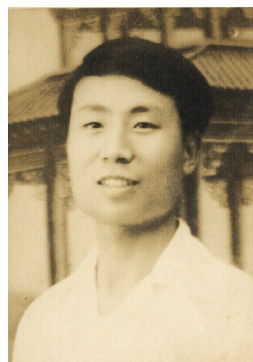
1958年1月，我女儿刚刚满月，我结婚（妻子是涪陵一所小学的教师）正好一周年。

一年多后，她带着女儿到南桐农村来看我。我在南桐两河公社和平大队一个最高的山上劳动改造。我心中有怨气、委屈，在她面前说了抱怨的话。她很着急，说我仍然是这个态度怎么改造得好，怎么能够“摘帽”。说到“帽子”，共产党是太聪明了。这个“帽子”不是判刑，但戴上“帽子”就把你当坏人、当囚徒对待，而且没有时间限制，没有刑期，十年？二十年？

我见妻子都不理解我、安慰我，心里就来了气。心想，你也要认为我抱怨是对党不满，我们就没有什么说的了。送她母女俩回城时，我很冷淡，绝望中，还伸手打了女儿一巴掌。

现在我当然理解她了！她是个共青团员，积极、进步，对党热爱。我出了事，她着

急，抬不起头，政治上、经济上压力大。我那时二十多岁，血气方刚……我们离了婚。但是我心中一直挂念她们母女俩。1961年，我在长寿湖快饿死时（那时，我虚弱到极点，每天晚上睡下去，都不知道第二天还能否醒来），给她和女儿写了一封遗书，告诉她，我不行了，离死不远了，嘱托她好好把孩子养大。人的本能是爱下一代的，这也叫人性吧。人之将死，最怀念他的亲人。我见不到她们母女，只能留一封信。



常青 1954 年毕业任教

我当右派后，还有件事让我非常悲愤。我母亲同我住在学校，我一离开学校，学校马上把她赶出去，收回住房。母亲没有工作，没有经济来源，借住到别人家，天天为我伤心，几个月后就心脏病发病死了，死在重庆南纪门，才 50 多岁。他们不告诉我，说不要影响我劳动改造。我得知后气得发抖。我一生坚守八个字：孝亲、尊师、爱国、守纪。首先就是“孝”，母亲去世，居然阻止儿子去尽最后的孝道！！共产党所讲的革命的人道主义，只是宣讲或者印在书本、报刊上，实际生活中是不存在的。要说什么人权，在共产党人的脑子里就更不存在了。

1960 年，我们转到长寿湖，说是长寿湖吃得饱饭。我被分配到飞龙，有二十人左右，其中有两个女的，一个叫钟树琴，另一个名字想不起来了。粮食每月 21 斤，要我们响应党的号召——节约，又扣去两斤，只剩 19 斤，这点粮食莫说劳动，光耍也饿得慌，我的体重从 120 斤一下减到 80 斤，像骷髅。最心痛的是眼睁睁看着把粮食往湖里倒。我们播种胡豆，上面下命令每人每天必须播种多少斤，播种不完的不敢带回去（要挨斗），更不敢私自吃“国家财产”，当组长的便把播不完的胡豆统统倒进湖里。那个年代，既荒唐又残忍。我们最怕阶级斗争，右派是阶级敌人，一切都要专政呀。

我还是没有躲过。

1961 年底，我因为“逃跑”，被公安抓捕了。

起因是这样的。有一天，我地还没挖完就到了开饭的时间，我很老实，回来就说：“没挖完，我吃了再去。”结果厨房只给了我一两饭（本该给二两）。我苦苦哀求，几个流浪儿（长寿湖是个汇纳各种“杂质”的湖，社会上收容的流浪儿也送到这儿。这些流浪儿比右派地位高，打骂右派是常事）冲上来狠狠一拳把我打倒在地，我皮肉受伤不重，但心头受不了。我一言不发，第二天天不亮卷起一包衣服就开溜。我往珍溪镇赶，想从那儿乘船去看我女儿，我对她日思夜想。不料走到半路就被民兵挡住了，民兵把我弄到派出所，派出所把我那包衣服扣了，要我回农场办证明来取。

这件事给我定了一个“逃跑”罪，也是“反改造”，斗我一通之后，送我到新滩去劳动。当年评审，我因“反改造”被公安押送劳动教养。一起被抓的还有两个“表现不好”的右派，其中一个是我同事董守中老师的爸爸。他们俩是逮捕判刑，路上用绳子捆着，吃饭由我喂他们。

押回重庆，路过储奇门时，我眼泪哗哗淌下来，我女儿王 XX 就寄养在储奇门她外婆家。女儿不跟我姓，跟她妈姓，她妈一直不让她知道有我这个爸爸，怕影响她的前途。我落难，她是我唯一的亲人，特别想念。押送我的公安见我掉泪，到了转运站后，对接收人员说：

该犯思想上有情绪……

在转运站，听说要挑一些犯人去修铁路，他们见我瘦得像木棍，不要。我一再恳求，终于同意。不料我走到半路上就因身体虚弱栽倒在地。我醒来生怕不要我，急忙说，主要是没吃饱，只要吃上43斤，我肯定是强劳力！

后来的事实证明也是如此。一吃饱饭，我力气大增，反过来，为了吃这43斤，我拼命干，很快我就可以抬7袋水泥，100斤一袋！我还当了班长，当时当班长必须劳力超过班里所有人。我们那个劳改队里，很多人都有知识，有文化，这些人一旦又有了大力气，劳动效率就很高，质量也好。省委书记李井泉就比较赏识我们。因为“聪明+劳力=很好的生产力”。

我这一干，就在劳改队和劳改农场干了17年，一直干到1978年。其中值得说的是我在“改正”前一年又结了婚。

当时，我在离西昌80公里的一个劳改农场，由于我学会了理发，所以不下矿井（煤矿），天天给人理发。这个手艺活我很珍惜。当时想，这辈子能一直让我理发就太幸福了。所以，我对人态度很好，服务非常热情周到。有一个工人对我印象很好，他回家探亲（在重庆江北农村）时，对他表妹说到我。当时她已经三十多岁，属于大龄未婚。

他表妹对我有了兴趣，表示愿意来见个面。我不抱希望，以前别人也介绍过几个，但一听我的身份，扭头就走了。

“表妹”来了，她见到我们这儿这么偏僻，心里发凉，到农场门口，得知这是个劳改农场，站住不动，不愿进来。不过后来还是进来了。

我当时住一个单间，是当理发匠的优惠。她住到我的单人间，我没指望有好结果。还为她准备了50元钱，重庆到我们农场单边走路费24元，往返48元，还有2元她回去时路上吃饭。

当天晚上，农场的人很兴奋，纷纷涌到我房间来看她。夜深了，大伙离去，我也起身准备离开。突然，她抓住了我的手。接下来的情景同电影《牧马人》的那一幕一模一样，她说：“我看你这个人老实。”……

我们在1977年除夕之夜结了婚，到这时，我已经过了19年的单身汉生活，从25岁到44岁。

三个月婚期过了，农场要她离开。这个时候，她已经非常爱我，分别时，她一把抱住我，说离不开我。那次拥抱，一个女人的拥抱，让我刻骨铭心。

一年之后，我获得“改正”，回到重庆，我又有了一个儿子。这个时候我前妻找到我，希望同我复婚。说实话，我对她仍然有感情，她有文化，那些年她也吃了不少苦，独自把女儿养大。不过她也结了婚，丈夫是农村一个煤矿的会计，又有了一个孩子。我对她说，我们复婚，要扯散两个家庭……

如今又是二十多年过去了，越过越觉得苦闷、孤独。我不愿呆在家里，想出去干活。但现在年龄大了，身体也不是很好。我只有从书中找慰藉。我一辈子酷爱读书，在劳改队只准读毛主席的书，我把他的书全读完了，把他的诗词全背了下来。每天收工回来，要读一首毛泽东诗词才上床睡觉。那些年没钱，我曾经用衣服去同别人换书。文革时，把我的鲁迅的书抄走了，我心痛得睡不着觉。

看电视，我爱看关于海峡两岸、时事政治方面的内容。我们这种知识分子，有很强的爱国情结。我特别欣赏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为祸福避趋之”。可惜妻子不理解，彼此文化差异太大……

我也不时想起前妻，想起她提出复婚……

我现在最想做的事是写一本有关孔子论教育方面的书，算是给我这辈子划个句号。不知你出版社有没有熟人，如果要我出钱包销，我就没办法了。妻子从农村出来，没经济来源，我退休金少，病都看不起。

最近我常常背诵陆游的诗作《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从中获得一种感召，也算慰藉吧。

“僵卧孤村不自哀，  
尚思为国戍轮台。  
夜阑卧听风吹雨，  
铁马冰河入梦来。”



常青，1992年

采访时间：2003年6月18日，地点：重庆市清华中学

### 采访后记

2003年6月18日，我偷偷摸摸来到位于清华中学的常青老师家。

说“偷偷摸摸”是因为我尚处于“取保候审”时期，担心有人“汇报”——谭松还在（又在）活动。

我不敢用家中电话，到街上用公用电话同他联系，然后立马出发，一口气赶到位于郊外的清华中学。

常青老师由于住得偏远，又同其他右派少有往来，竟然还不知道我被抓的事。去年8月，我刚放出来不久，他打来电话，热情邀请我去采访，我吱吱唔唔，不敢作答。

但我心里一直挂着他，总觉得欠了他。

从去年6月13日采访冉德瑜到今年6月18日采访常青，整整一年过去了，我没有采访一个右派；其间，又有一些“57分子”与世长辞。这使我想到，共产党其实用不着抓人，只要让我不敢动弹，岁月会迅速把这些老人一个又一个地“淘汰”（或者说帮共产党“杀人灭口”）。再过个七、八年，“老右”们人去楼空，我党的那一段血腥罪恶，死无对证了。

常青老人一心希望那段历史真实地保存下来，他说他要尽力帮我。果然，他不时打来电话，说给我找到一些资料，让我去拿。于是我在三个月内，三次登他家门，从他那儿拿来了右派李才义写的《天府悲歌》、右派绿石写的《左右春秋》等等。

我希望接到他的电话，但又害怕他在电话上“乱说”。我一直没告诉他我的电话“不安全”，他要是知道了实情，会不会像其他很多右派一样，因担心（恐惧）而退缩呢？

## 吃人的“黄狼将军”

刘淑明

1957年重庆市巴蜀中学生物学教师

1923年生



我这个“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同抗日战争有关。

我是河南西平县人，1939年下半年时，我正读初三，日寇大举入侵激发了我们强烈的爱国热情，学校一些教师慷慨激昂，给我们影响很大。还有，我家住了一些逃难来的亲戚，他们讲起日寇的暴行，我恨得咬牙，于是下定决心，不读书了，我身体好，我要参军！

我们几个女同学，离开学校，加入了国民党的一个训练班，当时，我们不知道这个训练班是做什么的。

在郑州，日机来轰炸，我们去救护，唉呀，那个鲜血、尸体！我们几个女孩吓坏了。后来训练班往长沙迁移路过西平，我的两个西平老乡下车回家，不干了。但我留了下来。

在湖南呆了好几个月，又转到重庆，我在训练班里搞无线电通信，这时我已经知道我加入的是戴笠办的一个特务机构。戴笠很霸气，记得有一次一个叫张铨的人犯了一点小错，戴笠冲着他一拳打脚踢，我十分反感。我们搞通信的主要都是些女孩子，其中有一个叫丁绘，她是北大来的学生，是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丁肇中的姑姑。她比我大，比我成熟，她对这个训练班非常不满，想走，不久她就找关系离开了。我也想去，但不敢，私自逃走抓住要杀头。后来有一个叫刘宁台（音）的年轻人表示愿意帮助我，他说，他老家在丰都，在当地很有些势力，乡下也有房子，我可以去躲躲。就这样，我悄悄逃到了丰都，隐姓埋名在他家住了一年。说隐姓埋名不确切，我把名字都改了，我原本姓赵，他家姓刘，家中有一个女孩叫刘淑君，我于是改为刘淑明。

躲了一年后，我考入丰都高家镇的一所中学读高中，在那儿，一位中央大学毕业的教师爱上了我，他叫陈祚璜，后来成了我丈夫。

1946年，我考入重庆大学医学院，一直读到1949年。

解放之后，我主动向组织交待了加入训练班那段历史，组织上给我的结论是“不作为历史反革命”。我于是安安心心教书。

1957年，老陈（在教师进修学院任教务主任）被整成了右派，下放到南桐矿区最苦的一个地方两河口农村劳动改造。1958年，我所在的41中（即著名的巴蜀中学）突然把我们有“历史问题”的教师下放农村。我当时有四个小孩，最大的11岁，最小的才4岁，我们全家五口一起下放，几个孩子还不懂事，一路上兴高采烈，一遍又遍地高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

下车后要走20多里山路，我一会抱6岁的女儿，一会抱4岁的小儿子，还背一包行李，

走得非常吃力。押送我们的那个工人，是我们学校的校工，我永远记得他，空着两手不但不帮我一把，反而一路走一路骂，那个话难听得很，什么“你们一家坏透了烂透了，头上生疮，脚底流脓...”等等。他后来得癌症死了。

当天晚上，我们睡在农民家，床边放着两口大棺材，孩子们怕得不得了，一声声叫：“妈妈，妈妈，怕呀怕呀。”我把两个小的抱到床上同我挤在一起，对两个大的说：“那是空的，没装过死人，不要怕。”

在南桐农村劳动的老陈陡然见到我们，一下子呆了，那个地方，贫穷落后，娃儿生活、读书怎么办？

紧接着就是饥荒年，就是不断饿死人。老陈亲自抬、埋了六个右派。其中有一个求精中学（市6中）的教师，名字记不得了，他饿得奄奄一息，家里给他寄来一包饼干，他抓起猛吃，吃到一半就断了气。他个子高大，棺材装不下，只得硬往里压，看上去惨不忍睹。

1960年，上面把我们转到长寿湖，说长寿湖吃得饱。我和四个孩子到了长寿湖园艺队，老陈没去，他后来转到南开中学，干抬石头的体力活。

我小儿子陈晓光差一点在长寿湖送了命。那是1961年，他在邻封读小学，老师反应说他逃学。我很生气，我们知识分子，虽然落难，但把子女读书受教育看得很重。我考他生字，果然不认得，一气之下我打了他一巴掌。过两天，我发现他头肿了，身上也肿了，原来，由于吃不饱，他已经得了水肿。初步检查，他心肺已有积水，医生说，必须送重庆抢救，否则有生命危险。我慌了，赶紧送他到重庆儿科医院，他整整在医院躺了一年多才康复，我们付不起医药费，带着他一走了之，从此他留在父亲身边。后来，我被调进岛子里，生活实在困难，被迫把女儿送到湖南亲戚家，我们一个家搞得四分五裂。

说到小儿子，说到四分五裂，我给你讲一个“分子”的故事。他叫尹从华，是教师进修学院的“历反”。1963年，我们在长寿湖王家坡劳动，尹从华是我们的小组长。那年小春丰收，大家很高兴，一天收工后聚集起来吃顿丰收饭。饭间，我们一时兴起，决定每人唱支歌。我唱了首《三只小鸡》，歌词是：

“（小鸡唱）：春天到，天气好，黄莺歌唱在树梢，多快乐，多逍遥。

（黄鼠狼唱）：小白鸡呀小白鸡，你认识我吗？我是一个黄狼将军，我来捉你当点心。

（小鸡唱）：黄狼将军呀黄狼将军，请你饶了我的小生命。我的年龄小，我的身子轻，不要把我当点心。

（黄鼠狼唱）：不能！不能！不能！不能！我要结果你的小生命，还要把你们一个一个吃干净！”

尹从华唱了首《燕双飞》，记得有两句歌词：“画栏人静晚风吹，去年门下燕双飞。”

这件事被汇报上去，上面把它当作一个政治事件来追查。唱那些歌是什么目的、什么用心？尹从华被勒令写检查，写了一篇又一篇，总过不了关。这个时候，正是他两个儿子小学放暑假来长寿湖陪爸爸的时期，儿子闹着要爸爸陪他们出去玩，尹从华不敢走，关在屋子里写检查。两个儿子见爸爸不动，便自个跑到湖边玩。不一会，大儿子尹学跑回来说，弟弟掉进湖里了。

我们赶紧跑到湖边，把尹新打捞上来，我是学医的，给他做人工呼吸，但是晚了！



他才5岁，就这样在长寿湖走到尽头。

上面见出了人命，这才停止了尹从华的检讨，给他假让他把大儿子送回去。

尹从华的妻子是市宽仁医院的护士长，她最爱这个小儿子。尹从华带着大儿子在朝天门下船时，妻子来接。“尹新呢？”妻子问。尹从华不敢说实话，骗她说，有人带他先回去了。

到家后，尹才把实情告诉她，他妻子一听，一头栽倒在地上，昏死过去。

她娘家的人得知消息后，又悲伤，又恼怒，他们觉得这一切不幸都是尹从华引起的，政治上、经济上，现在又赔上了儿子。

“离婚！”“离婚！”

就这样，尹从华被迫与妻子离了婚。离婚后，尹的妻子同重庆大学一个职工结了婚，但她对尹的感情很深，十多年后尹从华获得平反，她很想同尹复婚，但她丈夫坚决不同意，他们俩没能破镜重圆。

对了，尹新就埋在长寿湖王家坡。当时埋得不深，有一天，刘文秀（女，市总工会“历反”）看见他的骨头露出来了，不敢告诉尹从华，自个挖些土掩埋起来。

这件事对尹打击极大，一辈子抹不去。前几年他告诉我，他到大连，看到水，想起儿子，非常难过，赶紧掉头离去，不敢再看。

（笔者注：我一直想采访尹从华，但他一再拒绝。看来，往日的伤口太深，轻轻一触动便会流血。所以，他打定主意“闭门谢客”。）

当时，气势汹汹来追查，强迫尹从华写检查的是一个摘了帽、有了一点权的右派，叫XX，这人很“左”，尹新的死间接同他有关。上个月（2003年9月21号）聚会，他和尹都到了场，不知他们相见会有什么感想，反正我见到他心里很不是个滋味。

（笔者注：我见过XX，曾打电话向他核实几个右派的情况，他妻子接的电话，我听见他在一旁不耐烦地说：“这个人真讨厌！”这句话是我在整个采访期间听到的最不客气的一句话。）

我是1974年才回到重庆，老陈仍然在南开劳动，我们夫妻一个右派，一个“历反”，都抬不起头，但我们总算团聚了。老陈是一个非常有才华、又很正直的知识分子，最宝贵的20年，他是在挖地、抬石头的“劳动改造”中渡过的。他去世前，把我们一家的遭遇写成了一本书，取名《受困记》，我们自己把它打印出来，很多朋友都要，现在只剩一、两本了。

（注：陈淑明送我了一本《受困记》，但该书在第二年（2002年7月2日抄家时被重庆市国安局收缴）



2004年5月16日尹从华参加长寿湖右派聚会，他又一次拒绝了  
我的采访请求。



可是，他在聚会上发出压抑不住的声音。  
（谭松摄）

采访时间 2001年4月、2003年10月27日，地点：重庆市南岸区

# 不批斗右派丈夫的代价

杨和钰

1957年西南政法学院教师，

1934年生



西南政法学院的教师黄涛和妻子杨和钰双双被打成右派，一个下放长寿湖，一个下放缙云山劳动改造。

我出生在成都，是独生女，父亲曾在四川省财政厅工作。1948年我高中毕业时，父亲被裁员，失业了。家里生活困难，我只得到小学去教书，在青羊宫小学。没多久，解放军就来了，我们教师被集中起来办了个教师讲习会，我就在那儿加入了共青团。

1953年，成都市教育局为培养人才，让我们去考大学，我本来是要考四川大学中文系，但却被西南政法学院录取了，西政也是那一年才创办。我在西政读了两年毕业（当时专科只读两年）。我是全校两个全优生之一，另一个叫郭庆新（音），他分到重庆大学，后来也当了右派。

我因成绩好，留校当了助教。当时，苏联专家在北京政法学院办了一个两年制的研究生班，学校保送我到那儿学习，于是我又到北京学了两年，学的民事诉讼法。

我毕业时正是1957年，北京先开始整风，团支部叫我们提意见。我对共产党没得意见，但团员要响应党的号召，我就提了这样一条意见：有些社会活动不一定非要研究生或党团员学生去，其他学生也可以去，比如到机场欢迎来访的外宾呀等等。我就提了这么一条意见。



杨和钰（第二排右一）参加广汉县土改工作队

反右时给我的结论是很好的，什么“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等等，好得很。

我回到西政，丈夫黄涛已经被划成右派了。我们是在1955年底结的婚，结婚还不到两年。

他为什么被划成右派？

我在学校算是比较优秀的，但黄涛在当时看来就是比较落后的，所谓落后，就是不关心政治。他喜欢的是唱歌、拉手风琴，体育锻炼，而政治上不要求上进。他中学没读完就去一个钱庄当店员，后来考入富江商学院学银行会计，解放后考取了财政学校。后

来西政需要体育教师，他就来到了西政。

我同他认识是在学校合唱团，他在合唱团当指挥，我们就这样相识相爱。但是，学校认为我们两不相配。校领导找我谈话，说我要求入党，很有培养前途。我优秀、先进，黄涛落后，怎么能同他相好？我不听，坚持同他结了婚。

我本不该给黄涛说这件事，黄涛得知后心里有些不舒服，于是对学校的一位医生说了这事。一年多后，反右运动来了，那位医生在鸣放时给学校提意见，说学校干涉教师的婚姻，违反了婚姻法。结果那医生因此被划成了右派，黄涛也跟着当了右派。

我从北京一回学校，就叫我揭发黄涛。我说，他从没给我说什么反党的话呀。还有，我从内心就觉得他不是个右派，他只是喜欢吹拉弹唱，单杠双杠。说他是“资产阶级右派”，他同资产阶级毫不相干；说知识分子，他也算不上什么知识分子。我怎么去揭发他嘛？

我揭发不出来，学校一个姓李的总务长（管体育）指点我说：你把桌子一拍，然后给他一耳光，大声说：“黄涛！你必须老实交待！你如不老实交待，我就要同你离婚！”这个总务长也是一番好意，想保护我。

我那时很年轻，怎么演得来那种戏？

于是，后来——1958年4月——学校突然把我也划成了右派。

这事给我打击很大，我一时转不过弯，我那些年受了满脑子革命教育，无限崇敬那些革命先烈，也无限热爱共产党，我怎么会反党？怎么突然一下子成了阶级敌人？！

我想不通，在绝望中，我把宿舍的电线剪断，把电线抓在手中，嗨，不知怎么的，像是没电，一点感觉都没有。我于是又跑到学校后面的一个水池（这个水池现在还在），跳了下去。那是四月初，我穿得还多，人又比较轻，一时没沉下去。我们教研室有一个老师叫崔成田（音），那段时间他们已经注意到我的情绪，崔老师见我匆匆向水池跑去，就跟了上来，他把我捞了起来，我又没死成。



夫妻双双被打成右派后留影



杨和钰（右二）在北京学习时

从此他们把我守着，门口坐着人。

我就不出门，不出去吃饭，以绝食抗争。那个时候，还是有不少好人，有一个资料员叫熊立华（音）悄悄给我买来馒头，劝我吃，还有我们教研室的王秉新（音）老师，晚上来劝我，还专门陪我出去吃饭。学校叫我干打扫卫生的活，我不干，趁他们不注意，我先跑到18中（那时黄涛已贬到18中），后又跑到南岸黄涛家里。学校派人在黄涛家找到我，把我劝回了学校。

没有开我的批斗会，因为我什么言论都没有。

1958年4月底，学校宣布了对我的处分，我只记得有几句，一是说我同黄涛划不清界线。二是说我态度不好。最后的结论是：“情节轻微、态度恶劣，送农村监督劳动。”

5月1号我们一卡车右派下放农村，车上主要是学生右派。

我们到北碚澄江乡下劳动，农民对我们很好，同情我们，还给我评了8个工分。但是我个子小，体力弱，一次担粪上坡，我一头摔下去，粪淋了我一身是小事，我额头磕在石梯上，里面骨头受了损伤，给我留下了后遗症，你看我现在的眉毛长得都有些怪样。

在农村，每个月发我8块钱，但自己只能领到一块钱，7块钱要作为伙食费。1960年转到市公安局办的缙云山农场，工资增加到18元。我每月寄10元给成都的父母，他们在帮我带女儿。

我在农村劳改，一直没有怀疑党，我以为是下面乱整，是政法学院乱整，如果毛主席知道这事，一定不会划我右派。那个时期，人单纯得很。

我说说那几年我的几个亲人。

我是家里的独生女，父母对我抱很大的期望，希望我这辈子事业有成，人生光彩。我原本发展得也很好，成绩优秀，又到北京政法学院读了研究生。可是，突如其来的灾难一下子把我打到农村，成了阶级敌人，父母很是受不了，尤其是母亲。她在1959年12月25号圣诞节的时候去世了。我当时好难过。

母亲去世后，父亲想来重庆投靠我，我有个难友本来答应让他住在她家里，（在中区枣子岚桷），可父亲来后她家里突然不干了。我都不知父亲是怎么走到澄江农场的，那时我已经转到缙云山农场了。我曾住过的那家农民对父亲很好，招待他吃了饭，还把他带到澄江街上租了间房子住下来。我们农场离澄江镇不远，父亲来看我，有时就在我这儿吃饭。我们农场每次蒸罐罐饭时，抓一把干包谷洒在米上，这就算是额外的“福利”，我爸爸来，吃了这一把包谷，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我只好不让他在我这儿吃饭。

1960年12月，元旦前几天的一个早上，突然有人来找我，说我爸爸死了。

我赶紧赶到澄江。

原来，头一天，是妈妈去世的周年，爸爸独自一人，怀念妈妈，十分苦闷。那天夜里他不停抽纸烟，后来睡着了，纸烟未灭，引燃了蚊帐。楼下的人听见楼上有翻滚的声音，跑上去破门而入，赶紧灭了火。父亲已经窒息了，那些人也没有急救的知识，加上父亲身体本生就虚弱，他就这样走了。

再说我的女儿，妈妈去世后，我想，父亲一个人怎么带女儿，她才三岁。我只得把她接回重庆，放在南岸弹子石黄涛父母家。黄涛的母亲是继母，她对孩子没那么上心，那时又是饥荒年，女儿吃不饱。我自己也饿得皮包骨，月经也停了，从1959年到1962年，我都没来月经。我觉得这样也好，少些麻烦，劳动时轻松一些。我帮不了女儿，去看看她都不容易。我一年只有春节的两天假才能去看她。记得那一年春节——就是我父亲去世后一个多月的那个春节——我去南岸看她。吃饭时我给她添了一点饭，她望着我说：“妈妈，下一次还是你给我添饭好吗？给我多添一点。”那一刻我好伤心，我知道她没吃饱，没人会给她添饭。可是，我第二天就要走——（杨和钰眼中闪烁着泪光）。对了，她还说，她要她的爷爷。我说，你爷爷已经死了。

就在那个春节，大概是元宵时，传来她的死讯，说她吃汤圆时噎死了。我得知这个消息，一下子发了急性胃炎……

其实，她不是噎死了，是她饿得肠子很细小，吃汤圆时，她多了吃点，造成了肠梗阻。

在短短的一年多内，我接连失去三位亲人。我一下子变了，把一切都看淡了。以前，我还满怀理想，要为社会作贡献；另外，也想有所作为回报父母。现在，我成了敌人，还贡献什么？父母都死了，还回报什么？当时，还有人去汇报，说我因为死了人，攻击三面红旗，对大跃进不满。



杨和钰与女儿

我已经完全无所谓了，再把我打成反革命，没关系！什么反革命、什么阶级敌人，通通无所谓了。

从此我想开了，所以，后来文革那些种种苦难我都能承受，而有些人就受不了。现在，我当然更无所谓了，8964学运期间，学生叫我参加游行，我毫不犹豫地加入，一路高呼口号……

采访时间：2012年1月13日，地点：西南政法大学

## 采访后记

一个偶然的原因，我在《长寿湖》一书已经出版后走进了杨和钰的家，采访了这一对夫妻右派。

杨和钰不是长寿湖右派，而是长寿湖右派黄涛的妻子。她当右派的原因，同长寿湖夫妻右派刘燕、罗成蓉一样，又是一曲千古绝唱——

——杨和钰为什么当右派，因为丈夫黄涛当了右派她无法揭发批判；黄涛为什么当右派？因为一位医生当了右派；医生为什么当右派？因为他提到学校干涉了黄涛和李和钰的婚姻自由。

那位医生的情况不知道（当时我忘了问），知道的是，黄涛夫妇为此走上漫长21年的劳改之路，为此家破人亡，九死一生。

我们的后代们读不读得懂这一幕天方夜谭般的“千古绝唱”？

整理杨和钰录音时，我正在讲一门新课——影视文学，我讲到“新中国”刚诞生时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我对学生说，如果你们交一份作业，老师觉得你做得不对，便发动全校批判你，并把你抓入监狱，甚至把你整死，你——

“嘻——”全班一片笑声，觉得我在讲“天方夜谭”。

我说，电影《武训传》就是电影界交的一份作业，伟大导师毛主席认为作业不对，便发动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大批判。在这个运动中，演员赵丹被迫一次次作检讨、导演孙瑜被批判，两人演艺生涯从此一蹶不振；武训家乡堂邑县的郝瑞琛，为武训辩护，被开

除公职，遣送还乡劳动改造；著名老报人李士钊因为赞扬过武训和影片《武训传》，横遭批判，被发配云南劳动改造；画《武训画传》的孙之隽竟因此遭难，后被逼致死……

接下来，我说，对文化界、知识界的整肃和打压在1951年还是小巫，全国范围的打压发生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你们知道那场运动吗？

除了个别学生知道一个名词，大多学生一无所知。这是我这几年教学中看到的一个普遍现象。

难怪当局要加强学校的言论控制、难怪当局要求教师“七不讲”（其中之一就是不准讲共产党的历史罪恶），原因之一是：那个罪恶实在是太荒谬太残暴太违反人类常情！

总之，实在是“太罪恶”！

“善欲使人知不是真善；恶唯恐人知必是大恶。”



惡意誹謗

充滿階級仇恨，滿臉杀气騰騰，  
手執大棒急先行，狂呼反蘇反共。  
忽然風掃烏雲，掀起反右鬥爭，  
對此凶狠勿寬容，理當嚴厲“回敬”。

1957年丑畫右派的漫畫（網絡圖片）

# 那件血衣，我保存了好几年

黄涛

1957年西南政法学院体育教师

1932年生，



刚才我老伴讲了我是如何被划成右派的，我就不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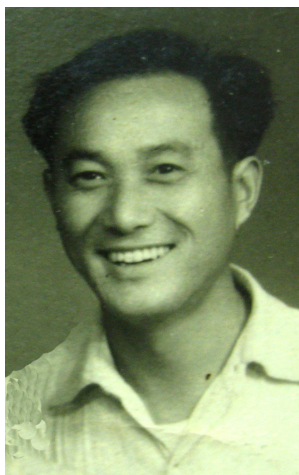
批斗我时，坐在我旁边的一个老师，拍着桌子吼叫，声音很大，我当时差点要跳起来揍他。学生们看不下去了，觉得不该这样整老师，于是又把我弄到大会上斗。还好，体育教研室的老师保护我，没有挨打。那个教政治经济学的老师李景（音）是挨了打。

批斗会上让我交待反党问题，我实在没有交待的，他们说，再不交待就要送去劳教。好嘛，我就准备去劳教了，我回家把铺盖准备好。但是，我没被送去劳教。

把我送去劳动改造时，他们对我说，我（右派）情节严重，但有悔改表现，下到农村劳动，对我改造有好处。就这样，我下放到了南桐农村劳动改造。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1958年4月27号。所有右派老师都在市中区凯旋路集中，乘车去农村。

在南桐和长寿湖艰苦的劳动我就不说了（我几次差点被石头砸死），我讲一件我在长寿湖挨打的事。

记得那是1972年，我们到狮子滩修堤坝，快过春节了，我给管我们的领导说，其他队都放回去了，是不是也让我们回（岛上）去，我们准备一下，春节好回去。他一声不吭。我没办法，转过身说了一句：“不像话。”这话被他听到了，他冲着我就是一拳。那一拳打得很重，我一下子冲动，还了他一耳光。这可就闯下祸了。



年轻时的黄涛

很快，来了两个年轻人，冲着我劈头盖脸一阵暴打，他们边打边把我押往供销科。供销科门口是张卖酒的桌子，他们叫我从桌子下钻过去。供销科的科长叫郭广（音），他说：“你敢打我们书记？！”他一说，那两个打手就劈头盖脸地打，那顿打把我耳朵打缺了，现在都是缺的，没有长好。他们边打还边叫：“你一个大右派！”

打完后我实在想不过，到场部去找军代表，但没有用。我只得保存那件血衣，我保存了好几年。

我从1958年4月27号下放劳动，到1979年4月份回来，整整21年。我回来后，组织部的一个干部问我：“老黄，你晓不晓得你档案里有些啥子东西？”我说：“我从下去到现在21年，根本不晓得里面有啥内容，给了我啥子处分和结论。”后来，支部书记给我看，说材料里有几条划我右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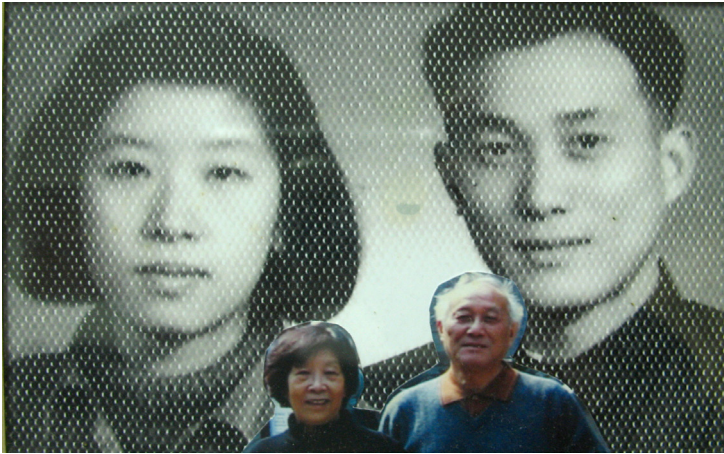
那顿打把我耳朵打缺了，  
现在都是缺的（谭松摄）

的罪行。我记得有“反对学校党委”、“企图篡夺教研室的领导权”等等。

我当时气惨了，忍不住破口大骂：“狗日的！只让他们去尝一天那种劳动改造的日子！”

采访时间：2012年1月13日

地点：西南政法大学



黄涛、杨和钰老两口将自己劫后余生的照片附在当年的结婚照下面



## 部分教师右派（或“历反”）简况

### 1、林振笃之死

林振笃——重庆 57 中语文教师，右派。

林振笃是个天主教徒，为人谦和，在长寿湖一向埋头劳动，不多言语。1967 年初，造反派进入飞龙岛，勒令右派们互相揭发、批斗，右派组长也不例外。

组长有极大的权力，甚至可以置其他右派于死地。平日里右派们对组长也是十分畏惧。

在一次批斗会上，造反派要林振笃发言揭发。一向沉默寡言的林终于说了一句话，大意是：我们的命运捏在学习班的主任、组长手里，可怕得很，他们就代表无产阶级专政。

造反派走之后，队长和组长组织了对林振笃猛烈的批斗。在恐惧中，林振笃穿上一件长大衣，把所有口袋装满石子（林游泳游得极好），在飞龙岛白雕堡投湖自尽。

（详见本书“1967 年，我两次在长寿湖见到父亲”一文）



沉默寡言的林振笃

### 2、王明范之死

王明范——体魄健壮，仪表堂堂，夫妻俩同在重庆市市中区石灰市旁的一所中学任教，他们无所它求，一心扑在教书育人上。两人志趣相投，家庭和谐幸福。王明范被打成右派送到南桐后，妻子经受不住打击，精神失常，因疏于照料，小儿子又夭折了。她抱着死去的儿子整整一个星期不肯松手，一直诬称她装病的学校领导只得把王明范叫回来，这才将孩子料理了。王明范后来也转到长寿湖，1963 年教育系统右派全部按退職处理，遣返原籍，王明范以他妻子的家属身份回到学校，靠在段上筛炭灰维生。

“文革”中，身患精神分裂的妻子被造反派拉出去批斗毒打致死，王明范悲恸欲绝，他变卖家产，东拼西凑，安顿了妻子的后事，接着他感染上肺结核，日夜咳嗽、咯血，身体整个垮了。为了活命，他继续去筛炭灰，经常晕倒在炭渣堆上。段上的老人都很怜悯他，但谁也没有能力帮助他，也不敢为他说句公道话。在又一次晕倒之后，王明范再也没起来。他大约去世于文革中期。

（王明范之死由陈英文字提供）

### 3、陈嘉行之死

陈嘉行——重庆工农师范速成学校带薪学员。1957 年，学校领导组织学员批判右派的反党言论。陈在看了那些“反党言论”后，私下说：“我看那些言论没得啥子”。有人将陈的话向上汇报，陈因“同情右派”而被划为右派。

陈嘉行当右派后，很悲观，曾对同校的右派冉德瑜说，他孤身一人，只有一个母亲，母子俩相依为命，他要有个三长两短，母亲怎么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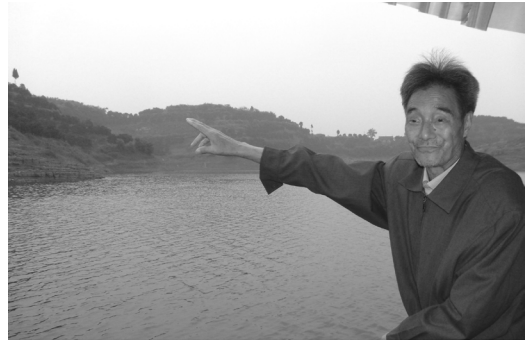
1961 年的一天，管教干部通知他（还有其他几个人）第二天把铺盖卷打好搬地方。

由于“把铺盖卷打好”往往意味着被抓进监狱，以前发生过这种事。陈嘉行感到极度恐惧。

在同心岛上有一个地方叫牛粪堡，那儿有一块岩石面对湖水，从石缝里歪歪拐拐长出一棵树，人称“歪脖子树”。陈当天深夜悄悄来到岩石上，将一根绳子拴在树杆上，另一头系在自己的脖子上，然后一蹬石壁，身子悬在夜空中。

第二天，“历反”李长文发现了陈的尸体，他探出身子，用手将陈勾回到岩石上。

陈死时约 26 岁，未婚。



陈嘉行就死在对面的山岩上”  
——李长文 2003 年 6 月 6 日说（谭松摄）

#### 4、李彦辉之死

李彦辉——教师右派（学校不详）。1961 年因偷吃了一块晒在地坝上的生鱼片，被队长王 XX（长航工人）和一群学生痛打，并且扣饭。第二天早上李起床后走到门外，倒地而亡，遗体瘦骨嶙嶙、伤痕累累。李死时 30 多岁，埋在长寿湖小河口湖边。

注：黎民苏的妻子程惠淑（当时小河口的农民）目睹了李老师挨打的惨状，她告诉我，王 XX 等人用楠竹冲着李一阵劈头盖脸乱打，楠竹打成一条条的细片。

#### 5、何泰贵之死

何泰贵——重庆 17 中教师右派，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言谈举止十分文雅。1960 年，何因病、累、饿交集，全身浮肿。11 月的一天半夜，他下床后再也爬不上他睡觉的上铺。一番挣扎，他“砰”地一声倒下，再也没有起来。（详见对何泰贵之子何隆华、何泰贵之妻戴儒愚的采访）

#### 6、曹亚琪之死

曹亚琪——重庆 25 中学音乐教师，擅长拉小提琴。1961 年，因身体极度衰弱，管教干部同意他回重庆调养身体。曹回家后，不知什么原因，只呆了几天便返回长寿湖。

曹亚琪所在的劳改地点是新滩，距狮子滩约 70 里。曹下车后徒步返回。路上，一户农民见他面色惨白，给他吃了一块南瓜。曹在走到距新滩只有几里的地方，支持不住倒了下去。

他的尸体摆在地上几天几夜没人理睬，后来发出恶臭，当地农民挖了个坑把他就地掩埋。

其子女曾找当时在新滩捕鱼的李淦询问过父亲的情况，并在 90 年代末到长寿湖找李长文，希望他帮助寻找父亲遗骸，但未能找到。

#### 7、卢蕴伯之死

卢蕴伯（女）——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卢孤身一人办学一生，1949 年前曾任几所

中学的校长，当年，卢氏三姐妹是重庆的才女，留学日本。1957年卢蕴伯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妹妹卢蕴兰被打成右派。1975年初，在一次被捆绑吊打并受到威胁后，卢蕴伯恐惧中半夜在先锋岛投湖自杀。死前她把自己的所有东西收拾得整整齐齐，包括几本毛主席著作都摆放得端端正正。卢蕴伯终身未婚。



卢蕴伯投湖自杀处（谭松摄）

### 8、马成敏之死

马成敏——市一中教师？年轻时在上海作过共产党的地下交通，后当了国民党成都中心粮站主任，划为历反。他到长寿湖时年龄大了，身体很差，于1962年饿死在长寿湖一个猪圈里。死后他母亲和女儿曾到长寿湖凭吊。

### 9、俞舜臣之死

俞舜臣——天津人，1920年生，重庆10中（南泉中学）教导主任，右派。1979年获得“改正”通知时极度兴奋，倒地脑溢血而死。

### 10、周建龙之死

周建龙——市41中数学教师，说他解放前参加过“基督教圣母军”，由此打为“历史反革命”。在41中，周建龙为人、教书都很好。1961年，因饥饿身体极其虚弱，管教干部放他回家休养。周建龙走到长寿县城，买了第二天回重庆的船票，当天住在县城一家旅馆里。第二天清晨，人们发现他死在床上，手中还紧紧捏着那张船票。他妻子赶来长寿，哭得死去活来，说：“你船票都还捏在手上，你是要回来见我一面啊！”周建龙死时约60岁。

### 11、胡哲先之死

胡哲先——重庆某中学教师，右派。1960年，饿得要死的胡收到家里寄来的一包干炒面，晚上，胡躲到工棚里，一把接一把地抓吃炒面，竟把一包炒面全部吃光。炒面在胃里发胀，胡被撑得死去活来。第二天，人们发现胡哲先胀死在工棚里。

### 12、女右派胡甫琳

胡甫琳——重庆80中学地理教师，著名工商实业家胡子昂的侄女。丈夫解放前是一个著名律师，五十年代去世。胡甫琳当右派后曾与刘曼若一块在南桐洗衣服，1962年从长寿湖回重庆，被市教育局开除公职，靠打零工生活。

刘曼若：胡甫琳性格非常开朗，心眼好，我有一次在街上见到她，她穿一件破烂的麻布衣服，灰头灰脑，比一个地地道道的下力人还要土。她看到我，非常高兴，要请我吃饭。

我说，你工作都没有，靠啥子生活，她笑嘻嘻地说：“没啥，有办法活。”她告诉我，她每天早晨给人倒尿罐，包一家一个月一块钱，她包了30家。另外，她还给别人挑煤，100斤两角钱，帮民工织毛衣，也有点收入。她没娃儿，一个人，够生活。

她坚持要请我吃饭，还要到饭馆去吃。她回家换了一件好衣服——中山套裙，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地走出来，毕竟是出身于大家闺秀，又是知识女性，打扮一下，马上就显出风采，那种反差，给我印象极深，至今不忘。吃饭时，她笑嘻嘻地告诉我，她喜欢上了街道上的另一个男右派，原科技情报所的翻译，他解放前曾被派到美国学习空军。她说，街道把他们俩抓上台去斗，下面革命群众喊打倒，他们俩在台上悄悄眉目传情，好耍得很。

**黎民苏：**胡甫琳不管多么艰难都乐观开朗，性格直爽，对人很好，她后来同那个男右派结了婚，没子女，抱养了一个女儿。九十年代她不小心从坝子上摔下去送了命。

**郭绪昌：**她这个人由于出身比较显赫，所以有点喜欢打扮。她被分到南桐矿区一个非常偏远的地方，那儿苦得很。她后来和一个姓陈的右派结婚了。

### 13、女右派王清兰

王清兰——重庆29中学教师。王长得有些姿色，性格开朗，十多岁时加入华蓥山游击队，五十年代被打成叛徒，1958年下放长寿湖。

1964年，王在评审时对自己被划为叛徒感到冤枉，说了几句牢骚话。王因此被抓，判三年劳教，押往北碚西山坪劳改。

王清兰被打成叛徒后，丈夫（时任重庆市体委主任）与她离婚。王一直盼望能够复婚，在狱中时王听说丈夫已经又结婚，感到绝望。

劳改时，王与同狱的一个农民相好了，该农民是四川简阳人，没文化，因盗窃入狱。

三年后两人双双出狱，回到简阳乡下结了婚，婚后生一女。婆家嫌她是“反革命”很歧视她。王背着女儿劳动，日子极苦。

上世纪七十年代，王的冤案获得平反，调入简阳县政府机关工作。

14、乔明鑫——重庆江北某中学教师，1960年饿死在长寿湖。

15、梁耿法——市党校右派，下长寿湖前与一个劳动模范结婚，当右派后妻子与他离婚。1965年因病未得到医治，死在一个工棚里。

16、王健——市党校文化部教员、右派。子女随同下放长寿湖，生活极其艰苦，其中一女只得嫁一丑男。王健身体好，在长寿湖的最大特点是劳动积极，担粪跑得飞快。王于文革初期病死在长寿湖，死前仍在拼命劳动。

17、罗宇——教师右派（学校不详），1961年饿死在高峰岛，死时30多岁。

18、姚述隐——重庆市一中右派，死于长寿湖飞龙岛，具体时间不详。

19、姚必正——重庆市一中教师，右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去世。

20、邢风——重庆市一中教师，历反，“改正”前去世。

21、黄力威——重庆市一中体育教师，右派，饥荒年去世，终年40多岁。

22、戴学珍（女）——重庆市一中教师，右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去世。

23、李定权——重庆市一中教师，历反。

24、李华伟——重庆工农速成中学右派，饥荒年饿死在长寿湖瓦银坳，死时30多岁。

25、刘景向——重庆工农速成中学会计，右派，1992年在上海去世。

26、XXX——重庆工农速成中学学生会主席，学生右派。1962年在长寿湖跳湖自杀，姓名与年龄不详。

27、张宗明——重庆市41中最优秀的语文教师，右派。大约在1960年死于南桐农村。

28、熊建文——重庆市41中优秀的语文教师，爱提意见，右派，1961年（或1962年）饿死在长寿湖桐子沱。

**刘淑明：**“是我把他的遗物交给他的妻子的。他妻子已经同他离了婚，但是对他很有感情，她看见熊建文的遗物，哭得很伤心。”

29、余重学——北京人，1924年12月生，大学文化，重庆市第三中学右派。妻离异。

30、徐毅（女）——重庆41中语文教师，右派。

31、张大开——重庆兼善中学数学教师。1957年因一句话被打成右派，下放长寿湖近20年，于1997年去世。那句话是“统购统销，饿死不少。”

32、谢德全——重庆兼善中学语文教师，书教得极好，但因为没有像样的文凭，学校一直不给他提级加薪，他对此不满，提了意见，被打成右派，于1997年去世。

33、李岑西——重庆兼善中学美术教师，上海美专刘海粟的学生。1957年因一句话被打成右派。李当时已50多岁，未下长寿湖，被发回老家原籍，于1960年去世，死因不祥。那句话是：“苏联老大哥把我们好大一块地方拿去了。”

34、龚燮——重庆市第一师范学校语文骨干教师，原准备调到成都编写语言参考资料，龚燮为此作了大量工作，鸣放时突然通知他不去了，留下来参加运动，龚燮抱怨了一句：“不去就早点说，我们又不是夜壶，随便提。”龚因此划为右派，1958年下放南桐农村，1960年转到长寿湖，1963年被教育局发回江津农村老家，八十年代去世。

35、陈家耀（民盟）——重庆市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教教育学和心理学。1957年他在一次会上说，一师工作开展得比较好，得力于领导班子配合得好。他与党支部书记王幼群，副教长扬明志扣得起手。反右时批判他否定党的领导，认为工作搞得好的是因为几个人配合得好，不是党领导得好。陈因此划为右派，1958年发配到缙云山劳改农场。1979年“改正”后到重庆教育学院，任教授。

36、杨静予（民盟）——重庆市第一师范学校语文教师。1957年因为一句话被打成右派——“毛主席与佛罗西洛夫（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拥抱很肉麻。”1958年杨静予发配北碚缙云山劳改农场，上世纪六十年代不堪忍受外逃，至今下落不明。

37、袁克众（民盟）——重庆市第一师范学校物理教师。袁当时被赞为重庆的小钱伟长，评为少有的二级教师。1957年在民盟的一次组织生活中，他很委婉地提出，“在现在的政治生活中缺少温暖。”两周后，校长突然宣布他是右派。袁被调到41中，该校当众宣布他是右派，学生上他的课不再起立，不再称他老师。袁未下放，在重庆41中退休。

38、姚家骏（民盟）——重庆市第一师范学校音乐教师。姚是无党派人士，比较爱说话，鸣放期间，党组织派积极分子到姚的窗下去偷听姚同妻子谈话。一天晚上，妻子发现了窗外的人影和响声，姚跑出门外，叫了一声：“是哪个？搞特务活动吗？”

那晚派去的“积极分子”是一个共青团员。给姚定罪名是姚家骏说“共青团员都是特务。”在一师划为右派的六名教师中，只有姚进行了辩解，他反复说，误会了，他不是哪个意思。越辩解，批斗越狠，惩罚越重。姚因此被划为极右，送进监狱（后被罚去内江修铁路），妻子与他离了婚。姚于1980年去世。

39、徐惠玉（女）——重庆第一师范学校语文教师，历反，开除公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去世。

40、谭芝萍（女）——重庆第一师范学校教师，右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去世。

41、王仪——重庆教师进修学院教师。他莫名其妙地被下放劳动，20年后“改正”时，他不属于“改正”对象，因为当初没有罪名（即没戴“帽子”）。市教育局的人说：“你已经下去了20年，就算了。”于是王仪未能回到重庆，在长寿湖回龙中学当了教师，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去世。

42、杨子绍——重庆教师进修学院教师，右派，文革期间被斗死。

43、尹从华——重庆进修学院语文教师，历反，尹的小儿子淹死在长寿湖。

44、宋兰馨——重庆教师进修学院教师，右派。（宋未下长寿湖）

45、周人文——重庆五一技校化学教师，毕业于云南大学，鸣放时因说学生是廉价劳动力而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南川乐村农场劳动改造时，给姐姐写了封信，表示想逃到国外，姐姐将信交给组织。周人文因此被捕，后死于监狱中，死的具体时间不详。1979年“改正”后，周的哥哥寻找他的尸骨，没有找到。

46、廉瑞侦——重庆五一技校教师，毕业于河南工业大学，历反，开除公职。

47、陈英——重庆五一技校数学教师，与学生恋爱，该女学生怀孕。陈因此被打为“坏分子”，入狱劳改而死。1979年，该女学生来校要求给孩子的生父平反，学校不予理睬。

48、刘汉中——重庆五一技校体育教师，因打了学生一拳被划为“坏分子。”1979年获得平反消息时高兴而死。

49、王绵——重庆五一技校教师，1949年前任重庆2中校长，国民党国大代表，历反，开除公职。

50、冯炳章——重庆五一技校学生，他睡上铺，墙上有张毛主席的像。一天，他冲着毛的像打了个屁，被划为“反社会主义分子”，押送劳动教养，现下落不详。

51、王兴明——重庆五一技校学生，反社会主义分子。现在五一技校。

52、孙道良——重庆五一技校学生，反社会主义分子。平反后在重庆双碑。

53、黄XX（女）——重庆五一技校学生，因喜欢打扮而划为反社会主义分子。现在重庆特殊钢厂工作。

（重庆五一技校在1957年划了几十名学生为“反社会主义分子。”现年80岁的李恩章还记得起名字的有以上4名。上述五一技校的教师、学生未下长寿湖。）

54、潘广桂——重庆市煤矿学校制图教师，在厕所拉屎时读政治学习发下的马列的书，有人说：“你拉屎还在读书嗦？”他回答：“这种书嘛在这个时候看最合适。”他因此被打成右派。饥荒年，潘广桂与队长一起吃了长寿湖潘家村农民（潘广桂同他们关系好，认了家门）的南瓜。农民问，能不能把湖边那些水淹地让他们种点菜。潘找到队长，队长同意了。1964年搞四清，潘为这事被抓出来判了刑，管右派的队长只受了一

个警告，潘后来死在劳改队，死的时间等情况不详。

55、吕声拯——重庆市煤矿学校数学教师。没有具体罪名，说他在私下议论过共产党。当右派后他只有8元钱，后来加到18元。他一家5口人（三个小孩），全靠他的工资，在南桐时，他身体就垮了。到长寿湖后，由于得不到任何外援，身体极其虚弱，1960年在一次出工时，半路上倒下去再没起来，终年40岁。

56、郭无畏——重庆市煤矿学校外语教师，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其父曾留学英国皇家学院。郭从小受到良好教育，英语很好，贵州解放时参加了解放军，后到西南俄语专科学校（四川外语学院前身）学习，毕业后分到煤炭部当翻译，1954年因翻译工作上的问题，与苏联专家发生争执，被贬谪到重庆煤矿学校。到煤校后他看不惯一些当官的作风，写信给他在贵州大学任教的姐姐。姐姐认为弟弟思想有问题，将信寄给煤校的领导，请领导帮助弟弟。领导将郭无畏打成右派，下放农村监督劳动。郭无畏先到南桐矿区，后到长寿湖，“改正”之后在中梁山煤矿子弟校任教。

郭于2001年8月去世。

（那位在贵大教书的姐姐后来追悔莫及，在郭重病去世前，哭着说是她害了弟弟。郭的好友梅吾对她说：“你也不用太自责，当时我们都单纯，都迷信，以为党组织是最好最亲的，一切都交给它。”）

57、廖石城——永川人，1913年4月生，大学文化，重庆市煤矿学校总务副校长，来校前在天府煤矿任公方代表，据说是因为他为资本家说话而打成右派。1960年睡在他身边的一个右派饿死了，在场部意见下来以前不敢擅自处理，廖不得不与死人一起睡了两个晚上。廖已不觉得害怕，说：“我反正也要死了，无所谓。”廖石城1979年“改正”后去世。

58、李天枢——重庆市煤矿学校数学教师，先划为右派，后来说他有历史问题，于是作为历史反革命投入监狱，1978年改正后回到学校。李天枢、潘广桂、肖晋虞三人是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不大敢公开说话。但三人关系好，爱在一起发点议论，被打成右派小集团。

59、聂崇枚——重庆市煤矿学校语文教师，曾经担任剧作家洪深的秘书。1958年，学校说他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表现不好——一始至终沉默寡言，又说档案上发现他有历史问题，于是把他划成历史反革命，开除工职，遣回浙江义乌。由于聂是城市人口，无法放到农村，因此返回重庆下放长寿湖，每月8元生活费。1982年其所谓“历史问题”的冤案得到平反。聂由“反革命”变为“1949年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享受离休待遇，现住在煤校。

60、杨鹏翥——重庆市煤矿学校教务副校长，因“右派”教师颂扬他能理解知识分子而被打成“反党分子。”现在下落不详。

61、包万江——重庆市煤矿学校实习工厂技术员，因说他家乡（黑龙江鸡西市）有许多混血儿，是当年苏联红军解放东北时强奸妇女留下的，被划为右派。

62、戴披星——重庆市煤矿学校图书馆长，右派。（详见“赵子生”）

63、赵长华——重庆巴县人，1930年5月生，大学文化，重庆市煤矿学校右派。

64、赵世瑞——四川遂宁人，1932年10月生，大学二年级文化，教师，重庆市煤

矿学校右派。妻离异。

65、萧晋虞——江安人，1919年3月生。大学文化。重庆市煤矿学校教员，右派。

66、董鹤雄——重庆市煤矿学校教员，右派。（因认罪态度好，留校）

67、张克震——重庆市煤矿学校教员右派。（因认罪态度好，留校）

（重庆市煤矿学校共打了16名右派）

68、柳秀钟——重庆市城建校右派。

69、崔可久——重庆市城建校右派。

70、姚江屏——重庆市城建校极右，副校长，已去世。

71、宋朴——重庆市育才中学教师右派，复旦大学毕业，1963年被遣送回乡，现情况不详。

72、陈秋屏——重庆市育才中学音乐教师，历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去世。

73、周怀笛——重庆7中语文教师，著名象棋冠军、才子。在长寿湖擅长“软斗”，为逃避繁重的劳动，他曾拖根棍子，当众将裤子脱光，露出屁股，对队长说：“我屁眼流血。”周去世时间不详。

74、顾恒德——重庆市五中教师，右派，在长寿湖当木匠，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去世。

75、余伟清——重庆市交通学院教师，右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去世。

76、欧文定——重庆市璧山人，1933年12月生，高中文化，1958年2月在重庆交通学院打成右派，1966年11月22日在渔场被判“管制三年”处分，后被抓入监狱，判刑十年。欧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去世，终生孤身一人。

77、胡庄（女）——重庆北碚116中学教师，右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去世。

78、潘明信（女）——重庆石桥铺中学教师，右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去世。

79、陆远富（女）——重庆某师训班学员，右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去世。

80、阎淑群（女）——湖北人，1926年6月生，中学文化，重庆市中学师资训练班（学员）右派。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去世。

81、姚修振——重庆市党校右派。

82、李宜良——重庆市党校，因坚持马尔萨斯人口论被打为右派。

83、张健——山东人，1920年9月生，中学文化，（1938年入党，1949年进军西南）。1957年在重庆市委党校打成右派。张当右派后妻子与他离婚，他将三个孩子送回山东老家。后来，十多岁的儿子张平从山东独自一人到长寿湖千里寻父，找到了父亲。张健于1974年病逝，其女儿从山东来渝，痛哭，安葬父亲后，女儿回山东投水自尽。

84、李春阳——重庆人，1926年10月生。大学专科文化（民盟成员），教师。1957年在重庆市第四女子中学打成右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去世。

85、龚韵琴（女）——重庆50中学教师，右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去世。

86、曾文逵——重庆江北县人，1919年4月生，大学文化。（1939年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通讯员）1957年在重庆市第十六中学以“情节不十分严重，但态度恶劣，划为右派，送农场劳动。”未摘帽。妻离异，有三子（无联系）。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去世。

87、刘立清——重庆南岸39中学教师，历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去世。

88、郑杰——重庆人，1923年1月生。大学文化。重庆37中教师右派，长寿湖的



“顽固右派”之一，非常有骨气。郑于 2005 年 2 月去世。

89、杜 渐——重庆人，1927 年 5 月生。大学文化。教师。1958 年 1 月在重庆市茄子溪中学打成右派。

90、晏杰全（女）——重庆市 22 中教师，在南桐和长寿湖劳动改造 20 年，没有任何罪名，因此 1979 年不给她“改正”。去世时间不详。

91、张积成——陕西人，1917 年 11 月生，大专文化，教师，1959 年 1 月在重庆市第六中学打成右派，张 2001 年去世。

92、陈益民——重庆市二中教师，右派。

93、孙 进——浙江人，1929 年 11 月生，参加西南服务团入川，大学肄业文化。1957 年在重庆市第三十中学打成右派。

94、成中霖——四川岳池人，1922 年 12 月生，高中文化。1958 年在中央公安学院重庆分院打成右派。成于 2009 年 3 月 15 日去世。

95、崔京生（女）——北京人，1932 年 5 月生，大学文化。四川美术学院附中右派。

96、崔 炎——四川美术学院右派，崔京生之夫（崔炎未下长寿湖）

97、吴德昌——内江人，1930 年 10 月生，大学专科文化（二野十八军转业），音乐教师，1958 年 8 月在重庆师范专科学校附属中学打成右派。独身。

99、郑可庄——重庆北碚某中学教师右派。

100、牟寒冰——重庆江北 18 中学教师，右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去世。

101、王钦福——上海人，1918 年 10 月生，大学文化，教师，重庆市第三十六中学右派，发生活费，有妻（无工作）、二子、二女。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去世。

102、周世矗——重庆市江北某中学教师，右派，情况不详。

103、孙瑞秋（女）——重庆江北某中学教师，右派，现情况不详。

104、王谦湘——教师右派（学校不详），1963 年被遣送回湖南老家，现情况不详。

105、高明斋——重庆市中区某中学教师，历反。现情况不详。

106、黎春浓——重庆某中学教师，历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去世。

107、邓祐曾——重庆四中教师，右派。饥荒年想逃往国外吃饱饭（其母是比利时人）被抓入监狱，坐牢 10 年。

108、黄孝颐——重庆三中右派。黄于 2008 年去世。

110、李 路——重庆八中政治教师，右派，1979 年去世。

111、陈西平——四川岳池人，1922 年 10 月生，大学文化，地理教师，重庆市第九中学右派。陈独身一人，足不出户，说：“把过去的一切全忘记。”陈已去世，时间不祥。

112、唐永怀——重庆某中学地理教师，右派。2000 年去世。

113、高久长——（民革）重庆某中学历史教师，右派。（未下长寿湖）

114、潘明谷——重庆清华中学政治教师，极右，押去劳改。（未下长寿湖）

115、刁停图（音）——重庆清华中学语文教师，右派，2001 年去世。（未下长寿湖）

116、崔永禄——教师右派（学校不详）饥荒年饿极了，在岛上抓住一条毒蛇，未及煮熟便匆匆吞下，不一会，全身肿胀，中毒而亡。

117、赵师明——重庆市六中数学教师，右派。1960 年在南桐农村饿死（详见“陈祖翼”）

118、杨先庚——重庆市六中最优秀的化学教师，右派。（详见“陈祖翼”）

119、黄 熹——重庆人，1926年10月生。1957年在重庆市第十八中学打成右派。

120、李树文——重庆人，1925年11月生，大学文化，教师。1958年4月在重庆市第九中学打成右派。

121、唐 轲——浙江人，1918年7月生，初中文化，西南服务团入川，重庆市第二中学右派。独身。

122、蔡 容——三台县人，1914年5月生，初中文化，重庆水利电力学校右派。

123、刘允迪——四川南充人，1929年1月生，大学文化，教师，重庆水利电力学校右派。独身。

124、陈 莫——浙江人，1926年3月生，大学文化，教师，重庆市工业学校右派。独身。

125、董延安——重庆四女中语言教师，右派，“改正”前去世。

126、杨 健——重庆第六中学右派。

127、刘允迪——重庆水利学校右派。

128、颜润德——教师右派，情况不详。

129、李在泉——长寿湖教师右派，情况不详。

130、张并闾——教师？情况不详。

131、沈汉卿——教师？情况不详。

132、黄一模——教师？“改正”前去世，死因不详。

133、廖忠观——教师？“改正”前去世，死因不详。

## 以下是从重庆市南岸区档案上查到的部分教师右派情况

重庆市南岸区右派分子处理情况登记表

学校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别	分类	处理决定	备考
17中学	何泰贵	男	37	地理教员	一般右派	撤职	
17中学	秦贡九	男	38	数学教员	一般右派	降职、降级、降薪	
17中学	何贻？	男	25	历史教员	一般右派	撤职留用察看降低原有待遇	
17中学	王家述	男	36	语文教员	坏兼右	开出公职返乡生产自谋生活	
38中学	何恒舫	男	36	语文教员	一般右派	劳动教养	
38中学	余志毅	男	46	职员	坏兼右	管制劳动教养	
39中学	吴自强	男	35	生物教员	一般右派	送农村监督劳动	
39中学	刘泽芬	女	23	地理教员	一般右派	开除自谋生活	
43中学	梁明炎	男	34	语文教员	一般右派	撤职另行分配待遇较低的工作	
43中学	李远昌	男	41	物理教员	一般右派	撤职另行分配待遇较低的工作	
43中学	刘自珍	女	30	语文教员	一般右派	撤职另行分配待遇较低的工作	
43中学	陈庚禄	男	32	语文教员	一般右派	撤职另行分配待遇较低的工作	
43中学	刘乃戡	男	31	语文教员	一般右派	撤职另行分配待遇较低的工作	

43 中学	周正心	男	28	理化教员	一般右派	撤职送农村监督劳动
43 中学	高明辉	男	25	副校长	坏兼右	撤职监督劳动
窍角沱中学	代汝骏	男	34	语文教师	一般右派	撤职监督劳动（已送农村）
龙门浩中学	张同远	男	20	数学教员	一般右派	按师专总支意见留校
龙门浩中学	吴代华	男	30	历史教员	一般右派	撤职 已送农村
龙门浩中学	陈贞沛	男	40	语文教员	反兼右	开除劳动教养
XXX 中学	刘秉谦	男	34	生物教员	反兼右	开除劳动教养
李家沱中学	杜文光	男	29	生物教员	一般右派	撤职 已送农村
李家沱中学	李维华	男	35	副教导主任	一般右派	撤职 留用查看，降低待遇
重大速成中学	李华伟	男	40	会计	一般右派	撤职 已送农村
重大速成中学	刘景向	男	40	会计	一般右派	监督劳动 已送农村
重大速成中学	汤儒君	男	30	办事员	一般右派	撤职 已送农村
重大速成中学	肖述成	男	27	学员	一般右派	
重大速成中学	刘 瑛	女	21	学员	一般右派	
重大速成中学	谢丕文	男	28	学员	一般右派	
重大速成中学	谢崇焕	男	27	学员	一般右派	
重大速成中学	程嘉行	男	25	学员	一般右派	
重大速成中学	王智能	男	27	学员	一般右派	
重大速成中学	郝玉明	男	32	学员	极右	
(XXX 中学)	蒋维志	男	22	政治教员	坏兼右	逮捕法办
4 中	彭 强	男	26	语文教员	极右	开除劳动教养
4 中	邓祐曾	男	30	化学教员	一般右派	撤职留用察看 已送农村
4 中	董延安	男	31	语文教员	一般右派	撤职送农村或其它劳动场所 监督劳动 已送农村
4 中	李春阳	男	31	历史教员	一般右派	撤职，监督劳动 已送农村
4 中	刘光大	男	40	文学教员	一般右派	撤职 已送农村
4 中	刘贝子	男	36	校长	极右	保留公职 劳动教养
5 中	别 泽	男	36	副教导主任	一般右派	撤职另行分配待遇较低的工作 已送农村
5 中	陈秉南	男	30	历史教员	一般右派	撤职送农村或其它劳动场所 监督劳动 已送农村
5 中	杨玉庆	男	27	数学教员	一般右派	撤销原有职务，另行分配待遇 较低的工作
5 中	张 镛	男	33	副校长	一般右派	降职，另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5 中	冉熙光	男	43	地理教员	反兼右	开除，管制劳动教养
11 中	张忠全	男	47	数学教员	一般右派	撤职留用察看，降低原有待遇
11 中	严希陵	男	53	数学教员	一般右派	撤职监督劳动，如本人不愿则 自谋生活。已送农村

11中	张洁	男	33	历史教员	一般右派	撤职 已送农村
11中	陈群惠	男	51	史教员	一般右派	撤职留用察看 已送农村
11中	孙X秋	女	36	地理教员	一般右派	撤职 已送农村
11中	朱一心	男	29	副校长	一般右派	撤职降三级下放农场参加劳动
17中?	孙力生	男	45	地理教员	一般右派	撤职 已送农村
17中?	钟明咸	男	39	地理教员	一般右派	撤职另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17中?	徐有贞	男	50	数学教员	一般右派	撤职另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 重庆市南岸区反、坏分子处理情况登记表

学校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别	分类	处理决定	备考
4中	沙青	男	34	语文教员	反革命	安置生产, 监督改造	
4中	任尔康	男	44	职员	反革命	开除, 劳动教养	
4中	马志崇	男	41	地理教员	反革命	继续查清问题后再作处理	
5中	巫量宇	男	39	职员	反革命	开除, 劳动教养	
11中	陈时珍	女	31	体育教员	反革命	安置生产, 监督改造	
11中	黄盛传	男	36	语文教员	坏分子	开除, 劳动教养	
11中	刁国海	男		工人	坏分子	逮捕法办	
11中	吕声雅	男		音乐教员	坏分子	逮捕法办	
11中	钟远鹤	男		语文教员	坏分子	逮捕法办	
11中	郎西吾	男	61	语文教员	反革命	留校监督改造, 分配一般工作	
17中	洪传泉	男	30	美术教员	反革命	监督改造 送长寿湖农场	
17中	黄遗模	男	46	数学教员	反革命	安置生产, 监督改造	
17中	王维闲	男	46	体育教员	反革命	管制, 劳动教养	
17中	代鸣钟	男	39	教员	反革命	开除, 劳动教养	
38中	姚来X	男	38	职员	反革命		
38中	徐德权	男	42	语文教员	坏分子	开除, 劳动教养	
38中	黄振国	男	29	数学教员	坏分子	管制, 劳动教养	
39中	刘醴清	男	31	音乐教员	反革命	监督改造 送长寿湖农场	
窍角沱中学	秦静	男	47	生物教员		开除, 送农村监督劳动	
南坪中学	项济谦	男	44	地理教员	反革命	开除回家, 安置生产监督劳动	
下浩中学	易力生	男	30	化学教员	反革命	开除, 劳动教养	
下浩中学	张力	男	28	教员	反革命	继续留用, 在工作中监督改造	
白沙沱中学	朱家政	男	28	工友	反革命	逮捕法办	
白沙沱中学	吕恒楚	男		工友	坏分子	管制, 劳动教养	
重大速成中学	杨开勋	男	30	职员	反革命	开除, 劳动教养	
重大速成中学	刘世璜	男	37	体育教员		监督改造 送长寿湖农场	
重大速成中学	田荣才	男	40	工友	坏分子	开除, 送回农村监督劳动	

此外，经南岸区委五人小组批准，还划了以下 18 名“中右”，1 名“中中”，7 名右派和 4 名因“历史问题”被调离的人员：

中右：	彭泽渊	反革命
中右：	周 琰	反革命
中右：	张允中	反革命
中右：	张志雄	历史反革命
中右：	蒋隆勋	反革命
中右：	潘竹陵	反革命
中右：	游学渊	历史反革命
中右：	李春敏	普通反革命（政治历史问题）
中右：	张基尧	普通反革命（政治历史问题）
中右：	甘志辉	普通反革命（政治历史问题）
中右：	周永萍	普通反革命（政治历史问题）
中右：	廖健北	普通反革命（政治历史问题）
中右：	陈华栋	一般问题
中右：	徐文彬	政治历史问题
中右：	周显标	政治历史问题
中右：	易 (?) 耕伯	政治历史问题
中右：	吴植仙	政治历史问题
中右：	严职昌	政治历史问题
中右：	贺晨昌	政治历史问题
右（捕）：	陈贞沛	叛党
右（捕）：	彭启予	历史反革命
右：	曾君剑	叛党
右：	X 长培	普通反革命
右：	陈嘉树	普通反革命（政治历史问题）
右：	喻绍炯	普通反革命（政治历史问题）
右：	王次椿	政治历史问题
调（动）：	曾禧禄	历史反革命（政治历史问题）
调（动）：	蒋纯一	政治历史问题
调（动）：	刘冬雷	历史反革命
调（动）：	庄万鹏	历史反革命

以下 3 人未经区委批准：

中中： 张 虎      政治历史问题  
中右： 周济民     政治历史问题  
右：    雷 X 孔      政治历史问题

## 咬断舌头的一位中国知识分子

文革期间，四川外语学院俄语系翻译教研室主任任醒云被关押，强迫他揭发他人，包括他妻子。在长时间的刑讯逼供下，任醒云被迫编造了妻子的“罪行”。

当天夜里，想到妻子将会因此遭受迫害，任醒云又愧又悔又怕又气，他深恨自己长了舌头，害了妻子，绝望中，他咬断了自己的舌头，吐在地上。

任醒云倍受折磨终于神智不清，最后跳楼自杀。

“任醒云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教师，同时又是一位非常善良可亲乐于助人的人。”四川外语学院教授林亚光说。

（任醒云的情况由四川外语学院教授林亚光 2001 年提供。）

## 毛泽东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 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话

“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

## 十二、“另类”

他们不是“分子”，而是“分子”的妻子、子女，也有长寿湖的农民、管教干部、学生和下放干部：

- 1、郑修成
- 2、韦绍新
- 3、黄晓龙
- 4、鲜担志
- 5、张一华
- 6、林兴和
- 7、谭宗旭
- 8、何隆华
- 9、戴儒愚
- 10、王薇
- 11、徐瑗
- 12、孙洁源
- 13、茹章鹏



长寿湖（陈华摄）

## 一个有良知的管教干部

郑修成

长寿湖管教干部



郑修成不是右派，而是管右派的人，具体说来，是管右派思想改造的人——长寿湖同心岛改右学习班政治指导员。

郑修成从部队转业后长期在公安局工作，1965年调到长寿湖作管理干部，与其它管理右派的下放干部不同的是，他没受过任何处分，属于“冰清玉洁”的革命者。正因为如此，文化虽不高，但政治上绝对可靠的郑修成被派来监管并改造右派的灵魂。

我到长寿湖后，看到右派的处境很糟。从政策上讲，右派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是在执行时，完全是按敌我矛盾，把他们当劳改犯。管理上也基本上是按监狱里的方式。例如，右派之间，不准交头接耳，交头接耳被认为是在密谋发泄对党的不满。另外，右派没有书籍报纸，没有娱乐，劳动之外只有学习、批斗。1966年有些右派的原单位寄来毛主席著作和语录本，场部扣住不给发，说右派学马列越学越反动。其它书籍就更不准读。我去之后，看到右派生活很单调，精神非常空虚，有的右派只得躺在床上翻新华字典。我认为，既然政策规定右派在处理上按人民内部矛盾对待，就不该将他们当劳改犯。所以，我去之后，给他们订了一份报纸，场部放电影，也安排他们去看，还组织他们唱歌。右派有事请假，我能批的尽量批。工作上我坚持三点：1、对右派要管，要改造。2、管得不要太紧。3、翻案要斗。上面认为我右了，说我同右派分子有说有笑，打得火热。

在文革时，我不主张武斗，也尽量减少了造反派对岛上右派的冲击，尽我的力量做了一点保护工作。

当然，在那个年代，我也执行了左的路线，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伤害了一些人。我感到最内疚的有两人，一个是白永康，一个是欧文定。白永康在日记本上写了几十首诗，他用报纸将日记本密封起来，藏在行李里，被造反派搜查出来。有些诗句很反动，例如，他写原子弹爆炸有感中有一句是“暴君聊发原子狂”；写李宗仁归国是“大鹏展翅救中华。”我文化不高，一些诗我也不懂，其他右派帮我分析讲解，我才明白。白永康的材料是我整理，我上报的。我以为最多判他三、五年，没想到判下来竟是死缓，我当时就感到问题严重。白永康这个人劳动很积极，肯干，不多言，不多语，没想到他思想上想得太多，但这也不该是死罪呀。没判他“立即执行”是因为他的反诗没有外传，否则他肯定掉脑袋。也幸亏是死缓，他活下来，否则，我就是认识到自己错了，想向他道歉也不可能。



欧文定也是我整材料把他送进监狱的。欧这个人的主要毛病就是色迷迷地去盯人家女青年，不仅盯着看，还要去追。他也不想，他一个右派分子，哪个革命女青年会嫁给他？好事没沾着，惹了一身骚，影响很不好。这样，把他定为坏分子，送进监狱判了10年徒刑。现在回想起来，欧文定当时30来岁，一个男人正当壮年，色迷迷看几眼也很正常。这事我做过头了。遗憾的是，白永康我还当面给他表示过歉意，欧文定我一直没机会，现在他已经死了。

还有，当时抓政治思想改造，给右派造成的精神压力相当大。每天晚上，右派劳动回来要学习，要交待劳动任务完成得怎样，某人表现如何，态度如何，说了些什么话，弄得不好就要挨斗。另外，每年还有两次评查，主要内容是，你这半年改造有哪些进展，认罪态度如何，生产劳动表现怎样，先本人自己写，大家提意见，最后作鉴定。有几个人，劳动表现很好，但死活不认罪，所以每次评查都通不过，不仅摘不了帽，还吃不少苦，比如重庆日报的詹光和五一技校的李恩章就是如此。我对他们说，放聪明点，光棍不吃眼前亏，但没作用。

当然，现在我早就认识到右派这个事是彻底错了，不是扩大化，1957年应当彻底否定！中央现在还不彻底否定是不对的。中国说假话就是从1957年开始，现在普遍的假话、假货，根源就在反右，中国落后人家20年，同把一批知识精英，一批知识分子整了有关。

作为我个人来说，我要向被我整了、被我伤害了的人表个态，表示歉意，也许人家不理解，不领我这个情，但我仍然要这样做，我的确也这样做了，取得了许多人的谅解，这些年来长寿湖每年的右派聚会我都参加，大家对我也还不错。去年孙重来看我，我劝他向大家道个歉，消除隔阂，孙重笑了笑，没有回答。

采访时间：2001年6月4日，地点：重庆市南岸区

## 采访后记

郑修成是一个管教干部，也就是说，是当年管右派的人。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最初不愿我去采访。不过，在“六、四”十二周年这天，我终于在南岸黄桷垭山下叩开了他的房门。

最初的半个小时比较尴尬，郑的声音很低沉，几乎听不清，他一开始就喃喃地说：“当年我也执行了左的路线，我无法超越那个时代。”

声音虽低，但目光真诚，整个面容给人和善诚恳之感。

据众多右派反映，在长寿湖的管教干部中，郑修成下手不算狠，用那个年代的语言说，他还不那么“左”。相对整右派已整得有些变态的其他监管人员而言，他也许算得上将右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共产党好干部”。在他相对“不紧”的管理中，当年的右派少受了一些痛苦，也许，还因此少死了几个人。在专制暴政下，各层执行者的个体素质尤其是良心的多少对无辜者而言意味着生命的得失。

郑修成最突出的亮点是他一次次真心诚意的道歉。这实在是太难得太稀少了。在长寿湖前前后后无数任职的管教干部中，能作到这一点的，仅郑修成一人。还有一些右派、

摘帽右派、当了组长的右派，因种种原因，揭发，批斗、诬陷、压迫自己的同类，甚至造成了同类的死亡。今日，即便可以理解在当时条件下的不得已，但绝不应当原谅至今不向受害的同类道歉的行为。

在这一点上，那些人不如郑修成。

采访结束时，郑修成说：“长寿湖的右派和其他‘分子’为长寿湖的建设作出过巨大贡献，仅那成林成片的果树，就是他们一棵棵种下的，有许多是在石头上一个坑一个坑打出来的。长寿湖当年没给他们一分钱的报酬，回报他们的只是批斗，是饿饭，甚至是死亡，长寿湖应当永远记住他们。”

郑说这话时，充满了真诚，充满了感情。我盯着他的眼睛，那里面没有丝毫的伪装。我伸手向他道别，真心诚意地说了声谢谢。



谭松、郑修成合影于长寿湖猪儿岛（2002年6月）

# 风雨人生——我在长寿湖的经历

韦绍新

1957年重庆海员工会副主席。

长寿湖下放干部，1928年生



我是广西横县峦城镇人，1945年在永淳初中毕业后，我以优异成绩免考直升南宁高中。读高中时，曾任学代会主席。1948年高中毕业后，我赴沪宁投考大学，被五所大学同时录取。我选读了复旦大学政治系（现为国际关系系），1949年2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地下党）。5月上海解放，8月我响应党的号召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于1949年12月抵达重庆，后任重庆海员工会宣传部长、办公室主任、副主席。反右运动中，我被安了一个“严重工团主义错误”的罪名，受到开除党籍，撤职降级降薪，下放长寿湖劳动的处分。

我是1958年10月下放长寿湖的。临走那天晚上，我和妻子通宵未眠，盘算着如何才能养活三个幼小的孩子，如何让老母亲不挨冻受饿。我对自己的冤屈不敢申辩，在那个权力就是真理、领导就是党、领导人神圣不可侵犯的年代，抗争、申辩，只能罪加一等。我曾经因为不承认“反党”，并狠狠向窗子吐了一口唾沫而被加重了处罚。我对妻子说：“不能再申辩了。”妻子痛苦地接受了这个现实。

一大早，我轻轻吻了吻还在熟睡的三个孩子，在心里默默地向他们告别。妻子把送我到朝天门码头。在码头上，没有拥抱、没有亲吻，甚至没有握手，我俩木头似地立着……轮船拉响了汽笛催客上船。

妻子抹着眼泪对我说：“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回来。”

我讲一些在长寿湖的经历和见闻。

1959年，我在新滩区劳动半年，印象很深的，是右派詹光被捆打事件。

詹光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毕业的学生，在战争年代，他写过不少前线的新闻报道。当右派后，他拒不承认强加于他头上的“反党”二字。一天，在新滩区队部驻地的大宅里，对他的“反党”罪行进行批判，有人大吼：“把他捆起，看他承认不承认。”

人群中窜出一个人。此人人高马大，一脸横肉。他把詹光反剪双手捆了起来，吼道：“你承不承认？”

“我没有反党，怎么承认？”

打手把詹光捆得紧，厉声说：“承不承认？！”詹光摇摇头。打手更火了，把詹光推倒在板凳上，下死劲捆。“你承不承认？！”詹光抬头，目光显然在抗议。看到詹光快不行了，人们才给他松了绑，搀扶他回了寝室。

区队部就驻在新滩口旁一家大地主的旧宅里。我不知道这家地主是否曾如此对待过他的佃户？我也不知道这里的佃户在土改中是否曾这样对待过这家地主？！

这个打手叫邹振林，据说后来有一次他为了不花路费而去重庆，偷偷地爬进运鲜鱼的冷藏车，几乎冻死在车子里。

1959年9月，我所在的大网队开进同心岛参加四秋大战。这时长寿湖上空已经笼罩着浓浓的大跃进的气息。人们的头脑膨胀到了发疯的程度，大话说尽，空话连篇。翻土的指标，一队比一队高。个个队都树标兵、放卫星。

连年的大跃进，使粮食减产，农场的粮食供应定量已降到每月21斤。

一方面吃不饱，一方面又不断苦战，长寿湖农场与全国许多省、区一样出现了水肿病。李长文是大网队第一个患水肿病的人。他是苦战三天三夜不下火线，并创造了日挖土九分地的记录后得病的。

偷盗现象发生了。据1959年12月22日的统计，同心岛共发生案件46起，案情主要是：

厨房被盗面粉10斤，馒头4个；

孙静轩被盗半包饼干，重4两，及57块水果糖，幸福牌香烟1包；

谭显殷被盗一碗萝卜；

李在泉被盗二块猪肉；

李长文菊花糖一包被盗；

罗元亨一斤六两粮票被盗；

……

农场党委王磊书记指出：盗窃与破坏是阶级敌人的反扑。他把问题的性质提高到敌我矛盾的高度。他还说：问题的产生和泛滥的主要原因是领导上的右倾。

这样，同心岛更狂热了。白天生产，晚上搞运动。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大网队张某于12月23日怯生生地在大会上作了交待。他说他们四、五人实在饿得受不了，一共偷吃粮食九次。第一次在郑家湾。当天的任务是每人种一亩葫豆。这么高的指标根本完不成，干脆煮葫豆吃。张煮了五斤葫豆，郑某放哨。

张某的交待，激起一片喊打喊杀声，要求严惩者有之，要求把他捆起，吊在黄桷树上示众亦有之。有人把两根麻绳紧紧地捏在手上，准备动手了。我是队长，比较冷静，劝阻了他们，只把张某又在会上狠狠批判了一顿。

张某是从印尼归国的一个爱国青年，还不到20岁就在学校里糊里糊涂被划为右派。那个年代，有海外关系的人最容易划入另类。

“双反运动”给人的精神压力是巨大的。重庆废品站的一个右派在同心岛的一间宿舍里吞玻璃渣自杀了。这种自杀方式十分痛苦。他对现实无力抵抗，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活不如死，于是选择这种方式来了此一生。



市领导与长寿湖下放干部合影

（图片来自画册《长寿湖》）

这个老“右”的尸首用席子一卷，抬到湖边的荒地去埋。上级还规定，只能埋在水线以下，这样，一涨水，便让他尸骨无存。

近几年，我曾多次与当年在同心劳动的李长文叙旧。他说他患水肿病以后，我曾走到他的床边，见他的脚肿得发泡，遂叫他把脚抬高一点，不出工了。他为此感激不已，说我把他“当人看了”。可见，当一个人被人不当人看时，是多么渴望“被当人看”啊！

1960年3月，大网队离开同心到大湖捕鱼。四月中旬，几天大雨之后，桃花水来了。

每年的头发桃花水，都是捕鱼的最好时机。我们正准备大干一场时，突然被通知停止捕鱼而去帮助其它队扶麦子。我不敢不执行。但事后我说了一句话——“忍痛牺牲”。

几个月后，党委召开三反运动，我万万没想到，早已忘到九霄云外的“忍痛牺牲”这句话给我带了灾难。

大会小会对“忍痛牺牲”的动机穷追不舍。

“中央要求以粮为纲，市委辛易之书记检查农场工作时指示要把伏倒的麦子扶起来，你反对扶麦子就是反对市委，反对市委就是反对中央。”有人抓住我最害怕的“反党”问题，直捅我的软肋。

“我没有反对扶麦子，我执行了的”。我申辩说。

“你行动执行了，思想没有执行！‘忍痛牺牲’说明你有情绪，有情绪就是不满。”他又加重语气补充说：“不满，不是反党是什么？”

受批判之后，1960年9月的一天，党委办公室的方甸康对我宣布了党委对我处分决定：撤销队长职务，到农村参加整社，好好改造。

在那个荒唐的年代，我能说怎么？我敢说什么？我默默地离开了那座阴森森的办公大楼，愤愤地径直往江湾码头走去……

10月，我到了飞龙公社，工作组驻在雷祖庙。

我走遍了雷祖管区的山山水水。大跃进带给雷祖的是一片荒凉，满目疮痍，断垣残壁。全管区有164间屋的房料，207条板凳，1923张桌子和40425根木料被调去炼铁或送进公共食堂的炉灶。

农民，无论男女老少都面容枯黄，骨瘦嶙嶙。全管区275户1095人，必须在公社食堂吃饭，但赖以活命的公共食堂，普遍缺粮少菜。其中作坊湾食堂每天供应一餐；三夫庙食堂一天供应混糠带水的两餐；打锣冲食堂完全停止不开伙。雷祖食堂的供应标准是一两一钱，255人一天煮粮28斤5两。即使已难以维持生命的低标准，七间食堂有六间也只剩半个月的存粮，麻冲食堂已颗粒无存了。由于缺粮，全管区1095人中，截止1961年1月10日已有184人死亡，还有34人患水肿，干病及子宫脱垂症。这是我亲眼目睹的惨绝人寰的悲剧。

粮食减产，天灾还是人祸，是社会上争论不休的问题。

一个只有30户的大山弯的农民告诉我：连绵的阴雨天，上级叫社员去收葫豆，结果霉烂了5500斤；正逢栽秧的季节，上级却把劳动力调去割麦子，结果4500个秧子报废；撒了4000斤谷种，没人栽，秧子疯长，也废了；在大太阳天，命令社员种了17亩红苕种，

又不淋水，白白晒死了；硬性规定按T字形及三角形的规格栽秧，导致功效极慢，32个劳力，一天才栽一亩一分地，使急需劳力的活路无人干。就是这样，这个生产队的粮食连年减产，1958年产17万斤，1959年丰产不丰收，只收2万6千斤，1960年更糟，只有1万5千斤了。

面对这种局面，上面将矛头错指基层农村干部。

按照当时的标准，飞龙是典型的三类社（即落后社）。1961年1月4日，在工作队长会议上传达上级指示。在谈到如何改变落后社队的问题时，毛泽东指出：“这是第二次革命，因为这部分地区解决的是政权问题，反革命、坏分子篡了权，借共产党之名，行国民党之实，现在就是要革他们的命。”



下放干部。图片来自光碟《长寿湖我们怀念您》

四川省长李大章指示：“对落后地区，凡烂掉的要夺权。”他强调：“搞不彻底，决不收兵。”

1月8日，工作团长李正舟指示：“对三类地区，要收复失地，夺取政权，改朝换代。”

1月18日，市委书记辛易之说：“三类地区重要的是敌我斗争，也有两条路线斗争”。

1月20日，市委书记任白戈说：“对敌人不是说理，而是镇压。”

从此，一场声势浩大的以农村基层干部为斗争对象的运动席卷了飞龙、华中、云集三个公社的高山深谷、湾湾冲冲。

飞龙公社卷进了这股洪流。1961年2月2日召开了控诉大会。大会主席团有工作队队长赵风霓，云集区委书记徐明泉。我担任大会司仪。苦主在大会上控诉：

社员王国珍回父家，在路上捡了一个红薯，被打了一个耳光，并被吊在屋梁上直至天黑。送至父家，又不拿饭吃，不久即死去。

1960年8月，社员袁永珍议论某领导偷粮食。被发现后遭报复，不给袁粮食吃，活活将他折磨死了。

薛邦林曾因揭露某领导偷粮食，从1959年10月起，被陆陆续续扣饭。薛去采蕨根来充饥，1960年3月在去荒田坝买盐的路上，倒地而亡。薛死后，仍然扣薛的妻子及孩子的饭，他们被逼得只好流浪他乡。

1959年10月，叫魏廷清去捆二季稻谷子。魏有病，突然喊眼黑，一头栽倒在水田里，当晚即死亡。

1959年12月，社员毛连安偷吃红苕，被吊了三个小时，队上把毛驱到蒋家坝，回来后又不给饭吃，还派毛去狮子滩抬木料，毛饿死在狮子滩。

这是血和泪的控诉。公社化三年中，这个管区有26人被吊打，起因都是一个“粮”字。

我听着农民一句句渴求活命的哀怨，一声声在死亡线上挣扎企求活命的呼喊，心碎了，流下了同情的眼泪，有时竟失声痛哭起来。

这次控诉大会，飞龙公社被抓去的基层干部有戴树成，王禄贤、王吉元、严吉木、陶炳成、马开盛、王吉英等等。

在飞龙，一件父吃女儿的天下奇案让我终身难忘！

1961年1月，我从云集区参加整社工作队会议后回到雷祖庙，我翻开枕头，发现一堆人的头盖骨。我大为震惊。

怎么回事？我与工作组的其他同志判断，估计是一桩人命案。我们决定对全管区的人口进行排查。最后，疑点集中在堡上的王吉华身上。

堡上是只有几户农民的一个小湾。湾里人发现王吉华的女儿王开述1月14日还在坡上放牛，近几天突然不见了。王对湾里的人说，他女儿到外婆家走人户了。奇怪的是她的衣服裤子却晒在地坝的凉衣杆上。那时的农民衣不蔽体，根本没有多余的衣裤换洗。这引起了湾里人的怀疑。

王吉华的邻居反映：夜深人静的一个晚上，听见王吉华家里传出“唉呀！娘呀！！”的惨叫声，随即又传出厨房里噼噼啪啪煮东西的声音，还有一股难闻的毛发烧焦的气味直往邻居家里窜，弄得几家邻居整夜不能入睡。

一家邻居直接了当地问王吉华：“你姑娘到哪里去了？”

“死了。”这与过去说到外婆家串门不一样。

“埋在哪里？”

“我把她烧了，用麦杆烧的。”

“真的？”

“不信，你把灰灰扒出来看。”

我枕头底下的头盖骨就是这位邻居扒出后悄悄送来的，他不敢公开揭发。

1961年1月23日夜，王吉华从堡上被带到了雷祖庙。雷祖庙天寒地冻，我们在二楼烧了一盘红红的杠炭。我主持对王吉华的审查。

“王吉华，你女儿是怎样死的？”我直问。

“病死的。”

“不对，如果是病死，为何晚上还会惨叫？”

他感到无法隐瞒了，一口气交待了他整死女儿的经过：深夜里，趁女儿熟睡，他突然把她抱起，用力把她的头朝床厅的硬板上撞。未断气，他又用装满谷壳的枕头按住她的嘴巴，直至窒息死亡。

“你为什么把她烧了？”我又问。

他先讲了近年来他家里死人的情况：他母亲魏朝云，于1960年3月饿死。他妻子汤维德，在魏朝云死后十多天也死了。死前，汤曾经埋怨王吉华吃了她的饭。王一怒之下，把汤打得死去活来，不到四天，他妻子死了。他的么儿，三岁，于1960年10月饿死。据群众反映，王吉华去公共食堂打他一家人的饭，回家路上，王就挖吃家里人的饭。那时公共食堂分饭，每人一个瓦罐，食堂的定量每人只有一两一钱，少得可怜，瓦罐底部只有一个小饼子大的饭，王吉华挖吃了边边，剩下的饭更少了。

王砸死女儿的原因就是想占有她那份饭。为什么用火烧呢？王吉华的一个亲戚告诉

他，人死了有火葬和水葬两种方式，葬错了就会全家死绝。王吉华想，他的么儿死后是抛到飞水扫脚凶去水葬的，但厄运并未停止，所以，王吉华决定对女儿火葬。

王将女儿的头和肠子烧了，但对她腿上的肉及心、肝、肺舍不得烧。他想，他饥饿难忍，不如把这些煮来吃了。我们后来去他家检查时，在厨房的鼎罐里还有好几块吃剩的人肉，在橱柜里还有一些血水浸泡着的内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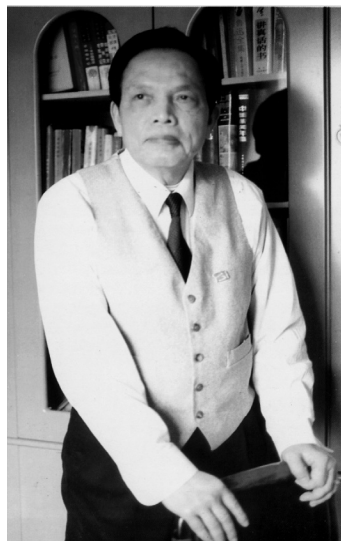
审完王吉华后 20 天（1961 年 2 月 13 日），我就离开了飞龙公社，但那血淋淋的一幕，使我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2005 年春节，我重访飞龙，正巧遇上当年雷祖管区的会计王文学及民兵张洪桥。我们谈起那不堪回首的岁月，不禁相对唏嘘。他们告诉我，王吉华后来被判刑 15 年，刑满回家已是 58 岁，不几年也去世了。

在整社期间，我们白天与社员一起上坡下田参加劳动，夜里走家串户抓紧工作。我们粮食供应标准降为城市人口成年人平均月供 21 斤，比长寿农村的农民强了许多，他们每月的标准为 11 斤至 15 斤带壳的谷子。食油城市人口原来一人一月供 1 市斤，1960 年减为 1 两；糖，1960 年一人一月 1 斤，1961 年开始根本没有供应了；肉，城市人口每人每月供 3 两。一个鸡蛋价格相当 5 斤大米。还有布，1960 年发 1 尺 8 寸布票，这点布票只够买一条毛巾。

还有布，1960 年发 1 尺 8 寸布票。这点布票只够买一条毛巾。

这是大跃进、三面红旗带来的灾难。

1961 年，我患了水肿病，脚肿了，眼皮也沉重得快张不开。我是靠吃蛇消肿挺了过来。



韦绍新

1962 年 11 月，我被调到长寿湖桐子沱生产队，在那儿干了 11 个月，有几件事很难忘。第一是喜迎妻子。

我妻子杨文清是湖北随县人，1947 年考入国立中央工业学校到了重庆。1953 年春节我俩结婚，婚后恩爱有加，特别是生了三个小宝贝以后，家里更是乐融融的。1958 年我受处分，给她致命的打击。那年，我 29 岁，她 27 岁。组织上曾动员她与我离婚，她坚决不同意。她相信我不是坏人，愿意为我作出一切牺牲。她宁可吃尽人间苦难，也要把这个家维持下去，不让它破碎。她唯一的希望是我在农场好好改造，早日回到她身边。

1962 年 12 月，她在医院作宫颈切除手术。我在手术申请书上签上我的名字后，便要匆匆赶回狮子滩参加三级干部会。行前，她躺在病床上，面容憔悴，握住我的手，有气无力地哀求：“难道不能多留两天吗？”当得知我必须走时，她哭了，哭得非常伤心！

我回到狮子滩，就在那次三级干部会上，王磊书记还不点名地进行了批评，要求我们在“要革命或是要老婆”两者中作出选择。

妻子手术以后，身体一直未恢复，肚子和腰疼痛，组织同意她到长寿湖养病。

1963 年 3 月 8 日，我到长寿码头接她。她见我在码头上的身影，病态的脸上顿时绽



放出喜悦的微笑。那一刻，我看到她像我们恋爱时那样年轻妩媚。

那天到桐子沱时，已是漆黑一片，队上安排我们在一间只有几平方米的保管室居住，保管室虽然四壁简陋，但还清静。

我们在微弱的灯光下倾诉着彼此的思念。此时此刻，好像世界上充满了幸福，没有苦恼，没有悲伤。我俩完全沉浸在幸福的暖流中。照国际惯例

妻子在桐子沱的那一个月，是我在长寿湖最快乐的日子！

第二是“捉奸”。

桐子沱有几十家农民，其中有一个女青年叫曹素花，年约20，脸蛋红润，眼睛水灵，头发乌黑。她起伏的胸脯和袅娜的身姿，显出女性特有的曲线美，加上她身上散发出那股诱人的青春芬芳，令桐子沱不少青年农民为之倾倒。

蒋文金，30多岁，是从工人中提拔的青年干部，工作很有朝气，曾担任市食品工会主席，五七年那场无情的政治风暴，也把他吹落到了长寿湖，他在长寿湖担任了桐子沱生产队长。

曹素花的妈妈是长寿湖选出的县人民代表，老贫农、队委会委员。老蒋需要和她研究工作，间或在她家里吃饭。他经常出入曹素花的家，天长日久，对曹素花产生了爱慕。

曹素花婚后不久，丈夫就应征入伍，到云南去了。她也耐不住寂寞，二人越过法律的红线，苟合在一起了。

在那个年代，在长寿湖这块特殊的地方，与女人隔绝，与妻子隔绝，时间久了，一切都丧失了，连人的本能都丧失了。性压抑和性萎缩在男人中并非鲜见。出于人类对与生俱来的性欲的需要，有的在包谷林里寻欢，有的在树荫下偷情，有的在山沟里作乐，甚至在椅子上交媾……而这一切也只是越过了传统道德的红线，至多是越过纪律的红线，而老蒋则是跨过法律的红线了。

不知是谁，把这事捅给了苏新。一天苏新向我交待：“你尽快把老蒋的问题弄清，整份材料给我。”

苏新与樊善祺不同。老樊对人是宽容的。但苏新不同，特别是这次，态度十分严肃，语气非常强硬。

我回到桐子沱，在小范围内对老蒋的问题作些调查。曹的妈妈知道了，十分恼怒，三天两头在我住的屋前粗野地怒骂：“哪个烂贼，乱造谣！捉奸要捉双，捉贼要拿脏，不在肚皮上逮到，一切都是假的。冤枉好人，没得好死。”曹妈总是重复这几句。

我找老蒋谈话，他拒绝承认。老蒋憨厚的态度，使我对苏新的介绍产生了怀疑。

曹妈的叫骂，引起了邻居的注意。

一位知情人悄悄向我透露：“雨天，蒋队长要来曹素花房间过夜；晴天曹素花要到队部与蒋队长过夜。我住在她的隔壁，又是夹壁墙，耗子走路都听得见，他们的一举一动听得一清二楚。先是开门，接着是脱鞋宽衣上床。蒋队长那个金属皮带扣碰击椅子的清脆声听得最清楚。熄灯后只听到床铺上轧轧摇晃的声音了。偶然，还传来曹素花轻轻的恳求声‘动作慢一点’。”

他见我既不摇头又不点头，又用十分肯定的语气说：“你不信，今晚下雨，明早你到地坝上看看有无蒋队长统靴的脚印。”

果真不假，第二天早晨，我在曹素花门口见到了老蒋统靴留下的深深的脚印。

但老蒋仍然不承认。曹妈照例骂骂咧咧。

曹妈骂得有道理呀，捉奸要捉双，但如何捉双？

有天晚上，月亮在桐子沱的上空泻下一片雪白光芒。按常规，这是偷鱼炸鱼的最佳时刻。

“嘭嘭嘭！快开门！”一阵急促的敲打队部木门的声音，把老蒋和曹素花的美梦惊醒了。

四个民兵重重地拍打着门房，并齐声大吼：“蒋队长，快开门，有人炸鱼！”四个民兵是张春芳、张大新、大海、还有曹素花的胞弟曹弟。

门开了，老蒋还来不及穿好裤子，几个民兵直冲进去。张大新提出一支火药枪即慌慌忙忙地走了出来。曹弟分工是捞桡片的。桡片在保管室里。他闯进保管室，看见他姐姐蜷缩在蹇斗的背后，一丝不挂地裸露着。曹弟明白了，他不好意思地捞起桡片扭头就走。

四个民兵和我，按照我指引的方向，划着两支双飞燕直奔炸鱼的港湾。但我们两支船在港湾里转了好几个圈却找不到炸鱼的迹象，连人和船的影子都找不着。我们失望地往回划。

他们不知道，这是我导演的一出戏。

曹弟回到家，把他在队部看到的告诉了他妈妈。从此，再听不到曹妈叫骂的声音了。老蒋和曹素花也都交待了他们苟合的情况。

我提笔整理老蒋材料时，手在颤抖。如果不是遭遇“五七”风暴，老蒋莫说当产业工会主席，就是回到面粉厂当工人，也比在桐子沱强百倍；如果他不是孤身一人留在桐子沱，而是和妻子一起过着温暖幸福的生活，他也不致于如此。我曾想在材料中为老蒋隐瞒些什么，但想到苏新那凶神恶煞的面孔，想到法律的尊严，我不能也不敢说假话。

报告上交苏新后，苏新就直接处理了。

老蒋被判了一年徒刑。听说，长寿县法庭开庭审判他们的那一天的夜里，蒋与曹还在长寿河街旅馆里幽会。看来，他们真的有感情了。

我的妻子几年后知道了这事，指责我没良心。她说：“1963年5月7日，我还托老蒋给你带一斤半猪油，两斤红枣，两斤炒面，10个大饼，一瓶榨菜。这么重的东西，老蒋高高兴兴地给你全部带来。”她还说：“你与老蒋在桐子沱和睦相处，工作默契，怎么闹成这个结局？”

面对妻子的责备，我只有叹息。

1963年8月7日，支部书记苏新通知我：“党委决定调你去大洪湖。”

16日上午，我登车告别了我整整生活了五个年头的长寿湖，朝大洪湖方向驶去。

汽车沿着西山透迤的乡村公路颠颠簸簸吃力前行。我想，人生漫漫，茫茫人生，我今后的道路是否也似今天的汽车一样，甚至比今天我乘的汽车所走的路更为坎坷更为艰难呢？

在整理这份材料时，我心情是沉重的，有些情节是含着泪写下的。妻子一再劝阻我：不要写了，你挨整得还不够惨吗？把家庭连累得还不够惨吗？谁知道今后会不会有人又

把这些材料作为整你的钢鞭呢？

可正是为了不让人类的悲剧重演，不让悲剧的历史重复，我才整理这份记录历史真实的材料。让我们的子孙后代都铭记这段血和泪的历史吧！

最后，我以我的好朋友、诗人孙静轩《历史在这里沉思》中的一些诗句作为这份史料的结束语吧：

我们，全部被卷进了旋风，卷进了暗流  
听天由命地被一种无法抵抗的巨力随意摆布  
是的，我们必须忏悔  
忏悔我们的愚昧  
忏悔我们的迷信  
忏悔我们的盲目  
敢于坦率地承认自己的丑陋  
假若一个民族不肯反思  
这个民族就不会从梦中醒来  
假若历史不反思  
历史的悲剧必将重复  
假若你和我肯反思  
就只能作一个可悲而可笑的阿Q  
啊！人们，不要说一切都已过去

## 采访后记

这篇“采访后记”有些名不副实，因为对韦绍新老人，我是先读到文字，然后才有采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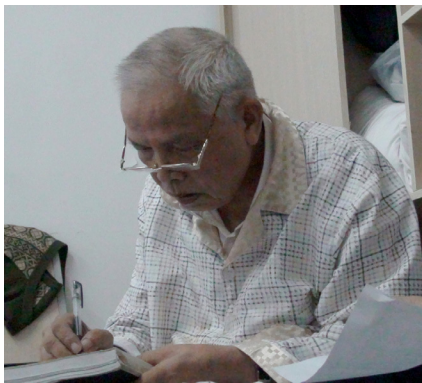
我曾从好几个长寿湖右派口中听说过韦绍新，对他的评价都很好。我也好几次见到他，并给他和其他右派拍过照。他给我的外在印象是慈眉善目而又宁静儒雅。

但是，我却没有，也没有想过采访他。原因是，他虽然也在五七年遭受迫害，给他加了个“反党”罪名，但他没被打成右派，而是“下放干部”。

长寿湖先先后后共有 1030 名下放干部，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也是因为这样或那样“问题”被五七年的反右风暴刮到了长寿湖。其中不少人，也大悲大苦，九死一生。其人生经历，其心路历程，自有一道惊心动魄的“风景”。

可惜，由于我认识上的误区，我从没想到去采访一位“下放干部”。

2009 初，我在父亲家见到了韦绍新送我父亲的书《风雨人生》。我借回读后，感叹万千！当即就决定去前去采访。



韦绍新老人只能以笔代言

不幸，老人因病入院，并且已经不能言语！

我一心指望医生妙手回春，恢复老人的语言功能。可惜，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近半年过去了，韦绍新老人还是说不出话。

其间，韦绍新老人在听说了我采写长寿湖及其经历后，专门托人送我一本记述他一生“风雨”的《风雨人生》。我又细读了一遍。20多万字和几十幅图片，牵引着我的心，跟随老人坎坎坷坷的人生脚印，风风雨雨的悲欢离合，作了一次跌宕起伏的漫游。

感叹、痛惜、惊愕、悲愤、同情、沉思、敬佩……

读完合上书时，一个饱经风雨苍桑、一生大悲大苦，但一直坚守伟岸人格的老人形象，则鲜鲜活活伟立于眼前。

我决定立即去拜望老人。

在市三院的老年科病房里，韦老看上去比几年前苍老了许多，但那双眼睛依然透出和善真诚之光。

由于言谈不便，我写下这样一段话：

感谢您赠我的《风雨人生》。

《风雨人生》既为您自己作了一个最有意义的“交待”，更为后人开启了一扇了解那个年代真相的大门。后者更有价值，更为珍贵。

在“唯物”的价值判断中，您和我父亲这种人都很“划不着”，但在一个更高的境界里，您们活得其所，浑身散发出一种独特的魅力之光——一种高高站立，让人仰视的魅力。

可惜，眼下像您这种在大风大雨中保持做人良知、坚守高尚人格的人不多了。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年来，每一个如您这般的长寿湖老人的离去都让我感到十分痛惜和悲伤。

可您写下了《风雨人生》！您不仅将那个时代的一角真实地留给了后人，您也将一种良知、一种真善、一种高贵展示于世。

我在这种真实前深思浩叹，更在这种良知与高贵前感受精神的升华、思考做人的道理。

书中，您在写到离开长寿湖时说：“正是为了不让人类的悲剧重演，不让悲剧的历史重复，我才整理这份记录历史真实的材料。让我们的子孙后代都铭记这段血和泪的历史吧！”

如此，我替将读到您文字的读者后辈向您表示一声感谢——感谢您的良知、责任感和勇气！

也是基于相同的“不让悲剧重演”的愿望，我将您在长寿湖的那段经历，整理成一篇8000多字的专题，我想将它收编在我采写的《长寿湖》一书中，希望今后有更多的人



能读到您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恳请您同意。

老人慨然写下：“同意收入《长寿湖》中。韦绍新 2009年7月15日于三院病房”。

以上这篇文字，便是老人书中长寿湖经历的记述，而不是我采访后的记录。

告别前，老人又拿起笔，抖抖索索为我写下这样几句话：“我为有你这样的青年感到骄傲。为我的亲密朋友谭显殷有这样的后代感到自豪。我听了王义珍的讲述，我佩服后代人比我们勇敢。我已年老并身体不好，否则真要同年青人一起战斗，直到我们的社会实现公平正义为止。”

山城七月，骄阳似火，我同老人握别，走出医院，大汗淋漓。

惭愧！我们“后代人”，哪儿有如韦绍新这般老人的那般魅力呢？

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气节、良知，从屈原到谭嗣同的精神品质，早已被共产党60年的“改造”、“批判”、“整风”、“运动”、“发财”等等扭曲得面目全非，清除得所剩无几！

看看身边这个飞速变化的社会！

看看身边这个已经变化的人群！

医院渐渐消失在身后，韦绍新这样的老人将从那儿走向他们命定的归宿。

与他们一同消失的，将是我们这个民族最宝贵的千年精髓？

我大汗淋漓地走出死亡和新生共存的医院，身后，分明感到传来一种召唤，一种无声而深沉的精神感召……



谭松与韦绍新老人合影与三院病房（2009年7月15日）

# 长寿湖，我的那些右派恩师

黄晓龙

长寿湖下放学生，1943年生



我在长寿湖劳动期间，有幸认识了一批右派老师，在耳闻目濡的潜移默化下，我得到了最初的人文启蒙，学会了思考判断，形成了最初的价值和是非判断，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我的追求和人生道路。

我是1959年考入重庆水产校的首批学生，一进校就遇上那场肆虐全国的“三年自然灾害”。我曾亲眼目睹过刚刚还在校门前蝼蛄而行的农民，突然缓缓曲膝，像电影里的慢镜头一样倒下的死亡过程；也无奈地体味过用同一块面团蒸出的馒头，领导一两个馒头竟比学生二两的还大，解释为“领导的馒头发得泡一些”的黑色幽默……

1961年夏季，尽管我的成绩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但由于我“阶级出身”的缘故（父亲1953年以“特嫌”罪名冤死狱中，1957年家中又有好几个亲人被打成右派。），学校让我“暂时休学”，下放到长寿湖劳动。

当时的长寿湖农场尽管名曰大型国营农场，但与周边那些正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却毫无二致，依然沿用着原始的工具和方式，从事着效率低下的劳动。我所在的捕鱼队更是如此，在纵横两百多里，近千个湾岔的湖上，三五只“双飞燕”（一人划着双桨的木质小船），以旋网（又称手网）、拖网之类的原始网具，凭藉体力从事着闯运气式的捕鱼生产。

打鱼是非常艰苦的，冬天冷雨严霜，夏天暴雨骄阳，荒山野水，四处为家。不过，捕鱼队却有一种自由自在，令人谈虎色变的“政治”在这儿也威力大减。

最初让我对那些右派生出好奇，并在感情上和他们相通的，是在捕鱼队广泛传唱的《三套车》、《深深的海洋》、《茫茫大草原》之类的苏联歌曲。每当暮色四起，渔火点点，三两双飞燕从朦朦胧胧的湖光山影下掠过时，总是会响起深邃、凝重，带着忧郁和悲沧的歌声。歌声令人想起广袤雪原上飞快掠过的雪橇，想起被践踏、掠夺、遗弃的命运和苦难……此时，近于麻木的心，就像被一只手轻轻抚过一样，变得温暖柔软活跃起来。我满怀好奇地猜想，那些被打下长寿湖的，在雨雾风雪中唱着这些歌的右派们，是一些什么样的人？

于是，在这近乎于原始状态的水天之间，我接受到另外一种“不合时宜”的教育和熏陶。晚炊之后，几只“双飞燕”系在一起，在水天澄沏的月影星辉下，在浩渺空阔“冯虚御风”般的飘飘然中，听老捕鱼队员讲那些“大右派”的轶事。

李南力、陈孟汀、卢光特、孙静轩、吕琳、谭显殷、詹光……这些当年的英雄好汉们，满怀崇高理想和革命热情，为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出生入死。不料，一场“反右运动”让他们从高级干部、诗人、作家、艺术家的位置上一头栽到长寿湖劳动改造。

还有一些一直不认罪的“死硬右派”们，他们在逆境和苦难中始终保持着人格尊严，依然那么坚定从容。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是一种很难达到的境界，但我在不少右派身上看到了这一点。这对我们这些年轻人产生了一种吸引力，让人从心底升起对他们的尊崇和向往。据说，卢光特曾当众直言：“甚么自然灾害，本来就是人祸！”这令在场的年青人都为他捏一把汗。还有，一个下放干部无端辱骂孙静轩，遭到回击后恼羞成怒，欲动手打人。孙静轩抓起一根桨脚叫道：“不错，我是右派，但那是冤枉的。只要你敢动手，老子这一百多斤就不要了！”那个家伙顿时软了下来。（这件事一度在捕鱼队传得沸沸扬扬，但上面对此公然“犯上”的“抗拒改造”一直没追究。）

大概在5、6月份，农场党委曾经下发过一份“社教”动员文件，组织全场职工学习。文件以大量篇幅列举了团市委右派曹贞干、高志长、谭显殷等人多次聚在一起散布的“反动言行”。如：他们议论周边农村每天都有人饿死；议论农场和农村对生产的瞎指挥；议论干部多吃多占等等。这些“言论”被认为是“发泄对党的刻骨仇恨”、“攻击总路线和三面红旗”。甚至他们在饥饿中咽口水，怀念久违的红烧肉，回锅肉、水饺的味道，也被认为是“准备反攻倒算”，是“人还在、心不死”。

饥饿中的我，不由得对这些敢于“直面血淋淋现实，敢于面对惨淡人生”的右派，生出深深的敬意。

那时，对右派的“思想改造”和“劳动改造”极其残酷，这种改造让右派们丧失人格尊严，失去思考能力，甚至摧残他们的生命。尽管好多右派都是正直和饱学之士，但当时阶级斗争“痛打落水狗”的社会氛围却使他们活得像卑贱的猪狗。至今，我只要一想起长寿湖那段岁月，眼前就会浮现出泥泞的路上，那些脸色灰暗、面部浮肿、穿着开花棉袄，一边走，一边用大木勺贪婪地在饭盆中舀着稀饭的情景……

最难忘的是在新滩参加“红五月”双抢劳动时亲眼目睹的一幕。

当时，我和四五个同学正在水田里插秧，突然听见工区主任钱XX在4、5根田坎外大喝一声：“给我打！”

只见几个身着齐腰防水裤的彪形大汉扑上去，噼噼啪啪，脚尖拳头加耳光把一个右派分子打翻在地！

“我没有装病呀！我、我……”

几个壮汉将这个“装病”的右派打得连连惨叫，最后没有声音了。我看见他们把已经没有气息的他从地上拖走了。我目瞪口呆地看完这一幕，半天回不过神来。

后来，听说这个右派“病死”了。

还有一幕印象也很深。1961年10月



下放长寿湖的知识青年（来自画册《长寿湖》）

份，我们在飞龙参加农场的“红十月会战”。开荒时我饿慌了，大嚼茅草根，午饭后突然腹痛。在医务室看病时，见到一位面目浮肿脸色惨白，已经病了好几天的右派。右派苦苦哀求那位女医生多拿几颗药。女医生对该右派声色俱厉连声呵斥，竟只给了一粒止痛片。当她看见我脸上流露出一丝不满时，这位“立场坚定”的女医生竟对我说：“小黄，你别看他们现在可怜，你不知道，他们向党进攻时，一个个西装革履眼睛朝上，神气活现。我一想起就来气。”

当时，右派要摆脱这种非人的待遇，除了“认罪”，除了认真改造，争取早日“摘帽”回到“人民队伍”之外，别无它途。其中“认罪”是最基本的前提。如果不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不承认“有罪”，就意味着自己和家人都将面对漫长而无止境的非人待遇。

当然，右派中也不乏萎靡不振，神情颓唐者。他们要嘛是为当年的冲动懊悔不已；要嘛是为沦为贱民的家人忧心如焚，于是不得不放弃尊严点头哈腰，深恐稍有不慎就罪加一等。

我也见过受难之后便以“左”的面目出现的右派。那时，中苏论战已全面拉开，但是，在长寿湖，苏共的“苏维埃加土豆烧牛肉”和我们的“人民公社加大锅清水萝卜汤”之争，只唤起了饿得要死的右派对食物的强烈渴盼，人人都对“土豆烧牛肉”垂涎欲滴。然而，一位曾经是知名讽刺诗人的右派，却多次选择人多时当众宣称：“我一听到‘土豆烧牛肉’几个字就想吐”。其实，人们看得很清楚，每当说到“土豆烧牛肉”时，同样是饥肠辘辘的他禁不住吞口水。据说这名右派是个有着超常记忆力的才子，几千上万字的文章，看过两遍就可以一字不漏地背下来。但他在说那明显背离常识和良知的話时，语言十分流畅，丝毫不脸红。

在和一些正直的老场员私下摆谈中，我得知右派获罪的真实原因：他们要嘛是响应党的号召，真诚地帮助党整风，提过一些善意的意见，要嘛就是平时得罪了领导，因而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

我潜意识中对他们有一种敬重和理解，我对那些因言获罪后还敢于对“自然灾害”私下称为“人祸”的右派，油然而生出一种信赖和亲近感。我同一些性格开朗的右派们有了密切的交往。

还在水产校时，我就多次听文学课老师以无不惋惜的口气，讲起过当时正在农场劳改的大诗人孙静轩。我本人读过他的《海洋抒情诗》，读过他的《献给母亲的河》。

“满身泥痕，赤身露体的孩子，彼此用饥饿的眼睛长久的默默对望”

“在混黄的流水边，倾听着船夫脚下的皮肉和船板摩擦时发出的低沉叹息”

对饥饿有着刻骨铭心体验的我，用整个身心体会孙诗人的诗句。我从小就爱写诗读诗，梦想成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有影响的诗人。我暗自生出了一定要见见这个大名鼎鼎诗人的愿望。

当确知孙老师当时就在同心岛上的右派学习班时，我忐忑不安地将几首习作寄给他。仅仅三天，我就收到他热情洋溢的回信。这个以《海洋抒情诗》在青年中颇具影响、在我眼中高不可攀的著名诗人，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和肯定，使我在迷惘中看到一道明亮的曙光。我同孙老师的首次见面，竟是他和李武珍正式结婚登记的日子。我这个懵懂的尚不谙世事、只知道写诗的少年也是这场婚礼的唯一参加者。我只顾和他谈诗、谈文学，



谈那场令国人良知集体陷落的“反右斗争”等等，直到晚上10点方才分手。这个以“孙浪子”和“白眼向青天”而著称，并开罪了不少权贵的诗人，给我留下的印象竟是谦和，质朴，和没有丝毫矫饰的率真、热情。

我开始拼命阅读唐诗、宋词、元曲、《古文观止》和艾青，聂鲁达，普希金的诗。诗赋中那些美好动人的情感，那些博大精深、充满睿智的思想，迷人的文字，将我带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于是，我打渔时默诵，休息时手不释卷，沉醉于先贤们留下的思想文字中。

精神的充实，导致了我从性格到习惯的一系列变化。但是，和右派们的频繁接触，公开称他们老师等等，引来了那些一心想立功，借以高升的人的关注。

一位原水产校的总务老师（时任捕捞队副大队长），非常亲热地找我聊天，我以为老师的关心，便将对诗的热爱和向往，对右派孙静轩的崇敬和感激，一一向他倾吐。不久，这位我信任的老师，在“社教”（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动员会上竟声色俱厉地说：“我们培养的是普通劳动者，不是精神贵族，更不是那些口口声声称右派分子为老师的人！这是阶级立场问题，是大是大非问题，如果不迷途知返，就将是运动的重点！”

不久，我被调到水研所，不知是有意或无意，我的宿舍竟被单独安排在右派学习班宿舍的外间。我依然保持着上班默诵诗赋名篇，晚上看书到深夜的习惯。因紧邻之便，我同前《民间文学》编委的右派作家聂云岚建立了朋友加师生的情谊。

1963年春，正当我为“雷锋日记”大受感动时，一度暂缓的“社教”重新启动。我突然被调去搞基建，干重体力活。原来十分亲密的同学突然有意和我疏远，我这时才知道又是水产校的那个“老师”在作祟。我心中充满愤怒，屈辱，不平，但个人又岂能与强大的“政治”抗衡。为了躲避迫害，经一个不知名的右派暗示，我以在水产校时腰椎受过伤旧病复发为由，每天交一份“因病退职报告”。不久，我获得场部人事科以“只能自动离职”为条件的批准。批准后，他们以派出所无人，办不了户口为由，让我先回重庆等待。

回到重庆后，我借来高中二、三年级的文、史、地、数和政治课本，复习备考。可是，到了5月，长寿湖答应寄回的户口仍不见踪影。在重庆40中学作音乐教师的母亲着急了，只身赶赴长寿湖为我索要户口。在长寿湖，母亲得知因为我和右派交往密切，已被党委高度关注。正焦急时，她又收到右派孙静轩寄给我的信。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已经吓成惊弓之鸟的母亲，将大姐，四舅和全家兄妹召集家中，召开紧急家庭会。他们先动之以亲情，晓之以利害，然后给我下达最后通牒：必须马上向长寿湖写检讨书和揭发材料，并交出孙静轩的信，断绝同右派的来往。以此，争取把户口要回来。如果我照办，家里可以全力支持我复习参考，否则，家里将拒绝接收我。

我清楚，如果回长寿湖不去“揭发”那些右派老师，必然会被打成反面典型，我这



下放长寿湖的知识青年  
（图片来自画册《长寿湖》）

个风雨中支离破碎的家庭，处境将更难。但是，从小受的教育，做人的起码准则，又不允许我无中生有地按“组织意图”去牺牲他人保全自己。更何况我敬重那些右派恩师，是他们让我在迷茫中看到希望，在苦难中有了追求。此外，我坚信，要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必须心地坦荡磊落，品德高尚。我以林哥哥、三舅、四伯被冤枉打成右派的事例说服他们，希望求得他们的同情。然而，在家庭的现实安全面前，平时教育我要堂堂正正做人的大人们，此时已顾不上那些于现实威胁毫无补益的道义原则。尽管他们对我的反驳无言以对，甚至面有愧色，但无论怎样都要我同右派老师们断绝往来，并向长寿湖写检查和揭发。

我拒不从命，双方僵持，不欢而散。

自此，家里的气氛紧张起来，焦虑惊恐的母亲下班回家后，厉声呵斥，逼我就范。由于长寿湖扣着户口，我在重庆没有粮食定量，家中兄妹多，无法维持基本生活。我也“争饿气”，早上出门，深夜方才归家睡觉。靠黄珏，严中和，武辉夏等朋友和聂云岚老师的接济，饱一顿饿一顿地熬日子。这样坚持了近一个月，高考报名期一天天逼近了，可户口还是不见踪影。据从长寿湖回来的同事讲，社教运动已经开始，一些同右派交往密切的下放学生先后被冠以不同罪名被捕判刑。在社教动员报告中，党委负责人已将我称为“被右派拉过去的小青年”。在这个时候回长寿湖，不仅拿不到户口，反而可能遭遇不测。正惶惶不安时，一直同情我的大弟弟偷偷告诉我，母亲又去过一次长寿湖，仍没拿到户口。

走投无路的我，在绝望怨愤中，一连几天在储奇门河边望着江水，好几次都想一死了之。

长寿湖不给我户口，是想逼我回去当“反面典型”，我不敢回去。我上午泡图书馆，下午就去聂老师家，或者探讨欣赏唐诗宋词元曲，或者听他讲《基督山伯爵》、《撒克逊劫后英雄传》、《玉娇龙》等。

我现在回想起我当年的那个倔犟，依然无怨无悔。我和右派老师的交往是值得的，虽然我这一生与金钱和权势无缘，但那些人文思想对一个少年的启蒙，却使我受益终生，我的精神生活始终是充实和愉悦的。



黄晓龙与妻子

没有户口，考不了大学，我于是打算在重庆谋一份工作，继续做我的文学梦。但是，在这座“阶级斗争”之弦越绷越紧的城市，在这个已有三个“右派”亲属的家庭里，在我已被农场领导当成反面典型的情况下，母亲如惊弓之鸟，终日惶惶不安。我实在不忍心看她那焦虑的面孔。曾经温暖的家，已使我感到阴冷。处于惊恐中的亲人，用令人心酸的沉默明确地告诉我：家，已容不得你继续留下了……

这座熟悉亲切的、曾将做人的要义和人生的价值植进了我血液的城市，已没有我的容身之地。除了去到比长寿湖更远的农场，我别无选择。

1963年8月初，四川大竹县云雾茶场到街道办事处招工，已走投无路的我当即就报了名。

时隔多年后，母亲一提起当年逼我重新下乡的事，就愧疚不已。我不怪她，在那风

声鹤唳人人自危的年月里，除了出走没有别的路。

1963年8月中旬，一个阴霾的早晨，从几个绝望难眠的日夜中平静下来的我，以一种近乎“壮士一去兮不复返”般的断决和平静，随同120个赴大竹云雾山茶场的知青，登上了6辆军车。

没有日后为知青送行时那夸张喜气的锣鼓，没有写满豪言壮语的横幅标语，甚至没有亲人送别时的难分难舍。在一种近乎凄凉萧杀的气氛中，我离开了家，离开了我生长的城市，开始了长达数十年之久的、充满苦难与抗争、迷茫与求索、彷徨与追求、放弃与坚守的人生之旅。



下放长寿湖的知识青年  
(图片来自画册《长寿湖》)

## 后记

长寿湖先后共接纳了1455名学生。同后来全国范围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不同的是，这些“下乡”的学生绝大多数要嘛是“出身不好”，要嘛便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因此，下放这些学生到长寿湖，也是一种“发配”，一种惩罚。

他们中，也有因“罪”而被捕入狱的，如莫德仲、肖顺伟，也有在长寿湖献出年青生命的，如王宝华。

2003年，我曾采访了一位长寿湖下放学生李明富，他给我提供了一些下放学生当年的照片。但是那次采访收获不大，因此没有有关的采访录。

我同黄晓龙的相识相交算是“以文会友”。

几年前，一位朋友传来黄晓龙的一篇长文《流年往事》，我读了之后心中十分感慨，随后我们便有了往来。

这篇《长寿湖，我的那些右派恩师》就是《流年往事》中的与长寿湖有关的内容。经征得黄晓龙的同意，收集在本书中。



下放长寿湖的知识青年  
(图片来自画册《长寿湖》)



1958 年下放长寿湖的部分学生在长寿湖机械厂前合影。  
(前排左二叫王宝华，她在长寿湖献出了生命，埋在狮子滩大坝。)



45 年后（2003 年），当年（1958 年）的部分学生重返长寿湖，  
并在当年的猪儿岛（现浴滨岛）上合影。

## 女子写给恋人 10 封情书被农场扣留 50 年

半个世纪前，重庆渝中区在校女生周德翔执着追求被下放到重庆长寿湖农场改造的男子罗立平，并给他写了 10 封情书。然而，因为这些书信被农场保卫科审查时扣留了下来，直到今年 4 月才被人发现。

重庆商报（2008 年）10 月 1 日报道 半个世纪前，渝中区在校女生周德翔执着追求被下放到长寿湖农场改造的男子罗立平，并给他写了 10 封情书。然而，这些书信全部被农场保卫科审查时扣留了下来。今年 4 月中旬，原农场工作人员郭良在清理当年积存下来的档案时，意外发现了这些被扣达 50 年之久的信照。昨天，郭良委托本报寻找当初的这对恋人，希望这些信照能物归原主。如有知情市民，请拨打本报热线 966965 提供线索。



信件的背后被人批注“情信写的如此肉麻还说是同胞妹妹”。

### 清理档案发现被私拆情书

发现这些情书的郭良系长寿湖联合企业公司（即长寿湖农场的前身）行政办工作人员。昨天下午，郭良向记者介绍，今年4月中旬，因公司一幢存放档案的办公楼被卖给当地一家医院，领导叫他去清理被存放了半个世纪的档案。

“当我打开这些尘封了半个世纪的档案时，突然发现了一张面容清秀女子的照片。”郭良说，与照片相伴的还有25封被私拆了的信件，收信人均是一个叫罗立平的男子。这些信中，有罗立平的母亲和姨妈写来的，还有同事和朋友写来的，其中还有10封情书。郭良称，他从信中得知，给罗立平写情书的女子叫周德翔，她当时在重庆市21中读书，她的信件大多是从渝中区民生路340号寄出来的。

### 痴情女生两天写3封情书

昨天，记者看到，这25封信全都被人拆开了，邮票也被剪了，有些甚至没有了信封。郭良说，从这些信的内容大致可以看出，罗立平系主城人，当时被下放到长寿湖农场改造。记者同时还看到，这10封情书的信封背后还被人用铅笔批注了“情书”、“情信写得如此肉麻”等字样，信的正文处一些写得情深意浓的地方，也被人用铅笔勾画了出来，有些字句后面还被打上问号。

写信女子周德翔在1958年8月的一封信中写到，她在两天内接连给罗立平写了3封信，但均未收到他的回信，这让她惆怅不已。

### 当年收信要经保卫科审查

今年70多岁的伍成模系当年长寿湖农场的捕鱼队队长。昨天他回忆称，1958年3月，农场建成，主要接收从重庆主城来的下放干部及在学校“犯了事”的学生等进行劳动改造，他们收信全要经过当时的保卫科审查。伍成模称，当年罗立平被下放来时最多不超过20

岁，“他踏实能干，整天沉默不语”。伍成模回忆，后来不久，罗不知为何主动离开了捕鱼队，但在上世纪70年代还有人在渝中区看到过他。

## 网上发帖寻找当年情侣

郭良告诉记者，从今年5月起，他就在重庆的主要网站上发帖，希望能找到当初的这对恋人，但一直未果。“后来，我还托朋友到渝中区民生路一带去打听当年的情况。”郭良说，但时过境迁，大家都已不了解当时的情况。

昨天，记者在民生路340号一带看到，这里现在成了一家婴儿用品专卖店，附近的人都称他们不认识叫周德翔的女子。“我想找到这对恋人，把这些信照全部归还给他们。”郭良说。

### 补记：

据曾同罗立平一块在捕鱼队劳动的右派高志长和一道在飞龙岛劳动的右派王义珍介绍，罗立平是重庆市工会的下放干部，擅长音乐。当年他主要为两件事经常受到批斗：一是他身体很瘦弱，难以胜任高强度的劳动；二是他同右派们打成一片。前者被认为是抗拒改造，后者被认为是阶级立场不稳。因此经常受到批斗。他曾对高志长说，他受不了这种折磨，想逃走。

一次，一群党的“积极分子”将他捆绑起来一阵痛打，打得罗立平头破血流。打完后，打手们扬长而去。一位农民过路看到头破血流的罗立平，便对他说：“他们要把你打死，你还不如逃走。”

罗立平听了这话，坚定了逃跑的决心。（逃跑的过程不清楚）

他逃回重庆后，见到了他妹妹的同学，也就是给他写信的姑娘周德翔。罗立平下放前曾为她辅导功课，就是在那时她爱上的他。她给罗写了许多封信，其中一封还特意用鲜红的墨水写成。但是，信全部被农场扣押。

罗立平逃回时，周德翔已是一家医院的护士，她悄悄把罗立平藏了起来。不久，这事被发现，医院强迫她同罗立平“划清界限”。周德翔宁愿失去工作也不愿离开罗立平。她离开医院后，同罗立平在长江河边靠筛河沙和鹅卵石为生。后来他们在渝中区七星岗的一条小巷里摆了一个摊，1979年高志长获得“改正”后还专程去看望了他。“他看上去很潦倒，精神状态很差，身体也不好，那个摊实在简陋。他也不想找有关部门‘落实政策’，但他没有戴右派帽子，还不属于‘改正’的对象。我记得他当时很忧郁。”高志长说。

现在罗立平周德翔夫妇住在北京，王义珍曾打电话去问候，是周德翔接的，但她不愿多说。

他们的两个女儿，都成为音乐人才。

# 飞龙岛上的老农

鲜担志

长寿湖飞龙岛农民，1943年生



我是长寿湖土生土长的农民，土改时给我家划的成份是富农。我对这个成份一直想不通，我爸爸妈妈一辈子起早摸黑，田头地坝辛勤劳动，耕作一小块土地。我妈是文盲，钞票都认不得，啥子剥削阶级？

长寿湖修电站，1956年把我们迁到丰都。因为是富农，我们一家弄到丰都大山上贫穷荒凉的地方。我在长寿县读过初中，在大山上算“高级知识分子”，让我教小学。

饥荒年，丰都整得才叫惨，路上经常看到饿死的人，还打死不少人——用打夯的方法把人夯死。

什么坏人？不过饿急了弄点地头的东西吃，甚至是摘点胡豆叶。丰都县搞得左。我教的55个学生，到1960年初，只剩下22个，其余的都饿死了。我记得1960年开春，完全没得粮食吃，连坡上的黄豆叶都吃光了。我们住的地方叫中坝，不远处有一个叫熊家湾的地方，70多口人剩20来人。还有崇兴乡曾家沟，270多人死得只剩下几十人。我父亲就是在那个年头饿死的，死在中坝。

丰都死人太多，县委书记刘维梓因此被撤职（1960年），换成一个姓姜的书记。姜书记上任后作了个统计，丰都70多万人死23万！

当时丰都真真成了个“鬼城”。{注}

[注]《丰都县志》（1991年版）第31页记载：

1959年9月，全县粮食总产由1958年的21.75万吨降为11.51万吨，上报地委称42万吨，地区下达征购任务11万吨。

1959年12月19日，县委在上游公社三合管区召开“反粮食瞒产”现场会。县委主要负责人提出“先打第一线（管区支书、大队长、会计、保管）、再打第二线（生产队长），后打富裕农民”的主张。当场吊打七人，其中打死一人。会后，区、乡召开打人现场会，当场打死173人，被撤销干部职务1179人，造成全县性严重违法乱纪。

1960年2月，反榨菜“瞒产”，继续任意撤销干部职务，乱清家。

1960年3月，地委派姜成玉任中共丰都县委第一书记。

（遭撤职逮捕的县委书记刘维梓于1983年3月被“免于刑事处分”，原因是“当年丰都的违法乱纪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造成的”。——见县志同一页）

我们全家实在活不下去，决定跑回长寿湖。我先悄悄来联系。我找到飞龙一个姓马

的主任，嘿，运气好，这边正缺劳力开荒，更主要的是，这边还供应半斤粮。联系好之后我们全家半夜偷偷出发，怕什么？丰都不准走呀，要抓。还好，我们一路翻山，顺利逃回长寿湖。

那一年陆陆续续回来了300多户，有700来人。

那个时候飞龙还是个荒岛，蒿草一人多深，钻进去就出不来。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你看到的那些竹林、樟树、果树，都是右派当年种的。

说到右派，我从来就没拿他们当坏人。1958年我的一个老师划成右派，这个老师教书很认真，人也老实，我想不通，他怎么会是坏人？

到项家坝后，接触右派就多了。右派老实，一喊就得动，不敢反抗。举个例子说，有年冬天，一艘机动船的螺旋桨被渔网缠住了，开船的人自己不下水，看见坡上的右派练冰梧，就喊：“你，下来！给我把网解开”。练冰梧不敢不去，他当时快50岁了，喝了一碗红苕酒，跳到冰冷的湖中，整整干了一个多小时才解开。我们在岸上看，他起坡后，不仅嘴发乌，身上都发乌。我记得那次下水后，他倒下一个多星期没有出门。

还有一个叫王义珍的女右派，是个医生，在飞龙项家坝喂猪，她的医术比乡里的医生好，对人也好，很和气。农民都觉得她是个大好人，就是管她的人说不是，她给我们看了病还要挨整。农民说：“她坏？如果都像她那样坏就好了。”

我刚到项家坝的时候还接触了一个女右派，叫杨惠云，她对别人很好，很和气，我特别愿意同她打交道，可惜后来她跳湖自杀了。

说实在的，农民对右派没得仇恨，也没得矛盾。我们觉得，他们有文化，都是知识分子，干的活比我们还多，对人态度也谦和，有什么仇恨？

所以，要斗他们，就得事先发动。怎么发动？把贫下中农集中起来，先说幸福生活是怎么得来的（呸，什么幸福生活，饭都没得吃的！），再说右派们要变天，要回到万

恶的旧社会，要让地主、资本家重新骑在人民头上压迫劳动人民。总之，激发人们对右派的愤恨。贫下中农里的年轻人比较容易发动，斗右派主要是他们上场。有一次发动我们农业队的农民斗右派殷宗炳、熊明鑫、郑平等人，斗得最凶的是个叫魏XX的贫下中农（他父亲原来是场上的地痞）。他把一个烂背篋罩在右派头上，拉着他转圈子，一边折磨他，一边说：“你要推翻共产党，我先把你推推磨”。右派只有不断认错：“是，是，是，我有罪，



飞龙岛上鲜担志的家（谭松摄）



长寿湖右派李普杰、刘康在飞龙岛默默注视着当年劳动过的土屋，那上面还残存着“大批资本主义……”（谭松摄）



我有罪。”否则收不到场。

当然，右派自己也相互斗。有一年修红旗荡，一群右派（有詹一之、梅吾、李恩章等）来干活，住在我家。事先告诉我们不准与他们多说话，更不准照顾他们。我们在一起住了两年，看他们那个日子的确难过。我们农民打霜落雪不出工，右派必须天天干，干最重的活，吃得孬，晚上经常加班，不加班就学习。那个学习就是互相斗，你说我，我说你，你揭发我，我揭发你，你汇报我偷懒，表现不好，我也反映你偷懒，表现不好。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说：“干活回来累得很，还斗啥子嘛？你们互相都说对方偷懒，坝上那几千斤重的石滚子是哪个拉动的？”组长李黛林说：“我们本来就是坏人，不说坏说啥子？”我这才明白。



那些年我觉得右派不如农民，农民至少比他们自由。有些右派看上去简直就象叫花子（乞丐）。有个姓罗的右派，吃四季豆叶，那叶子又涩又毛，猪都不吃。我当时说他“女婿卖丈母娘——想苦方”，意思是山穷水尽没办法。还有个右派梅吾，穷得很，穿个烂棉袄，一根草绳系在腰上，棉花一团一团露在外面，跟讨饭的没两样。他有一次发高烧，我叫他弄点药，他说：“我每月只有16块钱，还要养母亲。”我硬是见他硬拖过去，没吃一副药。听说这个人很有学问，不过，他也想得通，不愁眉苦脸。

鲜担志与当年在飞龙劳改的右派合影（谭松摄）

采访时间：2001年10月14日，地点：长寿湖飞龙岛

## 采访后记

飞龙岛是长寿湖一个非常偏远的岛子，也是当年右派们的一个主要劳改地，有一些右派在这儿投湖、饿死、被打死。

如今，已有一条土公路修到离岛子只有几公里的乡上，但没有班车。好容易租了一辆破破烂烂的车子，颠颠簸簸赶到乡上，却发现由于头一天的大雨，使得进岛的土路泥泞难行。

在一家小店里借了一双长筒靴，然后在那条惨不忍睹的泥路上挣扎了近一个小时，才看到了风景如画的飞龙岛。

这是长寿湖又一个幽雅宁静的世外桃源。雨后的飞龙岛满目苍翠，一尘不染。一丛丛竹林、一坡坡樟树，与碧绿的湖水相映成辉，风，凉悠悠地吹来，使人心舒气爽。

这儿，是劳改之地还是疗养胜地？

眼下飞龙岛上只有几户农民，这几户人家中，年轻人耐不住寂寞和清贫，大都已外出。偌大的岛子上，难以看见人影，屈指可数的几间农舍一声不响地静卧在苍翠之中。

鲜担志的子女已移到县城去了，他们老两口守着一间土屋。老人很热情，冒着细雨，

带我走遍全岛，一一指给我看当年右派劳动的地方。

“这条石板路就是当年右派修的……这些樟树也是右派栽的。”鲜担志边走边介绍。“飞龙岛以前没有这么多树，也没这么好看，都是右派的功劳，只是他们都走了。”

的确，眼下的飞龙岛一片寂静，一点右派的“气息”都闻不到。

不过，右派们也没有全走，一些人永远留在了这儿，如投湖的宁振笃，被打死的杨昌林等。

世外桃源般的飞龙岛，含翠欲滴，这儿会有那么多血泪？那么多苦难？那么多恐怖？怎么看也让人难以相信。



2002年6月，当年在飞龙劳改的右派重返旧地留影（谭松摄）

## 不是“分子”的“分子”

2004年7月7日，我在长寿湖边偶遇右派李正的弟弟李柏桦，他对我讲述了他的遭遇：

我是1961年在重庆第二师范学校（即现在的重庆教育学院）读书时遭的殃。

有一天我背诵李友才板话——那是语文书上的一篇课文。

“模范，模范，从西往东看

西边吃烙饼，东边喝稀饭”

我背到这儿时卡住了，于是从头又背。

这个时候窗外有一个学生会干部路过，他是低年级的，没学过这一课。他听见我读“西边吃烙饼，东边喝稀饭”，认为是个政治问题，因为毛主席说过“东风（社会主义）压倒西风（资本主义）”。

他马上跑到教务处去汇报。恰巧教务长出差，他若在，知道这是课文，我也没事了。教务处一个女干部也没读过李友才板话，听了汇报，她也认为问题大，于是就把我下放到重庆广阳坝农场劳动。

我一直在那儿劳动到文化大革命才弄清楚我被发配的原因。是教务长告诉我的，他叹了口气，说：“这事整个整错了。”

但是，木已成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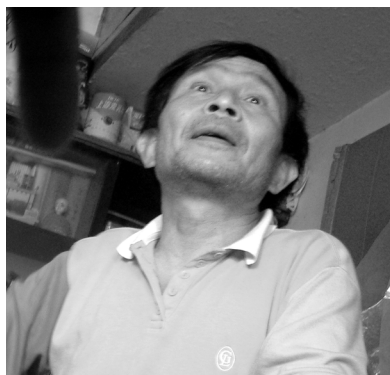
你不知道，当年我特别喜欢读书，尤其是喜欢语文，喜欢写作……

1971年，我通过婚姻转到了长寿湖，从此留在这儿。

## 在苦难中坚守

张一华

长寿湖右派张元任之子



我爸爸是1958年被打成右派的，当时他在北碚44中学教书。运动都要结束了，上面来人叫他一定要给党提意见，爸爸顺便说了几句，大约是关于教学方面的，结果马上就被揪出来斗。我当时读小学四年级，认得些字，记得那大字报上有“张元任为大右派董时光摇旗呐喊”、“挂羊头卖狗肉”等等。

爸爸下放农村后，我们全家生活立马陷入困境。最痛苦的是学校要把我们赶走，不准我们再住学校的房子，我们全家六口人被挤到一个7、8平方米的灶房里。我没地方睡，天天晚上翻到教室里，把课桌拼拢当床，夏天那个蚊子才把我咬得惨。

婆婆看这不是个办法，到市中区求她的一个亲戚，亲戚勉强让了半间屋给我们。

1960年我小学毕业，一毕业就给我一张通知书——到缙云山农场劳动，也就是下放农村。我们学校所有“出身不好”的同学都收到了通知。这一棍子把我打昏了，也打痛了，后来我经历的那些挫折和痛苦都没有那张通知给我的打击大。我清楚自己“出身不好”，我也明白今后肯定不会准我上大学，但我没有料到连初中都不准我读，才14岁就要赶我下农场！

我一气之下跑到朝天门码头给人擦皮鞋，这一擦就擦了四年。那一段日子很艰辛呐。当时，擦皮鞋是非法的，说是“挖社会主义墙角”，警察要抓，要收缴工具。我天天像做贼，看见警察的影子，提起箱箱就飞跑，就看谁跑得快。

另外，我还经常过江到南岸的黄山上去挑黄泥巴卖。从黄山到市中区有好远你晓得，一斤泥巴（捏煤球用）才一分钱。我为了多挣点钱，拼命压担子，十五、六岁，我就可以挑100多斤。你看我爸爸个子高高大大，我这么矮小，就是那时压的。

1964年，搞“四清”运动，我被抓了，罪名是“投机倒把”。一大批像我一样生活无着落，没工作、没职业的人（都是“出身不好”的人）也被抓了。我们被集中到沙坪坝办“学习班”，半天劳动半天“学习”。头半年没得自由，半年后准许星期天回家一次。我在“学习班”里一直呆到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才出来。“林彪事件”之后，社会松动了一点，准许我去干临时工，这样我进了一个厂当了临时工，几年后转正，成了正式工人。

现在？现在那个厂（重庆印制二厂）已经垮了，我放回家，每月从社保领取生活费400元。

那几十年共产党整我们，我认命，谁叫我们“出身不好”？我爸爸当右派，主要是因为“出身不好”。我爷爷张一之曾经担任丰都、长寿、威远等县的县长，1950年3月被共产党镇压（枪杀）。爷爷死时我才4岁，不懂事，后来我到丰都、威远，意外地了解到，我爷爷是个清官，正直、有文化、有同情心。例如，前些年我到威远去找我妈妈的坟（她在我一岁时就去世了），在乡下遇见了一位86岁的老人，他得知我是张一之的孙子时，立马对我十分恭敬。他告诉我，我爷爷是个大好人，当官清廉，很关心老百姓的疾苦，遇到荒年，马上开仓济贫。我爸爸也说，爷爷当了多年的官，一生清贫，没有置下任何产业。“文革”时红卫兵来抄家，见我们一贫如洗，不相信，认定我们一定是把金银财宝埋藏起来了。他们挖地三尺，真真的挖地三尺！就在我们的屋里，结果一无所获。

我爸爸继承了爷爷的品质，正直、讲良心，只是他一生太不幸。

他是重庆大学工商管理系的高材生，校学生会主席，著名数学家何鲁非常赏识他，把他引为自己的得意门生。可惜，“解放”不久（1950年），他就被公安局抓走，说他是特务，关押了一年多。后来查无实证又放了。几年后他当右派，1960年老婆离婚，带走女儿（从此他没有再婚）。1963年，他被重庆市教育局开除，从长寿湖回来后生活没有着落，只得天天起早摸黑走街串户去给人理发。当时理一个发小孩一角钱，大人两角钱（我擦一双皮鞋两角钱）。我们父子俩出卖劳力，一分一角的挣钱活命，但是我们两个都被当作“挖社会主义墙角”、“破坏社会主义公有经济”的“投机倒把分子”。我爸爸好多次被抓住，收缴理发工具，人被扣押。我最记得我婆婆，每天早晨眼巴巴地望着爸爸出门，每天晚上又眼巴巴地盼着儿子回来。天一黑，她就站在门外，一动不动地盯着爸爸回来的路。多年来，我都忘不了婆婆晚上站在门外的情景。

我婆婆没有文化，但她一辈子温良恭俭让，我们搬了好几次家，没有哪一处的左邻右舍不说张婆婆是个好人。“文革”时她也被抓来斗。爷爷被镇压时她还不到40岁，从此守寡，一辈子担惊受怕。

我这一辈子虽然只读了个小学，但是我清楚该如何做人。我爷爷、爸爸有很好的家传——做一个正直的人。我在朝天门擦皮鞋时，经常有其他娃儿来怂恿我去摸包（当小偷），他们说，擦鞋又累又不挣钱，要我跟他们干，我坚决不同意。再苦再累，我也要正正规规做人。

采访时间：2001年10月18日 2003年10月21日

### 采访后记

2001年月10月，我初次到张元任家采访，老人因患帕金森氏综合症，说话吃力，行动困难。然而，更重的“病”是他内心深处的“恐惧症”。他断断续续提起往事，生理和心理的巨大障碍使得他的表述十分艰涩。他儿子张一华在一旁帮他，提到他曾被公安关押。张元任见我拿笔记，神色骤变，突然一挥手，厉声说：“公安这一段你不准写！”

我一惊，抬眼一看，见老人面色异常凝重，目光里充满恐惧。

我没想到“公安”两个字竟让已75岁的老人反应如此强烈。我知道无产阶级专政“伟大”，但没想到它“伟大”到这种程度——真真的“谈虎色变”。

然而，老人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激“怒”了我，我慷慨激昂地发表了一通“演说”，大意是：不能因为恐惧而让这段历史永远淹没。如果不让子孙后代了解真相，吸取教训，那些苦是白受了，那些死去的难友才真正冤枉。同时，我暗暗有些责备，说，要害怕，应当是我害怕，我也有妻子儿女，而他，在这把年龄，应该是无所谓了。



张元任

老人听了我的“演说”，默默无语。半晌，他指示儿子把他发表过的几篇文章交给我，其中一篇是纪念他的恩师何鲁（著名数学家、重庆大学校长）的。

从张元任家回来后，我一直没有动手写他的经历（采访本身也不完整），他那恐惧的目光让我想放弃他。

几个月后，我本人落入“公安”（国安局）之手，出来后，又度过了一年不准“乱说乱动”的“取保候审”。

但我始终忘不了他，总想再去看看。终于，昨天，在距初次采访的两年后，我又走进他的家门。

老人坐在轮椅上，目光呆滞，已经不能言语，也不能动了。

显然无法再同他交流，我望着他，感到十分悲伤。这位1949年重庆大学的高材生，仪表堂堂的男子汉，从1950年起，人亡家破（父亲被杀，妻子离婚），几十年大悲大苦，走到晚年，又落下这种病，生不如死。

幸而他唯一的儿子张一华十分孝顺，同妻子一起尽心尽力照顾父亲。

他一边关照父亲，一边告诉我他的经历，并说他最恨那些当官的，敢同他们斗。

显然，张一华不会再像他父亲那样“谈虎色变”了。不过，提到我被“公安”抓的事，他好几次提醒说：“你看上去比两年前苍老多了，搞长寿湖，你要多加小心，告密的人多，公安黑。”

2003年10月21日

补记：张元任老人在2005年去世。

# 1967年，我两次在长寿湖见到父亲

林兴和

长寿湖右派林振笃之子，1947年生



1967年，我已经好几年没见到父亲了，心里很想念，正好遇到几个在长寿西山劳动的学生，他们说见到过我父亲，于是，我便找了个机会去了长寿湖。到了狮子滩后，不知怎么走，看到一幢办公楼，我便进去讯问，一个工作人员以为我是造反派来接洽工作，态度还热情，当得知我是右派亲属来找人，态度就变了。他伸手往湖边一指：“那里，一大群右派。”

我赶到湖边，一群右派正在抬石头。那个石头很大，听见一个右派在唉叹：“唉呀，我真的抬不动了。”

在湖边，我听说父亲在飞龙岛，还很远，不过到晚上那些造反的人要回去，他们有机动船。

我等到晚上，搭乘他们船在夜深时到了飞龙岛。当夜我就住在他们那个地方，好像是叫杨家湾。

第二天早晨，八点时分，右派排成单行出工劳动，有人叫：“林振笃，你儿子来看你了。”

我看到了几年未见的父亲，父亲看见我很高兴，兴奋得连他的饭碗放在哪儿都不知道了。但是我们没有多说话，他也要干活，是给猪场打猪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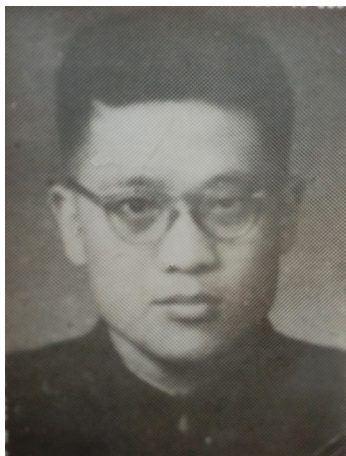
当天晚上我同他挤在他的床上，他问了家里的情况，我们小声地讲起正在全国开展的文化大革命。第二天他给我五元钱叫我去赶场，那时五元钱还是很值钱的。

几天后我要走了，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临走时他对我说：“你回了家之后，去照一张你几姊妹的相片给我寄来，有多余的粮票给我准备一点。还有，能不能给我买一双统靴。”我都点头答应了。

他要劳动，不能送我，他去借了二十元钱交给我。我对他说，我去买支钢笔，用它给你写信。

说完我同父亲就分别了，这是我在长寿湖第一次见到他，时间是1967年2月中旬。

我回来后只有二十多天，突然接到北京姑姑的电报，说我父亲去世了，叫我赶快到长寿湖！



林振笃当右派前

我慌忙又往长寿湖赶，又是乘船到长寿，乘车到狮子滩，然后一个姓黄的人划一条“双飞燕”（一种双桨的小木船）把我送进飞龙岛。

父亲就躺在湖边，一个叫张学渊的右派在照守，他说，父亲是投湖自杀的，好些天才浮起来。

我看到尸体时，尸体已经发胀变形了。我俯下身子去看他，心中当然很悲痛。旁边一个学生还好，他安慰我，叫我不难过。最混账的是那个叫“耗儿”的学生队队长，他冷言冷语地说：“你好像同你爸爸的界线还没有划清。”

我离开他只有二十多天，与父亲就阴阳相隔了，这二十多天发生了什么呢？

（注：为了解林振笃之死，我采访了好些当时在飞龙岛的右派，下面是几位的讲述。）

**杨光瑜：**林振笃是个很好的人，个子又高又大，他不多言多语，一向沉默寡言。

**李恩章：**他从来不发言，那次造反派组织开会，要他发言，他就发了个言，对学习班的组长提了个意见。这就遭了，要批斗他。

**王义珍：**他对造反派说，你们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我建议你们把学习班这些组长横扫一下。他就说了这句话，唉呀，就不得了了，要把他弄来斗。

**黎明苏：**他经常被批斗，觉得没有出路，他平常也比较孤独。

（连续不断的批斗，终于摧折了林振笃的生存意志。）

**李恩章：**他跑到馆子，要了几个菜，吃了以后，他会游泳，游泳游得好，他在口袋里装上石头，跳到湖里。

**杨光瑜：**他自己又会游泳，生怕死不了，他把那些石头放进衣袋里，强迫自己沉下去死了。

**林兴和：**我了解到，他给学习班的组长孙某提了意见，组长就是领导，给组长提意见就是攻击领导，攻击领导就是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我听说他用了“刚愎自用”、“断专行”的词。

有一个右派告诉我，他投湖的那天晚上，在马灯下写到凌晨两点，怎么知道的？因为他有手表，他看了手表，还说了一声：“老林，该睡了。”

可是，我没有看到他的遗书，据说他投湖后，孙组长第一个去查了他的遗物。我去接收父亲遗物时，没有见到他的遗书，还有他的一件咔叽布的衣服也不见了（二十多天前还在）。遗物中有一个旧皮包，但里面一分钱都没有。另外，在他一件衣服的口袋里有一张照片，上面是我母亲和我二妹。这使我想到二十多天前他托付的事，可惜我一件都还没有给他办，他想要的那张照片也没去照。

问：你父亲是怎么打成右派的？



林振笃（右一）与妻子和儿子林兴和

**林：**他是南开大学毕业的，1953 年从北京到重庆 57 中教书。1957 年反右运动时，校长赭作阶（音）找到他，说要帮助党整风，要他给党提点意见。父亲说他没得意见，校长一再要他提，并同他在校园里散步谈心。于是他提了两条，一是“现在的教育质量没有过去高了。”二是，“麻雀也要吃害虫，不该剿杀。”（因为中共曾把麻雀列为“四害”，发动了一场剿灭麻雀的群众运动。）他就为此被打成右派，也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林振笃当右派前与子女合影

现在五十年过去了，我没有哪一天忘记过在湖边见到父亲遗容的情景。有句话说：死不瞑目，死不瞑目。真的是！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鼓起的眼睛，很大！那一对死不瞑目的眼睛……

采访时间：2016 年 1 月 22 日 地点：重庆市渝中区



林振笃投湖处（谭松摄）

林振笃 1967 年 3 月遇难，终年 42 岁



# 那血泪横飞的一堂课

谭宗旭

谭显殷之子，1955年生



十三岁时的谭宗旭

父亲划为“反党分子”时我只有两岁多，我进小学时他才从长寿湖回来。他给我们全家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在我记忆中，那20多年里人生路上的每一步都要因为他而受挫折：升学、加入少先队、共青团、招工、参军、谈恋爱……

例如，我在农村时爱上了一个女知青，第一次到她家，她父亲就扳着脸当着我的面训他女儿说：“你太幼稚了，太感情用事！就算你不怕，你也要为你后代着想，现在做什么都要查三代。”

那些年，经常要填家庭出身，每次我都狼狈不堪，就像自己是个小偷、强奸犯，必须把自己的丑恶一次次昭告天下。

讲一件我初中在课堂上的经历吧。

那一年我13岁，在重庆东方红一中（后改为90中）读初一，我个子矮小、瘦弱，坐在第一排。我也愿意坐第一排。1969年，社会上乱糟糟的，教室里也乱糟糟的，老师没办法管学生，也不敢管，上课时学生可以闹，可以在教室随意走动。我从小就喜欢读书，喜欢上学校，我愿意坐第一排就是想认真听课。

那一节是语文课，教师叫程志远，她教得很好，很生动，我最喜欢听她的课。

后面一向闹哄哄的，我专心听课，没注意他们说些什么。突然，有几个字钻进我耳朵：“谭宗旭的爸爸是反党分子！”

“轰”地一声，我头像炸了。糟了！他们知道我爸爸的事！他们怎么会知道呢？！才进校不久，彼此并不熟。我决定装聋作哑，不理他们。我再也听不进课，盼望赶快拉下课铃。

一个叫蒋XX的同学从后面摇摇摆摆走上前来，他是海棠溪一个杀猪匠的儿子，生得武大三粗。他走到我课桌前，指着我鼻子说：“你，滚出教室！”

我瞪着他，一言不发。

后面一位姓范的同学高声说：“蒋XX是群专大军的。”

“群专大军”是文革中的一个新生事物，全名叫“无产阶级群众专政大军”。范说这话是指要对我进行专政。

蒋XX见我不动，伸手一挥，把我桌上的书、本子、文具盒全部扫到地上。

我气得发抖，笔还握在手上，我冲着他一挥，一管墨水洒在他脸上和衬衣上。

课桌翻了，我们扭打起来，他后面那帮哥们一拥而上，我转眼被打倒在地。

摔在地上的文具盒里，掉出一根铜尺子，那是我外公的遗物，混乱中不知谁用那铜尺在我头上打了一下。

程志远老师拚全力拉开同学，把我从地上拖起来。我坐回座位，衣服撕烂了，书和本子更是撕得稀烂。恍恍惚惚听程老师说：“你们不要这样对待谭宗旭同学，你们不要这样对待谭宗旭同学，他还有一个共产党员的妈妈。”

（后来我才知道程老师了解我家的情况，我妈妈在一所小学当校长时，她在那所学校教过书。）

我觉得眼泪要涌出来，拚命忍，脸发烫，双手发抖。不能哭，绝不能哭！班上有这么多女同学，有一个叫唐孝蓉的女同学我正暗暗有些喜欢，我不能在女同学面前丢丑。

眼泪夺眶而出！我这辈子对“夺眶而出”有刻骨铭心的体会。

我用手一抹，发觉有血——铜尺敲过的地方正缓缓流出鲜血，我一点都没有觉得痛。

程老师也看见了，她赶紧把我带到校医务室——一个位于楼梯下面，斜斜窄窄只有几平方米的地方。程老师把我交给那个全校唯一的校医——一个胖大嫂，便匆匆赶回教室。

胖大嫂剪去我头顶上的头发，叫了一声：“天哪，只差一点就打在脑门心上！”

我一点不觉得痛，只有上碘酒才有感觉。

我头上顶着一块白纱布走出医务室，去哪儿呢？回教室？不，绝不！回家？也不。

学校背后的山坡上，为响应林彪备战的指示，挖了一些半人高的防空壕，我走到防空壕，跳下去蹲在里面。

四下很安静，我听见心还在疯狂地咚咚地跳，我觉得自尊心就像我的课本一样，被撕得稀烂，踩在地上，再也捡不起来，再也补不好了！

我在那个防空壕里整整蹲了5个多小时，不吃、不喝，也不觉得饿。就在那儿，我对天立下两个誓愿：一、发奋读书，这辈子要做个有用的人；二、一定要操“扁挂”（即练武术），像水浒上的好汉，“拳打北山猛虎，脚踢东海蛟龙”，十个蒋XX也不是对手。

当天回家，我对妈妈说，打球头撞在篮球架上，受了点伤。那些日子妈妈天天焦头烂额，顾不上我。

每天，我背起书包出门，但不再去学校，我往黄桷埡山上走，想寻找寺庙。武侠小说上说，庙里的和尚都会武功，我想拜他们为师，或者干脆出家，习文练武。

山上有座老君洞，我爬上去，进门一看，断壁残垣，空无一人，门口那尊高大的石头将



初中毕业合影，第三排右三是谭宗旭

军被拦腰打断，庙子里吊着几个泥菩萨的头，下面还残留着红卫兵留下的标语“砸烂狗头”。

我又往更深的山寻，仍然一无所获，我很失望，只好回家自己练。我把两块砖头打两个孔，当哑铃，在腿上绑上一圈铅块，练轻功，把手臂往门前那棵树上“披”（即碰砸），练坚硬。晚上练，早上练，四点半就起床练。我身体原本瘦弱，家里穷，营养不良，傻乎乎地猛练，肯定要出问题。一天清晨，我正在练习假想中的对打时，头发昏，一头撞在厨房墙的棱角上，当场人事不醒。

醒来时已经是中午，躺在医院。一颗门牙断了，额上一个大血包，嘴肿得同鼻孔一样高，弟弟正在擦我不时吐出来的呕吐物。

我清醒后的第一个念头是：我给家里添麻烦了，家里穷，住院费怎么办？

那是我第一次住院，住了6天，为了省钱，我坚持让家里把我抬回去，在家里又躺了两个月。两个月后，我偏偏倒倒站起来，身体更加瘦弱，胳膊更细，拳头都握不紧，彻底断了“拳打、脚踢”的远大志向。还有，大脑也受到很大影响。以前，我记忆力特强，岳飞的《满江红》，我读两遍便能背诵，至今不忘。小学时，我从二年级跳入四年级，学习轻松得很。脑震荡后，头痛了很长时间，记忆力也下降。



小学跳级后，妈妈很高兴，  
特地带我照了张像

重返学校时，我心情非常紧张，记得进教室时，我咧嘴笑了一下。后来，好朋友杨星月告诉我，我那个缺牙咧嘴的笑，像鬼。

整个初中，我都很孤独，不敢与同学往来，但我心里面很渴望交朋友，想得要命。有一天，班主任冲着那个正调皮的同学说：“你捣什么乱，你那个出身还不让你吸取教训？”那个正活蹦乱跳的同学马上呆了，垂头丧气走到过道上淌眼泪。我一见心中大喜：哇，班上还有个出身不好的！我于是主动去亲近他，同他坐到一起。我了解到，他爸爸以前是国民党的一个军医，眼下正在挑泥巴劳动改造。

这个同学叫杨星月，我同他成了好朋友，30多年了，至今我们还有往来。

对了，那个要对我进行“专政”的蒋XX，毕业时我们也和好了，他也是个十几岁的男孩，不懂事。他告诉我，是郑宏伟（我们班上的另一个同学）告诉他们我爸爸是反党分子。

郑宏伟的父亲当时任南岸区武装部部长，他认识我父亲。

采访时间：2002年4月6日，地点：重庆市九龙坡区

## 采访后记

去年今日，我去拜访黎民苏，开始了对长寿湖右派的采访，到今天，采访了76位老人。此外，在这一年内，为协助中央电视台拍摄专题片《重庆大轰炸》，还采访了102位大轰炸幸存者。

近 200 位沧桑老人，在我面前打开一页页尘封的历史，我读得双目疼痛，心灵喘息。  
中华民族这 100 年的血泪沧桑啊……

我不幸看到了你喧嚣下面沉默的真实。

我有幸读到了你遗忘后面苦难的记忆。

家住渝中区大同路的罗汉先生，父亲（杂技演员）被日本飞机炸死，继父（杂技团团长）被共产党抓进监狱整死。

家住杨家坪电力大厦的刘管如老人，四十年代三岁的女儿被日机炸死，五十年代本人被共产党关押，没收全部财产，外加一个“管制”。86 岁的老人，60 年来面对从他女儿头上取出的弹片，无处诉说。

家住渝中区的黄天禄老人，父亲开的栈房被日本飞机炸毁三次，全家节衣缩食修复三次，最后被共产党全部没收，再也无法“修复”。

9 岁时被日机炸断一条腿的石仲英（女，家住沙坪坝区凤凰镇皂角村），29 岁时连滚带爬到公社食堂去吃被别人抢剩了的“共产主义集体伙食”，差点饿死。

家住江北洋河花园美居园的赵幼庚，1940 年全家财产被日机燃烧弹焚毁，爷爷奶奶活活气死。1968 年，他最心爱的独子赵宏强（重庆市育才中学学生）被“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造反派打死。

还有为炸死的母亲泣哭和为右派丈夫泣哭的王惠。

还有从日本人的屠刀逃脱，落入共产党“阳谋”的李恩章。

还有 40 年代在大溪沟家被炸，50 年代在南温泉人被整（当右派）的王义珍。

还有……

一年的时间，稍稍一接触，竟发现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中，在高楼林立的辉煌下面，编织有一张细细密密的苦难蛛网，正像索尔仁尼琴笔下的《古拉格群岛》。

面对这蜘蛛网一样密布在地下的苦难和冤魂，我感到无力得很、绝望得很。我采访过的白永康老人、王吉福老人（大轰炸受害者，家住江北野水沟 94 号）已经走了，在我采访期间，长寿湖右派郭无畏、张积成也走了，在我采访前，无数长寿湖和非长寿湖的各种“分子”早走了，他们把自己的眼泪、屈辱、爱、恨永远带进了坟墓，无人知晓。

时光轻灵地流淌，再浓的鲜血也稀释了，再多的苦难也遗忘了。况且，这原本是一个善于遗忘的民族，况且，这是一个决不准揭头上癞疮的政权。

昨天是一年一度的清明节，我没有去上坟烧香。

在哪一个人的坟头伫立致哀呢？为白永康？还是为郭无畏？而且，万顷湖水中有多少沉默的冤魂？白茫茫的大地上有多少无碑的坟墓？惟有在这盏伴我寂静长夜的灯下，让灵魂在那些永远消匿了的无辜而高贵的生命前长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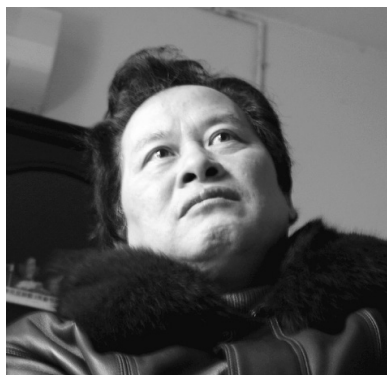
2002 年 4 月 6 日夜

（写完这篇采访后记两个多月后，我被重庆市国安局抓获。）

# 我走向父亲死亡的地方

何隆华

长寿湖右派何泰贵之子，1948年生



何泰贵，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他为一句话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并祸及妻儿老小几十年。那句话是：“上课的教师应当有真才实学，否则要误人子弟。”

下面是其子何隆华的亲身经历。

我八岁以前曾生活在一个温馨、安宁的家庭，父亲在重庆第十七中学教书，母亲在银行工作。十七中学位于南岸海棠溪烟雨坡山顶上的那栋有围墙的教师小院，是我们五兄妹儿时嬉闹的天堂。院内住的老师们的孩子有十几个，我们玩“官兵捉强盗”的游戏，去小溪里捉鱼，傍晚争抢母亲从银行工会借回来的十本连环画，无忧无虑地过着短暂而欢乐的童年。

1957年一夜之间，灾难降临到我们家庭。父亲学校的领导反复动员父亲帮助党整风，提意见。父亲于是说了一句：“上课的教师应当有真才实学，否则要误人子弟。”父亲说这话是基于当时学校调进了不少没有文化的人，包括一些转业军人，这些人也站到讲台上上课，效果极差。为这句话，父亲被打成右派送到南桐矿区乡下劳动改造。

当时，我们兄妹五个中最大的姐姐十三岁，最小的弟弟才六岁。父亲被带走后，家里忽然失去了主要生活来源，母亲早出晚归独自苦撑。我们被人赶来赶去不断地搬家，无人照料。读四年级那年，九岁的我考试得了第一名，当我正沉醉在考了第一的喜悦中时，老师放在讲台上的点名册中，我的名字后面赫然写着“右派家属”四个字被同学发现了。在学校广播里“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右派分子跑不了”的歌声和同学的轰闹中，我因学习成绩好而仅有的一点自尊和优越感被撕碎了，我默默地远离同学，从此变得落落寡合。



何隆华五姊妹 1954年

我们班有三个出身成分好的同学程温斌、陈森林、宋同福。三人的共同特点是学习成绩出奇的糟糕，但身强力壮。他们经常暴打体弱的同学。我不仅体弱而且出身“不好”，更是被欺负的对象。初中三年我都是班上的学习委员，程温斌老是抄我的作业。一次我稍示不满，他踹了我几脚后，跑到讲台上活灵活现地表演想象中的解放前：他们家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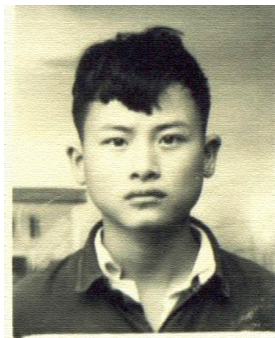
雪天提篋到我家讨饭，被剥削阶级的我父亲一脚踢出门外。全班男女同学哈哈大笑，泪水在我眼眶里打转，屈辱的我羞愧得无地自容。表演完后，程温斌还丢下一句话：“不管你成绩多好，量你也升不到学！”

1964年8月，程的这句话不幸言中。我们班（重庆三十九中初六四级五班）52名同学几乎全部考上高中和中专，只有少数几个和我一样家庭出身有“问题”而学习成绩名列前茅的同学落榜了。

一向健谈的班主任邓时才老师沉默了，收拾了几本他自己的书递给我后一言不发地离去。

随后，龙门浩街道办事处于子力书记拿出一张纸单向我母亲宣布：“无产阶级教育要为阶级斗争的政治服务，下面念一下上级通知——龙门浩地区本年度应届毕业生中家庭出身有问题，中考不予录取的八十人名单。”

我自然在那八十人中。为了迅速把我们这些“分子”子女撵下乡，街道办事处使用了各种手段。比如对父母双亡只有十五岁的贺树全，办事处通知供电所停了贺的兄长的临时工工作，兄妹三人断了生活来源，无奈之中贺树全只好下了户口。又如贺亚伦全家老小九人，靠其父在南岸区龙门浩小学工作维持生计。街道办事处采取分批进屋24小时轮番“轰炸”战术，最后干脆通知学校停发其父的工资……



少年何隆华（14岁）

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孤儿寡母早已是阶级斗争暴风骤雨中的惊弓之鸟，全家人赖以生存的母亲如果再出点问题，一家人怎么生活呀？

我清楚地知道，生我养我的故乡已经没有了我的安身之地，厚爱我的班主任邓时才老师和我珍爱的校园生活将永远离我而去。临行前集中住宿在两路口公寓里，睡梦中泪水浸透了枕头。学校上课的钟声条件反射地将我惊醒，我茫然地看着窗外，校园的钟声今生已与我无缘……

1964年9月，我下乡到了大巴山深处的南江县，那时我尚未满十六岁，体重七十五斤。我在那大山里做了八年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其中的艰辛一言难尽！

最痛苦的是在精神上。夜深人静时我冥思苦想：父亲因言获罪受辱，就算有罪，他已经用生命作了代价，而我何罪之有？想到这儿，我又为自己有这些想法感到害怕和恐惧，受了那么多年的“革命”教育，知道这样想下去是非常危险的。于是，白天我拼命咬牙干重活挣表现，要求进步争取入团，晚上煤油灯下学毛主席的《青年运动的方向》、《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老三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等。希望在农村艰苦的生活中把自己改造成社会主义新人，这样，我的下一代才会有一个平等的生存环境。

为了回到离别了八年的重庆，1972年我只好到了别人都不愿去的运输合作社。所谓“运输”，就是抬石头、拉板车、扛货包等苦力活。上班第一天我领的工具是两个竹筐、一根扁担、和一条再生布搭肩帕，工作就是到码头木船上挑煤炭。

运输合作社人员结构可谓“复杂”，除了我们这些家庭出身“有问题”的知青外，老的下力人大多数都是从各个单位淘汰出来的“黑五类”。我所在的第五组中就有原国民党庐山军官训练团出来的宪兵班长黄杰、中华职业学校校长肖中一、国民党赴缅青年

远征军周绪光、逃亡地主柴福堂、国民党“内二警”卞绍中等等。这些人要嘛很有才学，要嘛十分冤屈。比如肖中一，他懂好几国语言。又如周绪光，他是抗战打日本，但只因是在国民党军队里，就被打成了反革命。这些人当时统统被称为“牛鬼蛇神”和“国民党残渣余孽”，每个礼拜都要定期到派出所去接受训斥，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还有，运动一来首先就把他们拖出来整，挨打受骂



第三排右二为何隆华

是家常便饭。几十年整下来，他们早已没有了做人的尊严，一个个畏畏缩缩，成天心惊胆颤。有一个叫李伯安的摄影师，解放前曾被叫到南山给蒋介石拍过照，为此事他也被淘汰出来下苦力。前几年我一个朋友听说了这事，来了兴趣，想去采访他。我把朋友带到李伯安家，这时他已80多岁了，社会上也没再搞阶级斗争，但他一听到问起给蒋介石照相的事，仍然骇得心惊肉跳，连连说“没有，没有！我从小就拥护共产党！我从小就拥护共产党！”

（注：我同何隆华都是重庆南岸区上新街的人，我每天上学、放学都要经过那个运输合作社。文革中的一天，我放学路过，门里面传来怦怦砰砰的踢打声。我扭头望去，几个汉子正围着一个中年男人边打边骂。不一会，中年男人被一脚踢出门来，摔倒在地上，里面还在骂：“今天先放你回去，明天来继续接受专政！”中年男子从地上爬起来，双手压着被打伤的腰，轻声呻吟着，一跛一跛地走了。几十年过去了，我永远忘不了山城血红的夕阳映照的那张惨白的脸。）

管理运输合作社的人是一个叫淦某的共产党员，此人一字不识，他有一个人所共知的特殊爱好，就是常常单独找一些长得胖胖的女知青到办公室去关门做党的“思想工作”，若干次“思想工作”后，这个女知青就有可能获得脱离苦力活而进入办公室的机会。

运输合作社的劳动强度非常大，拉板板车、抬连儿石、扛货包、装车、卸船……超强度的繁重体力劳动磨平了我们的心智，也佝偻了我们的身体。和我一起从南江县正直区调到运输合作社共四个知青，其中三人皆因劳累过度先后去世，他们是邱仁杰（南江县正直区黑潭公社林场）、夏宝庆（南江县正直区朱公公社林场）、杨昌荣（南江县正直区菩船公社林场），他们死时都不到五十岁。

从1972年到1986年，我又下了整整十五年的苦力，其中的艰辛又是一言难尽！

此外，还有说不完的屈辱。例如，一次，淦某叫我们去给南岸区公安分局伙食团运煤炭、砖头、木料、石灰等。我们肩挑背磨，汗流浹背干了好几天。干完后，大家谁也不敢拿托运单去找公安局的经办人签字，签不到字就等于白干，拿不到工钱。那些老的“残渣余孽”们早被“公安”们整得心惊肉跳，谈虎色变，一个个你推我，我推你，谁也不敢上前。最后他们对我说：“小伙子，你没有什么问题，好说一些，还是你去吧！”

我于是拿着托运单，找到公安分局管总务的警察李某。他双眼一瞪，把托运单一扔，吼道：“甚么？甚么！给公安局做事还要签字，还要付运费？！走！走！！”

我想到我们这么大一帮人，靠苦力挣钱，不甘心放弃，缠着他向他讨要。他烦了，一个电话招来分局有名的打手，刑警“王摩托”。“王摩托”一进屋，“哗”地一声掏出手铐说：“你敢在这里闹，老子把你铐起来！”

我强忍怒火，万般无奈地走出了公安分局大门。

……

到1986年，我已经38岁，已经下了23年的苦力，但是，这并没有改变我酷爱读书学习的秉性。我在劳动之余通过电大和自学考试的学习，深藏内心的求知欲被激活了。

1986年夏，《重庆日报》刊出了一条《招聘启事》——长寿湖渔场子弟中学招聘教师。

长寿湖！我心灵深处埋藏的那段悲情被触动了。我于是别妻离子，孤身一人到长寿湖应聘任教。

坐在长寿县城到长寿湖的汽车里，我刻骨铭心地想到了父亲！

他当年到长寿湖劳改也是三十八九岁……

我多次听母亲讲，父亲非常敬业，他复旦大学毕业，教普通中学仍然备课到深夜……

在长寿湖渔场子弟中学，我只是一个招聘的临时教师，但我全身心投入了教学。同时，我似荒芜已久的土地如饥似渴吸取着知识的甘露。启蒙主义、人文主义的光辉使大写的“人”在我心中复苏。在长寿湖渔场子弟校这个相对封闭的地方，我通过了自学考试、高中语文教师教材教法和专业证书考试的全部课程，获得证书。我教过初中至高中段的语文、英语、历史、地理、政治等学科，也得到老师们和同学们的信任。1987年底，长寿县推行校长负责制，我这个招聘教师经全体老师、职工代表和学生家长无记名投票选举，当上了副校长兼教导主任。

1987年春，我带学生到湖中的同兴岛野营。望着当年右派分子种下的大片大片的广柑树林，闻着在春天的阳光下喷发出的沁人的花香，听着学生们追逐着拾蘑菇准备野炊的欢声笑语，我又想到我父亲。

据说，父亲到长寿湖后仍然很讲究卫生。当时，不把右派当人，用装粪便的篾箕给右派装馒头，挑到地头之后往地上一倒，饿得头晕眼花的右派们抓起馒头就往嘴里塞。但父亲不，他还要把沾了粪便的皮撕下来扔掉。你想，那是什么年代？一个馒头撕掉皮后就更小，他怎么活得出来？

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大约是在1960年初。他下放劳改后第一次回家。但是，家里人对他很冷。妈妈受党的教育多年，也认为他要好好劳动改造思想；哥哥姐姐饱受“出身不好”的痛苦，又在学校受了大量“阶级斗争”、“划清界限”的教育，不自主地把他当敌人看。父亲想亲近子女，但子女躲着他。那个时候，父亲身体已经很虚弱了，我外婆对我母亲说：“你看到没有，何泰贵的双脚是浮肿的。”可惜，家里没有给父亲一点资助。后来，母亲银行里的另一个右派家属张光宇对我说：我才不像你妈那么傻，我把黄豆炒了磨成粉，包做一个个小袋子，藏在何世平的衣服里，叫他饿慌了时拿出来冲水吞下去。”何世平因此活了下来。

父亲只在家里呆了两天，我清楚记得，他一言不发，呆呆地坐在椅子上，仰着头，长时间地望着天花板。两天后，他走了，双手空空，一两粮票、一点食物都没有。



青年何隆华



父亲很快全身浮肿。1960年11月的一天半夜，他下床后再也爬不上他睡觉的上铺。一番挣扎，他“砰”地一声倒下，再也没有起来。当时，他才40岁。

当年的幸存者、子弟校李长文老师很感叹地说：“六零年走的人算幸运啊！以后的历次运动更是了得！文革中，‘黑五类’们头戴高帽子、脸上泼墨汁、身上刷浆糊、挂牌弯腰；被造反派逼迫装猫装狗在地上爬，让大伙围着吐口痰；往裤子上泼煤油点燃后让红卫兵取乐……”

如此看来，父亲的早歿的确算幸运。因为这样的折磨，以父亲的性格是忍受不了的。

又一年夏天，我游泳游向长寿湖深处，我看着天空变幻莫测的云朵，又想起了父亲，想起了自己走过的几十年人生……

采访时间：2005年12月20日 地点：重庆市南坪

### 采访后记

2004年，在一次朋友聚会上，我遇到了何隆华，并读到他为《魂系大巴山》一书写的文章，十分感叹。2005年底，《魂系大巴山》出版，又细读了他的文字，当即前往采访。

在南岸区南坪何隆华的家里，何隆华谈到了一些他文章里没写进去的内容，好几次，泪水在他眼眶中打转，但，一直没有流下来。

2001年，我在采访时，仅从其他右派口中得知有何泰贵这么一个右派，饿死了。记录下来，只有一句话：何泰贵，教师右派，1960年饿死于长寿湖。

那背后的故事、那家庭的悲凉、那子女的不幸，一无所知。

本书中，有多少只有寥寥一句话就“交待”了一个人和其家庭的凄惨命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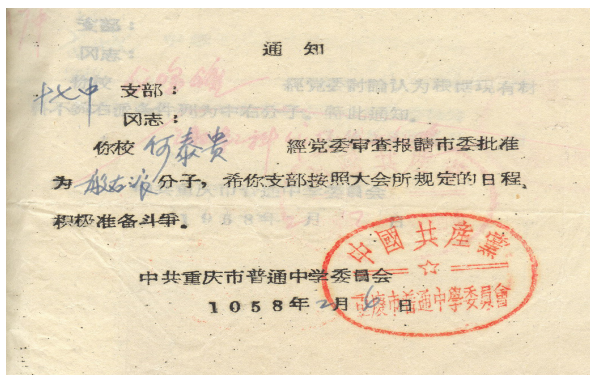
从何隆华家里出来，我老想起何泰贵呆坐在椅子上，久久望着天花板的情景——一个男人，此时是何等的绝望！

他只有付出生命的代价了，为了那一句“向党猖狂进攻”的“右派言论”——

——“上课的教师应当有真才实学，否则要误人子弟。”



何泰贵（1919年——1960年）  
此照片摄于1951年，32岁。



中共下发批斗何泰贵的通知

# 我一想起就头昏

戴儒愚

长寿湖右派何泰贵之妻

1920年生



## “我不想说那些事，提起头就昏”

我同何泰贵是在江北治平中学读书时认识的，他很快就喜欢上我了。后来上高中、上大学，他不断给我写信，写得很勤。我喜欢他是因为他非常聪明，在江北治平男中他老考第一；在西南联大也考第一；在复旦大学还考第一。在他大学毕业的头一年，我们结婚了，当时他23岁，我22岁。我们的婚礼办得很隆重，可惜那些照片在“文革”时全部烧掉了。

何泰贵毕业时，由于成绩非常优秀，又被保送到中央财大深造。老何这个人，是个才子，干事又认真，本来是应当有一番作为的。没几年，遇到解放（1949年），何泰贵是旧政权培养的经济人才，新政权不用他，他失去了工作，在家闲呆着。但是，他还是同其他人一样，满腔热忱地欢迎这个新社会。他跑到街上、码头去组织大家唱歌，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朗的天”……后来，有人说他“身份”不好，不要他去，他才又呆在家里。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找了一些关系，才给他找了一份当初中教师的工作。他本来是学经济的，从此改行当教师。虽然只是教个初中，但他非常认真，每天备课到深夜。

我做梦都没想到他会当右派！

我了解何泰贵，他是一个踏踏实实的知识分子……共产党老是整好人……算了，我不想说这些事，这么多年了，说到这些事我头就要昏。



戴儒愚 1952年

他下放到南桐农村劳动后，不断给我写信，写得很勤。我们单位的人事科长冲我说：“何泰贵组织观念很强呀。”意思是警告我，要划清界限。我害怕了，写信告诉他说，像你这种情况，不要再写信了，在那儿好好改造。

他于是就不再写了。在南桐最初时，我还知道他吃些什么，干什么，连他睡在鸡圈上，每夜鸡闹得他睡不着都知道。断了通信后，他的情况就不清楚了。后来转到长寿湖，更是一无所知，连他劳改和死亡的地点——同心岛——都是他去世后我才知道。

1960年11月23日，我接到了《右派分子何泰贵死亡通知书》。

他走了，他活不出来。他是个老实人，一个书生。从小他就很优秀，可以说出类拔萃，一直活得很有尊严。57年的巨变给他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紧接着的饥饿又彻底摧毁了他的身体，他活不出来。

我请假去长寿湖，身上带了十三个红苕。那时困难得很，每月一个人只有20斤粮，还要捐2斤“光荣粮”给国家，只有十八斤，每天六两。所以，我们也没办法支助何泰贵。

船到长寿县时，是下午一点，我不知道长寿湖往哪儿走，还有多远，我很少出门，心里很害怕。幸运的是，在船上一个坐在我旁边的男人也要到长寿湖，他说他是到云集，还在狮子滩的前面，可以一直陪我走拢。

下船之后，他说去找个人，不见了，我心里发慌，站在那儿不敢动。过了一会，他返回来了，我于是同这个男人一块上路。

在路上，我掏出三个红苕送给他，算是感激他陪同我吧。他当场就把红苕吃了，那个年代，人人都饿得慌。

我们走呀走呀，天慢慢黑下来，又下起雨。荒郊野外，我独自同一个陌生男人，心里又慌又怕……

突然我看到灯光了，那真的是像救星一样！

后来得知，这个地方叫邻封，是电厂的一个工地。

我们前去求宿，对方问：“你们是什么单位的，到什么地方去，干什么？”同行的男人很坦然地拿出外调的出差证明。但是我不敢把银行人事科给我开的证明拿出来，因为那上面写着：“兹证明右派分子家属戴儒愚前往长寿湖农场办理死亡右派何泰贵事宜。”这样的证明在那个年代我哪里敢拿出来？唉呀，说来也巧，办理登记住宿的那个人突然看着我说：“你不是上新街储蓄所的吗？”我赶紧说，是呀，你怎么认得我？他说，他到上新街去参观过，就是我给他们作的介绍。



何泰贵夫妇

我在那儿等了两天，还是没能进去。银行只给了我五天假，往返就要两天，我不敢再等下去，没办法去看丈夫的坟了，不得不返回。场里的干部拿出一个麻布口袋，说：这里面是何泰贵的遗物。我打开看，里面是他用过的被子、穿过的衣服……

我提着麻布口袋匆匆往回赶。在一个三叉路口，看见有萝卜卖，想到家里挨饿的孩子，就买了十斤，我拖着麻布口袋，搬不动，只好把口袋移一段路，又返回来搬萝卜，就这



戴儒愚 1954年

我心一下子放下来，这下好了，他没要我的证明，给我在临时工棚里安排了一个住处。虽然有了个栖身之地，但我哪里睡得着，天下着大雨，工棚又漏雨，我呆呆地坐了一夜。

第二天又走，到了农场场部所在地狮子滩。场里干部说：你丈夫是患心脏病突然死的，劳动的地点在长寿湖深处的同兴岛，还很远，要岛上的交通船出来才能进去。

样一段一段地往返，把丈夫的遗物和萝卜搬上船。

船到重庆朝天门码头时，我犯愁，怎么搬回去？哪知女儿隆静和儿子隆光早就等在码头，他们叫着妈妈扑上来，我眼泪一下就涌出来……

**戴儒愚女儿何隆静在《撕开尘封》中描述：**

60年的一天，我周末从寄读的汪山中学回到上新街枣子湾，才知道妈妈去了长寿湖。记得晚上很晚了与隆光去朝天门江边等妈妈，初冬河边冷风飏飏已刺骨了，只有我们两个小孩，不知妈妈何时到，我感到了忧心和凄凉。隆光说，他来接妈妈已经是第三天了，看着隆光忧郁的孩子脸，心里好冷好痛，想到隆光比我懂事，我俩因年龄靠近小时候经常在一起，他本来是出名的淘气，总爱歪着嘴笑。家庭的不幸夺走了他的童年和欢笑。

**戴儒愚：**直到1990年，我才第一次登上长寿湖同心岛，丈夫当年劳改时的住处已荡然无存了，他们只指给我看他去世时的地方，至于埋葬他的地点，一直没人说得清楚，他的尸骨，想必也早已无影无踪了。

采访时间：2006年3月4日，地点：重庆市南岸区



戴儒愚和她的五个儿女



1990年，戴儒愚携儿孙在长寿湖同心岛丈夫去世的旧地前致哀。

# 一个将门后代的遭遇

王薇

右派王大虎和右派曾蓉之女

1948年生



## 一，我的祖父王缙绪

要说我们一家的经历，先得介绍我的祖父王缙绪。

祖父1885年生于四川省西充县观音乡。幼年受业于举人，考取了秀才。他喜爱书法和诗词，也好收藏图籍。1908年，考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与刘湘、杨森同学，曾参加辛亥革命和“四川保路同志军”；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第五师师长；1928年改任第二师师长兼四川盐运使，驻守重庆达5年；1930年，创办重庆巴蜀学校；1932年，任刘湘部北路总指挥、第三路总指挥，助刘湘统一全川；1935年，任第四十四军军长；1938年，任第29集团军总司令，同年任四川省主席；1939年底至1945年，率第29集团军出川抗日，参加了随枣会战、第二次随枣会战、宜沙会战、滨湖战役、鄂西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等战役；1944年，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1945年，任陪都卫戍总司令，同年，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47年，任重庆卫戍总司令；1948年，当选第一届国大代表，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武汉行辕副主任、重庆行辕副主任、西南行政长官公署副长官。1949年12月14日，在成都通电起义；1950年，任川西人民博物馆馆长、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1957年10月，离境出走时被捕。1960年，在狱中去世。



王缙绪将军

祖父虽然戎马一生，是陆军上将，但他骨子里是个文化人，从小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孔孟之道的影响，他对故土有很深的感情，这也是他不愿去台湾的原因之一。1949年起义时他对共产党并没有认识，也没有接触，不了解。他只读过毛泽东的词《沁园春·雪》，读了那首词，他觉得他同毛泽东在孔孟上是相通的。

但是，进入“新社会”后，他对共产党开始有所认识，并越来越不满：他认为共产党的一系列作法违背了中国的文化和文明传统。连简化汉字他都十分反感，他认为文字是中华文化最基本的承载物，不能随意改变。1957年反右，他的友人等纷纷中箭落马，比如，与祖父有“三同”（同乡、同学、同庚）的著名民主人士鲜英、曾作为统战对象的台盟

中央主席谢雪红、云南起义将领龙云等都被打成右派，并在全国范围内遭到“口诛笔伐”。祖父对此非常愤怒，认为共产党太不像话，领导人政治品质极其恶劣。另外，他也感到大事不妙，他平时就爱发牢骚，从不隐忍忌讳，甚至直接骂共产党和毛泽东。此外，他还写了大量日记、诗词，对“解放”以来的历次运动，镇反、三反、五反等发泄不满。他觉得他也会步龙云等人的后尘。

1957年10月，他以治病的名义来到重庆，召集了在重庆的所有家庭成员开会，当时我只有九岁，也跟爸爸去了。祖父是习武的人，剃个光头，红光满面，每天早上脱光衣服，练拳，噼噼啪啪周身拍打。他还信佛教，每天晚上盘腿打坐，身体和精神一向都很好。但是那一天晚上他看上去身心像是受到极大的伤害，他睡在床上，脸色很差，神情十分沮丧，也可以说是很绝望。他对父亲他们，包括他的几个夫人说，从现在起，绝对不要说任何话，绝对不要提任何意见，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共产党马上要开始算帐了。

那天晚上大家在一起吃了晚饭，但气氛很沉闷，吃完饭各自就回家了，祖父住在解放西路，我们住在七星岗，我记得那晚还下了点雨。

祖父当时对反右的恶劣性质看得十分清楚，所以他决定不再呆在这个国家。但是他想得很简单：我本来就不是你共产党这一派的，当初我是自己选择留在这儿，现在我看到你这些作法，不愿再呆在这儿了，要离开你。

此时是轻易能离开得了的？

他不是选择到台湾，因为，曾经对他寄予厚望的蒋介石在1945年后对他很失望。他写过一份万言书，希望国民党改革，万言书公开发表在成都的《新新新闻》上（我已经查到了）。

祖父以72岁的高龄出走，在深圳被抓，以“投敌叛国”罪被关进监狱，1960年死在狱中。



儒将王缙绪

那次祖父为了保护他家人的聚会，起了完全相反的作用！由于这次“反革命活动”，他的亲人一个个被打成右派或者反革命。数给你听，他的十个儿子，除了老人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他是淮海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44军军长，1975年死在战犯管理所。），老六在台湾，老二病亡外，其余的都成了“分子”。老三（即我爸爸）——极右；老五——反革命；老七——右派；老八——右派；老九——反革命；老十（当时他还是重庆大学三年级学生）——右派。他们全部在1958年3月当了右派或反革命（也就是我祖父被抓进监狱后）。20多年后平反书上写的都是：受其反革命父亲王缙绪的影响……

## 二，我的父亲王大虎

我父亲1927年出生在四川资中县，当时祖父是刘湘手下的一个师长，驻扎在资中。他的生母（即我的祖母）王璋玉是祖父的第三房太太。小时父亲就读于祖父创办的巴蜀学校，中学时父亲受同学应薇和夏瑞阳的影响，热爱上了戏剧。应薇是著名戏剧艺术家应云卫的女儿，应云卫曾导演了《桃李劫》、《八百壮士》、《生死同心》等优秀影片。

夏瑞阳则是重庆国泰大剧院总经理夏云瑚的儿子。

1943年，父亲不顾家里的反对，考入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前后学习了五年。很多人都不理解，父亲为什么要选择戏剧。当时祖父身居四川省主席，陆军上将高位，完全可以为他提供很多很好的人生选择。但父亲偏偏选择了戏剧作为终身事业，而且一直走到底，至死不悔。

1949年，父亲以万分的热忱和激动迎接重庆解放，并以为一个自由而广阔的艺术天地展现在前面。如他在《加紧学习，彻底改造》一文中写道：“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也就是人民文艺的胜利！今天，是一个新的起点，新的开始……漫漫的长夜总算过去了，在过去的那段日子里，我们是生活在愤怒与苦难之中。不能自由地生活，不能自由地工作，不能自由地说出我们想说而又应说的话，不能自由地去做我们想做而又应做的事……感谢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感谢一切热烈支援前线的解放区的父老们，让我们热烈地拥抱一次吧！”（1949年12月4日《新民报日刊》）

（注：当时重庆的一大批文人、艺术家们都写了热情洋溢的文章，如美术家汪子美的《学习进步迎解放》、作家黄贤俊的《呵，重庆，你解放了》等等。但后来这些文人、艺术家们要嘛劳改几十年，如汪子美，要嘛被迫害至疯至死，如黄贤俊。）

1951年，父亲当选为中华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重庆分会的常务委员兼创作研究部副部长，部长是汪子美。但是，在接下来的1952年，父亲只发表了两篇文章，除了身体原因外，重庆可供发表影评的阵地越来越少。

1957年，父亲的“右派言行”有几条：一是他在1955年说过：“胡风这个人嘛，就是说话刻薄些，怎么是反革命？”二是他在《红岩》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左右左》，认为解放后中共的政策时而左，时而右，一会狂热，一会又纠偏。三是认为大鸣大放就是引蛇出洞，拿肉诱狗。

在斗争他的会上，父亲不断辩解，他甚至哭了。但是，他越辩解就斗得越凶，越辩解就使自己的罪行越严重。于是，在批斗会上当场给他升级——从右派升为极右！后来又宣布他是反革命——反革命是受祖父的影响。



王大虎 1949年

本来对父亲的批示是“开除公职，送去劳教”，但由于父亲患有严重的肺结核病。对他的处理改为“开除公职，由当地居民委员会在政治上加以监督。”

1958年4月，父亲从文联宿舍搬出来，独自住进七星岗一间只有七平方米的非常破烂的阁楼。父亲的劳动是纳鞋底，双手分别拿着锥子和钢针，锥子把鞋底锥穿，钢针把线穿过去，然后双手同时用力拉紧。一只鞋底要纳近千针才能完成，报酬是一角五分钱。这种“劳动改造”摧残知识分子做人的尊严。还有，在经济上把你打垮，让你觉得连生存都困难了，你还有什么理想、什么主义、什么思想？一切都没有了，一



少年王大虎

切都不去想了，只剩下活命了！

父亲在纳鞋底时用力过猛引起剧烈咳嗽而大吐血，于是便安排他为其他右派每天清除渣滓记数，后来又在街道开办的印字社里往衣服上印字。

除了劳动，“管制分子”们每天还须在“学习会”上深刻认识自己的“罪行”。最初，他没认识到自己为啥有罪，总是讲，我从来都是对共产党忠心耿耿……但无论如何都过不了关，他感到很委屈。后来，经过一百次、一千次的“学习”和批判，父亲开始批判自己，诚恳地承认自己有罪——出身在剥削阶级家庭就是罪过。就这样，你觉得自己有罪了，管理干部才认为你开始自觉改造了。

在“监督改造”的6年间，父亲有一件事从未停止过——他坚持有戏（或电影）就看，看完就写评论，不过，他再也没有公开发表文章的权利了。另外，他同祖父有同样的习惯——坚持每天写日记，而且非常详尽具体。父亲的这些日记和文章，在1966年文革即将开始时烧掉了。据寄存父亲遗物的张阿姨回忆，有半个多月他们煮饭没用过煤炭或柴火，全部烧的父亲的日记和那些未能问世的影剧评文章。

在那三年大饥荒时期，祖母和二伯父相继去世了。我的祖母王璋玉是活活饿死的。抗美援朝期间，祖母捐献了大量金银首饰用于购买飞机，这件事曾被编成歌谣广为传唱。祖父出事后，她即被判为“管制”，强迫她去拉人力车等重体力劳动。没得吃的，她很快水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住进医院。父亲带我去看她，医院的护士知道她是“管制分子”，对她非常凶，冲她厉声呵叱。父亲知道这种状况，为什么还带我去？后来我明白了，父亲是有意识地要让我记住那最后一幕！



祖母王璋玉

那是1960年，祖母58岁。

多年后，我在台湾的叔叔回来，得知祖母的情况后，十分震惊：王绩绪的妻子居然是饿死的！不说别的，仅捐献给共产党的巴蜀学校（现在它是重庆市第一流的重点中学），当初就是王家花几十万银元创办的。

父亲的身体也江河日下，他似乎有什么预感，在他35岁生日那天（1962年5月17日），他专门去照了一张像，并分送给所有的亲属。



王大虎35岁生日照

1963年9月9日，街道负责监管右派分子的干事告诉他，根据他的表现，最近将摘掉他的右派帽子，“你一定要争气。”干事说。父亲听后欣喜若狂，他认为摘帽后就可以重新工作——那是他6年来苦苦奋斗的目标！

6年来，父亲很虔诚地想通过自身的努力，积极劳动，好好改造，摘掉帽子后继续从事他最喜爱的戏剧研究和写评论。父亲真是天真到了极点，他不知道这是共产党强加给他们的罪名，不知道这是政治上的阴谋，以为是自己说错了几句话，现在就用劳动来赎罪，大口大口地吐血也坚持劳动赎罪。



9月初的重庆，天气十分炎热，父亲心头更是火热，他激动万分，立马过江，要把“即将摘掉右派帽子”的重大喜讯告诉他的亲人。

在南岸野猫溪上岸后，父亲沿着陡坡往山上走。突然，他开始大口吐血，当即伏在一块大石头上。几个过路的人见事不对赶紧将他抬到附近的五院。

但是，父亲已经永远走了！

他带着他“摘掉帽子，再写剧评”的梦想永远走了。

第二天，慈云寺的柴火把一切都化为灰烬……

### 三，我的母亲曾容

我母亲曾容是湖北沔阳县人，生于1927年。她是父亲在国立剧专的同学，比父亲低一级。1945年，他们相恋并于次年生下了我姐姐王蔷。他们的婚姻是不顾门第差距，不顾家庭反对的勇敢结合。婚后，他们一块参加戏剧活动，可谓志同道合。父亲曾用过一个笔名“汪爱憎”，去掉三点水和人旁，就是“王爱憎”了。

但是，原本是自由恋爱的婚姻，在社会变革中还是破裂了，他们在1953年离婚。

妈妈酷爱演戏，那是她的第一生命。她演了不少戏，当时在重庆颇有点名气。1957年，她在“帮助党整风”中提意见说：“为什么演主角的必须是党员？为什么不根据业务能力安排主角？”

妈妈因此被打成右派，市委书记任白戈说：“曾容是个特殊的右派，极端的个人主义。”她先被下放到重庆南桐矿区农村劳动，后又转到长寿湖农场。

1960年的夏天，妈妈接我到长寿湖。我们在长寿县城下船后步行到狮子滩。我当时才11岁，太阳又大，又没有吃的。我们从早上走到下午，才走到邻封镇。在邻封，我突然一下昏倒了——中暑。幸好是在镇上，如果在半路上可能我就没命了。抢救我的医生责怪妈妈说：“你怎么让一个娃娃顶着太阳走这么远的路？！”妈妈不敢说她是右派，没有钱。



曾容与王薇（1951年）

我们在邻封住了一夜第二天才走到狮子滩。

妈妈和其他右派天天出去劳动，他们每人腰上系一个木勺，一个盘子。我看见妈妈中午打饭时把盘子取下来，用手肘在上面胡乱擦一下就去打饭。这个动作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因为妈妈以前是很讲究的人，绝不会像这样不讲卫生。还有一个细节我也记得很清楚，有一个叫陈孟汀的右派每次从我面前走过时，总是在我做作业的小凳上放一颗糖，但绝不同我说话。那个饥荒年，糖是很珍贵的。

当年，由于重庆需要一批演员演戏，任白戈特地指示将妈妈从长寿湖调回话剧团。妈妈当然非常高兴，她把演戏看得重于一切，也是一名非常优秀的演员，但是她已注定不可能再有她的事业。

由于她是剧团里的头号阶级敌人，文革一来她首当其冲。家，被抄了无数次，真的

是抄得一贫如洗。妈妈的衣服，两双皮鞋，还有婆婆留下来的牙骨筷子等，统统被抄走。文革结束后搞清退，说我们的东西都被卖了，进行赔偿：一把象牙筷子赔2分钱，全部家产只赔偿了人民币11元！

妈妈是演员，很讲究衣着，但一次次抄家后，她冬天连一件毛衣都没有，为了不显得太寒碜，她把一件破棉袄穿在里面，用绳子系紧，外面再穿一件稍好一点的衣服。

再后来，妈妈被赶出来，住到一个黑暗的摄影棚里。当时我从农村回到重庆，同妈妈一起在那个摄影棚里住了两年（1967年至1969年）。那是用几块幕布隔出来的一个小空间，门是一个演戏用的道具门，我同妈妈关在里面，黑得很，晚上老鼠乱串，像是囚室。1969年我走后妈妈一个人住在里面。

她挨了多少斗已说不清，记得有一次她跪在搭在桌子上的椅子上挨斗，有人从后面猛地一掌击来，妈从椅子上扑下地，双手在地上磨得皮开肉烂。当晚回来后她还不告诉我真相。

妈妈是一个很爱面子的人，把她抓到最热闹的解放碑去斗，她十分狼狈、十分难受。同她一起挨斗的人悄悄对她说：“有啥子嘛，你就当我们在演戏，你今天演坏人。”但妈做不到这种洒脱，那天她回来后长时间地唉声叹气，饭也不吃。

长期的折磨，妈妈变得胆小如鼠，每天都惊恐有大难临头。有一次一个右派叫她去申诉冤情，说现在有政策了。妈妈去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骇得赶快回到剧团。我记得那天早上她回来后惊恐万状，不知道如何是好，连连说：“我去扫地，我去扫地。”说完抱着扫帚缩着头出去打扫厕所。

妈妈觉得腹部越来越痛，她强忍着，继续劳动，后来，用手摸，肚子里有一个大包块。妈妈找监管她的造反派请假看病，他不仅不准，反而冲我妈一阵骂。妈妈没办法，只好继续忍。日子一天天过去，疼痛加巨了，妈妈夜夜叫喊，影响了隔壁的人睡觉，反应上去，这才同意她去看病。到医院一检查，已是癌症晚期！

在医院抽腹水，妈妈痛得撕心裂肺地叫，她那个病，十分痛苦。后来只得打杜冷丁镇痛。妈妈一打针止痛之后，马上就捧起剧本读，她还想上台演戏！

为了今后能重返舞台，妈妈一心想恢复健康。她已经吃不下饭了，但她强迫自己吃，她还要吃一只鸡。当时家里很贫穷，千方百计给她炖了一只鸡，她一边吃，一边连连叹气。

在去世前的一个月，妈妈还认认真真地读《艳阳天》剧本，并表示希望扮演剧里的“焦淑红”！

1973年1月13日，妈妈带着她的“重返舞台，再作演员”的梦想永远地走了，终年45岁。

我父母在政治上都是很幼稚、很理想化的人，解放前他们是民主青年，对当权者的专制、高压不满，文艺界都公认他们是进步的青年。解放后他们对中共没有清醒的认识，至死都在渴望能从事自己喜爱的艺术事业，双双极其悲凉地走完了各自短暂的一生。



曾容 1961年从长春湖  
劳改回到剧团留影

#### 四，我的苦难经历

我正在巴蜀小学读书期间，祖父出事了，他被抓入监狱后，为了宣扬“阶级斗争”，搞了一个“反革命分子王缙绪偷越国境罪行展”。各单位都组织人去参观，我们学校也组织学生去“受教育”。参观的人好多，外面排起长长的队。高音喇叭不歇气地反反复复播：“反革命分子王缙绪偷越国境……”

同学们冲着我指指点点：“就是她爷爷，就是她爷爷！”

我满面通红，万分狼狈，恨无地洞可钻。老师也是那种眼光，让我心寒心颤的眼光——他们为什么不懂得办教育应当保护儿童心理？为什么非要我去？我才9岁呀。

我记得展品中有一把手枪，一份蒋介石给他的委任状，有“反革命资料”——他写的对共产党和历次运动不满的日记、诗词等。我认为除了日记、诗词外其它都是假的，“委任状”尤其不可能，爷爷解放后不可能保留什么“委任状”。为了造阶级斗争的声势，不惜造假。

我们作为右派、反革命的子女，处处受气，人人都可以欺负我们。也是我9岁那年，我到话剧团澡堂去洗澡，人多拥挤，有人就冲着我说：“这种人也来跟我们挤！”我当时身上已经抹了肥皂，也不冲洗了，穿上衣服就走，我回去只是哭，不说话。

我从小读书就很努力，成绩非常优秀，小学毕业我以优异成绩考入市重点中学——南开中学。在中学，除了成绩以外，我的文娱（唱歌跳舞）、体育（长跑）等都很好。我当时的目标就是读大学，而且自信一定能考上重点大学。

在我刚读完初二进入初三的那一学期，具体说就是1964年10月13日，班主任（教我们政治，姓宋）突然把我叫到办公室。

“你爷爷叫王缙绪，是个反革命分子，是不是？”

“是。”

“你爸爸叫王大虎，是个右派分子，是不是？”

“是。”

“你妈妈叫曾容，也是个右派分子，是不是？”

“是。”

“像你这种情况，不能继续在我们学校读书了，你只能到农村去。”

我“哇”地一声哭出来。

班主任冷冰冰地看着我，说：“你今天就得离校。”

我边哭边说：“我去给同学说一声嘛。”

“不行，马上走！”

我们培养人的学校和教师啊——一年前我父亲去世，应当马上告诉我的大事不告诉，等到星期六放学了，宋老师才轻描淡写地对我说：“你爸爸死了。”我问为什么不当即告诉我。宋老师说：“你爸爸是右派，所以不立即告诉你。你要同你爸爸划清界限……”

我气得浑身发抖，我的父亲去世了，你有什么权利隐瞒不告诉我？！

结果是，我未能为我父亲送终，是姐姐王蔷守在那儿，捡回了父亲的遗骨。

我后来得知，把我驱出学校是市教育局领导亲自前来布置的任务。那位姓林的领导说：“王缙绪的孙女居然还在我们的重点学校受培养？！你们学校的办学方针有问题！”

于是，他们决定我马上离校，当天就得走！

突然赶我出学校对我是一次极其沉重的打击，我整整痛哭了两天，我觉得，从那一天——1964年10月13日——起，王薇已经死了，理想、前途、大学……统统没有了。

当时我只有15岁，还不到规定的下农村年龄，但我决定马上走，离开这个让人伤透了心的地方。我写了一份血书，坚决要求下乡。

当年，我就到了四川省达县农村。劳动几年后，文革时（1967年）回到重庆，同妈妈在那个黑暗的摄影棚里住了两年，后来又转到湖北妈妈的老家投奔我舅舅。1972年，为了把我调回身边，让我有份工作，妈妈办了病退让我顶替。

我回到重庆，在妈妈单位报到。报到时，又是那种我从9岁时就开始遭遇的眼光：右派分子曾蓉的女儿……

我决心发奋工作，自强不息！我从小就很优秀，我一定要，也一定会做出成绩，我要为我自己，更为我父母争口气！

我在劳动电影院干了8年，不管干什么工作我都全力以赴，无论是扫地、抬砖，还是四处奔走推销票，我都全身心地投入。由于工作出色，我被一些学校请去当了校外辅导员。1980年又调到市文化局，几年之后，仍然是由于出色的工作成绩，我当了电影处的处长。



王薇，王蔷两姐妹

1979年，妈妈平反之后，剧团为妈妈补开了一个追悼会，当初不遗余力整妈妈的那些人，在会上说：曾蓉为党做了不少工作，是党的好女儿……有的人还哭起来。

我觉得非常好笑，一滴眼泪都没有！这些人真是会演戏，这几十年来培养了一大批这样的“优秀”演员！

9岁起我就背负着沉重的负罪感，人人都可以欺负我，几十年过去了，我只剩下自强不息，在逆境中拼搏、前进的勇气和毅力，没有了眼泪。

采访时间：2006年6月16日，地点：重庆市渝中区

## 采访后记

五年前，在采访长寿湖右派刘曼若时就了解了一些关于曾蓉和她一家的情况，刘曼若还给了我她写的关于曾蓉同她在南桐劳动的文章《红苕鼻子》（附后）。我当时就想采访曾容的女儿，但直到五年后我才走进王薇的家。

王薇已退休，是当婆婆的人了。此时，她依然“自强不息”地“承上启下”——一方面在家带孙儿，一方面收集整理父亲和祖父的文字。眼下，她收集的父亲的评论集《有戏剧的地方就有我》已经出版，另外，她正努力争取收回祖父当年的日记和诗词。

就在采访王薇前几天，我采访了一个九死一生的女右派蔡素心，她在谈到她只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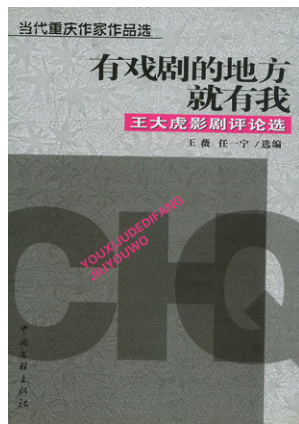
初二的儿子奋斗考上重庆大学时，慷慨激昂地说：“右派中的绝大多数子女，虽遭遇厄运，但绝不沉沦，他们积极奋斗，顽强拼搏，在艰难困苦中开辟一条路来……”

那一刻，一种悲凉和壮丽的神圣情感排山倒海地袭来，我眼前出现了千万个右派子女：他们默默舔着伤口，在威严、歧视、冷漠、贫困、凄荒的丛林中忍辱负重奋身向前……

泪水，忍不住涌了出来。

离开王薇家时，我捧着她送给我的她父亲的文字，抬眼望天——

——那些被扼杀在“阳谋”祭坛上的在天之灵，会感到一点安慰吧？



下面是在《重庆名人辞典》(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中查到的关于王缙绪的情况:

王缙绪(1885-1960)国民党重庆卫戍总司令，四川省西充县人。1921年初，在川军杨森部第9师任团长，年底任该师32旅旅长。1925年任第一师师长。1932年，他在重庆创办了巴蜀学校(现在重庆最著名的几所中学之一)。1935年10月1日，蒋介石任命他为国民党军第44师兼第六路“剿匪”总指挥。1938年1月，任第29集团军总司令。8月1日，任四川省主席。1939年12月，他辞去省主席一职，率部到达湖北襄阳、樊城、大洪山一带抗日。1940年3月1日，收复张定集一战，歼敌5000余人，5月至6月，率部与日军在大洪山周围艰苦激战1月余，拖住了日寇西进计划。“大洪山老王推磨”在全国传为佳话。不久蒋介石提名他当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47年，调任重庆卫戍总司令，后改任西南绥靖公署副主任、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1949年12月22日，他率所部4万余人通电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川西博物馆馆长。1957年以治牙为名到重庆，化名张正言，与原成都警察局局长雷少成潜赴深圳，企图乘夜由罗湖桥越境去香港，被边防部队逮捕归案。1960年病死狱中。(摘自该书176-177页)

王薇保存了一份她妈妈在文革时写的“坦白交待”，多年后，她据此写了一篇文章，我摘选如下：

## 妈妈的“坦白交代”

我保存了妈妈于1969年10月27日写的一份材料，题目叫《我的坦白交代》，是妈妈写下的“认罪书”。

1968年冬，因为妈妈“摘帽右派”的身份，我们被所在单位重庆市话剧团的“左派”们强行赶进一个1941年修建的摄影棚。摄影棚足有一个篮球场大，工人用布景在墙角搭了一个L形的挡板，就如同舞台上那假设的“家”；屋顶很高，顶上是当年挂摄影灯和布景道具的腐朽不堪的横梁，年久失修，这里从来没有住过人。摄影棚很黑(因为摄影

不能有外来光线干扰），白天也伸手不见五指，空旷的大屋子没有窗户；四周全是灰尘，老鼠乱跑……

只有我们母女二人，我感到毛骨悚然，就如同走进令人窒息的坟墓。1969年初我投亲到湖北农村舅舅家去了，漆黑的大房子里就只剩下妈妈一人，《我的坦白交代》，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写下的。

《坦白交代》是一摞长达26页的手写稿，纸张早已发黄，字迹也有些模糊，更因为曾经被撕碎，重又拼接后粘贴，个别地方已经不够完整。那时，妈妈因为被无休无止地责令检查、大小会批斗和关押，内心产生了强烈的内疚和自惭，写下了这些违心的“坦白交代”。写完之后，她又曾经愤怒地将它撕碎，以发泄心中积压得快要爆发的愤懑，因为她写的那些批判自己的话都不是真的，是外力强加于她的！可是，她最后又不得不亲手把它一点一点地拼接上，重新粘贴起来，并上交给“组织”。这个过程，妈妈经历了怎样的内心屈辱和煎熬！每当读它，我都如同听见妈妈的魂灵在呻吟。

从《我的坦白交代》中，我了解到妈妈的经历。妈妈八岁时，因家庭困难被说给人家做童养媳；11岁那年，日本人打到湖北，妈妈只身逃难到武汉，被当时的难童保育院收容，1938年底转移到重庆歌乐山。

在难童保育院她才开始学习识字。1942年秋，孩子剧团到难童保育院选小演员，她被选到孩子剧团。妈妈被偶然选中去演话剧，谁也未曾想到这影响了她一生的命运。



曾容在话剧《在那一边》中扮演卡嘉（1955年）

1943年，妈妈被捍卫剧团正式招收作演员，在《重庆二十四小时》里扮演报童，《金玉满堂》里扮演郑安凤，《民族英雄》里扮演卖唱小女孩等。

《我的坦白交代》里，妈妈认为她的“反动思想，就是从这时开始产生的”。她写道：“我十五六岁时，由一个难童成为一个小演员，我对一切都新鲜好奇，这时也是我的世界观开始形成的时候。当我第一次听到表扬，说我化装好看，有发展前途，以及看到一般演员与有名气的演员差别很大，我便第一次发现，一个人不仅仅是为了吃饱饭，还应该有前途，这个前途就是像那些有名气的演员那样。”

1944年夏天，妈妈在重庆考入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在剧专学习期间形成了她作为一个演员的最为可贵的人生价值观——那就是要做一名好演员，要获得观众的掌声和鲜花。但是，在《我的坦白交代》里，妈妈不得不违心地深刻批判自己，她说：“进了伪剧专，这是一所专门培养资产阶级演员的大染缸，虽然当时我确实什么也不懂，但我像个大口袋一样往里装……我又拼命学习所谓世界名著，开始幻想要像那些小说和剧本里的人那样生活。我曾想，我这一生只要演几个世界名著里的女主角，轰动一时，就是死了也划得来了。”

1950年1月，妈妈怀着巨大的“革命热情”参加中共执政后组建的重庆市文工团，

当了一名话剧演员。她认为她的人生理想终于有了实现的可能，在此后的近八年时间里，她先后在《红旗歌》、《俄罗斯问题》、《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四十年的愿望》、《尤利斯·伏契克》、《种桔的人们》、《在那一边》、《西望长安》、《归来》、《日出》、《夜店》、《北京人》、《是谁之过》、《刘介梅》等多部话剧中扮演了角色。虽然她扮演的角色不一定重要，但社会反响并不小，尤其是1954年演出《尤利斯·伏契克》，妈妈扮演的一个女招待，出场仅二分钟，却博得全场四次掌声。还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冬妮娅，《日出》里的翠喜，都让她获得了观众的喜爱和掌声。1956年全国话剧调演，妈妈扮演的角色受到同行和观众的一致好评，但是却没有被评上奖。妈妈对评奖产生了怀疑，进而产生“不满情绪”。她说，1949年后，一些人因为是党员，地位就比她高，她认为这不公平。



曾容（中）在话剧《尤利斯·伏契克》中扮演女招待（1954年）

1958年3月，妈妈终于因为这种“不满情绪”被划为右派分子。她在劳改农场天天哭，也不说话，后来听说“右派分子”改造好了还是可以回去演戏，她才重又找到了希望。

1961年底，当时的市委书记任白戈说，“曾容就是个人主义太严重了，劳动改造好了，还是可以让她回来演戏的。”于是，妈妈在这年得以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调回到市话剧团，继续做演员。她本以为自己比其他“右派分子”幸运，谁知道这是更大灾难的开始。

安排妈妈扮演的第一个角色是《雷雨》里的繁漪B角，这个角色对于她来说，原本并不困难。但是，因为“摘帽右派”的身份，因为劳动改造带给妈妈精神和肉体的摧残，也因为周围人事环境的改变，在导演的呵斥和部分同事诧异的眼光中，妈妈再也找不回作演员的自信。而失去自信，是对一个演员最致命的打击！这时，妈妈完全绝望了。她在《我的坦白交待》中写道：“最初回来时，认为政治上完了，业务上只要多演几个戏，还是有基础的。”但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她的希望很快就被打得粉碎。

妈妈一生除了演戏，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爱好或者特长，她的全部热情和人生目的就是做一个好的话剧演员，这样的一个人执着于自己的事业，视话剧职业为生命的人，失去了事业就等于失去了她的生命。

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等待妈妈的是一场更大的灾难。“摘帽右派”仍然是右派，从运动一开始就被扫入“牛鬼蛇神”的范畴。最初是被勒令劳动，负责打扫剧团的厕所和走道，后来又被无休无止地批判，妈妈曾被押解到解放碑开批斗会，胸前挂着自己名字上打了红叉的木牌。被抄家，被关押，被无数人训斥，她终日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在一次批斗会上，她站在食堂饭桌上的一把椅子上，被人猛地推倒在地，双手顿时摔得血肉模糊，回到家时连饭碗都无法端起，但妈妈没有吭一声，她怕我们知道她受到的屈辱，她想在女儿面前保持她的一点自尊！

此时的妈妈很柔弱，处于外力的压制之下，无助而无奈。终于，她在被关进清理阶级队伍的所谓“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审查批判后，在工宣队的一再督促下，开始写《我的坦白交代》，交代她的经历，深刻批判自己的“反动思想根源”，最后一段她这样写道：“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半年，是我一生中的转折点，通过学习毛主席有关著作，参加了各种批判会，特别下班后在工宣队和革命群众根据毛主席教导要把我这个坏人变成一个好人，做了几十次挽救工作，促使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重新估计自己，把长期被我颠倒了的历史再重新颠倒过来。前二十年，我犯了罪，对不起敬爱的毛主席他老人家，对不起革命人民。……我还有孩子，她们生长在新社会，热爱毛主席，我不能让她们有个坚持反动立场的母亲，我要永远在自己思想上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革命，今后为保卫伟大社会主义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永远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1970年底，妈妈感觉身体不舒服，时常肚子疼，负责监督她的人不允许她到医院看病，说她是想逃避劳动，逃避批判。直到有一天，她向同在被监督劳动的曹樱阿姨讲到自己身体的症状，曹阿姨摸到妈妈腹部有一个明显的包块，感到病情严重，于是向负责关押他们的人请求。最后直到1971年9月7日，妈妈才得以去医院看病。

9月27日剖腹探查，诊断为卵巢乳头状腺癌。因救治时间太晚，医生说，妈妈的生命最多只有三个月。但是，她活了一年零三个月。这多活的一年，全凭她对话剧的向往，以及能够重新上舞台的梦想支撑着。

生病后的妈妈，肉体和精神是极度分裂的。疼痛时她大声喊叫，尤其夜深人静时的哀号，更令我恐惧。注射了杜冷丁后，药物的作用可以维持几小时的安静。不过，在精神上，妈妈又显得格外松弛，因为生病而不再被批斗，因为患癌症可以“顺理成章”地离开人世，而免去了“自绝于人民”的罪名。我发现妈妈其实很享受这生病的过程。有时，她甚至会拿起一本剧本专心地阅读，这是当时剧团正在排练的一出话剧《艳阳天》。她对病友说，“等我的病好了，我要去争取扮演焦淑红（剧中女主角）的B角。”为了这个愿望，她再痛也要坚持吃饭，吃一口鲑海椒，下一小口饭，她坚信“多吃一口就是胜利！”

1973年1月13日，妈妈在平静和遗憾中去了。她没有实现她的梦想——“演几个世界名著里的女主角，轰动一时。”但是，她终于可以永久摆脱精神和肉体的折磨，去到天国。愿天国也有话剧，妈妈可以实现她并不奢侈的愿望。

1979年初，妈妈所在单位专门为她补开了追悼会。会场恰好选在曾经关押过她的摄影棚的隔壁——剧团排练场。妈妈的遗像挂在舞台正中的上方，我选择了她扮演《年青的一代》中夏倩茹的剧照，遗像下方的骨灰盒，是剧团特意去买的，里面没有骨灰，就像是剧中的道具。前来参加追悼会的有一二百人，把排练场挤得满满的。悼词说，曾容同志是一个优秀的话剧演员。台下的人们在哭泣，我站在舞台上，站在母亲的遗像前，一滴眼泪也没有。



1956年赴北京参加全国话剧调演



面对这个场面，我内心异常冷静。台下哭的人我都熟悉。我心里在想，他们为什么哭泣？是因为自己曾经伤害过别人而内心真正感到忏悔？还是把这个场合也当作演出，剧情规定应该哭，他们就哭了？我想说，如果当初你们稍微有一点同情心，面对一个毫无招架之力的弱女子，手下留一点情，妈妈的身心就不会遭受如此严酷的摧残，或许就不会有今天的悲剧情景。

我知道，人性是善恶兼备的。当整个社会在纵容甚至挑动人性恶的一面恶性膨胀时，人的行为将会比野兽更残酷……现在的人很难想象，那是怎样一种状况，也很难相信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这么黑暗的一段。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何止是人的生命，是这个国家和民族道德的沦丧！

这也是我将妈妈的《坦白交待》保留至今的原因。



1967年在市体育馆门前留影

附刘曼若写的纪念曾容的文章：

## 红苕鼻子

——悼亡友

又是风雪交加的季节！

又到了你的祭日！

二十五年了！

每年到这时候，我都不由得会想起你，想起了你，那过去了的一串串日子又会在我的眼前泛起。一场历史的误会使许多无辜的人抛妻别子，远走他乡；也是这错中错，使我们相识、相知而难以相忘。

我没有为你采撷鲜花，也没有为你买来好酒，像往年一样，我又回到那边远山村，又回到当年我们经常洗衣服的山间小溪边，默默地停立在你的坟头，寻找那岁月留下的痕迹。

你是演员，五十年代初在话剧舞台上曾名噪一时。那时候，剧场的门厅里，经常悬挂着你的剧照：冬妮娅、繁漪……你是那么年轻，那么美丽。那时候，我刚刚参加工作，出版社的一个无名编辑，像许多戏迷一样，我喜爱你创造的角色，欣赏你的舞台风度，我崇拜你，却无从认识你。每每有你的演出，我看了一遍又一遍；每次走过剧场门口，我忍不住要在你照片下停留很久很久。

那一天，那应该忘记而又永远忘不了的一天，文化局小会议室里黑压压地坐满了人，一个个垂头丧气，没有说话声，没有打闹声，只偶尔传出一声又一声轻微的、低沉的叹息。我含着泪，低着头坐在屋旮旯，想躲开人们的视线。忽然，“你们好！”一声轻脆的普通话把你带进了会议室。几十个人的头抬了起来，百来只眼睛盯着你：新烫的大波浪卷发，做工精致的浅灰色西装，潇洒的步态和一脸亲切的微笑。整个会议室突然变得光亮

而有生气。主持会议的局长面露愠色对你说：“找个位置坐下！为什么才来？”你满不在乎地回答：“烫发轮子等久了！”你的神态，你的语气，哪像是来听候宣判的“罪人”，简直就是没上装的冬妮娅！我以为你是来体验生活的（那时你剧团正在上演《百丑图》，不知是出自哪一位时髦作家的手笔），可是，宣布结果，原来你和我都被列入另册，我的名字紧挨着你。我的眼泪一大颗，一大颗往下滴，眼看就要哭出声来，你用手轻轻碰了碰我，悄悄说：“抬起头来，我们没有罪，历史会证明一切……”就这样，我们认识了。多么不幸，又多么幸运。

生活中的你，既不像冬妮娅，又不像繁漪。你就是你，黄黄的脸，小小的眼睛，有点塌的鼻子，不算漂亮，也不像剧照上那么神气；你最迷人的地方是整天挂在脸上的无忧无虑的笑容。你嗓子有点“左”，却时常爱哼点浏阳花鼓戏；舞蹈不是你的专长，可休息时只要有人喊“喂，冬妮娅，来一段！”你就毫不扭捏地跳起“夫妻观灯”或“胖大嫂回娘家”什么的。我知道，你是在为人们痛苦、忧郁的生活创造欢乐；也只有我听见，你半夜蒙在被窝里为思念一双女儿的嘤嘤哭泣。

岁月在艰难的劳动中慢慢流去，我忘了你曾经是一个有成就的演员，我只不过是一个无名的编辑。共同的命运使我们互相帮助，互相安慰。我们一起挖土，一起喂猪，一起洗衣服……。我们悄悄摆谈各自的经历，回忆我们的爱情和家庭，还不时憧憬我们的未来。你说，只要有一星希望，就要重返舞台，再为观众演戏。我说，我只希望我的儿孙永远当工人，三代以后，我们家就是响当当的无产阶级了，他们就不会再背上沉重的出身不好的包袱了。我说你想入非非，你说我过分消沉。尽管我们谁也说服不了谁，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与日俱增的友谊。

后来，我们被安排去为同伴们洗衣服，这是照顾妇女。的确，比起拉车、打夯、挖泥巴等等坡上的活儿来，洗衣服的节奏可快可慢，是轻松多了。可是，一到冬天，天上飘着雪花，水里结着薄冰，闲着还僵手呢，而我们却须一早出门，各人驮上四、五十个人换下的脏衣服，直奔到两里外的小溪去洗。手脚泡进水里，那冷呀，冷得铭心，冷得刺骨。洗呀洗，洗了一件又一件，直洗得腰酸背痛，周身麻木。天黑了，我们又背着湿漉漉的衣服往回走。拧不干的水，滴在我们背上，滴到我们腿上，浸透层层衣袂，冰着我们的肌肤。两里路，变得那么长，总也走不完；又冷，又累，又饿，使我抬一步都感到困难，我多想一屁股坐下去。这时，你总是伸出手来，托起我的背篋：“坐不得，坐下去你就再也起不来了。”“起不来就算了。”“不，不行，还有两个乖儿子等着妈妈‘出差’回家哩！”你放下背篋，把仅有的两尺见方的油布垫在我的背上。我暖和了些了，而你却咬着牙，忍受着浸骨的寒气。

偏偏那几年又闹灾荒，野葱、鹅儿肠、马齿苋、红果、青杠子……一切可食的野菜、野果都被我们找来骗肚子。不久，方圆几十里内可充饥的东西都被我们搜尽了，从此，只好挨着每天二两毛粮吊命的日子。有一天，下着小雪，我俩蹲在溪边正在搓衣服，溪水还是那样清澈、透明，你看见我的影子在水中晃动，说：“看你，简直是一张皮包骨！”我说：“还是看看你自己吧，小眼睛变成了大眼睛倒好，只是樱桃小口变成了血盆大嘴，怕再也不能演冬妮娅，只能演阎婆了。”“哈哈！”你开心地笑了。笑声未落，从上游飘来一团什么东西，你顺手捞起一件衣服，一步冲到水中，麻利地用衣服把那团东西

网起来。

你冻得乌红的双手捧着那团东西站到我的面前，牙齿打颤说：“快，快，接住，红，红苕鼻子！”我扶你坐下，脱掉你快结冰的湿鞋，拿件干衣服擦擦你的脚，然后，坐在你的对面，把你冰凉脚捂进我的胸口。那把红苕鼻子，猪儿都不喜欢吃的东西，我俩却忘了疲劳，忘了寒冷，坐在地上津津有味地大嚼起来。

不幸，第二天我病倒了。我知道，这下百来个人的衣服全都要推到你的头上。我挣扎着想起来，刚笼上背绳，只觉天旋地转，站立不稳。你按住我的肩头：“听话，休息吧，今天我又给你捡好东西回来！”说着，你的眼圈红了。擦黑时，你没回来；吃过晚饭，你还没回来，我正担心你是不是昏倒在路上了，只听门一响，你连人带背篋横着挤进了屋，疲惫不堪的脸上仍然挂着亲切的微笑。放下背篋，你就忙着摸口袋，摸了摸，好久才摸出一块裹了又裹的手巾，然后，小心翼翼地层层剥开，最后露出拇指大的红苕鼻子：“你吃吧，今天上游不挖苕了，我等了好久，才……”你脸上闪过一丝痛苦的表情，一下子把话吞在喉咙边。我木呆呆地望着你，想等你说下去。忽然，我醒悟了，这两根小小的红苕鼻子，是你不顾寒冷一次又一次下水去捞起来的，是你全天的收获，它承载着多么珍贵的、深重的患难之情啊！我再也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晚上，你平静地睡了。睡吧，你太劳累，太疲倦了。早上，你没有醒来，我不想惊动你，独自去溪边了。时近中午，没见你来，我料定你是病了，急急赶回去。你还昏睡着，满脸通红。我立即去队部报告，要求送你上医院。同伴们闻讯赶来，急忙用两根竹子，绑成滑竿，抬你去卅里外的镇上。可是，晚了，太晚了，你虚弱的身子，禁不住病魔的折腾，突发的大叶性肺炎，终于夺去了你年轻的生命。

二十多年过去了，几块薄板、一抔黄土，把我们隔在了两个不同的世界，你不再有痛苦，不再有烦恼；遗憾的是你没能等到历史判你无罪的那一天。我比你幸运，亲自听到、亲自看到了历史已判决我们无罪。你地下有知，也可含笑瞑目了。

几天前，路过农贸市场，摊子上摆满了鸡鸭鱼肉和各种时鲜蔬菜，我却一眼看到角落里搁着的两筐削了皮的红苕。我特意买了两斤回家，孙子一看，就噘着嘴说：“婆婆，我不吃这个，我要巧克力！”叫我说什么好呢，我们的后代，他们连做梦也想不到廿多年前我们曾经过的日子，但愿他们永远想不到，永远也看不到那一切。只是，我要告诉他们红苕鼻子的故事，要他们永远记住极左思潮给民族带来的苦难，永远记住人与人间的善良和真诚！

#### 关于本文的说明：

第二次到刘曼若家，刘曼若告诉我：“这篇文章由两个真实人物构成，一个叫曾容，市话剧院的女演员，另一个叫曹遂志，西南艺术剧院创作人员。文章中绝大部分写的是曾容，只有结尾是写曹遂志。因为曾容当时没死，死的是曹遂志——他患大叶肺炎未得到医治于1959年10月在南桐农村去世。

# 爸爸，我看你来了！

徐瑗

右派徐季正之女，1946年生



我爸爸徐季正，1917年出生在湖南常德一个世代书香门第的家庭，他自幼受着祖母严格而规范的儒家教育。他在湘西35个县的一次学生会考中独占鳌头，被选为全县学生联合会主席。七·七事变后，父亲毅然投笔从戎报考了国民政府军校。后来，他任军政部军需署财务检查官、专员。父亲在显赫的要职上，恪守家训，两袖清风、一身正气。一次他回乡省亲，祖父见他穿一件破旧的衬衣，不禁喟然感慨道：“真吾子也！”

在中共地下党员汪至柔的影响下，爸爸认定共产党是中国的希望。解放前夕，我大舅和外公的部下纷纷催促他到台湾，甚至将当时很难弄到的赴台机票交给他，但爸爸毅然留在了大陆。

在建设新中国的热潮中，爸爸把全部精力和心血都投了进去，他制定了庞大的发展计划，开拓川猪出口赚汇，仅一年时间就为国家赚回大批资金，相当于24万两黄金，他所在的重庆市食品公司成了全国同行的学习模范。

1957年，中国数百万知识分子遭受到猛烈打击，爸爸心情极度郁闷。他敏锐地察觉到鸣放是一场阳光下的骗局，以个人计，最好是一言不发，但他那传统的知识份子气质，使他又很难保持沉默。他私下里给自己的朋友们，倾述了对当前政治的一些看法。这些话，后来被公司领导罗列成他向共产党进攻的八大罪状，具体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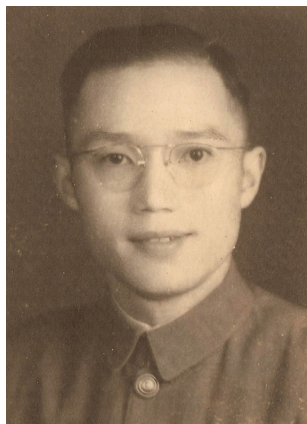
1、他说党的“三害”（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不是一、二个人的问题，也不是哪个地方的问题，而是党的政策和制度的问题。

2、他认为人与人之间只有善恶之分，没有阶级之分，阶级学说是挑拨人与人之间斗争的工具，经过几个运动之后，人与人之间都不愿以诚相待，变得互不信任，这是阶级斗争的结果。

3、他认为政府管的事太多，从生管到死，人民内部矛盾自然多起来。

4、他崇拜虚无主义，说孔子才是中国的完人。他认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不应以力服人，应以理服人。历次政治运动是霸道、不是王道，他希望对知识分子采取宽柔政策。

5、他说胡风反革命案件是文字狱。



徐季正 1947年

6、在党群关系上，他建议要吸取齐恒公不听管仲的话，而听易牙、竖刁的谗言，以致遭到身败国亡的教训。

7、他为蒋介石惋惜，说蒋介石要是走民主的道路，现在也不会如此的惨败。

8、他认为“鸣放”是放长线钓大鱼。等等。

在那个时候，爸爸还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无疑是飞蛾扑火！

爸爸当了右派之后，陷在深深的孤独、无奈、焦躁之中，他默默无语地一根接一根地抽廉价的香烟。

哥哥、弟弟沿街捡来烟蒂，卷成纸烟给爸爸抽。每天爸爸回家的时候，我总是领着弟弟妹妹到路口去迎接他，爸爸看上去憔悴、疲惫不堪。

我最后一次见到爸爸，是在长江边上的珊瑚坝河边。那天，我和全班同学到那儿除四害灭蚊虫。突然，我看见了多日不见的父亲，只见他单薄的身子抬着一条巨石，晃晃荡荡，一步一挪，他也看见了我，我望着他，近在咫尺。但是，我们不敢相认！他正在劳动改造，他怕影响我，我也怕同学知道我父亲是右派。我看看父亲眼里噙满泪水，目光里透出一丝愧疚。我记得他的眼光很深沉，深沉中有种无奈，那种无奈，直透入我的心底……

没想到这次令人心酸的见面，竟成为了我们父女俩的永诀！那一年，我才11岁，但爸爸在那瞬间留下的那种无奈而痛苦的眼神却永远烙印在我幼小的心中……

多年来我一直在想，我当时为什么不敢大胆喊他一声？那是我最亲爱的爸爸呀。这是我一生中最后悔的事！我一个才11岁小女孩究竟惧怕什么？是什么力量在阻隔我们父女相认？在我日后的梦里，我总是梦见父亲的脸上刻着金印，他抬着一口漆黑锃亮的大棺材，昏冥中像是在地狱里行走，我哭着喊着叫着，拉住爸爸的手不要他抬棺材……

（徐瑗多次谈到她与父亲的最后一面，每次她都泣不成声，她的讲述我已经录制在六集纪录片《长寿湖》中。）



徐季正被押赴劳改前为子女拍的照片（1957年6月1日）



13岁时的徐瑗

父亲被押走了，去修成昆铁路。

喜德县在凉山彝族自治州的腹地，我对它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成昆线恰是诸葛亮南征孟获的路线。那儿瘴气弥漫，瘟疫流行，毒蛇猛兽盘踞，历史上乃是蛮荒之地。

修铁路的艰辛，我是从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知道的。父亲一介文弱书生，且患有严重的胃病，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该怎样生存？

1960年7月29日，他们派父亲上山砍柴，父亲身体虚弱，一头摔下去，摔死在山崖。

父亲在去世前头一个月的6月份，还给我们寄回30元学费。在那饿得要死的灾荒年，在一切为了吃，

为了活命的年代，爸爸却在仅有 18 元生活费里，积攒着儿女的学费！这几十年来，我总忘不了爸爸在死亡边缘给我们省下的这带着血泪的 30 元，这是爸爸最后留给我们子女的最珍贵的遗产，他的厚爱、他的精神、他的生命。

两个月后，妈妈公司保卫科的一位干事阴沉着脸，从嘴里挤出一句冷冰冰的话：“徐季正摔死了，是因公死亡，你要和他划清界线。”

“划得清吗？！”母亲顿时痛哭着说，“一块石头这么多年了都会焐热，何况我们是十多年的夫妻呀。”母亲关闭了房门，穿上了孝服，系上了白绳，给我们六个兄妹带上了青纱，抱着我们兄妹痛哭。我们还不放声哭，因为在那个年代，右派家属和子女，是不敢公开地吊唁右派丈夫右派父亲的。

1960 年母亲才 34 岁，从那天起，妈妈越发沉默了，老是盯着一个地方走神。我们放学后，再也不去玩了，回到家里埋头做功课，帮妈妈做家务。整个屋里没有了生气。

母亲始终没有去过喜德。当局认为，一个政治劳改犯只应该受到老婆儿女的唾弃，去看劳改的丈夫，说明妻子立场反动。

出身名门并且在上流社会过惯了悠闲日子的母亲，跌落到生活的谷底。1960 年是中国大饥荒的年头，四川省又是饥荒的重灾区，在风雨中飘摇的我家更是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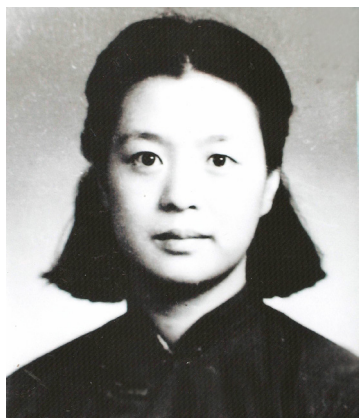
妈妈被扣上“反属，台属”之外还加上“何应钦的干女儿”——这不是帽子的帽子也很有分量。连年的政治运动，母亲总是免不了被批判、陪斗。在一次陪斗中，一个造反派头头用匕首把会计科的历反（即所谓“历史反革命”）吴叔叔的耳朵割下扔到台下人群里，妈妈一声惨叫，昏厥了过去。在那次批斗台上，妈妈早已绷得很紧的神经终于断裂了，她从此患上了间歇性神经病。

妈妈好几次走到朝天门，想跳进长江，但为了我们六兄妹，她终于未下这决心。但是，她的心事连我五岁的小妹都看出来，她对我说：“姐姐，我好怕妈妈死呀。”



何应钦题  
王靖澳的父亲王伦中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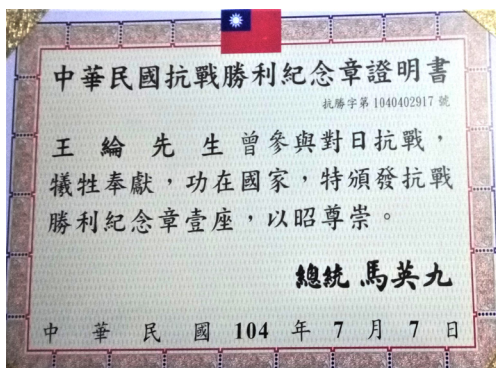
父，神画视觉设计



徐妻王靖澳（1955 年）  
抗日将军王伦中将之女

我们兄妹也被人白眼，邻居的小孩骂我们小右派，向我们吐口水。虽然我在班上学习成绩优良，但偏偏没那个中学录取我，学校还将 13 岁的我发配到农村劳动。

家门的不幸，过早地将我们兄妹推向了社会，哥哥刚步入中学就辍学，13 岁自谋生路。在妈妈的带领下，我们拼命地劳动。为了五分钱，妈妈和我双手浸在冰凉的水中清洗化学麻袋，忍受化学液的腐蚀，舅妈和我日夜剥洋葱，那呛人的气味熏得我俩双泪长流。弟弟妹妹为了找学费，放学回家一做完作业，就锤废铁钉。把生锈而又弯曲的废铁钉锤直后，每公斤可得 0.5 毛钱。铁钉只有半寸长，弟



弟妹妹常常把手指锤得鲜血淋漓……

文革中抄家的风潮席卷山城，妈妈已如惊弓之鸟，她慌忙将家中犯有忌讳的东西全部焚烧。她烧掉的不光有父亲的一些遗物，还有着我外公，原国民政府军部参谋本部一厅厅长王纶将军的所有遗物，其中包括很有价值的哀思录，哀思录是悼念外公时，许多名人、政要的真迹悼词。我赶到时急忙将还未烧掉的父亲日记、自传、照片抢出来，带

回我劳动的地点——重庆长寿湖——保存。

我在僻远渔乡中的小岛上，在沉寂的夜里，在昏暗的马灯下翻阅父亲的自传，日记，感受在那山雨欲来前，父亲那忧国忧民，郁闷而无奈的心境。

每年清明时，我感到茫然，到哪儿去祭祀父亲呢？我在梦中总见到他抬着棺材的蹒跚的身影。

我决心找到埋葬父亲的坟墓。妈妈告诉我，当年和父亲一起打成右派到喜德劳改的朱叔叔还健在，他们或许知道一些消息。

我见到朱叔叔时，他已是带着残疾身躯的83岁老人了。他说，1957年之祸，殃及儿女，他两个儿子，一疯一瘫，吃着低保。当我道出来意后，老人慨然说：“我平生最敬重你爸爸，我拼着老命也要去一趟。”

2006年5月2日，我兄妹四人同朱叔叔一起乘火车到四川喜德县。

其实我对找到坟墓，没抱太多的希望。在那个非人的年代里，有多少找不到坟墓的孤魂野鬼！

我们在喜德的前一站浅水湾下了火车，然后坐车赶到两河口镇。过了河，前往山里没有公路，我们雇了三个彝胞轮流背着朱叔叔，赶到父亲当年劳改的二〇七中队队部。

朱叔叔说：“这是你父亲生前劳改的地方，昔日这里曾是一片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河中的流水很清澈，而今已成了光秃秃的山头了。你爸爸就是在这个地方死的。”

现在的队部已成为彝胞的住屋，我找到彝胞向他们道明我们的来意，他们相当热情，找来了知情的龙大爷。龙大爷告诉我们，山上只埋了三个汉人，一个有棺材，另外两个是软埋（即没有棺材），摔死的那人是1960年收包谷时，因砍柴从山上摔下而死。旁边软埋的两人是1961年饿死的，其中有一个戴着眼镜，个子很大，是个北方人，死时很胖（实际上是水肿）。



当年父母和我们合影

虽然时代久远，但隐约高出地面的土堆，依然能看到坟墓的痕迹。我们对墓观察了

一会，从龙大爷所言的时间、地点及父亲遇难的情节来看，朱叔叔认为，都完全吻合。

我们兄妹四人跪在墓前失声痛哭。

爸爸呀，您的儿女来看您来了，您离开我们 48 年了……

我哭得昏天黑地，仿佛看见爸爸带着凄苦的微笑走来，又看见他抬着棺材，消失在阴霾中的背影。

我们拿钱请彝胞赶到两河口镇，买些祭祀用品、食物、10 斤酒，以祭拜亲人，酬谢彝胞。

这时，我仔细地观察了父亲葬身之地，坟向东方，坟头两棵青松护卫，坟后还挺拔着一棵郁郁葱葱的青松，坟上长着青青的松苗，整个咯呷山乱石嶙峋，杂草丛生，唯在父亲和两位不知名叔叔的坟地上长着三棵青松，难道这是宿命的使然，老天将这三个灵魂化作三棵松树？



徐瑗在父亲墓前

彝胞们拿着祭品赶到了。爆竹声声，青烟缭绕，红烛摇曳，我兄妹四人跪在父亲和两个叔叔的坟前行孝子的大礼。三碗浊酒洒地，一敬皇天，二谢后土，三敬亲人。

在父亲的坟头，我们决定，明年的清明，我们将为父亲，也为那两位不知名的叔叔，立下让后人永远纪念的墓碑。

采访时间：2006 年 6 月，地点：重庆市江北区观音桥

## 采访后记

徐季正不是长寿湖右派，但“喜剧”的是，他的女儿徐瑗受他影响，16 岁便被下放到长寿湖劳动，她在那儿干了几乎一辈子。



2006 年，徐妻王靖澳在听到一个幸存右派的苦难时失声痛哭（谭松摄）

长寿湖右派王义珍给我介绍了她之后，我们便开始往来。交往中，我感到，徐瑗对父亲极其敬重也极其热爱，她多次说，父亲是一个非常正直、非常善良，也非常有才华的人。提到她与父亲的最后一次相见，每次她都热泪盈眶。

徐瑗算是幸运的，事隔 40 多年之后，她还找到了父亲的坟。有好多右派子女，如回光时、何隆华、孙洁源等，苦苦寻觅父辈的坟莹，但一无所获。据说，在徐季正之后，喜德的劳改右派们大量死亡，根本就没有坟墓，甚至连“软埋”都没有了。

徐瑗现在也已是 61 岁的人了，但是，她不辞辛劳，



主动承担起了作为一个右派子女她认为应当承担的许多责任。她既关心幸存的老一辈，也关照像我这样的下一代。

在她写完上述文字的第二年，她又去了喜德，既给她父亲立了墓碑，也给那两个不知名的右派叔叔立了墓碑，既在父亲坟前跪拜痛哭，也在那无名的墓碑前叩首垂泪……

补记：

徐瑗 16 岁时“下放”长寿湖，在那儿她目睹了一些右派的情况，下面是她写下的一点文字。

由于我系右派的女儿，在念小学的时候，便体会到右派这个名词的沉重分量。到长寿湖之后，我自然就关注农场的右派、历反这群特殊的群体。

那时他们的人数有 605 人，主要集中在新渔村，另外零星地分散在狮子滩和湖心岛屿中。有五、六十个右派住在种蓄队旁边的茅草房里，干修筑鱼池的活，在淤泥中清理池基，抬巨石等等，每天的劳动量相当大，必须完成定额。

这群文弱的知识人，经过风霜雨雪的艰苦磨练，许多人脸上的书生意气已悄然淡去。他们沾着牛粪的棉袄腰系着一根棕绳，赶着装满牛粪的辘轳牛车。烈日下他们“吭哟”、“吭哟”地呼着号子，汗水湿透了内衬，赤膊下没有半点斯文，一眼望



徐瑗下长寿湖时（16岁）

去，就是一个活脱脱的苦力。不过，当星期天休息的时候，在狮子滩和附近的乡场上，他们却总是尽量穿着整洁，显示出书生的儒雅。我尤其印象深刻的是他们中许多人心慧手巧，居住的环境虽然是草屋，然没丝毫破旧颓废之感，茅草修理得整齐，周围插着篱笆，里面种着花草。

我想，这也许就是他们在苦难中仍然保持着对美和真的追求，“身陷囹圄，不坠青云之志”。虽然我不能深入到他们中间去，了解他们的灵魂，但我想这正是支撑他们走出那段艰难岁月的动力。

有几个关于右派的场景我一直难忘。一是暴打西南政法学院教师右派练彬梧。

那是 1968 年 5 月的一个中午，种蓄队一个姓陈的人（这个人是个很“左”的“积极分子”）突然在水研所楼前大叫：“右派练彬梧要翻天了。”当我赶到时，练彬梧已经被一群人拳打脚踢打倒在地，他在地上翻滚，满面鲜血，嘴、鼻流出的血染红了他的白衬衫。人们一边打，一边咒骂练彬梧是猪狗不如的右派分子。练彬梧躺在地上，一声不吭，随便怎么打，他都不叫一声，当时我想，这个右派好硬气。那群人打完后把练彬梧拉起来，给他戴个高帽子，押走了。

我记得当时天空很蓝，碧空如镜，没有一丝云彩。

我目睹另一个被打得头破血流的人叫欧文定，他是重庆交通学院的右派。当时欧文定 30 出头，正是男人身强力壮的时候，但是，那时没有一个女人愿意嫁给一个右派，欧文定也无法去追求爱情。在强烈的性冲动下，他去偷窥一位女性洗澡。右派加流氓，后

果可想而知，我亲眼看到，欧文定被拉出来，皮鞭和棍棒打得他在地抱头惨叫。那个场面我不敢看，赶快回避了。记得当时右派们也在骂他，认为他丢了右派的脸。

欧文定因此又加戴了一顶坏分子的帽子。后来他被逮捕判刑。

这使我想起一个朋友讲给我的故事：一个地主的儿子三十多岁仍是光棍一条，在生理的冲动中，他时常偷窥女性解便、洗澡，他因此无数次地遭到殴打，批斗。夜夜的性饥渴，终于使他不忍忍受，他使用剪刀剪去生殖的命根，以此了却红尘欲望，彻底断绝魔鬼的诱惑。

.....

几十年的光阴流水一般逝去，1957年反右运动的罪恶，会永远刻印在中华的历史上。



徐瑗在长寿湖

1958年3月5日，周恩来、李先念、李富春来到长寿湖狮子滩视察；1963年4月23日，朱德来到长寿湖。几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共计两天的光临，让长寿湖“蓬荜生辉”。于是，长寿湖给这几位“大人”树了一座高大的纪念碑，并建了一个幽雅秀美的庄园。

每天，无数游客走进庄园，抬头仰望“大人”的尊容，并在塑像前留影。



一百多个消亡在长寿湖的无辜的生命，何日才能有一个纪念碑？！

无数悲惨的青春，无数殷红的血泪，何日才能有一个纪念碑？！

# “解放”后，我们全家的遭遇

孙洁源

长寿湖右派孙毓澄之女，1950年生



1949年后，一个运动让我祖父身陷囹圄，家财尽失；另一个运动让我父亲发配劳改，命丧黄泉。

祖父的不幸，是因为拥有让人眼红的资产；父亲的罹难，是因为响应号召说了一句话。

## 我的祖父孙尊山

我祖父孙尊山，生于1902年。1949年时，他是“四川合众轮船公司”（1936年成立）的副总经理，实际主持公司的全面工作。

公司在1941年时已拥有长源、长远、长福、长宁、长丰、长乐、长寿，长天等轮船，航行于宜宾至南溪、宜宾至泸州、重庆至江津等七条航线，有职工700余人。1947年公司的股本增至3000万股，祖父拥有三分之一。

1949年前，孙氏家族参与的两件大事对四川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一是“合众轮船公司”，二是祖父的堂兄孙我山、孙望山参与组建的“宜宾五粮液酒厂”。

祖父勤奋敬业，谙熟业务，他尤其关心客轮上的职工。还有，他脾气是出了名的好，一向客客气气待手下，员工也恭恭敬敬待祖父。他使公司事业蒸蒸日上，是长江上游航运的重要开拓者和快速发展者。

1950年，祖父被选为重庆工商联委员，又参加了“重庆市各界人民代表参观访问团”到川北革命老根据地参观访问。1951年，全国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祖父把三儿孙毓洮送去参加志愿军，开赴朝鲜前线。1951年，“合众轮船公司”与“强华”“华中”两公司合并建立了“川江轮船公司”。

1952年的一天，几名公安人员突然闯进家来，说公司“偷税漏税”，不由分说把祖父带走。祖母还以为是带去调查，只给他备了带了两件换洗衣裤，哪知一去就是四年！没有一个明确的判决，祖父就被关押进重庆土湾监狱劳动改造。为了使他获释，祖母把家里所有细软变卖交给共产党，祖父才在1956年被放出来。



祖父孙尊山

人放了，资产呢？祖父打拼几十年的财产一夜间成了“国家财产”——“川江轮船

公司”所有航轮、码头设施和其他固定资产全部被收归“国有”。祖父拥有的个人股权自然也成了“他人的财产”。甚至他解放前买的一幢住宅，也被没收为“公房”。

在航运交通的管理上，祖父是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他曾主持了一个大型水上运输企业的经营。但他出狱后，被贬为一个储蓄所的小职员，永远离开了他钟爱的航运事业。

“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来抄家，说他是资本家，凡是值钱的东西均被扫荡一空，我记得祖父有床虎皮褥子也被抄走，还批斗游街。祖父不堪其辱被迫于1966年12月份逃回老家宜宾。

1984年祖父去世，享年82岁。他一生关心时局却不谋政仕，青年时有鸿图大志，从学徒到经商到公司副总，为川江航运事业做出了不菲的贡献。可1949年后历尽坎坷，落魄故里，住在他女儿家一间10平米的房直到终老。

## 我的父亲孙毓澄

我父亲孙毓澄自幼记忆超群，聪颖好学，中学考入重庆复旦中学，大学考入四川大学，是政治系的高材生。

1947年父亲毕业后考进四川美丰银行，后来担任康心如（美丰银行总经理，重庆工商联副主任，陪都参议会会议长）的秘书。

解放后，市政府招干，我父母分别被招进重庆市劳动局、民政局。以父亲的才华和能力，他担任了劳动局局长武毅的秘书。

1957年共产党号召知识分子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父亲是笔杆子，整风会上他担任记录。在提意见阶段将结束时，局长对他说：“你一直做记录，自己还没发言。”父亲说：“我没什么意见和建议，只是外行应向内行学习，有时外行不应领导内行。”

就这一句话，决定了他的命运！

本来没有划他为右派，不幸的是，1958年初毛泽东来到重庆，说重庆右派太少，还没达到机关干部5%。这一下局里立即增加名额，把父亲打成右派。



父亲慈祥可爱，童年时期，每个星期六晚上，当他出现在幼儿园门前，我总要跑上前去搂着、亲着、笑着……



1957年我们六姊妹合影

为什么选上了父亲？他出身是民族资本家，旧社会又担任过康心如的秘书，这就成了把他划右派的“理由”。

记得那时我刚上小学，爱说爱笑的父亲突然变得沉默了，下班回来躺在床上，从不抽烟的他一个劲地猛抽起来。一天晚上我睡醒一觉，听见有哭声，我睁开眼看见妈妈在抽泣，爸爸对她说：“我拖累你了，我走了，六个孩子就拜托你

了……”说着他也哭了起来。我在床上一动也不敢动，“出什么事了？”“爸爸要到哪儿去？”

不几天，爸爸果真没回家了，我问妈妈，她说爸爸出远差了。

父亲被发配到长寿湖劳动改造。他当时还认为，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在新社会就得改造思想。于是，一个温文尔雅的白面书生不分白天黑夜地改造，诚心诚意接受批斗。在长寿湖劳改三年中，他只回来过一两次。记得那次春节他回到家，又黑又瘦，头发蓬乱，一幅拉大板车的苦力模样，这就是我那才华超群、温文尔雅、和蔼可亲的爸爸吗？我们差点没认出他来，这一两年他不知受了多少罪！

爸爸意外出现，我们太高兴了，围着他问个不停：“爸爸，您怎么这么久才回来？”“爸爸，我们好想您啊！”

只有妈妈在一旁默默无语，我发现她好像在笑，又像在哭。

第二天，父母带着我们六姊妹，来到西郊动物园游玩了一天，逗猴子、喂金鱼、捉迷藏……两年没这样开心了，这是我印象中最深刻的全家聚会！

几天后的一个清晨，妈妈和我们大的三个孩子来到朝天门送别父亲。分别时，父亲俯身亲切叮嘱我们，要努力学习，帮妈妈做事，爸爸工作很远，工作完后回来与你们一起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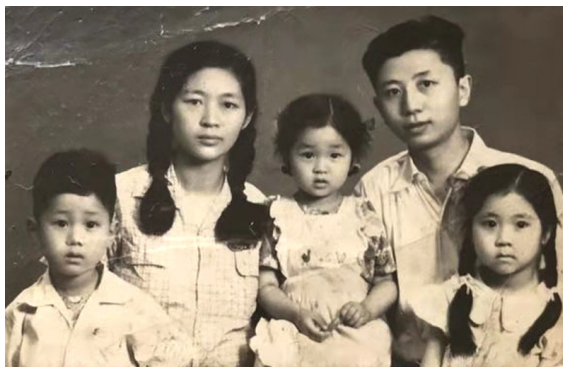
哪知，这竟是他留给我们的最后的话！

望着他瘦小的、黑黑的背影登上轮船，我眼里噙满泪水。此刻妈妈心里一定更加辛酸和痛楚。

若干年后，我见到父亲写给母亲的长信，他对妻子和家庭都有一种负罪感，心头郁闷而无奈，只有拼命劳动，争取早日摘帽，好对妻子和子女有一个交代。他说，劳动触及灵魂，要检讨家庭出身带来的旧思想，一定洗心革面，争取早日摘帽，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由于爸爸态度端正表现突出，1959年他就摘去了右派帽子，他曾兴奋地告诉妻子，他会很快回到劳动局，与家人团聚（可见当时爸爸还是那么单纯天真）。

不久后他担任了高峰岛伙食团长，1960年6月的一天，他到场部开会，天快黑了，他考虑到第二天还要煮早饭，便捎了一袋粮食，划一条小船返回高峰岛，划到桃花幽时，



反右运动前父母与我们



曾温文尔雅的父亲

船漏水下沉，他又不会游泳……

妈妈接到一封电报，说爸爸病危，她赶紧赶到长寿湖。

到了长寿湖才得知父亲已经遇难。母亲悲痛万分，想着看到父亲的遗体浮起来，又担心家里的六个子女（最大的13岁，最小的仅4岁）。她没等到看见父亲的遗体，跌跌撞撞地离开了那个伤心之地。

妈妈回来后，我抢先问：“爸爸的病好了吗？”妈妈流着泪，没有回答。那天晚上，家里像死一般沉寂。

父亲的尸体几天后浮起来，被拖到湖边草草埋了。一条鲜活的生命，一个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三十五岁就葬身于劳改之地。

八十年代末，哥哥来到长寿湖，寻找父亲的墓地。农场接待人员说，年事久远，很难找。最后找到一个还留在长寿湖的右派，是个养蜂人，他说当年很多劳改人员病死、饿死、淹死、累死，其后人去寻找坟地，大多无果而归。他带哥哥到出事地点，询问当地农民，农民说知道这件事，大概埋在山坡的乱石岗上。

他们在那儿寻了半天，一无所获。

哥哥跪在坡上，面对湖水仰望青天，磕着头泪流满面地说：“爸爸，我来看看您了……”

## 我的母亲包德钦

我的妈妈1921年出身于四川南溪的一个书香门第，她是包弼臣（清朝大书法家）的曾孙女。妈妈天生丽质，聪明伶俐，曾是南溪县中的“校花”，由于成绩前茅，被保送川大教育系深造，她与川大毕业的父亲成婚，郎才女貌，一时成了当年宜宾南溪的佳话。

解放初期，她以全市上千人中第三名的成绩考入重庆市民政局。父亲被打成右派后，民政局领导多次要她离婚，划清界限，但母亲坚决不从。妈妈三十几岁就守寡，每月四十几元的工资要养活七口人，可想多艰难。她把家里凡是值钱的东西全卖光了，包括她的手表。有些好心人劝她说：“你一个人太辛苦了，还是嫁个人家吧。”妈妈总是摇头。



我的母亲包德钦

在那艰难的岁月里，她一个人撑起了这个家！

在毛泽东“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年代，地富反坏右以及家属子女，成为底层贱民。



少年的我

哥哥由于是右派子女不准读高中，他只好去打临工，在嘉陵江边锤石子。我和姐姐在烈日下到大溪沟河边去批发西瓜来卖，记得有一次我中暑倒在街边……家道的艰难，过早地将我们几姊妹推向社会。

妈妈则被踢到条件和环境极差的石桥铺火葬场去守骨灰盒，她一个人在那阴森森的地方，一干就是好多年。

1969年我上山下乡到农村，随后又轮到三个弟弟，家里就剩下妈妈孤身一人。

正是此时，二十出头的姐姐突然病故（文革中医院闹革命缺医少药）。这一打击对妈妈是致命的，她原本因为太操劳和精神压力身体就不好，姐姐的去世彻底把她打垮了。她整天发高烧说胡话，我们从农村赶了回来。医生说，母亲可能患的是肺癌，要我们做好思想准备。

不！我们不能失去母亲！我跑到主治医师面前，向他哭诉母亲的遭遇。医生非常同情，表示要全力抢救。经过大手术，取掉四根肋骨，割去一叶肺，妈妈终于获救。

2001年的夏天，妈妈、我和小弟全家一同来到长寿湖桃花幽，住在面湖的宾馆里。那天阳台上飞来一只灰色的鸽子，怎么赶也赶不走，一直咕咕咕咕地叫。妈妈深情地对我说，这是你爸爸来看我们了。

几十年过去了，妈妈对爸爸一往情深。

2010年，母亲离开了我们。

我们为父母建了一个合葬墓，我们在墓中放入父亲生前的一顶帽子陪伴母亲。



父母结婚照

## 后记

孙洁源是在看到《长寿湖》一书后才同我联系上的。她传来了她家当年的照片，于是，我早已熟悉的“孙毓澄”不再是一个无声无形的名字，而是一个饱满的鲜活生命。

我久久注视着那发黄的、但充满了生命气息的老照片，心中又是那体验过无数次的情感——悲与愤！

《长寿湖》一书早在八年前就出版了，第二稿我也已经在半年前编排完成，但是，这些照片让我欲罢不能。于是我请孙洁源写一篇相关文章。

几个月后，孙洁源传来了她写的文章，上面的文字就是她文章中的一部分。



2001年我们陪妈妈来到父亲遇难的长寿湖

# 没有敌人也要制造出敌人

茹章鹏

右派茹荣江之子



## 一，父亲蒙冤

1957年下半年，反右运动开始了！

父亲胆战心惊，不知厄运将落在谁的头上。

上半年整风时，父亲一言不发，在逼他非得发言时，他只说共产党好，新社会好，其他什么都不说。他以为这样总可以保得平安。没想到那个年代，没有敌人也要制造出敌人。

当时父亲在忠县税务局工作。局长刘显志，副局长刘接双为了向上表功，谋取晋升，在20几个人的税务局里，抓出了一个有七个成员的反革命集团！

是怎么抓的呢？

有一天税局的同事李玉海过生日，请局里的同事到他家去吃饭。那天因党团员们要开会都没去。父亲和他的五个同事一块去吃了生日酒。那天我也赶路跟去吃了顿饭。这事实是在太平常不过了。

局里开始说他们吃吃喝喝搞小集团，反右运动一来，竟把他们七个人说成是一个反革命集团！（我也参加了那次生日宴，但因为只有8岁，幸免于难。）

七个人自然不承认。不承认？好办，关押起来严刑逼供！

父亲后来对我讲，先是饿饭，连续两天不给饭吃。随后一个姓冉和姓刘的打手端来一碗辣椒水，说：“你不是想吃饭吗，给你饭吃。”他们将一碗辣椒水从他的鼻孔和嘴灌下去，呛得他两眼冒金星，捶胸顿足咳嗽不止。

接着就是毒打，用乒乓球拍子砍，用棍子打，父亲被打在地上爬，满头满脸都是血，抓起来又打，打得父亲遍体鳞伤。父亲被关押达半年之久，天天被毒打，非要他交待“反革命集团名称、纲领、纪律、行动方案”。如不交待，又是一阵暴打。我父亲是一个文弱书生，好几次被打得昏死过去。

近日父亲的狱友古梦玲叔叔讲，他们用缝被盖的大钢针来刺父亲的手指头，刺得父亲尖声惨叫，双手鲜血淋淋，几度昏厥……。

打手冉隆碧、刘青鼎乘父亲不省人事，捉住我父亲的手指按在他们编造的口供上，然后上报。



县里很多人都不信，说茹荣江六百多度的近视眼拖着六个孩子会去搞反革命集团？这时反右运动已到后期，在那个不讲理不讲法的时代，没有公诉更没有辩护，当局不容分说，仅凭伪造的口供，法院一纸判决就定了罪。

“反革命集团”的五个成员被开除公职，遣送回家，其中邓炎、肖炎青戴着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回家后，经不起这种打击，不久就含恨死去。过生日请客的李玉海被作为“反革命集团”副首犯，判三年劳教。首犯是谁呢？是我父亲，他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押往青海省劳改。由于当时正是反右运动期间，父亲临行时又被莫名其妙地加了一项右派分子的帽子。

在那个野蛮时代，“没有右派言论也要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没有敌人也要制造出敌人”！

为什么反革命集团首犯只判了五年徒刑，副首犯只是判劳动教养，其余五人只是开除回家，难道他们敢放纵反革命？我后来听说，县里只有五年刑期的决定权，超过五年必须上报，如果上报，这个完全经不起核查的“反革命集团”就可能露馅。吃一次生日酒就成了反革命，那么，那次我也去了，8岁的我就应当是全中国最小的反革命了。

1958年初，我去接上夜班的母亲回家，快到家时我看见了父亲。他看见我很吃惊说：“你回家告诉妈妈，说我到公安局开会去了。”我转身说这不是妈妈吗？父亲、母亲四目相对，无语……这时我才发现父亲戴着手铐，跟着的是几个彪形大汉。他哪里是到公安局开会，是被抓走了呀！那时我还不懂事，但那一幕一直印在我脑海里。那时父亲才40岁。

母亲回到家，捶胸顿足嚎啕大哭，大人小孩哭声一片！那一夜成了我家命运的转折点。



1957年父亲蒙冤前全家合影

江边，父亲同一长串右派被押着，上船出发到青海去劳改。母亲匆匆拿了两包烟叫我姐姐章明给他送去。为这事，母亲被她单位领导批评，说她给右派丈夫送烟是阶级立场不稳，母亲为此写了好长时间的检讨。

后来得知，那两包烟被押解员没收了，他一支都没抽着。

## 二，父亲走后

反革命兼右派的父亲被押走后，厄运随之而来。很有天赋的、正读高中的大姐被放回家了；读小学五年级的我，也被开除回家。最不幸的是我母亲，她被下放到长江边挑水浇豆芽，每天要挑几百担水。寒冬腊月，河水刺骨，母亲赤着脚走进超过膝盖的冰冷的河水里挑水，每天要往返几百次。这不是劳改的劳改，母亲由此患上了风湿心脏病，

最后她也是因为这病而去世。

父亲被押走后紧接着就是三年大饥荒！忠县和全国一样饿死了很多人，有的一个村一个村的死光了。忠县本是个产粮大县，据老人说，一年生产的粮食够全县人民吃6年。那么粮食到哪里去了？

被四川土皇帝李井泉统统调走了！

1958年大跃进，浮夸虚报粮食产量。李井泉高兴地说：“粮食丰产这么多，粮库都来不及建啊！”他将浮夸虚报的粮食产量当作真实产量上报中央。中央便多次从四川调走大批粮食，许多省份都吃过“四川大米”。难怪小时候我看到忠县长江边，停满了一条条装粮的大驳船。为了方便运粮，还在夏王庙处修了一架专门运粮的滑车道。

粮食调空了，人们手中的粮票怎么办？1960年7月1日，李井泉宣布：四川省粮票全部作废！总数高达6500万斤。好多人手中的“四川省粮票”，都是忍饥挨饿积下来的，为的是关键时候能救命，如今这宝贵的救命粮票一下子成了废纸！李井泉这伤天害理的绝活不知把多少四川百姓送上了黄泉路！

城里居民比农村好一点，因为每月还有一点供应粮。四川城市居民每月25斤的供应量压缩为19斤。就这19斤还打折，有时用5斤甚至4斤带泥的红苕冲抵1斤大米。城里人吃不饱，也有饿死和自杀的。

我幺妹奶妈的丈夫叫郭玉儒，曾参加过抗美援朝，他饥寒交迫无路可走，不想活了，决定将当月的十几斤粮一口气吃完就去死。他原本还想拉着儿子冬生一块上路，最后时刻心有不忍，将儿子支走了，告诉他，明天到这里来与爸爸见面。随后他独自向永靖门的变压器处走去……

当夜全城突然停电，整个忠县城处在漆黑死静中。人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得知，郭玉儒爬上变压器触电自杀了！

我们跑去一看，郭玉儒损坏了一台变压器，他全身被烧焦，头枕着变压器圆柱形油箱，好像安然睡去的样子。那情景，一直烙印在我的记忆里。

母亲每月只有32、5元工资，要供养最小才2岁的六个孩子的生活，我们全家是在死亡线上挣扎。为了六个儿女不致饿死，母亲像牲口一样活着，她是在拼命！

好几次有人提出，为了活命把弟妹抱给其他人家。母亲拼死不干，她不愿意骨肉分离。可是，政治上的歧视、精神上的摧残、生活上的折磨，让她濒临崩溃。好几次母亲要自杀被我们发现，我们哭着说：“妈呀！你不能死呀，你死了我们怎么办啊……”

我们一家人抱头痛哭。

为了活下去，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15岁的大姐到养路段去打短工，13岁的二姐到服装社当学徒，11岁的我出去自谋生路：挑砖，挑瓦，补皮鞋，拉板车，抬石头……



我的母亲文德华

### 三，父亲归来

1961年秋，父亲以“保外就医”的名义，劳改了三年多提前释放了。

他回到家，抱着母亲痛哭：“文尧，文尧，是我把你们害苦了，今后我慢慢来报答……”

父亲说，劳改队（青海塘格木监狱）大量犯人死亡，他们监室里，每隔几天就有人死了被抬出去，塘格木监狱那个地方很荒凉，平时基本上看不到人。犯人死了卷个席子，挖个坑埋了就是，墓碑都没有。父亲之所以能活出来，全靠他在劳改队里遇到了一个忠县老乡，叫吴英全。这个老乡从部队转业分到劳改队当卫生员，一天他发现我父亲大便解出来是一滩血。

父亲肠胃本来就on不好，在劳改队都是吃糠粑，糠粑吃下去解不出便来，他好长一段时间便血，人瘦得皮包骨。吴英全说，你便血这么久了还不治疗？父亲说他不敢讲。这位老乡去跟监狱长讲了，父亲这才被送到监狱医院。医院里见父亲人老实，又有文化，医院后勤伙食团缺个记账的，就让父亲边治疗边记账，不回劳改队去了。父亲这才捡回一条命。

父亲40多岁头发就全白了，人们叫他茹老头。他回来后没有工作，找了很多单位都遭到拒绝，他只好每天出去帮人挑水谋生，每月挣十几元钱，他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整整挑了十七年的水。

有一天忠县法院来了几个人，给父亲宣读了《塘格木监狱释放证明书》。书中说父亲劳改刑期已满，现予释放，特此证明。可是，父亲随后又被当作管制分子管制起来。这种拘役、管制是刑法处罚的种类，必须是犯了罪，经人民法院正式判决后才生效。父亲劳改完了又没犯新罪，凭什么又把他管制起来？而且没有限期，让人永世不得翻身！父亲翻不了身，这就意味着我还要继续当反革命、右派的儿子。

文革中，我们想申诉，一一走访了当年父亲的同事：程守谦、崔玉禄、张子健、杜景福等等，他们都出了具书面证明，说我父亲是被冤枉。其中崔玉禄（时任副县长）写到：

“我路过税务局巷子时，听到里面传来凄惨的喊叫声，我就前去看见他们正在打李玉海，李玉海还将被打的全身伤口给我看，鲜血淋漓，惨不忍睹。我便制止了他们打人的行为。”最让人感动的是原人秘科长严绪炳（这时已调地区税务局）、原农税科长吴光烈（时已调地区行署）不惧风险共同书面签名证实：

“茹荣江反革命集团案是个假案，冤案！是用竹签子、辣椒水苦打成招的假反革命集团案！”在那个时代像这样敢说真话，难能可贵！



1961年父亲劳改回来全家合影

当时我们认为，只要英明领袖毛主席健在，就一定会实事求是把我家的冤案翻过来。于是我们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写了申诉书，要求鉴别平反。

我们太天真了，申诉书被退回原地政府！结果可想而知。我父亲又被挂上“右派分子茹荣江”的牌子，抓到建筑社的会议室台上进行批斗。积极分子刘巧把我父亲按成90度，说是叫喷气式批斗法。

我母亲也被拖出来游街示众，他们用废报纸做成船形帽，强制戴在母亲头上，押出

去游街。

看着母亲受这样的侮辱，我当时握紧拳头就要冲上去把母亲救出来。母亲看了我一眼，摇摇头。我脑海中突然涌现出母亲教育我们的话：“儿啊！你不要出去惹祸啊，我们这个家只吃得补药，吃不得泄药啊。”

我压下了冲动，但是，愤怒、仇恨，充满了我的心胸！

当时播放过一部电影叫《农奴》。片中的主人翁叫强巴，是个哑巴，遭受着农奴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片中的一首歌在我心中引起共鸣：“阿哥哟，你何须说，你何须说，且听我为你唱歌。我只能唱啊一支无字的歌。为了我的歌声，你也要在人世上顽强的生活……”

## 后记

茹章鹏不是长寿湖右派之子，而是长寿湖右二代孙洁源的朋友。孙洁源说，茹章鹏写了一本书，叫《右派的儿子》，想传一部分给我看看。不久，他传来了一万多字的文稿，我看后整理出了以上的文字。

忠县是我作中共土改调查时重点采访的地方，这个长江边上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的县在1949年之后是一部沉冤浩浩、血泪斑斑的历史。没有敌人也要制造出敌人，无数无辜的生命消殒在中共血腥的祭台上。

## 十三、一个女右派的九死一生

——女右派蔡素心的经历

她不是长寿湖右派，而是在恐怖的峨边劳改营中死里逃生的右派之一。

我记下她和王开泰的经历，以展示几分长寿湖之外的血腥。



# 蔡素心

1957年重庆唐家沱小学教师

1930年生

我出生在广安，父亲是个生意人，收购黄豆、大米、高粱等用船运到重庆去卖。有一次，一个地主打麻将输了，拿了30石谷的地契给父亲，因此，父亲后来又被打成地主。解放后，父亲把所有的财产都交给了共产党，被评为开明绅士，还当了广安第一届政协委员。但是，没多久城市里也抓地主，父亲又曾参加过袍哥组织，因此被作为反革命抓去劳改。

我14岁那年，家里请了一个20岁的年轻人来当帐房先生，叫欧阳祀传，是重庆广益中学（现重庆五中）的毕业生。他非常能干，我见他什么都会做，还自己补袜子。他说他母亲去世得早，家里贫寒。他介绍我看了很多书，什么《战争与和平》、《家春秋》等等。一来二往，我们有了感情，不敢公开谈情说爱，就把情书放在猫儿洞里（那时在墙角打一个小洞，便于猫儿从一间屋钻到另一间屋），没人的时候取出来看。我写：佩服你，喜欢你，愿意同你做终身伴侣……

父亲发现我们相好——从眼神上看出来的，他认为我们不门当户对，赶快给我说媒，要把我嫁给大兴场乡长的儿子。欧阳很伤心，关在屋里写辞职，他说我们只有下辈子再做夫妻，我说不，我要学党惠，我们跑。我逃出去，逃到哪？逃到外婆家，但很快就被抓回来关起。家里赶快让我出嫁，我在花轿上把婚纱都撕了，到了婆家我装疯卖傻，又哭又闹，最终还是逃了出去。

那一年我17岁，还是广安女子中学的学生。

我顺江而下，身上带的钱财在安庆被国民党士兵搜缴了，我走投无路，最后靠在南京帮人带娃儿为生，那段日子好苦。

共产党一打下南京我就参军了，然后随军回到四川。在重庆我找到了欧阳祀传，他



年青的欧阳祀传

先在较场口帮他哥哥卖米，后来到江北16中学教书。我们结了婚，算是有情人终成眷属。这辈子我为了他小姐不当，脱离家庭，逃亡流浪；他这辈子为我当了22年右派家属，吃尽苦头。现在他已经去世了，我想，我们两个在阴间见面没得扯的了，打平了。1957年，欧阳祀传已到唐家沱学区的太平村小学当校长，这时我已转业，也到小学教书。我喜爱教书，我这个人活跃，以前在广安女中时就是演讲第一名，爱唱爱跳。当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当中国的瓦尔瓦拉（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中的主角），60岁生日时学生们来庆贺。那个时候干工作积极得很呐，背着娃儿去家访。

1957年暑假，教师们到求精中学参加反右学习。这个时候，我们唐家沱教区的几所小学分了四个右派名额，暑假

结束时已打了三个。

一个叫唐志昆（音），他给党员校长写了张大字报，说他养鸡养鸭。给党员提意见就是反党，所以是“名符其实的右派”。

第二个叫胡立成（音），他是一个事务老师，有12块钱对不起帐，打成右派。他现在已去世了。

第三个叫尚本玉（音），当时她很年轻，20多岁，她谈了几个对象，又没有上床，为此也把她打成右派。

但是，还差一个。

上面说，任务没有完成，寒假要补课，叫做“炒回锅肉”。

有一次，我无意中看见一个从师范毕业分来的女教师同一个有妇之夫在煤油灯下亲嘴。这是道德作风问题。那教师还是一个团员。于是我就说：“她是哪个入的团哟？是不是跟着团支部书记屁股后头转才入的团？”

“屁股”两个字要了我的命！共青团是共产党的助手，你用“屁股”来诬蔑共青团——也就是诬蔑共产党，不是反党是什么？！

好了好了，我们唐家沱学区正好还差一个右派，蔡素心就算第四个——所以说我做“凑数右派”。

不仅有“凑数右派”，我们学区还有“没有右派你就是右派”的右派。

XX小学没有打出右派，校长被叫去训话。校长解释说，我们那儿条件差，缺教师，一个教师要上好多节课，上厕所都是跑，大家都忙着教学，没想其他的。上面领导冲他一阵骂：“你那儿是真空呀？是月球上呀？！没有右派？没有右派你就是右派！”于是校长当了右派。

划我右派时，我已快生小孩了，挺着个大肚子挨批斗。我受不了这种冤屈，血往上冲，想一死了之。我走到六楼上，要往下跳。一个老师一把抱住我，说：“蔡老师，要不得，你现在是两条命哟！”这句话救了我，想到肚子里的娃儿，我打消了死的念头。当右派22年，我三次差点走上绝路，这是第一次。

1958年4月，我生了儿子晓光。共产党真是做得出来，我产假都还没满（当时产假38天），就算是右派，要劳动改造，留在学校扫地、打扫厕所也好嘛，也有家照顾嘛。不！把我弄到老远的玉带山石马河去劳动。我带着出生才36天的婴儿，离家去劳动改造。我同儿子住在一个猪圈旁边，我下地劳动，婴儿没法带，只好把他放在一个摇篮里，休息时赶紧跑去给他喂奶，他在摇篮里“哇——哇——”地哭。

由于娃娃太小，又缺少照顾，不久他就开始拉肚子，随后又发烧，发高烧。别人说，要不得哟，你娃儿在扯筋（抽搐）了哟。

我赶快去找监管我们的杨队长请假，说娃儿发高烧。他一听就吼：“发啥子烧？！你是监督劳动改造，不准！”

我要救娃儿，不准也要走！我不顾一切跑回去，把锄头一丢，抱起娃儿就走。到儿科医院一看，高烧40度！马上就住院，用冰块降温。两天后娃娃的命才算保住了。

后来我想，我当了右派，怎么不去把娃儿打掉？后面的日子好艰难。

这事给我惹下大祸。

我一回去杨队长马上召集右派分子开会批斗我，这还只是个开始，我不知道这事不是开个批斗会就了结了的。

一天（当时我已回到唐家沱），突然接到江北区法院的通知，要我在指定的日子去法院。我不知道什么事，以为是要调查了解点情况。我从唐家沱坐船到朝天门，又从朝天门坐车到牛角沱，从那儿过江，走了大半天才找到江北区法院。

法院劈头给我一句话：“今天喊你来是受审！”

我头一下子就胀大了。

一个法官对我说：“听着，蔡素心，你不服从劳动改造，擅自离队，现依法判你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管制两年。”

我听到宣判，头胀啊胀啊，胀得大得不得了。天哪，我哪个一下子又变成了反革命？！我又没有贴标语，又没有放炸弹，又没有组织人去游行，又没有去反对人民政府，只是去救了娃儿，怎么就当反革命嘛！

是那个杨队长到法院告了我，说我抗拒改造。

我从江北过河到了牛角沱，天已经晚了，当天没有船到唐家沱。我坐在趸船上哭，哭得昏天黑地。那个绝望啊。．．．．．我想跳河，跳嘉陵江。我俯身注视着江水，你猜我看到啥？我看到我的四个娃儿，一排站在面前，大的七岁、老二五岁、老三三岁，最小的还在吃奶，我哪个跳得下去哟。．．．．．我跳下去，眼睛一闭，没得痛苦了，丈夫怎么办？他拖四个小娃儿，哪个愿意嫁给他？他只有一辈子打单身拖四个娃儿，他那点钱，日子怎么过？

我跳不下去，又哭。守趸船的一个老师傅说：“妹妹呀，你都哭了几个小时了，你为啥子嘛？”

我哪个给他讲嘛，我一直哭到天亮。

宣判管制我之后，把我弄到江北去修路，抬片子石。同我一块抬石头的是一个高度近视的右派，他也姓杨。有一天，他望着江对面的市中区说：“城市一片黑暗，看不到光明。”又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我赶快说：“你不要这么说，不要雪上加霜，我们现在只能吃补药，吃不得泄药，我还有四个娃儿。”他听后“嘿嘿——嘿嘿——”地笑。

万没想到，他把所说的话栽在我头上，暗地里到江北雨花村派出所去揭发了我！

这下又罪加一等。我被从修路工地上抓走，宣布押送峨边劳动教养。这是1959年秋。

杨右派也没捞到好处，他被判刑6年，后来死在狱中。

我们一大群劳教分子，从储奇门转运站集中，丈夫赶来给我送了一点衣物。两天后我们出发，一个人发两个菜团子，前往凉山州峨边县的沙坪劳改农场。有些人见那个菜团子实在难吃，发下来就扔了，我则好好地收藏起来，后来那些人饿得只有喝水，看我吃菜团子羡慕得很。

我被分到沙坪农场太阳坪女子劳改二队，队长姓涂。我们都不知道要劳改多久，队长说：“你们好好劳动改造，好久改造好了好久回家。”

我为了早日回家，拼命开荒，一天开两分地，双手都磨烂了。墙报上我每次都是火箭，都是模范。



劳动累、苦就不说了，最要命的是饥饿。我们吃啥？早上一碗清汤汤，中午一个红苕，晚上几个土豆，一个个饿得偏偏倒倒。监管干部吃了鸡，我们去把他们扔在地上的鸡骨头捡起来，放在铁罐子里用水煮，然后喝“鸡汤”。在坡上劳动，抓到什么吃什么，癞哈蟆、蛇、叫叭叭（蟋蟀）。陈金蓉就是吃癞哈蟆中了毒，全身肿胀，拉血，又没有医药，死在劳改队。陈金蓉是重庆江北炼油厂的工人，她借了五块钱给段上的居民委员，后来她叫对方还，对方还不起，就说她娃儿喊了反动口号——一天，她娃儿才两岁半！于是追究大人的责任，就把她送来劳教。

右派许霞是个非常好的中年妇女，她丈夫是重庆上清寺邮政局局长，许霞贤惠得很，对人多好。在那种饥饿的情况下，她居然把早饭的粥和午饭的红苕卖了，换成钱给她娃儿寄去。她吃啥？在坡上捉叫叭叭，用狗尾草串起，在火上烤，噼噼啪啪炸开后就往口里喂。她怎么活得出来，死在太阳坪了。

黄汉超是自贡的一个体育教师，也是右派，她睡在我旁边，一天清晨，她醒后坐起来，突然身子一歪，倒下去就断气了。我赶紧叫：“管教，管教，黄汉超死了。”我自己也饿得有气无力，喊叫的声音像蚊子，外面根本听不见。我们睡的是一个用木头搭起来的长长的通铺，于是像传接力赛，大家一个接一个往外传：“管教，管教，黄汉超死了。”

管教进来说：“拖出去就是了。”

唉呀，那个时候死人多得很，开头还立个牌牌：劳教人员XXX之墓。后来死人多了，一群一群地死，于是一排七个、一排八个地掩埋，死者一个个骨瘦如柴，都是劳教人员去埋，劳教人员也没得力气，薄薄地掩一层土就完事，现在去挖嘛，保证是“万人坑”。

我们在太阳坪还算好一点，条件更恶劣的石大鼓（音）死人更多。石大鼓又高又冷，国庆节的时候就下大雪。在那儿劳改的是些有身分的右派：大学教师、高级知识分子、局长、厅长的。我要是到了石大鼓，肯定死了。

其实我也差点死了。首先是水肿，吃了肖光珠（她也是劳教人员，在队里当医生）给的利尿片之后，一夜拉20多次尿，人马上又瘦得像柴棍。父亲给我寄了半斤猪油，不准我吃，倒在河里，寄来粮票，根本收不到。1960年下半年，我虚弱得无法开荒了，就坐在坡上剥红苕上的泥土，还是不行，进了休养室，接着又被送进劳教医院。进劳教医院时我已经濒临死亡，一打针我就昏死过去了，隐隐约约听见喊：“快点！快点！”还好，四个小时后我醒过来了。

医院下面就是大渡河。我望着滚滚滔滔的河水哭，天天掏出丈夫寄来的一张照片，上面四个娃儿站成一排，最小的才两岁多，我一看照片就哭：不晓得还见不见得到他们。

1961年，由于死人太多，上面开始关注农场，于是，像我这种眼看要死的人被放回了家。

我永远记得我回到重庆时的模样：穿一身劳改蓝布服，颈子伸得老长，头发只有20多根，又黄又细，乳房已经完全塌陷，只剩两个乳头，身上皮包骨，肋骨一根一根地凸起，像个骷髅，体重只有35公斤，坐凳子必须垫棉垫子，否则骨头就抵得痛，两步梯子都上不去，上了一步第二步就只有爬。总之，那模样就像是要死的非洲饥民。丈夫说，去时是个人，回来是个鬼。这话还只能私下里悄悄说，不敢公开说。

丈夫一个人拖四个娃娃，家里已经十分贫穷，为了救我，只有卖东西，桌子、板凳、

棉被，包括一床父亲送我的英国毛毯。

回来后我没有工作，去找了一个代课教师的工作，只干了一个月，上面就来通知，说我虽然结束了劳教，但没有摘帽子，仍然是右派兼现行反革命，不能教书。我想去擦皮鞋，但是我们连买椅子和工具的钱都没有，我只得去摆一分钱看一本的小人书摊。

还是无法生活，我就去找雨花村派出所，想参加华新街街道运输队。派出所的民警说：“不行，街道运输队是集体所有制，你是管制分子，不能参加。”

那次到派出所去要求工作，让他们知道了我丈夫在劳动小学教书，结果，不仅我没得到工作，反而连累了丈夫。他们说，劳动小学是军工厂子弟校，像我这种分子的家属是不能在劳动小学教书的。丈夫教书教得很好，年年都是区优秀教师，所以才把他“提拔”到了市区。这一下他又被贬回唐家沱。

我们搬家，一口破木箱，一个煤炭炉子，一个尿罐就是全部家当。我带着四个娃娃，坐一条农民运粪的船顺长江下唐家沱，这是1962年。

在唐家沱仍然没有工作，我总不能让丈夫来养我，他哪里还养得起？！我去参加了一个没有任何福利的名叫“生产自救”的劳动队。我只能加入这个处在最最低层的劳动组织。干啥？担，抬，担，抬。给学校担煤炭、给船厂卸生铁砣砣、给派出所修房子——那是义务劳动，不给钱的，还有抬死人、埋死人。联合诊所的一个医生上吊死了，是我埋的，二院的内科主任郭医生也是我埋的。郭医生的爱人是日本人，回日本去了，郭医生给她寄了两张文革的传单，被打成反革命，他割颈动脉自杀。我去埋他时见他穿得整整齐齐，西装领带，还有皮鞋。但是他死前很痛苦，挣扎时皮鞋踢掉了，双眼鼓得很大。他是医生，以为割颈动脉死得快，看来还是很痛苦，我把皮鞋给他穿好后才抬去埋的。江中淹死漂到唐家沱的死尸我也得去捞（注：唐家沱是重庆一个著名的回水沱，江中的死尸往往在这儿回旋，不再下漂，所以，唐家沱以打捞死尸出名），有的死尸我们还得抬到很远的南坪四公里去烧。

那些年，在唐家沱，除了又苦又累的体力劳动，还有无休无止的批斗挨打，尤其是在文革期间。

文革时，除了右派和反革命外，又给我加了一条罪名——“黑帮家属”。哪个黑帮？邓小平！邓小平的姐姐是我的亲舅娘。因为同邓小平的那一点亲戚关系，我被打得惨啊。白天我像牛马一样的劳动，晚上被拖出去像狗一样地打。他们把棕绳浸了水，将我反吊起来，冬天里，吊得我汗水湿透了衣服，皮肉都吊脱了，你看我手指伸不直，就是那时吊残的（注：我同蔡素心见面握手时，已感到她手指的伤残）。有一次，他们把我拉到一个乒乓桌上跪着挨斗，突然有人从后面一脚踢来，我一个狗吃屎扑下地，两颗门牙摔断了，脸上鲜血长流。我想把牙齿捡起来，不准！一声骂：“起来！你装死狗！”

你看我的假牙（蔡素心取下假牙给我看）。

还有一次夜里把我从床上拖起来，押到民办校，用皮带死命抽打我屁股，把我屁股整个打成猪肝色。我说，我才6岁邓小平就出国去了，我同他又没得任何联系，更没有沾他一点光。只是在解放后同他在少年宫跳过一次舞，但是我都没对他说他姐姐邓光烈是我舅娘。为什么不说，因为我舅娘是划成地主的。文革时，舅娘就在人和街扫地，她还死在邓小平之后。

那些日子是狗都不如的日子。我三天两头被捆起来拉出去游街，人们，尤其是一些半大娃儿，冲着我吐口水，扔烂鞋子。他们强迫我在胸前缝一块白布，上面写“现行反革命蔡素心”，背后一模一样缝一块。我走在路上，一些年轻人看到我的“标记”。吼道：“站到！”我就赶快站住。“你说你害死了多少革命同志？你老老实实交待！”我说：“报告革命小将，害死了多少我记不清了，请你们到派出所了解，我害死的数目档案上都记得有。”“狗日的，”骂着一脚踢来，“滚！”

天天过这样的日子，我受不了了。我对红卫兵说，你们天天把我拉上拉下的斗太麻烦，干脆把我拖到沙河坝，一颗子弹就解决了。

他们没杀我，我自己想走绝路了——那是在把我手吊残了之后。

这是我在那22年中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打算自杀。

那天，我拿上绳子，独自走到家后面山坡的树林中，我拴好绳索，脚下垫起石块，正在作死前的最后哭诉：“娃儿哪——”

嘿，正在这时，一个十岁的农民娃儿带着我女儿找我来了！

那天我提着绳子上坡被那个农民娃儿看见了，正好我女儿到处找我，一边找一边喊：“妈妈呀，妈妈呀——”那个农民娃儿说：“我晓得你妈妈在哪点。”于是他带着我女儿来到坡上。这个农民娃儿也是在我被游斗时吐我口水的娃儿之一，他看见我要寻死，说了一句：“你死了哪个嘛，还不是挖不脱（意思是死了罪名也洗不脱）。”

我一听，是呀，死了是“畏罪自杀”，还是罪人，而且罪加一等。

“不死了！”我把石块“咚”地一声蹬掉，收起绳子回了家。

现在我每次回唐家沱都要去看那个农民娃儿——他在食品公司杀猪。我每次都给他买包烟，谢他无意中的救命之恩。

从那次自杀未遂之后，我变了，想横了！不怕了！

我对那些打我、整我、斗我的人说，我现在是一砣肉，你们拿去横切、竖切都行，红烧也行，清炖也行，小炒也行。我现在的名字叫“死猪不怕开水烫”！

人走到那个境地，什么都不怕了，胆子一下子大起来。当时一听到喊“分子”们集中，各类“分子”都吓得发抖，尤其是那几个地主婆，尿都骇出来。我完全无所谓：大不了一死，人死无大灾，要嘛就把我的命拿去，还怕什么？！

我们过一段时间就要进行“改造评审”。先在毛的像前跪下，脑袋啄起，向毛主席请罪，然后交待自己这段时间的改造情况，接下来进行改造的等级评定。一类最好（属于可以考虑摘帽的对象）；二类比较好；三类不好不坏；四类是抗拒改造。我们白天劳动，晚上来搞这些事。那一次评审我时已经很晚了，生产自救队的人劳累了一天，困得直打呵欠，想早点回去休息，不断催促我：“蔡素心你快点说嘛，快点检讨嘛。”

我交待我做了些什么好事，如夏天挑水去把河沙淋湿，免得大家烫脚；主动去义务扫仓，把每一粒粮食交还食品公司。 . . . . .

监管我们的派出所那位曾户籍，是个左得可爱的人物。他阴阳怪气地说：“评二类嘛高了一点，评三类嘛又矮了一点。”

我跪在地上交待了半天，头一直是啄起的，听到这话我一下子抬起头来：“曾户籍，你就来个发明创造，给我评二类半嘛。”

那个年代，监管我们这些分子的公安民警是何等的威风，没人敢在他们面前出口大气。我的话大大地冒犯了他，他一拍桌子，吼道：“他妈的，不准走！到派出所去！”我也火了，厉声说：“我陪你！”

他一看钟，晚上 11 点半了，就说：“其他人回去，蔡素心到派出所。”

在派出所，曾户籍骂道：“你格老子故意跟我捣蛋？！”

我说：“曾户籍，你评工资如果二级高了三级矮了，国家为了发挥你的积极性，靠高不靠低。我做了那么多事情，你就不能给我评个二类？我还是想摘掉帽子。不过现在我想横了，我就是把泰山背起走你都不会给我摘帽子，去它妈的，我以烂为烂了，随便你哪个搞，你明天把我送走（进监狱）都可以。”

他见我一副不要命的样子，骂一通也就下台了。

那些年，除了曾户籍这样的人，“革命群众”也可以随意欺负我。比如我拿肉票去割肉，卖肉的看见是我，就割最孬的肉，我求他几句，他还说些羞辱人的话。文革时搞武斗，长江断航，唐家沱连酱油都买不到，后来终于供应了一次，排老长的队。但是，我排拢了后不卖给我，我提着瓶子往回走，一个积极分子扯起喉咙叫喊：“革命群众，革命群众，严防阶级敌人搞破坏活动！”

我是唐家沱地区最后一个摘帽的分子，为啥？因为我有一顶“现行反革命”的帽子，直到江北区法院给我平反后我才摘掉右派的帽子。

平反后，我又成了共产党的“离休干部”。我回唐家沱，那些人看到我说：“蔡老师，你现在好了呀，工资有好几百元吧？”我说：“近 2000 元。”“唉呀，这么高的工资！”我说：“是呀，大难不死。”

我虽然活出来了，但已留下了一身的病：屁股是打烂了的，膝盖是跪伤了的，手指是吊残了的，牙齿是打断了的，最痛苦的是两个膝关节严重伤残，走路一瘸一拐。有人说，你是不是运动少了，生命在于运动。我听了哭笑不得：去把邓朴方叫来运动？去把张海迪叫来运动？我 20 年挑、抬，每天重体力劳动 10 多个小时，负重都在 70 公斤以上，就是钢关节也磨坏了！

我算是活出来了，可惜老伴先我而去。那 22 年，他过的什么日子呀！在家又当爹又当妈，独自拖拉四个娃娃；在外面又累又受气，别人叫他干什么他就得干什么，不敢拒绝。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性格很好，相貌、才华都很出众，可惜受我牵连，没过几年好日子。1995 年，他得了肠穿孔，被江北第一人民医院那个庸医——一个市级领导的亲属——误诊，第二天，7 月 2 号，他去世了。

我们全家哭得死去活来，儿子说：“妈妈，你死了我们最多伤心一年多，爸爸死了我们终身悲痛。”

我理解子女们的心情，这个家要是没有他，没有他的日夜操劳忍辱负重，早就破裂了！天公啊，你太不公平了，你怎么要把他收走，不把我收走？你让他留下来多享点福嘛！

回想起那 22 年，我总结说：共产党虽然没一枪打死我们，但那漫长“改造”加给我们的痛苦不亚于死亡！22 年，我们人格上受侮辱，肉体上受摧残，经济上受损失，亲属们受株连。多少家破人亡！多少妻离子散！多少血泪浸湿了衣衫！

采访时间：2006年6月9日，2006年6月24日 地点：重庆市江北区

## 采访后记

在我早已编排完《长寿湖》并写完后记两年半后，又采访了右派蔡素心。

2006年6月初，长寿湖右派王义珍告诉我，她遇到一个曾在峨边劳改的女右派，她的经历很悲惨，问我愿不愿见一下。

我就像一个已无法自拔的“吸毒者”，无论如何都抵御不了“毒品”的诱惑，何况“峨边”在我心中已是一个苦难和罪恶的同义词。

我在死于峨边的右派徐季正的女儿徐瑗家采访了蔡素心。

一身病痛的老人声音高亢，性子刚烈，看上去就是那种一生大悲大苦，早已置生死于度外的劫后余生之人。她在客厅讲述时，引得卧室的徐瑗母亲（原国民政府军政参谋部一厅厅长王纶将军之女，也是何应钦的干女儿）失声痛哭——她想起了她冤死在峨边的夫君。

蔡素心见状放下自己的悲苦，走到徐母面前放声歌唱——她用歌声来安慰另一个不幸的女人！

她唱了一曲又一曲，并说：“我们现在要以欢乐的心情对待生活……”

然而，蔡素心老人“欢乐”的歌声如同她的眼泪，同样让人一阵阵心酸……



蔡素心夫妇（劫难之前）



蔡素心夫妇（劫难之后）

## 十三、一个右派的逃亡之路

### 悲剧还在进行，冤案仍未平反

——长寿湖右派高明辉的经历

他竟然活了下来，是个奇迹。  
但是，他能活着看到那一天吗？



# 悲剧还在进行，冤案仍未平反

高明辉

1957年重庆市第43中学党支部书记、  
副校长，1931年生



我是1948年在四川省武胜县景仁中学读书时投身革命的。引导人是教我们英语的陈明亮老师，他是地下党的一个领导人。我们罢课、示威、游行、攻打新兵营、释放壮丁……

解放后我入了党，进入重庆市教育局，22岁担任了副科长，23岁（1955年9月）调任市43中学任党支部书记兼副校长。

1957年7月，因为我报不出我校右派分子名单，只报了两位“右嫌”，受到领导的批评。分管文教卫生的副市长邓垦（邓小平的胞弟）在干部大会上三次点我的名，要我千方百计引火烧身，挑逗引诱右派出洞，从而反击之。教育局长张仲明多次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命令我带头鸣放，用点火、放火、引火的办法，把右派诱出洞。他说，运动马上就要转入反击右派了，不能因为个别学校拿不出右派名单而影响全局。他还说，我是党培养多年的领导干部，党是信得过我的，知道该怎么办，等等。

在重庆有几位领导人我特别敬重，一位就是邓垦，我入党、提干是他批的，我和教育局的女干部李代淑的恋爱、结婚都是他夫人丁华牵线促成的。张仲明局长则一直是我的直接领导，我入党的第一介绍人。我想，难道我对他们还有怀疑吗？难道他们还会害我吗？另外，我想到这也是党中央的大政方针，想到李富春副总理在人民大礼堂作的报告，想到市委书记任白戈代表市委下达的反右指标。我记得任书记说，左派占20%，中间派占70%，右派占10%。重庆是国民党的老巢，国民党的残渣余孽都集中在这里。重庆的知识分子成堆成窝，定10%的指标只能超额完成，哪个单位完不成任务，哪个单位领导就有右派之嫌……

任白戈也是我敬重的一位领导。我思前想后，终于，在我主持的43中最后一次鸣放会上，在即将转入“反击右派”的最后一刻，决定照任白戈、邓垦、张仲明的指示带头点火、放火、引火，引诱右派出洞。我提了一些上下级关系、中苏关系的问题供教职员讨论，这个办法还真灵，会场活跃起来，发表意见的人一个接一个地站出来……

我的命运就在这次会上铸定了。定我的罪行是：高明辉在鸣放会上公开叛党，发动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成了右派反苏反共的急先锋。

除我之外，43中还打了6个右派，都是在那天会上被我“引蛇出洞”的。他们很恨我，认定是我欺骗了他们，害了他们。

我在被开除党籍、成了10%指标中的一个之后，上面就压妻子同我离婚，问她是要党籍还是要丈夫。她选择了前者。我知道她也无奈，她出身不好，心里不安，怕影响孩子。我当右派时已有两个女儿，大的两岁多，小的还不到一岁。想来她也是为了孩子的前途吧。离开重庆前，我同李代淑离了婚，她给了我一套衣服和被盖，从此我妻离子散，至今没有见过面。

（注：高明辉曾托我打听他两个女儿的下落，我四处寻访，还找到有关部门，但未能找到。）

1958年9月，我被下放到南桐矿区两河公社监督劳动，1959年转到长寿湖。我到长寿湖不久，就目睹了银行一位科长饿死在水文站。是我亲手把他埋在水文站野猫岩山沟边的。正因为目睹了右派的惨死，所以，派我在同心岛搞伙食后，我尽可能地让右派难友们多吃一点。后来盘点，差了粮，孙重主任把我和孙敬轩、游黎连续斗了几个月，每天只给我们二两粮吃。要不是陈锡元书记回来得早，我们几个人肯定成了饿死鬼。

1963年9月，重庆市教育局说我不认罪，在担任伙食团工作时贪污盗窃粮食几千斤，进行了新的犯罪，勒令我退职，放回原籍监督劳动。

我回到武胜县南溪公社四大队五小队。在这儿我又劳动了四年。由于右派是专政对象，除每年要扣几百个“义务”工分外，每个劳动日要比同等劳动力少评1-2个工分。此外，还强迫我挂一块“右派分子”的黑牌子，同“地富反坏”一起参加名目繁多的义务劳动。那几年过得艰辛，不过总还有口饭吃，有个地方住。

可是，这点“好景”也不长，文革一来，我更大的灾难开始了。首先是抄家，三天两头抄，将亲戚借给我的木床、箱子、蚊帐等物品和我的棉被、茶壶、凳子、信件、照片，乃至一双筷子都抄走，一些坛坛罐罐则砸得稀烂，连我住的那间草屋也没收了。我保留了三张抄家的“收据”，一张是“向阳公社（即南溪公社）四大队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开的，抄走的有：木料二根、铜烟杆二个、草房一间。时间是1967年1月2日。另一张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军前哨战斗队”开的，抄走的有：信件63件，花钵12个，茶壶1个，照片48张，筷子1双，私章一个，棉絮2床等，时间是1967年1月12日。还有一张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一战斗队”开的，抄走的有：铜2.6斤，漆钵一个，板凳一根等，时间是1967年2月5日。这三张收据的原件我在1981年3月上京告状时，交给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接待我的老同志。

1967年1月12日，南溪公社教师造反派由校长陈德开带队，抄出了我收藏的一个信封，上面有“中共中央送贺龙同志”几个字。我因此被抓起来。公社革委会主任周XX站在公社大门的平台上，大声狂呼：“贺龙大土匪……给我把高明辉抓出去专政！”早已准备好的打手一涌而上，剥掉我身上的棉衣和鞋子，劈头盖脸一阵乱打。公社还特意安排了一个身体长得很壮的疯子充当打手，他下手最狠，用棍子辟里啪啦死命抽打，然后又用脚踢，那顿打让我留下了终身的后遗症。

（高明辉让我看他后脑上的伤痕）

不仅打，公社杨XX主任还当众宣布：“从今天起断高明辉的口粮，公社已经通知生产队了。”



这个“宣布”比打更要命！没有了口粮，怎么活？我只得厚着脸皮上亲友和家族中的叔伯弟兄处讨点杂粮保命，还得躲躲藏藏，一旦被造反派发现，他们也要受株连。

吃饭问题还没有解决，一连串的批斗和挨打又接踵而来。一次，我被抓去批斗。他们在一个旧戏台上搭了一个高高的架子，架子上铺上木板，木板上安一张桌子，桌子上放一张高板凳，看上去就像戏台上的高空杂耍。几名打手提着我双臂，把我拖上桌子，按跪在高板凳上。我高高的跪在半空中，双臂被打手扭在后面，那模样像是凌空欲飞的空中飞人。我看见下面黑压压的人群，扭头对打手说：“好好抓紧我的手臂，如果我栽下去，摔死不要紧，这么多人的批斗大会就泡汤了。”

斗争会开始，中心区委书记宣布：“高明辉是重庆大右派，现在押到我们这里，我们要对他实行坚决的专政！他过去是中学校长，党支部书记，但他现在是共产党的敌人，是活老虎，比地富反坏这些死老虎更坏。今天一定要把他斗垮斗臭斗倒，要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我跪在高空，忍不住突然放声大叫：“享用人民俸禄的书记、区长、主任们，你们不是掌握着我的很多罪证吗，那就一条一条向群众公布吧，我的头条罪恶是什么？……”接着我拼命大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我无罪！还我党籍，还我饭碗，我要吃饭，我要活……”

他们没料到我会当众喊冤，一时乱了手脚，又是那个老办法——打！打手们爬上高台，一阵拳打脚踢，鲜血从我口鼻里涌出来，溅落到台下……

这个时候，台下群众看不下去了，喊起来：“不准打人！”“要文斗不要武斗。”主持会议的人这才叫打手们住手。

那些人不仅是斗我、打我，还一心想把我除掉。武胜县有一个右派叫徐普全，以前是武胜县县长，造反派把他押到县南门河坝嘉陵江边枪杀了。杀了徐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我。1967年12月28号深夜，他们把我绑起来押到南溪公社五大队长塘河边，逼我往深水走。我踩着冰冷的河水，心想生命走到头了，那一刻我反而无所畏惧了，死就死。我扯开喉咙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我的喊声惊动了村子里的农民，他们闻声赶来，我这才死里逃生。

但是，他们并不罢休，仍然策划处死我。白天他们不出动，夜里背着枪四处寻找。有几个同情我的红卫兵，在一天夜里悄悄告诉我，叫我一定要在野外过夜，而且每天都要换地方，否则没得活路。唉，那些日子，我像丧家之犬，像逃犯，在荒郊野外东躲西藏，麦田里、草堆中、大树上……饱一顿饿一顿，有一顿没一顿……后来，我跑到合川城我大姐家，结果又被发现，我大姐家遭围攻，全家受牵连，侄子苏仁禄还因此长期不被安排工作，十分埋怨我。

我只好从大姐家跑出来，往重庆逃。路上正遇到一支部队徒步拉练，我于是跟着他们走，他们停我也停，心想，这样安全些，至少喊救命有人听得见。就这样，我步行100多公里走到重庆。我二姐在重庆唐家沱造船厂，我去投奔她。二姐最疼我，见到我很高兴。不料，她们单位的阶级斗争也激烈得很，我这个外来的“逃犯”很引人注目，住了没多久，有人又找上门来。二姐不敢再收留我，万般无奈中抱住我放声大哭。可是她最终还是受我株连，被下放到江津一个贫困山里。她又气又病，死在那儿。

我至今感到愧对二姐，但愿我的冤案彻底平反后，我能手支拐杖，步行到江津深山，跪下来叩首祭拜我的好姐姐。

从二姐家逃出来后，我发现江北有个牛奶场，场里有大堆大堆的谷草堆，真是一个理想的“家”。于是，我天天钻在谷草堆里过夜。那段时间，重庆武斗打得热火朝天，望江厂的“反到底”派水陆两岸攻打市区的“八一五”派，枪声炮声日以继夜。一天，一颗炮弹飞来，把我的“家”——牛奶场的谷草堆——打燃了，大火冲天而起，我落荒而逃。

我逃到长江铜锣峡山上叫铁山坪的地方，指望在那儿躲躲。不料在那儿我看到不少死人——打死的、整死的，尸体倒卧在树丛中。我害怕，又从铁山坪外逃。

到1969年深秋的时候，我已经走投无路了。成天东躲西藏（有几次我饿了几天全靠喝长江水挺过来），天热点睡在河边的沙滩上，冷了就在车站码头过夜……国家也乱了套，坏人当道，好人挨整，武斗打得凶，打砸抢烧，无法无天，到处可以看见打伤、打残、打死的人……我目睹国家的灾难，又想到到自己走投无路的遭遇，绝望之极！

好几次我徘徊在长江边，想跳下去一了百了。

10月的一天，我偏偏倒倒来到重庆朝天门码头公安派出所，说自己是杀人犯，希望被关进监牢——这是我在万般无奈下想出的一条求生之路。嘿，他们不收！可能是看我不像，怕我进去混饭吃。我同民警吵了起来，他们这才把我送到收容站。在那儿我总算吃了一顿饱饭。第二天，我被放出来，仍然走投无路。我索性去市委求救。咦，在那儿见到分管文教工作的董次尧同志，他以前是市教育局中等教育科科长，我的老同事，好朋友。他好心地劝了我一番，说：“你这种情况上面不下文，我们也没办法，我只能内心同情你……”他叫我别再流浪，免得把身体拖垮了，还建议我到乡下去躲躲，说乡下安全得多。

我从他那儿出来，哭笑不得：我原本就是从乡下逃亡出来的呀。

我站在街头，想来想去，觉得还是只有冒充杀人犯，进监狱求食宿这一条路。于是，第二天一早，我从朝天门码头候船室起身，手提一块既当床单又当被子的塑料布和一张破毛巾，直奔市公安局。我说，我肃反时发动一些人杀害了李时友和刘伯景（其实这两人是在三、五反时自杀的），我前来投案自首，请求查处。嘿，真是巧，接待我的公安是我当年曾经短暂共事过的一个老同志（记不得名字了），虽然我又脏又瘦又憔悴，他还是认出了我。他盯着我，第一句话就是：“别激动，一眼就看出你不是杀人犯，有什么委屈说说！”我简单地讲了自己的遭遇。他拿出好像是(68)161号中央文件边念边解释。最后，他给我指了一条生路——到贵州去。他说，贵州比较偏僻，山多人稀少，容易生存下来，可以坐火车去，因为现在坐车不要票。他送我出大门岗亭后，嘱咐我：“用自己的双手劳动活下来。只要活下来就是胜利。”他最后这句话给我很深的印象，也给我极大的鼓舞。后来我好几次被逼到绝境时，耳边就响起他这句话。

当天晚上，我第一次登上了去贵州的火车。车上挤满了人，火车顶上都用绳子栓住趴着不少人。一路上，车门大开，任人上下，既不售票，也不查票。戴红袖套的红卫兵气势汹汹，走到哪吃到哪，谁敢说声“不”就要挨打。我只能挨饿，侄女苏仁秀给我的

30 元钱和 30 斤粮票我维持了一年多，现在只剩最后几文，不到生死关头不敢用。火车半夜到达遵义，我又累又饿，在候车室倒地就睡。一觉醒来，天已麻麻亮，我走出车站，走过一条穿城街，到了一个丁字路口的小河边。举目四望，四周皆是雾气茫茫的高山峻岭。往哪儿走呢？

然而这时我已走不动了，还是那个老问题，饿！饿得头昏眼花，全身发软。我觉得再不动用身上那最后几文钱怕是要倒下去了。

丁字路口两边都有小面摊，我打听到有家可以不收粮票但多收五分钱的小面摊——即二角五分钱一碗。我慌忙赶去。嘿！这面摊酱油酸醋可以随使用，连油水煎的辣子都可以任食客享用。我高兴得发狂，赶紧要了一碗小面，使劲加酱油，酱油加多了加醋，醋加多了又加酱油。还大大放了两勺子辣子。吃完又要了两碗汤，汤里又加油辣子。咳，那一顿美餐，辣得我汗水长流，五脏六腑都舒畅透了！这是我多年来从未遇到过的好事，也是我逃亡到贵州土地上，贵州人民给我的第一个见面礼。我心中充满了感激，它也让我对“新的生活”和未来充满了期望。

后来，我再去遵义时，专门去看望那家面馆，可是它不见了。据说，因生意不好，老板回乡当农民去了。这事我终身难忘，后来经常给家人和子孙提起，每次讲述我都充满敬意和感激。

丁字口左边有条窄窄的土路，曲曲弯弯伸向云遮雾绕的山乡。我打听到，前面是松林山区，一个荒凉偏僻山高入稀的地方，我觉得正适合我，于是抬腿往山上走去。

路的两边地里长着绿油油的秋玉米，有的玉米包已经成熟，我心想，不错，说不定能吃上嫩包米。

走到下午一两点钟，才碰上路边一户人家，本想开口要饭，但看到路上还有其他行人，脸上有点挂不住，又忍回去了。我干脆拐上一条小路，往更偏僻的山上爬，我想，既然有路，就会有人家。爬到半山腰，汗一滴，尿一洒，渐渐无力了。我举目四望，看见在两山环抱的一个松林深处有袅袅炊烟升起，我又鼓起劲往上爬。

这个村子很小，只有几户人家。路边第一家的一位大嫂正在用水淋玉米饭。我一看见饭，肠胃立马一阵痉挛，便把心一横，拉下脸，正式讨口要饭。

“大哥大姐（我在车上打听过，不能随便称大嫂），要点米汤喝好吗？”

她回答：“听口音你是四川人，你还不懂得这里的习惯，我们这里米少，主要吃包谷，滤下的米汤是要拌猪草喂猪的。”

我后来得知，贵州农村都是用米汤拌野草喂猪，农民自己根本舍不得喝。我当时觉得很屈辱，一言不发，转身往里面走。

一位老人坐在石墩上抽土烟。我走上前恭恭敬敬地问候：“老人家您好”！老人打量了我几眼，让我坐下，问长问短。我一实言相告。老人听后，进门用小盆端了大半盆嫩包谷。我大喜过望，一口气吃了八个，还不得饱。老人见我那个吃相，叹口气，让我把剩下的统统带上。他还告诉我，山里人平常一天只吃两顿包谷饭，只有农忙时节吃三顿，要讨到饭必须算好时间。

我向他谢了又谢，然后一股劲爬上山顶。山上居然还有一大片平地，农户也不少，但是山民很穷，富裕一点的吃包谷和大米各掺一半的饭，差的只能吃沙沙饭（即包谷面

拌上很少一点米用木甑蒸熟吃)。此时我腰无分文，上无片瓦下无寸土，除了要饭没别的活法，我只得把脸拉下来，天天东家讨把米，西家要点包谷，再去第三家讨个火煮煮吃……

后来，我同山民们混熟了点，就对他们讲述了自己的经历，渐渐得到了他们的同情和帮助。

没过多久，遇上一位患重感冒的苗族老大娘，她躺在床上，吃不下饭。我说，我懂一点医药知识，愿意去为她买药。她家同意了，于是我用了大半天时间跑到遵义买了一瓶阿司匹林、胃舒平和安乃静。晚上九点我赶回她家，用很烫的开水加量给她服用了这些药。不到一个小时她就大汗淋漓，开始感到想吃饭。由于病人身体原本结实，第二天她就有说有笑的下地干活了。她逢人便夸我，留我这个流浪汉住了十多天，并且天天好茶好饭待我。大娘姓杨，是山里比较富裕的人家。她家的习惯是一定要送“断根药”才算治好了病。于是，我带着她给我的二十元钱又去城里买了些药，给她配了三天的“断根药”。临别时，她拿了五十元钱一定要我收下，五十元在当时当地是很大的一笔钱，我很不安，取出十元退还给她。

这件事让身处绝境的我看到一线生机！贵州山区极其缺医少药，许多公社连个卫生所都没有，何不去买点药品，求个生存？

说干就干，我到城里买了一袋西药和三本书——《内科诊疗手册》、《常用药物手册》《实用针灸选穴手册》。从此，凡有闲暇我就埋头啃书，一边学一边用，我本着谨慎试行的原则，保证在不出事故的前提下治点小病。后来杨家又介绍我到遵义三合区他亲戚家去治病，从三合又介绍到尚稽的青杠林山上。那儿非常贫穷，许多农民（包括不少妇女）都没有衣服穿，他们只得穿秧衣、盖秧被（把没用完的秧苗晒干后做成衣被，用来御寒），一些家庭全家只有一条裤子，供外出的人穿。点灯的煤油也买不起，只好用松树疙瘩来照明，病了更是无钱治。我看他们穷成那样，实在不忍心收钱。这样，不到半月时间，我在三合、松林等地看病的收入共一百多元钱就全部消耗在青杠林上了。

我在贵州山乡流浪多年，不时看到像青杠林这样的情景，有时进入山民家里，骤然撞见裸露的身子，慌忙退出来。比如在关岭县的坡贡山上就遇到过这种尴尬。印象最深的是1974年在朗岱山上（现属贵州六枝特区），我同颜南生去给人看病，突然看见一对母女——我估计是母女——正在地里种豆子。她们身上只挂着很烂的几片布条，奶子和屁股都露在外面。那个姑娘大约只有十八、九岁，不是穷到极点怎么会这样。我一下子受到强烈刺激，冲口就呼出一串口号。啥口号？“打倒贪官污吏！”“妇女没有衣服穿！”转而又喊那个时代最流行的口号“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离开青杠林后，我又开始流浪。我渡过乌江，翻过一道道崇山峻岭，到达了开阳与瓮安县交界的深沟峡谷地区，据说再往西南就是广西的十万大山地带。

我到此地后，除了那几本医药书，身无分文，脚上的解放鞋也破得无法再穿，只得改穿当地的竹麻鞋和草鞋。

我走投无路，于是重操旧业——讨饭。

多年来，每当我回想起在要饭过程中那些同情我帮助我的好心人，心中总是充满了感激。这儿属于“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山民们朴实，看我像有点文化的人，便比较尊敬我，真心实意的帮助我。从没有人议论我是什么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在这大山里我才品味到人与人之间的真情与和谐。远离了“阶级斗争”的刀光剑影你死我活，我终于有了多年没有感到过的那种安全感——作为一个普通人平平安安过日子的安全感。虽说深山老林里另有一种威胁，就是常遇到虎豹、野猪、狼狗，但是，“苛政猛于虎”，我宁愿呆在深山里。

我在这儿总结了前段时间的经验教训，打算改变生存方式，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再走讨饭的路。我作出了两个决定：一，凡给富裕人家治病拿药，要收取费用，不能亏本；没钱的贫困人家，一般不收钱，也不吃饭。二，在任何情况下都讲真话讲实话，因为我高明辉没有做过任何亏心事。

不幸，我在深山老林里也没能“安稳”多久。

1970年，传来一个消息，说国民党向贵州山区散发了反动传单，全省要展开声势浩大的搜山运动。很快，各地都成立了搜山队，在大大小小的山上搜寻，在各个路口盘查。老百姓怕我这个外地人被搜山队抓去挨打，叫我逃走。一位姓陈的山民，带我经丛林爬陡坡到了一个小场坝（记不清名字了），边走边告诉我如何发现豺狼虎豹行踪和躲避的知识。下午，我独自翻山越岭朝马场方向走去。一路上荒无人烟，唯一遇见的人是一个12岁左右的小男孩，他背着几十个烧洋芋。我向他问路，他告诉我爬上前面那座山后要赶快下山过河，不然豹子会吃人。说完他还给了我几个半生不熟的烧洋芋。我谢过他，先把熟一点的洋芋吃了，然后急急忙忙往山上爬。上了山我不敢停下来喘口气，慌慌张张就往山下赶。可是，刚到河边天就完全黑了。小河不是很宽，却深不可测，寂静的山间只听见哗哗的水浪声。河上倒是架了一根独木，但黑黢黢的我根本不敢过。我呆呆地立在那儿，心慌意乱，进退两难。后面山上传来野兽的吼叫声。我心一横，决定抱着独木爬过河。我趴下来，正准备爬，突然发现独木桥下有一个洞，大约可容纳两人。我看见洞，心里开始盘算：就算安全过了河也没法走，更没地方住，不如今夜就钻洞，说不定还安全得多。对！我一下子高兴起来，找了根木棍，然后钻进洞里，面朝外蹲着。我紧握木棍，以防不测。水声、风声、野兽声，声声入耳，伴我渡过了一个惊惶之夜。

第二天天一亮我就钻出洞，渡过河又上路。又整整走了一天，在傍晚时分赶到了马场，这时下起了冷嗖嗖的秋雨，土路泥泞，我不能再走了。我四下张望，发现路下边有间破草房。我走去一看，草屋里挤着一家四口，他们告诉我，他们是从四川逃难来的。我看他们穷得十分凄惨。四壁空空，一张破床上盖的是破破烂烂的秧被，草房千疮百孔，到处漏雨，家里的雨点比外面还大。吃的也没有，我只得把药包里的葡萄糖液拿来喝了，然后支开伞靠着墙脚过了一夜。

第二天我走时送了他们一点感冒药，那是我唯一还拿得出来的东西。

步行了两天多，又回到了乌江边。这里是开阳、息烽、遵义三县交界的乌江河大塘口，也是红军长征时的一个重点渡口。我在渡口遇到一个叫袁世海的摆渡船的老人，他问我是干什么的，我一一如实相告。老人听说我懂医，便叫我去河坎上坐坐，顺便给他老伴

儿看看眼睛。我看完病后他留我吃了晚饭，还劝我不要难过，说好人多磨难。他还告诉我，他女婿刘应品是大队支书，我可以留在这儿，给大队的社员看病，什么都不要怕。我大喜过望，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当晚，袁老人和我聊了半夜，我谈我的身世，他讲他几十年划船的风风雨雨，谈得很投机。

第二天上午，袁老叫他孙儿带我上山，去给打铁沟生产队的一位老病人看病。我们先往上爬，一直爬到山顶，然后下到深沟边。这儿属开阳县马场区谷扬公社。病人年近七十，瘫痪多年，家里都医穷了，长期服草药又不能止痛。我给她吃了一剂镇痛药，果然起了作用。我告诉他们，像这种风湿和类风湿性瘫痪，我无法治好，就是医院也难以治愈，只能减轻病人的痛苦，但还得注意配药和调理，因为镇痛药是伤肠胃的。她子女们见母亲的痛苦减轻了，已经感到满足，说我与江湖医生大不一样，江湖医生看病从来都说包治好，但要多少多少钱买药等，把他们骗穷了骗怕了。我见他家很穷就没收药钱。他们很是感激，老人一定要我住在她家，专门给我铺了张床，并将她的小孙子拜送给我，认我作“干爹”，取名高勇。后来，好些人家怕孩子生病都将我认作干爹，图的是有个医生照看。于是，我成了农民们的好朋友，衣食住行总算暂时无忧了。

在这里我曾创造了一个奇迹——救活了一个“死人”！

住在山垭口的陈顶德有个约两岁的孙子，因发高烧未及时医治，半夜从息烽县的高坝子回到打铁沟时，周身已经冰凉。他们用烂棕衣裹着病儿丢在灶门前，动手做木棺。我发现病儿背心尚有点温热，赶紧用被子把他包好，同时考虑怎样救治。我想了一会，给他注射了一支半尼可刹米（克拉明），然后左右手握住孩子的双脚，只要脚心一发热就有救。40分钟后脚开始发热了，我将病儿交给母亲保暖，同时派人去找燕窝，这是抢救高烧、休克病人的绝招。燕窝取来，去掉杂物，尽量煮沸，用纱布过滤澄清。不多会儿孩子张嘴要水喝，我将亲手做的“还魂汤”喂他，终于把他救过来。

这件事全村人皆知，大大提高了我的知名度。

我也同袁世海的女婿、江山大队党支部书记刘应品交上了朋友，这样，我有了报纸看。1971年下半年，我发现林彪、叶群、吴法宪等人的名字不见了，几乎每版都是“要团结不要分裂”的警句。我告诉刘应品：“林彪等人肯定出大问题了。”他不信。没过多久就传来林彪投敌叛国的消息。他很惊奇，说：“你真神，一眼就看出了中央领导的政治动向！”从此他更尊重我，信任我，许多重大问题都找我商量，看病也由他介绍，甚至亲自送我上门。

我住在大塘口一年多时间里，往来于开阳县的马场、冯三、谷阳、两路、江山、打铁沟，息烽县的核桃箐、桃子坪、高坎子和遵义的尚稽、青杠坪等地。大塘口是最安全的地方。搜山队在大塘口设卡，吃饭就在刘书记家。刘书记把我找来同搜山队的人一道吃饭喝酒，当众宣布我是他的客人。有了他的保护，我在他管辖之地往来自由。但是，一旦出了他的辖区就危险了。搜山队查到不明身分的外地人，统统抓起来，先关后审。所以，我到“辖区”外看病，总是东躲西藏。比如，有一次我到息峰的高坎子，住在队长张明坤的堂兄张明安家，白天我躲在他家中，晚上就藏到乌江河坎悬崖上的刺林里。每天半夜时分，张明安都要给我送一碗鸡蛋炒饭。由于老百姓千方百计保护我，我一直没被抓走，算是躲过了那场

声势浩大的搜山运动。

然而，正如俗话说说的：“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阶级斗争”这张铺天盖地的大网疏而不漏。

有一个姓刘的退伍军人被遵义医学院诊断为癌症，没救了，已叫家人准备后事。刘家不甘心，求我治一治。我观察了一天一夜，见腹部压迫纹绉久久不起来，硬是硬，但硬不如石，我怀疑是腹部深部脓肿，不是胃癌。他家请来信用社的人担保，要我死马当成活马医，并立下字据，死了不負責任，只求手术后能吃饭，并说好事后由信用社付医药费和手术费200元。我用大注射器抽出血液，发现并非鲜红色，而是乌中带白花脓液，便断定他是腹部脓肿。我用小刀、小剪在腹部切开一小口，脓血一涌而出，足有1500多克。我还没缝合完，病人突然坐起来叫道：“饿死我了，我要吃一个大公鸡，快点”。我于是叫刘妻煮稀饭、煨鸡汤给他喝。信用社的人看我做完了手术，按协议付了200元钱。

没料到为此事当晚我就被抓进了马场区派出所，罪名是“非法行医”。

关了两小时后，刘家的亲友，还有两路学校的教师，男男女女一大群把病人抬进了马场区政府。他们叫道：“把我们的救命恩人放出来！”他们威胁说，如果不放人，他们就把病人摆在区政府，他是退伍军人，死了要区上负责。

区上怕出人命，只得把我放了。

这次算我走运，但下一次就没这么便宜了。

那次，我到息峰乌江区养龙公社场坡生产队给马树清家看病，不幸在一个赶场天被当地派出所一个姓石的公安抓起来了。他说我是重庆监狱逃跑出来的大反革命，指使手下的几个打手将我五花大绑，押到区法庭。石公安左手提枪，右手握一根铜头皮带，劈头盖脑就是一阵抽打。他那几个打手，冲着我拳打脚踢。然后叫我当众交待参加反革命组织的经历。公社一个姓王的主任吼道：“你不交待，今天就活活打死你！”我答应交待，先求他们给我把绑绳松了，并说如果我跑出五步他们就开枪。

这时，看热闹的群众围了个水泄不通，其中就有马树清等关心我的农民朋友。

我挣扎着站直身子，抖擞精神开始交待。我说：“解放前，一个教英语的女士要我参加他们的一个什么组织……1951年，我在重庆南温泉原国民党军政大学又参加了一个青年群众组织……”

“头子是谁？住在哪里？我们要一网打尽！”

我说：“恐怕你们抓不着，也不敢抓，我说完了再告诉你们姓名地址吧。”

这激起了他们的兴趣，围观者也伸长了脖子。

“1951年我在重庆市较场口参加了一个更加庞大的横跨欧亚的国际组织，这个组织有两大头目，一个在国外，一个在国内。在国内的组织已发展了上千万人，遍布全国各省市县区县社队……这个组织有政治纲领有组织路线……”

围观者听得入神，审讯者高兴得跳起来，一再追问：“头目是谁？我们马上派人去抓！……没有我们抓不着的反革命！姓高的，你要再不交待我们就要动刑了！”

我怕再挨打，不敢再绕圈子，于是说：“国外的头子叫斯大林，国内的便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

石公安和王主任同时跳起来，猛地一拍桌子，骂道：“好你个刁人！你放屁！”

我看他们又要打，赶紧说：“我没乱说，我这辈子加入的组织就是共青团和共产党，我是真正的共产党党员。你们要不信可以马上打长途电话到重庆市委办公厅和干部管理处请他们查查有没有高明辉这个名字。”

围观的群众嚷起来：“高医师您好好保重！”张明坤队长更是挤上前来大声嚷嚷：“高医师，您出来后首先来我家，一定要来哟！我们会保护您的！”

审讯者们泄了气，但不放我，把我押到养龙公社临时收容所关起来。

马树清父女、张明安夫妇、吴发开队长等一直把我送到公社收容所，然后每天三餐都由他们轮流给我送饭，而且每天都有肉、鸡蛋、面条。我吃饭时，一个我治过的患青光眼的病人手执木棍守在一旁，不准其他人捣乱。四、五天之后，公社组织对我的批斗大会，大会下午一点开始，主持人刚宣布开会，支着拐杖站在会场边的马光琼就扯起喉咙，尖声尖气地叫她丈夫：“吴（无）——发（法）——开，吃——饭——喽——”

听见她的叫声，会场上呼啦啦一下子走了几十个人，几乎走光了。批斗会只得收场。我永远记得他们——善良真诚的贵州老百姓！

然而，那些人则老羞成怒，坚决不放我，两天后把我押到息峰，从息峰转到贵阳，从贵阳转到重庆，从重庆又转到武胜。

我逃了一大圈，又回到出发点，心想，这下有我的罪受了。

嘿，人的命运真是说不清。武胜接收我的人早就听说过我的“大名”。他四下望了望，笑嘻嘻地说：“哟，有幸见到不屈不挠的高校长，是我的福份呀。”结果，当天他就把我放回家。

可是，我已经没有家了，我找到公社领导，他们仍然不给我口粮。我没法活，只得回到重庆我外侄处讨了几十元钱和二十斤粮票，又奔贵州而去。

1972年，各地开始搞革命大联合，打砸抢杀的暴力少下来。我又萌发了一线希望——回重庆找政府伸冤。在贵州几年了，到处流浪，没有家，饱一顿饿一顿，成天担惊受怕，不是个长久之计。没有路费，于是我去找到养龙区派出所当初抓我那帮人，要他们再把我抓起来，像上次那样食宿免费地把我一层层转送回重庆。可惜，这次他们不干了。

我决定沿铁路步行回重庆，也算发扬红军长征精神。可惜（又是“可惜”），我在半夜走到乌江大桥时，守桥的士兵坚决不准我过，从而阻断了我的“长征”。

这次回重庆上访，一无所获。在市教育局，挨了姓郭的一通训，回到武胜乡下，仍然不分口粮。生产队的人说，“不分口粮是公社决定的，谁敢违抗。”

我只得三上贵州！

这次回到贵州后，我开始考虑是不是在贵州农村安个家。这几年不少人问起过我有无妻室，也有人介绍我当个上门女婿。我一直没有答应，一心想申冤平反。但这次回重庆和武胜又碰壁，我感到有些绝望。

是不是在这大山里求一个安身之处，慢慢等待？自1958年同妻子离婚，我已经打了14年的单身汉了。这些年，蹲车站、住码头、钻草堆、滚石灰窑、睡刺巴林（即有刺丛的便于藏身的树林）……



在最困难的1972年春夏，我在养龙马树清家遇到一位有真才实学的医生颜南生，他也是受迫害从四川来到贵州，已在镇宁县的丁旗镇安家落户。我正走投无路，于是随他从养龙到了安顺，我们一起在安顺、镇宁、关岭、普定等地行医。

1972年秋，我在普定县田官公社二官大队给一个病人看病时，认识了他的独身女儿何正芳（小名昭妹）。昭妹很喜欢我，要我教她学医。我一到寨里，她就跟着我，帮我配药、换药。我感冒发烧，她就给我打针。有人开玩笑说：“高医师同昭妹正好配一对。”昭妹听后抿着嘴笑，十分高兴。

但是，昭妹在8岁那年，父母作主给她订了婚，许配给一家姓胡的。这是典型的包办婚姻，昭妹多次向我表示，她不同意这门婚事。1973年初春，我接到昭妹托人带给我的一封信，她叫我安排结婚时间，并要我在3月5号到黄桷车站去接她，然后去安顺照结婚像。至于在哪儿结婚也由我定。

我也想有个家了，我赶紧又回重庆。可是，无论是重庆还是武胜（市、区、43中、县、社、队等），都不给我开证明，没证明就办不了结婚证。我没有办法，3月5号要到了，只得两手空空赶回贵州。

我按约在黄桷车站接到了昭妹，第二天我们又乘车去安顺。在安顺照了像后天已晚了，于是当晚去我朋友孙善群家，在那儿我们住了两个晚上。

第三天一早，我们得到消息，昭妹私奔后，二官寨派出十多个人追赶捉拿我们，放出话，一旦抓住，不打死也要打个残废。胡家在当地是一个人多势众的大家族，大、小队都是胡家当权。女人居然跟一个外地人走了，他们觉得很没面子。我看事态严重，劝昭妹先回去，以免她父母不得安宁。昭妹不肯，死活要跟着我。她说只要把她带走，我到哪她到哪。可是，我把她带到哪儿去呢？

劝了好久——从早上一直劝到下午——我朋友也帮着劝，昭妹才勉强答应了。分手时我向她保证，一旦我找到了一个安身之处就接她出来。

她这一回去，就被看管起来，再也出不来了。很快，他们强迫她嫁给了那个她8岁时给她定下的男人。

我长叹一声，我高明辉落难，没有能力保护一个女人，也没有能力同包办婚姻抗争。

（我问起后来的情况，高明辉黯然神伤，沉重地说：“我想起来很后悔，何正芬是一个非常善良、勤劳、聪明的姑娘。我说我没有钱，她说她有些钱，我们共同用。我说我没住处，她说她想法去租房子……是我坚决把她劝回去的呀……从那一天分别到如今，30多年了，我们没再见过面。）

1973年8月，我住到在安顺么铺公社方牛庄村刘德富家里，给刘德富医痔疮。刘是个从朝鲜战场上下来的转业军人，在战场上流过血。但是他没有得到一点抚恤金，家里穷得一塌糊涂，两个小的女孩，小学都读不起。我见他家太穷，便没有收他的药钱，只是吃住在他家。我外出看病，无论是收的药费还是包谷、鸡蛋等，都统统拿回刘家共同享用。刘家见我待人真诚，又不嫌贫爱富，便有心招我上门，娶他的大女儿，18岁的刘大珍。

大珍文化不高，但朴实善良勤劳，她非常希望同我共同生活。1974年春，她多次表

明了这个意思。

刘德富夫妇把自己的房间让出来，让我和大珍住。

事到这个地步，我无法再拒绝。我流浪十几年，心底里一直渴望一个家。

但是，我坚持要先办结婚登记手续后再完婚。我又一次跑回重庆。

先找市教育局，我只求他们写一行字：“右派分子高明辉是离了婚的。”他们不理。我气得挖苦说：“你们现在官做大了，肥头大耳，心宽体胖，我这么一点小事你们也不给办！”

没办法，我只得又去武胜。我找到县统战部，统战部那个官员劈头盖脸给我一阵臭骂：“结婚？结你妈个脑壳昏！你给我回公社去接受批斗！”

我说：“中央文件和国家法律都没有规定右派分子只准离婚不准结婚。为什么不给我办？”

然而，不办就是不办，我干瞪眼，拿他们没法。

我又是两手空空回到贵州。

贵州山上的农民们并不再乎什么“登记手续”，好些青年男女办几桌酒，请请客就算结了婚。大队支书对我说：“办两桌酒席，请大、小队干部吃一顿你就算方牛庄的人了。”

1974年，我成了刘家的上门女婿。漂泊逃亡多年，终于有了个家。

一年后，1975年3月，我同大珍的女儿高春艳出生。一个月后，发生了一件事，导致了我的又一场灾祸和直到今天尚未昭白的冤屈。

那年春，我刚从重庆市上访回到大珍家，就有很多农民来找我，请我为他们向上面写检举信。原由是么铺区委书记张XX，公社书记李XX、大队书记何XX等在寨子里杨家吃了杀猪饭，收了礼之后，强行把队里一块肥沃的稻田划给杨家修私宅。农民们强烈反对，但他们拿书记们毫无办法，他们知道我有文化，请我为他们写信申诉。

贵州山上，田少山多，稻田十分珍贵，是农民的命根子。我眼见得农民们（包括好多背着娃的妇女）为开一块水田，日以继夜的劳累。

杨家开始动工挖基脚了，我不能再旁观，必须仗义执言。我马上在方牛庄大队新大楼正门上方贴出“保卫农民的命根子，保卫土地”的大字报，紧接着向安顺县公安局和贵州省委邮寄了检举信和控告书，我在信上署了我的真实姓名，时间是1975年4月13日。

我万没料到这两封信原原本本地转给了几位书记——也就是被检举人！

张XX书记和李XX书记亲自率兵坐镇方牛庄，召开大队及七个生产队的干部会。张手持我信件的原件，杀气腾腾地说：“这就是高明辉写的所谓的检举材料和控告书，今天这些材料全部落在我们手里了！这完全是对我们各级干部的造谣诬告……”会上没有人敢吭声，大家都怕手握大权的书记们，只有当过兵的民兵连长王明春说了句公道话：“如果高明辉没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他根本就不敢像这样大胆检举揭发。”

第二天晚上（1975年4月20日），区上的“专政人员”冲进家门，把我抓到了区上的法庭。先是一阵拳打脚踢，然后把我反手吊在区法庭的铁窗上，那个痛啊，钻心！我受不了，大叫：“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我无罪！我要伸冤！”我不停地叫，但没叫多久就痛昏过去了。

天快亮时，区公安员张德义给我松了绑，放我下来时，他教训我说：“谁叫你要乱说，乱动，乱写？！”这次吊打，导致我双臂长期疼痛，至今无法医治。

接着我被押到县看守所。在看守所的八个多月是我这一生中最悲惨的日子。各种折磨人的手段都用上了！张 XX 经常亲自到看守所来进行“指点”，我明白了，他是想把我弄死在里面！他知道我是个不服气、不认输的顽固分子，要是活出来还会找他的麻烦。有一次县公检法张、金二人提审我时，用枪抵住我脑袋要我招供奸污年轻妇女。我忍无可忍，大叫：“开枪呀，你们手握生杀大权，一枪打死我吧，好为张书记出气，消除他的心病。”

我清楚他们为什么这么气恼我，高明辉一个右派分子，而且是个外地人，胆敢跑到贵州来告官，来惹地头蛇，这还了得，非整死他。他们知道无法判我死罪，但是可以通过看守所的折磨让我“自然死亡”。这样既杀了人，手上又看不到血。

但是我到冬天了还没有死，他们又想了一个办法——不给我被盖。牢中的抢劫犯、杀人犯、乃至死囚都发了被盖，唯独不发给我。我申请了上百次，就是不发。贵州山上冷呐，我浑身发抖。这还没完。1975年12月，外面风雪交加，地上铺着厚厚的雪，他们强迫我走到外面，在风雪中吃冰硬的冷饭。我的肠胃马上就受损了，一阵一阵地剧痛，腹泻不止。看守所一不给药，二不准就医，我整整十一个日夜吃不进任何东西，躺在地上像死人一样，大小便和起卧全靠同室的难友扶助。就在这时，张 XX 又来了，他走进监房，逼着要把我绑赴么铺区游斗和批判。看守所的管理人员王昆指着我说——我枯瘦如柴像僵尸一样——对张说：“人已经不行了，还是不去吧。”张不肯，坚持叫人把我抬起来抛上了车，真的是像死狗一样抛上车。我每次遇到对我迫害都要呼口号，如“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我无罪”等等。但这一次，我叫不出来了。

我是躺在地上被批斗的。我蜷曲在地上，双手压着胃。就这付死人相，一个张指定的民兵还上来踢我几脚，押守我的解放军都看不下去了，一把将那个民兵掀了个趔趄，吼道“这里关你啥子事？！”

在看守所8个多月，我经常趴在地上写申诉，其中包括九份血书。牢房的地上冰冷潮湿，而且十分阴暗，长时间趴在地上，损伤了我的眼睛和左边的面部神经，从此我只要一激动，左边脸就一阵痉挛，左眼就睁不开。

（笔者注：长寿湖另一逃亡右派李文书是文革时被打伤右脸，导致了右脸和右眼神经性痉挛。）



高明辉讲叙时，好几次睁不开左眼

1975年12月31日，安顺县法刑字（75）第91号判决书判处我五年徒刑，刑期从1975年12月28日算起（在这前关押的八个多月不算在五年内）。判决书的具体罪状有三条：

（一）借整风猖狂向党进攻，定为右派后不思悔改，流窜行医四年多，骗人钱财300多元。

（二）妄图打击陷害他人，制造干群之间的矛盾，造谣污蔑区、社、队各级领导，

破坏革命团结。

(三) 以看病、谈恋爱、认同乡等手段奸污妇女何 XX 等。

宣判后不久，我就被押到贵州省安顺轿子山煤矿劳改支队服刑。

我这条命说来是到了劳改队才保下来的。管教人员看了我的材料和判决书后明白是怎么回事，没有把我当坏人看待，他们见我肠胃出血，给我提供了稀饭和面条等软食。另外，说我有文化，让我当了学习小组长，没让我下矿劳动。这两条“人道”救了我的命，也是我高明辉命不当绝，想来，当年如果判决再晚一个月下来，我肯定死在看守所了。

下面我想说说我妻子刘大珍的遭遇。

我在劳改队服刑两年多后，么铺区法庭的李进明来到轿子山，把我叫到管教办公室，向我宣布：“刘大珍已向法庭申请与高明辉离婚。”（以县法院的“公函”为证），李强迫我立即写个同意的纸条。我要求看刘大珍的字据，李说：“她的申请已登记归档，难道人民法院还会骗你不成？难道你还怀疑法院盖的公章？”

说到这个份上，我想也罢，拖下去对刘大珍的生活和前途不利，她还年轻，离了婚她日子可能还好过些。于是，我写了“同意”。

噢，没多久，刘大珍带着简单的衣物突然跑到劳改队来了！

原来这是一场骗局！

刘大珍当年写了一份申诉，我保留至今，看了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 申诉

7月16日，我才向县法院用挂号邮寄一份撤销刘保康（注：么铺区三查工作组干部）假借我的名义提出我同高明辉离婚的申诉书，没想到8月4日区法庭的李进明来我家给我说：“高明辉提出和你离婚，你还有什么意见？”我回答说：“我不同意离婚，死也要和高明辉死在一起！”当时父母大骂，后又强迫我签字，我不签，老的就打。结果硬是逼着我签了一个“同意”二字才放手。我没办法，8月7日又到劳改队问高明辉，并不是他提出同我离婚，现在我明白了，真是有人在搞鬼。所以我特向党和政府提出最后一次请求：

- 1、凡是过去刘保康伙同父母包办强迫和用棍棒逼我同意离婚的一切做法全部无效。
- 2、我同高明辉是双方自愿结婚的，他和我四处请求都没有办得登记手续，高明辉已受到处分，我决心同高明辉生死在一起，

申 诉 书

第 一 页

七月十六日我才向县法院用挂号邮寄一份撤销刘保康假借我的名义提出我同高明辉离婚的申诉书没想到八月四日区法庭李进明来我家给我说“高明辉提出和你离婚你还有什么意见”我回答说“我不同意离婚死也要和高明辉死在一起”当时父母大骂后又强迫我签字我不签老的就打结果硬是逼着我签个“同意”二字才放手我没办法八月七日到劳改队问高明辉并不是他提出同我离婚现在我明白了真是有人在搞鬼所以我特向党和政府提出最后一次请求

一凡是过去刘保康伙同父母包办强迫和用棍棒逼我同意离婚一切做法全部无效

二我同高明辉是双方自愿结婚的是合法的他和我在外清表都没有办得登记手续高明辉已受到处分我决心同高明辉生死在一起结为终生夫妻特请党和政府正式承认我们的婚姻头关系我敢死决不另外找家人

三请求政府帮助我从中调查一点房屋生产工具生活用品粮食等给我自立户口给我一条生路让我好好劳动生产

四下一刘保康同他父母还教唆他们害我的人再要强迫我乱打乱骂不让我活下去那时教唆党和政府给教伸冤！！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敬呈  
贵州省安顺县区人民法院  
么铺区人民法庭

附高明辉申诉书 安顺县么铺公社当年劳改队刘保康申诉  
一九七八年八月八日

结为终身夫妻，特请法院正式承认我们的婚姻关系。我至死绝不另外嫁人！

3、请求政府帮助我从家中调整一点房屋、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粮食等给我自立户口，给我一条生路，让我好好劳动生产。

4、万一刘保康同我父母还有支持他们害我的人再要强迫我，甚至乱骂乱打，不让我活下去，那时敬望党和政府给我申冤！！

敬呈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安顺县人民法院

安顺县么铺区人民法院

安顺县么铺公社方牛一队社员刘大珍（指印）

1978年8月8日

刘大珍对劳改队的管教人员哭诉，说一定要同我生死在一起（不愿离婚，不愿改嫁）。现在不仅法院和区社的各级人物逼她，连父母也逼她，逼她离婚，逼她改嫁。父母不仅不同意让她分家自求生路，还动手打她。她说，如果再逼她就以死相对。管教人员怕出人命，但按规定又不能留她住下来。因此，第二天，1978年12月29日上午，劳改队指派管教干部张瑞祥驾着三轮摩托到方牛庄。张瑞祥通报了大队和生产队，说如果逼出人命要承担法律责任。同一天，劳改队还向安顺地区中级法院发了一份由各级管教干部签名的公函，函中提出“现双方不是要求离婚，而是要继续维持原配偶关系，法院应予保护。”刘大珍的《申诉》用挂号邮寄给上述两个法院和一个法庭，但是没有得到一个字的回音。一个孤苦无助的山村弱女子向“人民法院”求救实是万不得已了。她到安顺找法院、找地委，但是，没有人给她救助，甚至有的人还变相把她往另一条路上逼。例如，县法庭张XX庭长骂她“不要脸”，不仅羞辱她，还威胁说：“过一天把就下判决书，废除你们的婚姻关系！”刘大珍当场就哭倒在地。这是刘大珍来劳改队亲口讲给我听的。

这样，我妻子的悲剧无法避免了。

1978年深秋的一天，大珍又到轿子山来了。她面色惨白，眼睛里露出绝望的光。她的两个妹妹怕她出事，陪同她前来。她妹妹一个十二岁，一个十岁，往返要步行100多里路呀。她把铺盖棉絮都背来了，又一次要求留在劳改队，愿意同我一起劳改，她表示，生，同高明辉生，死，同高明辉死。她就这么简单，就是这么单纯，要生死在一起死。

现在世界上还到哪儿去找这种人？

她要留下来坐牢肯定是不行的。她绝望了，倒在我怀里，一句话不说，只是哭。我不断劝她。到下午，她突然提出让我陪她过一夜，她说，只一夜，死也甘心了。我请示了管教干部，管教干部同意了，还专门找了一间房间。但是，我从大珍的眼光里看到一种不祥之光——她要走绝路！

我又找到管教干部，说还是不同她过夜，征兆不好，怕出事。

她们三姐妹都靠在我身上，大珍只是哭，她妹妹不断说：“哥哥你回去同姐姐过嘛，回去嘛……”

快黄昏时，她们三姐妹走了。这一走，大珍就永远走了——

几年后我出狱，赶到她家，大珍已经不在。他们说，她早走了，去哪儿了不知道。怎么走的也不说。我去她家多次，她父母不吭声。大珍的大妹妹也离家走了，后来她小妹妹告诉我，她姐姐被强迫嫁到绥阳县的大山里了，几个月后就死在那儿，没有埋，尸体是用木柴焚烧的。

她火葬在那个地方……她为了我，为了女儿，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的心不痛吗？我这一生中最痛的，莫过于她。在哪儿去找这种女人？

（高明辉失声痛哭）



高明辉讲叙时，一直比较平静，但讲到大珍之死和他女儿时，情绪突然失控，面部抽搐，双眼发红，他扭过脸，避开我的目光，说：“我从来都是流血不流泪。”



但是，泪水还是涌了出来。

（高明辉的讲述视频已经制作在纪录片《长寿湖》的第四集《断裂的爱情》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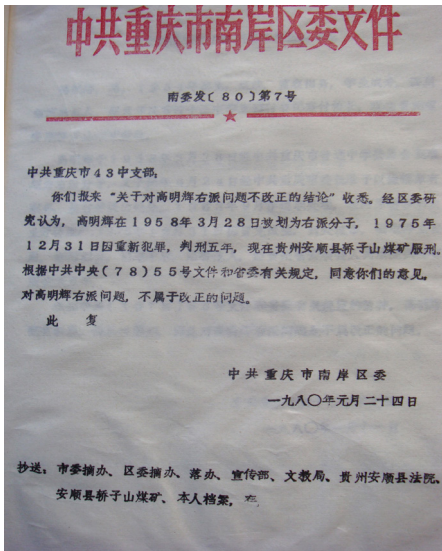
我女儿高春艳下落不明，是被抱走或者被卖掉了还是死了一概不知。1975年4月20日我被抓时女儿刚满月。我还没听见她喊一声“爸爸”就失去了她。近三十年过去了，女儿在哪里？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呀！我出狱后四处寻找，可一直没有找到，究竟这个娃娃在哪里？只要活着，我都想找到她。我一直不愿离开安顺这个伤心之地，就是一直怀抱着找到女儿的心愿。

（注：高明辉前后生的三个女儿都没能找到，所以晚年的他把他的一个侄儿从四川迁到贵州安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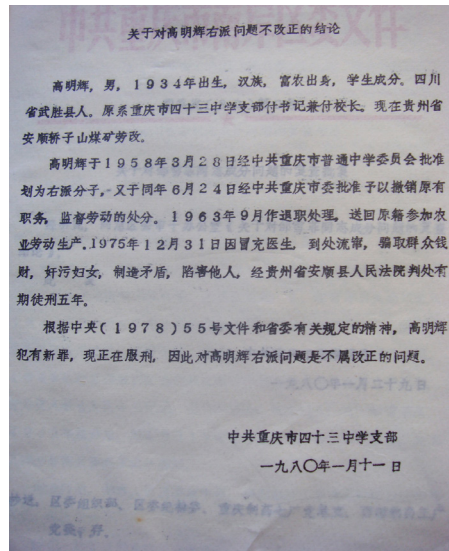
1980年元月，43中支部写了一份“结论”上报，上面说我“冒充医生，到处流窜，骗取群众钱财，奸污妇女，制造矛盾，陷害他人”，因此，我的右派问题不在改正之列。中共重庆市南岸区委发文同意。

1980年7月15日，重庆市南岸区委发文，说根据中共中央（78）55号和（80）42号文件精神，高明辉的右派问题属于错划，应予改正。我持改右文件逐级上访安顺市（已撤县并市）人民法院，安顺地区中级法院、贵州省委、省高院等单位，要求改正1975年对我的刑事判决。唉，我发现，当年陷害我整我的那些人，一个个都升了官，例如，张XX已升为市委领导，原审判庭庭长升为市政法委书记……。由他们来给我平反显然是不

可能的。果然，我跑了无数的路，写了一次又一次的“再申诉”，统统无人理睬。1981年3月，我回到重庆，上访市委、南岸区委、市教育局，但都不能解决问题。我又跑到成都上访四川省委。接待我的是一位老同志，他说：“像你这样跨省市的难题不好解决，你最好去北京向中央告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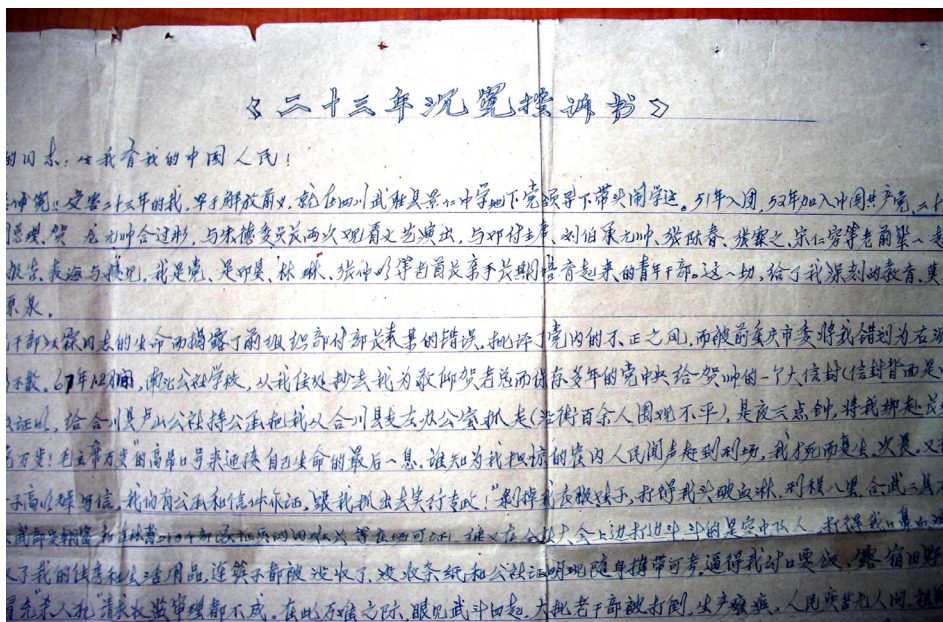
不予改正！



不予改正！

我走投无路，想来想去也只好如此。我买了一张大牛皮纸和一瓶墨水，在成都铁路子弟校找了间空教室，一口气写成了《二十三载沉冤控诉书》。我给控诉书配了一副对联：“支部书记讨口，中学校长要饭。”横批是“我要申冤”。

我没有钱，只得乞讨进京，我在成都火车站铺开“乞讨书”，然后跪在地上。



高明辉保存了23年的“控诉书”（谭松摄于2004年）

火车站人来人往。一对青年男女走上前来，看了看我写的“对联”，上下打量我。“你是不是重庆铜元局原来川益中学的那位高校长？”男青年问。我回答说是。他俩二话不说，弯下腰就收我的“乞讨书”。我喊道：“为啥收我的摊子？”男青年抬头说“我们是你当年的学生，在成都结婚两年了。”说着他俩哭起来，坚决不准我摆摊，要我跟他们走，住到他们家去。我不干，说一定要上北京告状。他们没办法，男的便叫他妻子守住我，自个飞快地跑了。不一会儿，他又跑回来。原来他去换了20斤全国粮票。他把粮票递给我，然后又给我50元钱。我要他们留下地址和姓名，他俩泣不成声，一言不发地离开了车站。我望着他们的背影，眼泪也哗哗流出来。我一直没用那20斤全国粮票，珍藏到今天，作为对那不知名的夫妻永远的怀念。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高明辉

到绵阳后，我坐的那辆空货车不走了。我便又在车站附近的一家旅社门前铺开“摊子”。当时正遇工厂下班，一位中年妇女看了我的“乞讨书”，掏出身上所有的钱粮，背过脸去放在我的“摊子”上，突然，她放声哭起来，匆匆而去。我受到刺激，也趴在地上哭起来。与中年妇女同行的几位妇女把我拉起来，叫我收好钱，暂时住在这家厂办旅社。我问刚才给我钱粮的妇女的地址和姓名，她们说：“别问了，她男人被造反派整死了，留下她们孤儿寡母……”

当晚，厂里来了两位同志，在看了我的控诉书和改右文件后，表示希望我留下来。他们说：“高同志，我们厂办学校急需办教育的人，你留下来，吃住都由厂里负责，平反冤案的事也由我们负责。”这确实很诱人，但我还是没答应，一方面我这些年被人骗怕了，二是我一心要上北京告状，不愿半途而废。

当天夜里，我在旅馆黑板上写下几句感谢他们的话，又动身北上。

最后一次“摆摊”是在北京丰台车站。很多人围着我，有人叫：“请哪个个子高的把控诉书举起来念给大家听。”闹声惊动了车站派出所，警察把我拉到派出所办公室，令我蹲在墙角。不过，当他们看了南岸区的改右文件和控诉书后，态度变了，给我倒了杯水，让我坐在椅子上。派出所负责同志亲自把我送出车站，一直送到汽车站的公路栏杆边。在给我指了路后，嘱咐我说：“到了对面大街上就不要再摆出来要钱，影响不好。”

京城三月还很冷，我在饿了两天一夜后，于第三天到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接待我的是一位老同志，他说：“你给中央的信件和材料全部在我们这里，已经够多了，不要再写了。先落实改右政策，吃饭问题解决后，一切都好办了。”我恳求说我已经没钱吃饭，没钱坐车，一切拜托中央纪委为我申冤、平反。老同志给我写了张纸条，叫我去找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纸条上写着：“高明辉被判刑五年，告状多年无人理，现转你们处理。”

我拿着这张纸条，找遍了我觉得该找的部门，如：中央组织部、统战部、宣传部、教育部、公安部、检察院、法院、人大法制委等等。两个月后，最高人民法院总算给了封信，叫我带回去交给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在北京期间，我也没闲着，在街上帮人写申诉书和诉讼状，几乎天天写，那些年我



已经练成了写控诉和申诉的行家里手，下笔来得快。求我的人有河南的、新疆的、四川的、内蒙的、太原的、湖北的、贵州的，也有北京和重庆的。当然不是白写，得吃顿饭，而且还有啤酒喝。我喝啤酒就是在北京告状时学会的。

北京告状一年以后，即 1982 年 4 月 2 日，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了（82）安市法刑申字 3 号刑事判决书，判决书的内容如下：

申诉人高明辉从四川流窜到贵州镇宁、普定、安顺等地农村，以看病、谈恋爱、认同乡等手段，先后奸污青年妇女何 XX 等四人，事实俱在。但原判以流窜行医、奸污妇女罪科处高明辉有期徒刑五年，定罪处刑均属不当，应予以改判，特依法判决如下：

- 1、撤销安顺县人民法院（75）安顺法刑字第 91 号刑事判决书；
- 2、本案案由改为奸污妇女罪，对申诉人高明辉从宽判处，免于刑事处分。

这份判决书给我留下了一个又压迫了我 20 多年（直到今天）的可怕“尾巴”！我高明辉不是右派分子了，但仍然是一个“奸污妇女犯”！！

（高明辉说，四名妇女一为何正芳，二为刘大珍，另外两名纯属子虚乌有。）

由于有这个“尾巴”，既不给我安排工作，解决我的生活问题，也不给我恢复党籍，这就意味着为了当年那些整我的人的“面子”，我还得继续受苦受难。

我当然不服。

又是漫长而艰辛的上访、申诉之路。



高明辉一直不改倔强的个性（高明辉 80 年代）

1982 年 5 月，我回到重庆一一上访有关部门。没用。他们推来推去，又把我推回贵州。我在贵州又一一一上访有关部门，他们推来推去，又把我推回重庆。这个“皮球”在两个省间踢来踢去，我便川黔两省往返奔波。那几年，路费、生活费、打印复印上访材料等共花费了近万元，我借遍了亲戚朋友（有些钱至今无力归还）。在最困难的时候，我后来娶的妻子徐桂英只能卖血才能维持一家的生活。贵阳、安顺、六枝、水城等地医院的血库里都有她的鲜血。这导致她长期贫血、浮肿。十年前她半瘫在家，无钱医治，卧床不起。

我曾多次找贵州省摘帽办的鲁 X 主任，一再请求他们下去调查“奸污妇女”的真像，改正那条压死我的“尾巴”。鲁主任不理不睬，十分冷漠，他不同意安置我工作，更不同意恢复我党籍，他拿了一个事实来拒绝我，他说：“你没有办结婚登记手续，这总算是不正当的吧？！”我气得不行，同他争吵起来，他一拍桌子，吼道：“你经过劳改，态度还是不端正？！”这一下把我几十年压抑的怒火一下子点燃了。我跳起来大叫：“就是你们这些权力机关乱整，才导致我一生的灾难，你们干脆对上访的人来一个抓一个，来一个关一个，来一个杀一个，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再也没有人检举、揭发、控告、申冤了，再也没有人上访了……”鲁主任大发雷霆，再一次拍桌子，喝令我“出去”！我气昏了头，也一拍桌子：“你不是有权吗？干脆又把我抓起来，秘密把我枪毙了，我受够了，不想

活了……”

重庆南岸区委摘帽办的那位姓李的，也是位冷漠而“极左”的人物，他骨子里仍然把我当作“阶级敌人”。他曾当面对我吼道：“我们就是同意贵州省委摘帽办的意见！不同意把你当改正人员对待，更不同意恢复你的党籍，重庆也不会给你安排工作。”

我去的次数多了，他一见到我就烦，同鲁主任一样，喝令我“出去”。他不仅动口还动手——把我推到外面的坝子里。

“出——去？”我“往哪儿去？”

从26岁蒙冤到今年73岁，前22年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后25年背着“奸污妇女”的罪名，我还得把这个“罪名”背到坟墓里去？！这几十年来，我一次次地上访，从最基层的生产队到最高层的党中央……我一次次地写申诉，从蓝黑墨水到殷红鲜血……我的一生苦苦挣扎，仿佛就是为了“还我一个清白”。

（笔者注：在我采访前，2004年7月，73岁的高明辉还在给重庆市委、市府写申诉信。）

这样不明不白地走向最后归宿，我心不甘呐！我怎么能带着这个“尾巴”去见那为我付出了年轻生命的妻子刘大珍？

怎么能心平气静地告别这个世界？！



……我心不甘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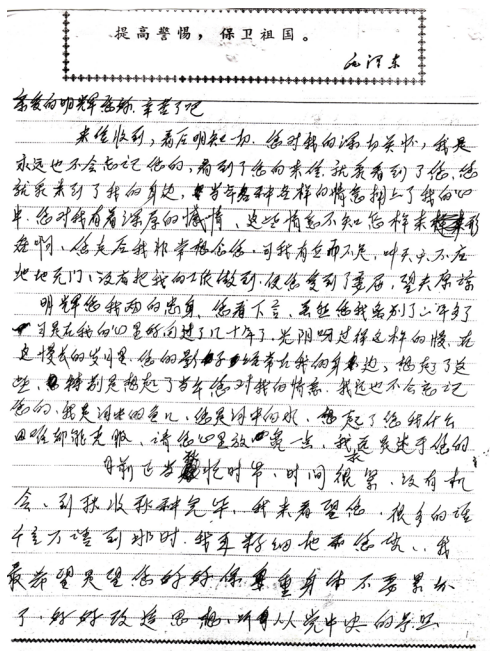
### 附：刘大珍给高明辉的信

高明辉在狱中期间，刘大珍给他写了很多封信，现高明辉还保留一封，书信全文如下：

亲爱的明辉您好：辛苦了把

来信收到，看后明知一切，您对我的深切关怀，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您的。看到了您的来信就象（像）看到了您，您就象（像）来到了我的身边，当年各种各样的情意拥（涌）上了我的心中，您对我有着深厚的憾（感）情，这些情意不知怎样来形容啊。您走后我非常想念您，可我（心）有余而（力）不足，叫天天不应，（叫）地地无门，没有把我的工作做好，使您受到了委屈，望夫原谅。

明辉：您我俩的忠（终）身，您看下言：虽然您我离别了二年多了，可是在我的心里好向（像）过了几十年了，光阴呀过得这样



的慢，在这慢（漫）长的岁月里，您的影子经常在我的身边，想起了这些，特别是想起了当年您对我的情意，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您的。我是河中的鱼儿，您是河中的水。想起了您我什么困难都能克服，请您心里放宽一点，我永远是属于您的。

目前正当秋忙时节，时间很紧，没有机会，到秋收秋种完毕，我来看望您，很多的话千言万语，到那时，我再仔（仔）细地和您谈。我最希望的是，望您好好保重身体不要累坏了，好好改造思想，听从党中央的号召（召），紧跟华主席，听政府的一切政策法规，争取立功受奖，满期以后和我们全家早日团居（聚），就是我最大的高兴。观（关）于家中老幼您不必挂念，我们一切都好。最后望您保重身体，对我不要有任何想法，安心的工作，思想烦造（燥）了常来信给我，使我心里也高兴一些。

时间有献（限），余言下次再书。

1977年10月28日夜

采访时间：2004年9月28日；2012年7月9日， 地点： 贵州省安顺市

### 采访后记

早在两年多前，就听长寿湖右派谈到高明辉，我根据他们的讲叙整理了一篇文章。2004年9月，在黎民苏的多次联系下，高从贵州安顺寄来一份材料，连同一些申诉信的原件或复印件。我正又一次失业，于是当即决定前往安顺。

火车穿过贵州高原的群山峻岭，穿过“圣地”遵义的凄风惨雨，于半夜零点12分到达安顺。车站冷冷清清，只有几个旅客下车。我在站外找了一家简陋旅社住下来等待高明辉。

早上8点多钟，高明辉前来，我们屈膝长谈，一直谈到下午四点半。

高明辉声音爽朗，思绪清晰，虽九死一生，伤痕累累，但看上去仍不乏知识分子的儒雅和“革命干部”的风度。也许是苦难经历太多，他已不把苦难当回事，谈起往事，嘻笑怒骂，挥洒自如。只是讲到刘大珍时，他突然左脸抽搐神色骤变。他竭力想控制自己，然而泪水——只有一滴泪水——从那伤残了的左眼里滚出，晶晶闪闪挂在那“神经性痉挛”的左脸上。

中午时分，我来到他家——一间低矮阴暗而又破旧的平房。房间里只有几件很陈旧的家俱，连饭桌都没有，我们是在一张旧茶几上吃的午饭。高明辉说，这几件家俱都是捡来的。

平房也是租来的，每月100多元钱租金。高明辉流浪一生，至今没有自己的住房，那一条“奸污妇女罪”，让他继续付出代价。



高明辉租来的简陋住房（谭松摄）

我问他有没有过去的老照片，他苦笑一下：“我这辈子光被搜身就是几十次。”

他告诉我，他现在很想离开安顺这个伤心地，但是心又不甘，冤案还没平反，女儿也未找到，刘大珍死因也没弄清楚，若一走，多年来坚持不懈的努力和抗争就付诸东流了。

但是，坚持下去会有结果吗？天不变，道能变？

高明辉自己也感到困惑，他一个外地人，势单力薄，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官官相护的势力网。

他再三叮嘱我，文中的那些坏人不要用真名，除了没有精力再打官司，还怕被人“黑整”——“现在的官僚好多都同黑社会有联系。”高明辉不安地说。

斗不垮整不死的高明辉也心悸了？

老人送我走到大街上，再一次挽留我，希望我在他家住几天。我犹豫了一下，还是伸出手。老人的左脸又有些抽搐，我心一酸，扭头匆匆而去。

晚上9点钟，我独自徘徊在火车站的广场上，等待从昆明来的火车。车站人不多，夜风冷嗖嗖地掠过广场，一座座窝窝头似的山峦在夜色中肃然兀立。一个贵州凯里来讨饭的老年盲人，支着两根竹棍，在广场上茫然地游走。（他被一个同乡骗出来行乞，讨到一些钱后同乡卷款而去，将他遗弃。）

正值中秋月夜，皎洁的月亮不时从大片大片的黑云中探出头来，照着这块伤痕累累、沉冤浩浩的土地。

我不禁想起高明辉在这块土地上的流浪，想起曾经、正在和将要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们，尤其想起刘大珍，想起她1978年11月20日“诉状”中留下的最后的呼求：

“……敬爱的华主席啊！敬爱的党！我有冤！我无罪，我要住房子！我要吃饭！我要活！……特求您申冤！特求您救命！……”

火车快到了，我踏上洒满月光的站台。

“……不让我活下去，那时敬望党和政府给我申冤。”

这声呼喊已经过去26年了，  
一个年轻女人的生命早已在大山  
中化作苍烟流泉。

我登上列车，回头望去，月  
光依然冷冷照着这块土地，无声  
无息，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2004年10月1日）



贵州安顺山峦（谭松摄）

## 十五、我其实很幸运

——记被重庆市国安局关押的日子

今天是2003年2月2日大年初二。去年的大年初二，黎民苏打来电话，说白永康在初一的下午去世了。我默默站在书柜前，望着白永康托付给我的记录着他心路历程的笔记本，想到写下这些细细密密文字的人永远离去了，想到自己竟然没有在大年三十去看望一下这位孤独老人，心中又悲又悔，泪水禁不住涌了出来。

半年前的今天，我走出重庆市看守所的大门，亲友们一再告诫，不要再写长寿湖！

这些天，春节近了，白永康的影子老在眼前晃动，那一代人的苦难老在心头萦绕。“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何处话凄凉！”

心里堵得慌，总想做点什么。采访，暂时不能进行了，于是，写下一点关于自己的文字。

—

2002年7月2日，山城又一个火烧般的大热天，我独自呆在家里，为《中华手工》杂志写卷首语。下午三点，门铃响了，我打开门，见楼梯口的铁门外，立着几条汉子。

“我们找谭松。”为首的说。

我有些诧异，但没多想，退回屋穿衣服。

刚披上衬衣，汉子们就进门了！

他们是怎么打开铁门的？还有楼下单元口的铁门？

一共涌进来八条好汉，一个个精精壮壮，雄雄纠纠。为首的一个掏出证件在我眼前一晃：“我们是国安局的，奉命搜查。”

据说，人在遭遇突如其来的灾祸时，头脑里会“轰”的一声。当时我就“轰”的一声：“遭了，我给那些右派们惹麻烦了！我那些稿子完了！”

汉子们（都身着便服）两人一组分别进入书房和两间卧室，剩下两人留在客厅看守我，其中一个用一个微型摄像机，近距离给我录特写。

约一个多小时后，搜查完毕。客厅里集中了一大堆战利品：所有的手稿、文稿、笔记本、光盘、软盘、书籍、电脑主机、记者证、作协会员证、护照、身份证、通讯本，还有那个领了一年多的“重庆市企业职工下岗证”等等（但给我留下了驾驶证和副教授职称证）。

接着我被带出门，这我已经料到了，不知道的是要“出门”多久。妻子碰巧出差，几天后才回来，女儿也不在家，没向她们道别。

汉子们提着两大包战利品上车，我被押上其中的一辆。我没有反抗，我采访过不少

老人，还读过一些书，懂得一旦“被抛出来”（长寿湖右派语言）一切辩解都没有用，反抗只能适得其反。更何况人家还是“依法办事”，有正式的“搜查证”等等，法律手续完备，不像无法无天的“毛主席的红卫兵”。

我被带到一个赭红色的宾馆，后来得知，这家宾馆是国安局开办的。

坐定后，有人指着一个仪表堂堂的精壮汉子对我说：“这是我们程科长。”

我一直保持沉默，这时才开口说话，提了三点请求：一、长寿湖老人受了一辈子苦，希望不要再去打扰他们，一切责任由我承担。二、搜查我办公室，希望在六点下班之后。三、不要让我父亲知道，他刚动了癌症手术。

程科（即程科长）没答复，只是叫我先打电话，把郑 XX 叫出来。

郑 XX 是几年前我任《重庆与世界》杂志主编时招聘的一个打字员，她帮我打了十多万字的长寿湖手稿，并作了编排。

郑被关押了一天一夜。这一天一夜把她吓坏了，后来我出狱，她连话都怕同我说。

当天夜里九点，第一次搜查我办公室，所有的手稿、打印稿、光盘、软盘、录音笔、网上下载的五大本“反动”文章（其中有一本是刘晓波文章的汇集）被一网打尽。

第二次搜查是在当天午夜 12 点，这次把所有右派的照片、我写的一本未出版的书《悲绝的呼唤》、电脑主机全部抱走。

接下来就是审讯了。程科先交待“政策”。他说：“我们抓人、办案，同公安有区别，我们是有了充分的证据才动手。”接着他告诉我，他们密切关注我已经大半年，（后来得知，早在两年前我主编了那期“抗战陪都”专辑的杂志后他们就调查过我。）我的一举一动他们了如指掌，现在关键是看我的认识、我的态度、我的交待。

“你的命运掌握在你自己手里，这是真的！”程科很认真地说。

我根据以前获得的“常识”，认为这是专政机关惯用的诱供手法，后来发现，程科说的是真话，我的言行，早有人汇报，甚至被录了音，“罪证”如山。

第二天黄昏，我在对我实施“监视居住”的单子上签了字。从那上面，我得知我的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程科说：“监视居住最长时间是半年。刚才我们已经把郑 XX 放了，她的问题不严重，交待得很好……”

我自然是交待得不好，又意外搜出了很多“难看”的东西，包括我几年前写的六万字杂感录《挣扎的魂灵》，一年前写的《悲绝的呼唤》，一个有“问题”的中篇小说以及厚厚的五大本从“反动网站”上下载的文章。这一大堆“罪证”让他们觉得我原来是个“惯犯”。

7 月 3 日的审讯是所有审讯中时间最长的，从晚上 10 点到第二天早上 4 点半。主要讯问长寿湖文稿传往境外的情况、王康（民间学者）与我本人和与采写长寿湖的关系、我们是如何商量找刘宾雁为长寿湖写序等等。

7 月 4 日晚上审讯时，他们有些不耐烦了，认为我避重就轻，关键问题拒不交待。半夜 12 点，双方都有些急躁。审讯到此时，我已经相信，国安局掌握了我大量的“犯罪事实”。例如，他们让我交待在 6 月 12 日的长寿湖右派聚会上说了些什么。我避重就轻

说了几句，他们批驳：“不对！你说没说‘要用道义的力量对抗国家恐怖主义’？还有，你说没说‘要对共产党的罪行进行清算？……要不要我们放录音给你听？！’”

我服气了，他们是专业人士，一个个训练有素，我是一个只有激情、不顾头尾的书生，哪里是他们的对手？此刻，我最最心焦的，是四盒光盘，那上面刻有除了录音外的几乎所有长寿湖的文字和图片。在我被抓的头一天，我刚把这匆匆刻出的光盘交到高中同学傅达芸手中。这四盒光盘一旦被查抄，那就真的是全军覆没了。

他们迟早会查出此事——我已经对国安局的侦察能力服气了。我拒不主动交待是想拖时间，只要傅达芸知道我被抓，她一定会想办法。傅是一个非常聪明、有正义感，而且不乏奉献精神的女性。

问题是，怎样才能让她知道我被抓了呢？

午夜时分，他们变得焦躁，认为我交待得很不好，要我用笔写交待。我开始觉得身体十分难受，头胀，胸痛，那种难受无法形容，竟渴望举起手狠狠抽打自己的脸、头，抓自己的胸，或者让别人来打。我望着窗外铁栏封锁的夜空，失去自由的痛苦排山倒海压来，我觉得承受不住了，平生第一次真真切切地、不可抑止地产生了死的念头。我不断去看门上的铜手柄，盘算着怎样冲上去，用脑门心对准它，“轰”的一声。

我拒绝写，告诉他们我很不舒服。他们盯着我看，也许看见我脸色很差，犹豫了一下，同意第二天再审。

公正地说，程科等人对我是相当客气的，既没有骂，更没有打，如果那天晚上逼我，不知会出什么事，因为我有个大缺点，容易冲动。

永远记得那一天，7月4日，美国独立纪念日。

## 二

7月5日中午时分，妻子、女儿和姐姐给我送衣服、药品等东西来。她们在另一间屋里，不能与我见面。我听见她们的声音，很大，仿佛在争吵。我实在忍不住，夺门出去。

妻子和姐姐情绪激动，正冲着程科嚷：“他一个下岗人员，刚刚找到份工作，写点文章，啥子颠覆国家政权？！他一个小人物，哪个颠覆国家政权？！……”

妻子看见我，急忙走过来，抓住我的手，死死盯着我，泪水涌出来。

程科容忍了我们这次违规的会见，他十分理解、十分宽容地让我坐了十来分钟。

出门分手时，姐姐紧紧抓住我的手，边哭边说：“谭松，你出来以后再也不要忧国忧民了，不要写那些东西了，各人去挣钱，挣钱！”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自己非常软弱，心想：只要让我出去，绝不再写了，一心一意去挣钱。

7月6日，程科特意请示了领导，恩准我去探望一下父亲，他亲自开车送我去，他冒了风险，因为我完全可能逃走。

父亲切了一叶肺，还躺在监护室没脱离危险。监护室不能进，我站在门外远远地望着他，他也看见我，吃力地抬手示意。我又一次感到十分悲伤，他还不知道我出事了，不知道我是因为写他当年的那个长寿湖被抓了。

(后来我进看守所，隐瞒不下去了，家人只得告诉了他，父亲听后一言不发，骤然在病床上浑身发抖，一夜间头发白了一半。)

离开医院，汽车启动，妻子突然从车窗外伸进手抓住我，不放，泪水大滴大滴往下滚，我尽量轻松地朝她微笑，说：“松手，王青，不要紧。”

我真的想放弃了，说妥协也罢，说投降也行，总之，“端正态度，认真交待”，让他们满意，让我过关。

不幸，接下来审讯时，我隔着桌子瞥见一叠材料，标题是几个大黑字：“谭松反动言论”。这一下又撩起了我的一点坏脾气——那种与生俱来的桀骜不驯。我想起我写的一篇采访后记中的一句话“这是一个有组织的犯罪集团，李宁熙跪在地坝，向这个犯罪集团认罪”。

我心中又涌起一股“顽抗”，一时忘记了妻子的泪水，父亲的病容。当问起我现在怎么看待这个社会时，我一丝不苟地谈了四点：一、反对一党专政；二、人民没有民主；三、新闻没有自由；四、不能把教育当作挣钱的产业。

我注定要为这种“顽抗”付出代价，1957年当右派的父辈们如此，2002年采写右派的我也如此。

审到7月11日，似乎该问的都问了，与长寿湖无关的也问了，如“为什么要同王康搞文革红卫兵墓？”“为什么要专门搜集刘晓波的文章？”等等。傅达芸的家也去过了，那四张“最后的收藏”也落入了国安局之手。

我坐卧不安地企盼着喜讯：“好了，问题搞清楚了，你可以走了！”

我已经坐了十天的牢，右派冉德玉一生中有一个最痛苦、最难熬的十天，我也是。“宣判”要来而未来的日子最令人不安，当年右派白永康如此，现在我也如此。

不提审时，可以看电视，还能看香港凤凰卫视。

我在电视上看到介绍日本导演松井和他拍的纪录片《日本鬼子》。松井采访了十几名当年侵华日军的罪行。该片在日本和欧洲引起轰动，松井获得了掌声和大奖。

我还看到调查日军细菌弹罪行，采访当年受害者的王选女士，她也赢得了掌声和喝彩。

我还看到我所熟识的、曾相互呼朋唤友的那些作家、诗人，正出席各种聚会，或作为嘉宾，对着镜头容光焕发，侃侃而谈……

我不禁想起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捷克那一群向专制极权挑战的作家：瓦丘利克写出要求民主反抗暴政的《2000字宣言》；昆德拉一面对自由大声疾呼，一面对反人道的斯大林主义痛加鞭挞；诺沃麦斯基则对曾经被迫充当专制工具沉重检讨、对极权制度愤怒控诉……这些捷克作家们，面对专制的黑暗和恐怖，一个个充满了道义勇气和社会责任感。回头看我们的不少作家，一个个聪明绝顶，绝不越雷池一步，用手中的笔猛挣金钱、名誉、地位、美女，在现行体制下活得有滋有味——当然这比充当专制的帮凶又算有“良心”了。我入狱后，妹妹曾向她的朋友，一个正走红的、名利双收的作家求助。对方冷冷地说：“他要去干那种事，就得承担后果。我帮不上忙！”而我作为会员的重庆作家协会，正一门



心思研究如何写好“主旋律”，争取获得共产党的“大奖”。

日子一天天过去，每天都有人24小时监守我。有一次，一个叫小齐的年轻人连守了三天三夜，受不了，盯着我刻骨铭心地说：“太难受了，我这辈子无论如何不能犯法！”我有些歉然：连累一个活蹦乱跳的小伙子跟着我“坐牢”。

7月19日下午5点左右，“宣判”终于来了——一份刑事拘留书。押送看守所。

我很平静地在拘留书上签了字。天天苦苦企盼，总算有了个结果。

加重处罚的原因还是那个老话题：态度顽抗。监守人员汇报：我显得若无其事，对自己的罪行根本没有认识。尤其严重的是，我进来了还在宣扬“反对一党专政”——也就是反对共产党。既然思想没有转变，放出去就会继续危害社会，这样，只有押进看守所了。

据说，主办我案子的程科受到批评，上面认为他对我太宽容、太仁慈。他垂头丧气，心情大概跟我一样沉重。他并不想让我走到这个地步，他说过，他对我作过详细调查，对我的人品是尊重的。

但是，我太“固执”。

临行前，程科阴着脸告诉我，我面临最高五年的徒刑。根据我的罪行，他估计会判三至四年。当然也还有希望不走到那一步，只是现在事情难办多了……

### 三

重庆市看守所位于渝中区石板坡，这儿关押过不少“知名人士”，最近的便是那位闻名全国的持枪抢劫杀人犯张君。

穿过两道武警守卫的岗门，来到“洗礼室”（我的命名），左手右手分别按手印，巴掌也按，搜查全身，收缴所有随身物品（包括钱、纸、皮带、鞋子、药品等），衣裤上的拉链统统用夹钳绞断，然后像被拔光了毛的鸡一样蹲在地上等候发落。

折腾了大约半个多小时，一位面色阴沉的中年看守冲着我喝道：“起来，走！”

又穿过一道门，眼前一条长长的露天过道，右边是厚厚的墙，左边是一扇扇封闭得水泼不进的铁门。我知道我马上要钻进其中一扇门，忍不住抬起头来最后望一眼天空。

天空中有几丝浮云，在夕阳血红余辉的照映下，自由自在地漂游。我最喜欢黄昏夕照，曾写过……

“站住！”看守在背后叫。

我在一扇铁门前停下来（后来得知编号是“下四房”）。看守按动一个按钮，电动铁门轰隆隆地打开。里面，是一个大约六平方米的小坝，有一个水池，两排塑料桶。高高的四壁阻断了外面的世界，但透过头顶上水泥条的缝格，可以看见破碎的天空。

再往里，又是一道铁门，这道铁门由粗铁条组成。待这道铁门隆隆打开，走进去，才算是到了“家”。

老犯人打新犯人是这块土地上的一个“约定俗成”，名曰“见面礼”，这方面的故事我听得太多。跨进牢房（这儿叫“监舍”）的那一刻，我作好了挨打的准备。我肝上有三个血管瘤，最大的4.5公分，医生说，一定要避免外力撞击，一旦破裂，只能维持10多分钟。我一点不觉得害怕，如果无法避免就不避免，我已经耳闻目睹太多的灾难、苦难、死亡，我要遇上了，不奇怪。

一股热浪扑面而来，明晃晃的日光灯下，满满一屋子人。“床”上、地上，到处都是，无处下脚。我只好紧靠铁门站着。

没人打我，也没人理我。

监舍大约20平方米，一个长长的砖木通铺占了80%的地盘。靠铁门这一头有一个凹入墙壁的仅容一个人的小厕所，任何人蹲在里面全室的人都能看见。室正中高高悬着一把吊扇，正呼呼地送出热乎乎的风。墙壁上很高的地方有一台电视，要仰着脖子才能看。铁门对面的墙上，有一个铁窗和小洞口，衣物或饭就从那儿塞进来。

有目光正注视着我、打量着我。

“上来！”通铺中央一个五大三粗的壮汉冲着我一挥手。我猜这便是牢房的“山大王”。

“坐下！你犯的啥子事？”山大王问。

几个估计是属于核心层或者上层人士的囚犯围上来。另一个“下层人士”不识趣，也想听，山大王冲他一瞪眼：“走开！”“下层人士”赶快缩了回去。

“我写文章犯了事。”

“写文章？写文章犯啥子事？”

“骂了共产党。”

“山大王”拿眼瞪着我，半晌，突然一拍光溜溜的大腿，蹦出一个字：“好！”

接着，“山大王”和那几个“上层人士”围着我七嘴八舌问起来。

后来得知，“上层人士”包括“老头”陈XX（他在里面年龄最大，53岁，原是市某单位的一个主任，因经济问题入狱），“局长”陈X（原市某局的一个副局长，也是经济问题），“胡二娃”（“山大王”的贴身侍从）。“山大王”叫张XX，是一个黑社会集团的打手，受白云湖枪杀警察一案牵连入狱，已在看守所关了两年。

听完我的简介，“老头”翻身找来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车轻路熟地翻到分则第一章说：“你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罪第一百零五条第二款——‘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读完他一拍我肩，笑着说：“不要紧不要紧，最多五年，这里面哪个都比你重。”

“山大王”（大家叫他“张哥”）手下支颚，打量着地上那已经睡满了人的过道。

“你，往开水桶下面移！”张哥下令。开水桶在牢房最里面的死角，又闷又热，而且也只有椅子大一块地方。那人不敢违抗，起身把被盖移过去。接着，睡在地上的人一个接一个往里挪，勉强在铁门口给我挪出一个可以躺下的地方。

“你要晓得，”张哥皇恩浩荡地说，“你能够坐在我面前，坐在这块地方，是抬举你！”

张哥占据的位置，正处在电扇下，又正对着电视，是下四房里的黄金位置。

“我们敬重你，不是因为你会写文章，而是因为你敢骂共产党，否则，你今晚要在厕所那儿蹲一夜。”

（我写长寿湖第一次有了正面的回报）

我已被国安局关押审讯了18天，独自一人，十分孤独。这儿大家都是犯人，都对那个时时刻刻要人热爱它，叫它“亲爱的妈妈”的东西不满。那一瞬间，我竟在这拥挤不堪、又热又闷又潮湿的牢房里产生出一种归属感。

我在紧靠铁门的地上躺下，我这一排挤了三个人，只能侧着身子躺。我开始感到整个空间给我一种挤压，就像春运时挤在装满民工的闷罐车厢里。我仰着脖子，透过铁栏和小院上空的水泥条望出去，夜空被隔成几个窄窄的、惨不忍睹的黑条。我突然强烈地感到，自由多么美好！然而又多么遥远！我曾在《挣扎的魂灵》的序言中对仅仅享有“生存权”表示不满，认为一个现代人还应享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我追求后一种自由的代价是前一种自由的丧失。1995年我失去工作后，曾很潇洒地说：“我是个自由人了，没有单位，没有组织，共产党那一套升官、发财、评职称、分住房等等于我不起丝毫作用。我已经没什么可丧失的了，再要丧失就是自由，进牢房了。”

当时，我以为只是说说而已，我怎么可能进牢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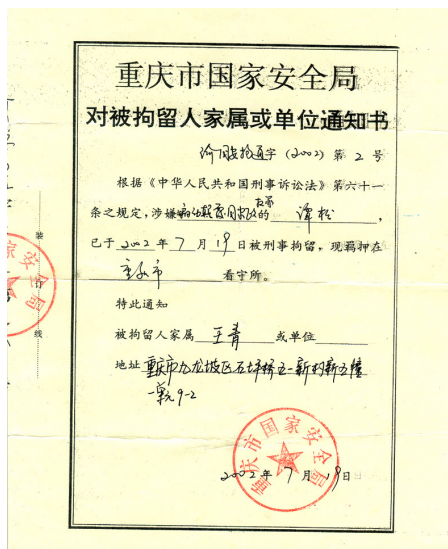
对面高高的铁窗外有人叫我的名字——妻子带东西来了！一个枕头，一床毛毯。

我抱着这两件东西回到铁门处，心中被一个字胀得满满的——“家”！妻子、女儿、床头的灯光，床上的被盖，还有叫“LiLi”、和“Mary”的猫……

长寿湖右派曾多次谈到的对亲人的负疚和思念，我刻骨铭心地体会到了。

那是一个很容易把人击倒的夜晚。

后来得知，那天晚上，妻子和女儿在看守所大门外站了几个小时。值班民警以没有手续（即国安局对被拘留人家属的通知书）为由，拒绝传递任何东西，而且态度十分恶劣。妻子又急又怕又屈辱，更担心我在里面挨打，不禁在门外失声痛哭。刚刚初中毕业的女儿目睹了这一幕，汗水、泪水、刺刀、铁门、吆喝声，那一刻，她变了，或者说，长大了。



接下来的三天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日子。

空间太窄小，又正值山城酷暑，定员最多10人的牢房挤了18个人，感觉像是被关在鸡笼子里。这间牢房，正是关押“著名人士”——杀人犯张君的地方。他们告诉我，当时张君独自一人享用这间房，就睡在张哥占据的那块“黄金位置”，而且每天免费供给他加菜甚至水果。看来，在这个社会中，只要有名气，那怕是杀人杀出了名，都比一个默默无闻的“颠覆犯”日子好过。

牢房两头的高墙上，各安有一台摄像机，对准我们24小时分分秒秒工作。每天晚上由张哥安排“下层囚犯”（包括初来者）轮流“值班”，我被安排在一点至三点（看守定时在铁窗外喊）。“值班”即监视其它囚犯，不准乱动。值班的人不准靠墙，不准闭眼。另外，初来者由于“牢历”浅，必须从最底层干起，因此我每天还要清洗厕所、擦洗地板和小坝（一天三次）。吃的是一个方块型的米饭和半碗水煮白菜，这点饭菜也不是白吃的，每个人必须完成生产任务——每天制作4000个头痛粉纸盒，完不成就要坐禁闭，违反了监规也要关禁闭。睡在我头上方的张X刚在里面蹲了九天出来，他瘦骨嶙嶙，面色蜡黄，而且肠胃被损坏，不时慌慌张张要蹲厕所。他告诉我，那里面站不能站、睡不能睡、蹲不能蹲，空间极其窄小，加上脚镣手铐、黑暗、臭气，时间一长，人要发狂。相比之下，这间拥挤的牢房是天堂。

禁闭室就在铁窗外，踮起脚扬起脖子可以看到“禁闭室”几个字。

那几天，我老听到外面传来闷声闷气的叫声，我很奇怪，监牢里谁敢叫喊？后来他们告诉我，那是蹲禁闭的犯人的声音。我侧耳细听，终于听明白了，从那黑暗窄小的地方曲曲折折地传出“唉哟……受不了哟……唉哟……”

我前所未有的感到了恐惧！我想起长寿湖右派汤儒君讲的禁闭室关死的那个少年，想起张志新在禁闭室里神经错乱……

我采访的长寿湖右派很多都还生活在恐惧中，我自以为自己是个勇士，站在一旁“大义凛然”，然而，那一刻我害怕了。铁窗、高墙、看守、禁闭室、监规、“头痛粉”、惨叫声，一起向我汹汹袭来，我第一次产生了后悔的念头：唉，为什么要去写长寿湖？为什么要骂共产党？

死的念头第二次浮现出来，唯一的方法只能撞墙，就像古代那些不愿受辱的烈妇。我拿眼睛死死盯着那面墙，几个小时一动不动。

“老头”看出我的情绪，走到我面前，很关心地说：“到这个地方来了，一定要想得开，精神上要放松，要强迫自己高兴起来。还有，你一定要记住，从现在起不要把自己当人，这样才活得下去。”

张哥坐在通铺上，居高临下地冲我说：“你不要觉得委屈、冤枉，这里面有几个不委屈、不冤枉？！你运气好，这几天没得生产任务，纸盒盒一来，累死你！你还不赶快把那8条监规背熟，另外那20多条也要记。背不到，罚死你！全室都要受牵连！”

我学外语出身，背功本不差，只是那8条实在“难”背。第一条就是“拥护中国共产党”，还有一串“端正态度，服从管教”、“认罪伏法”、“痛改前非”等等。

我背起来很吃力。

关进看守所的第二天，国安局的程、齐前来提审，这是我第九次受审，在一间单独的审讯室。程、齐坐在一张凸型的木桌后，颇有法官的味道，我坐在下面的矮凳上，低人好几等。程、齐面色阴沉，齐的眼睛中甚至还露出了恨恨的光。我知道，是我的顽固给他们增添了很多麻烦。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戴手铐，不紧，也不痛，它给我的压迫是心理上的，记得有位俄罗斯女作家，第一次戴上手铐时，觉得奇耻大辱，我似乎也有这种感觉。

有位作家曾说：“手中的笔，挣来冰冷的手铐。”说得真准确。

这次审讯是最短的一次，又问了一遍姓名、年龄、住址等就算结束。我觉得很滑稽，仿佛一群成熟的人在演一幕幼儿游戏。

接下来的一次审讯在两天后，是我经受的审讯中最为猛烈的一次。国安局来了一位处长，他冲着我一拍桌子：“谭松！我们对你够客气了，但是你拒不配合，一直不老实交待问题，一直拿谎话欺骗我们！现在你自己说，你还有哪些问题没交待？”

那几天正是我最软弱的时候，面对处长的冲天怒气，一直在我内心苦苦支撑的勇气退缩了，我终于把隐藏了很久的秘密——王康处还有一份打印稿——向处长交待了。

后来，我常常想起我那一天的软弱。

以前读 Smiles 的《信仰的力量》，十分敬佩胡格诺教徒那种威武不屈的精神。如果我有宗教信仰的支撑，一定不乏勇气、力量和精神上的宁静。可惜我没有，我只有一种道义力量的支撑和一点人文精神的抚慰，我绝发不出教徒们在铁牢中、在刑架上那种坦然的微笑：“啊，沙漠好像百合花，因为我走在主的路上。”

在看守所最初的那几天挺过之后，我精神压力开始减轻。不可思议的是，觉得四壁不再压得透不过气，话多了，脸色舒展了，也开始感到饿，觉得那个水煮白菜实在难吃。

难怪长寿湖那些放不下精神负担的右派只有死路一条！

在狱中我常常想起两个人，一个是刘晓波，一个是茉莉。这两个因“六四”入狱的人，才学和人格都让我敬佩，我读过他们的狱中记事。想到这么优秀的人也经历牢狱之灾，我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蹲蹲监算什么？更不用说还有索尔仁尼琴、阿赫玛托娃、曼杰施塔姆、哈维尔等等数不胜数的人类精英了。

想到他们，我感到一种安慰。

#### 四

看守所的生活非常有规律。早上7点起床，早饭之后是劳动（糊纸盒），没有纸盒就分成两排盘腿坐在炕上，不得乱动。高高的铁窗外不时有看守巡视。

每天晚上7点钟点名，全体囚犯挤在炕上面壁而坐，一一高声回答：“到！”其实关在这儿根本不可能逃跑，连放风都没有，真正的插翅难飞。

那铁门隆隆开启的声音，对全体囚犯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刺激。除了固定的点名，每个人都不知道它突然打开的原因。是福？还是祸？也许，是又来了新犯人；也许，是提审某人；也许，是突然搜查；也许，是要关某人禁闭。对隆隆声最感到恐惧的，是那些判了死刑，戴着脚镣手铐的囚犯，铁门每一次隆隆的开启，都意味着地狱之门的洞开。我们室有几个注定要判死刑的人，但还没判下来，所以暂时还无这种恐惧。他们告诉我，在我入狱前20多天，即“6.26世界禁毒日”，看守所总共拖出去了20多个男女。那一天，隆隆的铁门声、镣铐拖在地上的声音和呼叫声在整个看守所迴响，所有囚室鸦雀无声，整整一天没有一个囚徒说话。

他们说，死囚一出牢房门脚镣声就听不到了，因为这时要抬着他（她）们走，不能

让他（她）们留下脚板印，免得死鬼顺着脚印找回来，这叫做“收脚板印”。我有些怀疑，共产党是大无畏的无神论者，杀人千千万，气吞山河无所顾忌，怎么会怕“脚板印”？但他们都这么说，弄得我半信半疑。

毒品、自由、生命，在这高墙铁窗下，会有另一种思考，另一种感受。

隆隆的铁门，除了对我的“迎接”和“送行”之外，还专为我开、闭了10次，其中7次是提审，一次是“牢头”的讯问和登记，一次是挂着牌照罪犯单人标准像（牌子上写着我的号码，可惜，当时我脑子里装满屈辱，竟忘了记，仿佛是2000多号），还有一次是“牢头”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很好奇地问：“谭松，你是哪个反党的？”

有一次我很难忘。那天上午，隆隆之声后，几个戴着手套的好汉闯进来，厉声喝道：“出去，到外面坝子，蹲下！”

我们慌慌张张挤到洗脸的那个小坝，冲着墙根蹲下，大家挤成一团，不敢抬头。我蹲在地上，热汗直流，恍然想起农贸市场上一群等待宰杀的鸡鸭，买菜时我经常看到它们，不会言语，任人宰割。我们当然不是鸡鸭，但是“老头”在我一进门时就反复告诫了我：到了这地方，千万不要把自己当人。

我竭力去想这句话。可惜，人的尊严感顽强地涌上心头……

搜查完毕，戴着口罩和手套的汉子们走了，他们没查到任何违禁物品，我们的“家”被翻了个底朝天。张哥跳到通铺上，指挥大家打扫“战场”。大家收拾被盖，寻找衣服，一个个很平静，这点小骚扰，又没打人，又没流血，算什么呢？

上帝对我很关照，我入狱一个多星期，居然没有“生产任务”，他们说这种现象很少，估计是那个头痛粉药厂产品积压了。我原本是个喜欢采访的人，牢房天地虽小，牢友背景深远，我抓紧这个空闲，一一打探下去。下面是我“采访”的其中几位。

**梅X**，33岁。他的狱龄最长，在看守所关了四年。13岁那年（1983年），他到一个水库游泳，偷摘了岸边苹果树上的一个苹果，正巧遇上全国“严打”运动，于是被送到市少管所劳教三年。这三年中，据他说，除了挨打以外，最折磨人的就是抬石头，把他压惨了。出狱后，他在社会上流浪，1987年因摸包（扒窃）被抓，又判刑7年。狱中有一次被追打，他跳楼自杀，幸遇楼下是沙堆，捡回一条命。1998年，他作为一个贩毒集团的成员，被渝中区法院一审判处死刑。他不服，说那700克毒品完全是冤枉他的。上诉后，改判为死缓（因为证据不足——没有卖给了谁的证据）。

我入狱时，梅X死缓两年期已经过了两个多月，是杀，是判有期，还是放人，没有说法。梅X前前后后已经蹲了14年牢，他说，他是吃共产党（牢房）的饭长大的。

（梅X见我很专注地倾听他的经历，很感动，向我讲述了他挨打的一些片断。）

他们进我家搜查，打我是自然的，但是他们还打我小侄女。起因是这样，公安打开冰箱，抓起里面的啤酒就喝，侄女不懂事，也拿东西给我吃，一个公安狠狠一巴掌打过去，把她打在地上滚几转，我小侄女才两岁多！

审讯时，打得我哇哇叫，于是把我押上车——一辆长安面包警车——开到向阳隧道

(即火车站到牛角沱的隧道)，那里面噪音大，叫喊听不见。他们把我两手分开，吊到车顶，我站不直，半蹲半立，他们前前后后地打，我受不了，想死得很呐！后来，我吐血了，说我是装的，又打。最后见不对劲，怕出人命，才把我放下来。我倒在车地板上，发现地板上有一根细铁钎子。我悄悄把它藏在背后，决定如果他们再打我，我就立马用铁钎子自杀。那天打我的公安中有一个姓张的，下手狠，后来听说他打死了人，自己也栽了。

(注：我出狱后了解到，此人名叫张X，重庆港口公安，2000年因刑讯逼供打死人，被判刑三年，缓刑四年，同时被判的还有另一个公安李X。)

在洞子里打完后，他们把我关到少管所。我爸爸来看我，我已经站不起来了，两个人把我架出来，叫我不准乱说，我头昏糊糊的，远远看见老爸，叫了一声：“爸爸，我是冤枉的。”他们一听我“乱说”，马上把我架回来，吊到一棵树上打。打得凶狠，我痛得死去活来。放下来后，我决定自杀。我找出藏在背后裤子里的细铁钎，对准肚子一阵乱戳，把肠子都挑出来了，你看我肚子上的伤疤。

(梅X说着往上撩起衣服，我看见一道约一尺长指拇粗的伤疤，由下而上，弯弯曲曲，乌红凸突，像一条丑陋恐怖的大蚯蚓！那一瞬间，我暗自下定决心，今后出去一定要写出我的亲眼目睹。)

他们送我到医院抢救，把我爸爸叫来，对他说，拿一万五千块钱来，医好就放人。我爸爸是个摆摊做小生意的，为了救我，千辛万苦筹了一万五千块交给公安。医好伤后，公安又把我关起来，对我爸说：“他的问题还没搞清。”

我爸爸是个老实人，也气得哇哇叫喊：“你们公安哪个骗人！你们公安哪个骗人！”

(梅X由于在看守所时间太长，四年不见阳光，33岁年龄，头发已经花白。还有，每遇气候变化，他肚子就要痛。我被关押期间，正值山城酷暑，大家盼下雨，经常问他：“梅X，肚子怎样？”有一次，他面露喜色地说：“噫，快了，隐隐作痛。”第二天果然降雨，大家无不欢喜。)

罗X，30岁，后我三天入狱，罪名是吸毒，贩毒。他衣服又脏又破，张哥给他一件衬衣，我给他一条短裤，换衣时，发现他身上伤痕累累。晚上，他紧挨我躺下。我试图“采访”，他面色阴沉，一言不发。两天后，我慢慢掏出了他的话。

罗X家庭非常困难，父母双双下岗。八年前，他因盗窃被判刑七年，差点死在一个劳改煤矿。他提到那个煤矿（在宜宾上面）时，眼中露出恐惧和绝望的光。出狱后，没人雇他干活，熬了大半年，忍不住参与贩毒，这次进来，距他出狱只有一年。他不承认贩毒50克，说：“我根本没那么多钱，禁毒队只搜到0.5克，抓我几个小时后不知从哪儿拿出一包药，说是我的。我不承认，所以打得惨。”

罗X的脸上被烟头烧出几个血泡，那血泡紧贴着我的脸。“我真的不想活了，没得意思，没工作，没家，没钱，这个社会不是为我这种人设计的。”他眼睛盯着铁栏，嗓子沙哑。

铁栏外透入的光，洒在他苍白瘦削的脸上，我从那上面读懂了什么叫真正的绝望。那一刻，我感到自己其实很幸运。

几天之后罗X被转走，出门时我问他估计会去哪儿。

“无所谓了。”他垂着眼说。

仁 X，涪陵师专毕业的大学生。他家在农村，为读大学，家里负债累累。毕业后估计是因经济困难，与父亲一起入室偷盗，并杀死了人。现在父子分别关押在不同的牢房。他们告诉我，他肯定是死刑。仁 X 不多说话，面色惨白，他的简况是别人告诉我的。

“白市驿青年”，这样称呼是不知他的名字，只知道他是重庆白市驿的人。他在长沙赌博，对方作弊，他一怒之下杀了人。本来他已藏匿了一年多，后来大意了，被朋友出卖入狱。“我肯定飞钵（即掉脑袋）。”他手在脖子上划了一下。“除了长沙那条命案，我犯的事还多。”但他看上去很坦然，大口吃饭，倒头就睡，一点看不出这是他生命的倒计时。当他听说这间牢房正是著名杀人犯张君死前关押的地点时，眼眸骤然闪出惊喜的光：“真的？！那我死也值得！”

“白市驿青年”有一副十分健美的身材，骨骼匀称，肌肉结实，五官也很端正。尤其让我惊奇的是，他阴茎的皮下植入了一颗珠子，珠子在里面滚来滚去。他告诉我，这玩意他花了好几百元钱，做爱时女人很舒服。他说这话时笑咪咪的，像孩子一样充满了一种近于天真的快乐。“可惜这辈子用不上它了。”最后他有些遗憾地说。

四天之后他被押走，他要去长沙受审。铁门隆隆开后，他从地上一跃而起，走到门边，他停顿了一下，扭回头，最后望了一眼“大英雄”张君住过的地方。我注视着年轻而清秀的脸和饱含着青春活力的身躯，一下子想起奥威尔的随笔《行刑》，想起他笔下那位走向绞刑架的印度死囚。那一刻，我强烈地感到一种“困惑”——死刑，该，还是不该废除？

“17岁小偷”（我忘了他的名字）。他身子比较单薄，但生得眉清目秀。一进门，他便老实地蹲在厕所旁的地上，羞涩而惶恐地望着大家。我打量着他，这是一张稚气未脱的脸，眼眸里毫无圆滑狡诈。他从乡下来城里找活干，有两天没吃东西，于是伙同另一个少年半夜在一个铺子里偷了一箱香烟，价值约两千元，那个少年逃了，他落入法网。

“17岁小偷”在监舍里大气不敢出，天天干洗碗的活。几天下来，他很快适应了，有饭吃，活也不重（他从乡下来，不就是为了找份能吃饭的活吗？）。重庆市看守所据说是全国十大文明看守所之一，不允许打人。同室的小魏是一个进过无数看守所、戒毒所，受过各种酷刑的刑事犯，他宣称，重庆市看守所是所有看守所中的万豪宾馆（重庆市一家著名的五星级宾馆），从其它地方转来的囚犯，在这儿都“乐不思蜀”。

“17岁小偷”没挨打，饭也吃得饱，我看他慢慢安心了。有囚犯告诉他，这儿是关重刑犯的地方，他肯定要被转走，其他看守所打人就是家常便饭了。刑罚有“麻辣鸡腿”（即把大腿打变色）、“戴勋章”——金牌、银牌、铜牌（即把胸部打成三种不同的颜色）等等，等等。

大约6天后，“17岁小偷”果然被转走，估计是转往重庆松山看守所，出门时，他双腿打颤，面色惨白，泪水流出来。望着他仍是孩子般的稚气犹存的脸，我感到一阵心痛。

他仅仅比我女儿大一岁！



看守所楼上楼下每个监室都挤得满满的，每天还不断往里面塞人。铁门外正在大兴土木，日夜赶修一幢大牢房。我挤在地上，有些透不过气。心想，我们这个国家，每天要产生多少各种各样的“罪犯”呢？据说，在西方民主国家，每当有人犯罪，政府就要自我检讨：政府和社会该负什么责任？在我们这儿，抓了多少“罪犯”，成为一种“战果”。

在看守所，我曾想，如果判我几年徒刑，我不会白坐这个牢，只要能活下去，我将写出又一部像《长寿湖》一样“难看”的文字。在与专制极权的对抗中，我自然是输家，但他们一定不是赢家。

## 五

7月26日的提审是我进看守所后的第五次。负责我案子的程科显得很急躁，当他看见我仍然有些桀骜不驯时，气急败坏地说：“谭松，你要明白，你是在同一个强大的专政机器对抗！”

他下面的话没说，“这是不自量力，自取灭亡”。

茨威格在《良心反对暴力》一书中写道：“面对一种戴盔甲的独裁的优势，每一种纯精神的战争无不显得软弱无力……人们会一再发现，每当一个单独的人除了道德的公理以外，背后没有任何力量支持，去抵抗一个联成一体组织，其斗争总是多么没有成功的希望。”

我出狱后，几乎所有的人，朋友、亲人、同学都告诫我：“现实点，你能搬起石头打天？”“你丝毫动摇不了国家机器，而国家机器轻轻一动，就让你粉身碎骨”。

我知道这绝对是“真理”。

但是，我也知道，在军队、警察、刺刀、监狱的专政力量之外，还有一种力量——信仰的力量、良心的力量、道义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驱使弱小的卡斯特里奥向强大的加尔文政教合一的霸权抗争；这种力量可以促使弱小的俄罗斯诗人向斯大林强暴的帝国挑战。这种力量是专制、强权、暴政最可怕的敌人。虽然，在抗争中前者往往粉身碎骨。

我还知道许多人不知道有那么一种力量，在专制极权长期残酷的统治和镇压下，他们只感到自己的弱小和那一垛带血的石墙的巍然。

我所不知道的是：我身上有多少“另一种力量”，也许有一些，可是，它们完全可能消解在妻子涟涟的泪水中、父母哀哀的目光下、以及我自身的怯懦里。

我永远记得那次提审。审讯室外面，看守所的一群武警正在练武，一个个身强力壮，吼声如雷。

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软弱、孤立、惶恐。我答应按要求写一份材料（以前我只字未写）。材料须包括五部分：1、为什么写长寿湖；2、如何谋划在国外发表；3、在采访后记中的反党问题；4、反党的思想根源；5、今后的打算（包括“是否希望宽大处理”）。

我蹲在监室的地上整整写了一天半（当然是看守特许，否则没纸笔）。

令人头痛的“劳动改造”——折“头痛粉”纸盒——终于来了。原来拥挤不堪的牢

房更加拥挤，通铺上、地上，散乱着一盒一盒的原材料、一碗一碗的浆糊。我们18个人，一个个弯腰驼背加汗流浹背，挤在一起完成自己的定额。每人每天的定额是4000个。我是新手，第一天1000，第二天2000，第三天3000。我第一天干下来，手指就肿了，1000个“头痛粉”纸盒我折了整整8个小时！其中还有梅X的帮助——我因倾听了他的遭遇，他报答我，晚上帮我干了两个小时。

我感到绝望，望着铁窗外的禁闭室，还感到恐惧。他们告诉我，曾有一个法官因经济案入看守所，十多天“劳动改造”下来，精神几乎崩溃，提审时，他扑通一声跪下去，痛哭流涕地恳求减免他的“定额”。

我估计我不会“扑通”一声，但会不会进一步妥协——“听党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呢？

果然来了，在7月30日的提审中，程科要我写“三书”——“保证书”、“悔过书”、“自愿书”。保证书指今后不再从事危害社会的活动（包括不再写长寿湖）；悔过书是为自己过去的“犯罪”表示忏悔。自愿书是表明今后愿意配合专政机关，汇报其他人危害社会的言行。程科暗示，写了“三书”，事情就好办多了，希望我配合。

“三书”触及到我做人的底线，尤其是“自愿书”，我平生最痛恨的就是告密，就是“汇报”。

有一个声音在心底呼喊：不，绝不！

但是，我最终妥协了，或者说投降了。

我写了“三书”！

尽管我运用我那点文学水平，把“三书”写得比较含糊，尽管我以伽俐略也曾违心地在宗教裁判所前忏悔过为自慰，尽管我以“与共产党斗争要讲策略”为自己开脱，但是，我毕竟打开了那面丑陋的白旗，这足以让我羞愧一辈子。



反右漫画《新观察》1957年19期

（1989年“六四”运动，我在校内校外“上窜下跳”，结果被学校列为“重点”。为了保住饭碗，我被迫交出了照片和底片并写了三次检讨。这次为了出狱，又写“三书”，我实在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出狱后，我重读茨威格的《良心反抗暴力》，读到塞尔维特在走向火刑架路上的那种坚定，更觉得自己渺小。）

看到我总算“识实务”，程科松了一口气，他是真心实意希望我出去。

8月1日的提审是我受审中的最后一次。由于我极度缺乏睡眠（半个月来，每天只断断续续睡4个多小时），“定额”压力巨大，因此，头昏昏沉沉，连审讯记录上的文字都看不大清楚。

8月1日是建军节，晚上放电视，军号声声，刺刀闪闪。这支由人民的血汗供养的党的军队，常常让人民胆寒。1989年，它让身在学校的我害怕，此刻，它让身在铁牢里的我更害怕。囚室的墙上，办有一个“认罪伏法、悔过自新”的墙报，上面贴有一张戴着钢盔的粗壮的军人像，那双威严的眼睛分分秒秒瞪着我们，让人时时刻刻不忘“强大

的无产阶级专政”。

大家埋头一心一意完成劳动定额，没人注意屏幕上的欢庆歌舞。

突然，电视里传来一阵柔美的颂歌（至于颂唱的是谁已不重要），那饱含深情的旋律把我深深打动。

我从小酷爱音乐，音乐常常将我的整个心灵从现实中提升，升华到一个美妙而忧伤的境界。在狱中听到音乐，那种感受难以言喻。乐声把我带到一个温馨美妙的世界：月光、晚霞、森林、草地、母亲、爱人、童年……然而，铁窗、刺刀、手铐、脚镣、禁闭室、“头痛粉”……独特的环境更让那乐声透彻灵魂，让整个人瘫软下来。

小时候看罗马尼亚电影《齐普利安·波伦贝斯库》，其中一个面目狰狞的老犯人，在波伦贝斯库的小提琴声中全身颤抖，热泪纵横，整个人瘫软在地。那时我不懂，现在懂了。

我想，每个人心中，都有柔软、温情、善良的一面，如何才能让这个社会多一些唤起温情的乐声，少一些你死我活的斗争呢？

8月2日中午1点半，我坐在地上手忙脚乱地对付“头痛粉”。高高的铁窗外突然有人叫：“谭松，收拾东西！”

我浑身一震，从地上一跃而起。全室的人不约而同停下手中的活，目光齐刷刷地注视着我。

那目光里含有多少复杂的情感。

释放，还是转移？他们来不及询问，铁门便轰隆隆地打开，狱警威严地立在门口。

一切来得这么突然，我来不及同他们告别，也不敢多说话，一手抱着几件衣服，一手伸出去同张哥和“老头”匆匆握了握。

他们欲言又止。

我知道是释放，因为我升起了那面白旗！

仅仅几秒钟，我就走出了绝望的囚室。

程科和小齐同看守所办好了交接手续，一车把我拉到一家理发店。“你先整理一下，领导还要同你谈谈，然后就可以回家同家人度周末了”。

“同家人度周末”，这句话让我酥软！那一瞬间我觉得世界上再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了。我知道这是程科拼力的争取，我感激他的善意。在巨大的、冰冷而血腥的专政机器中，我有幸碰上了一颗“柔软”的“螺丝钉”。

我坐在理发店，15天来第一次看见自己。天哪，那是我吗？！双颊凹陷，胡须横生，一双阴阴冷冷的眼睛在蓬蓬乱乱的长发下闪烁不定。我看来去总觉得“他”真像一个罪犯，不禁心底一声长叹：要把一个人（良民、公民）变成犯罪分子，至少在外型上是多么容易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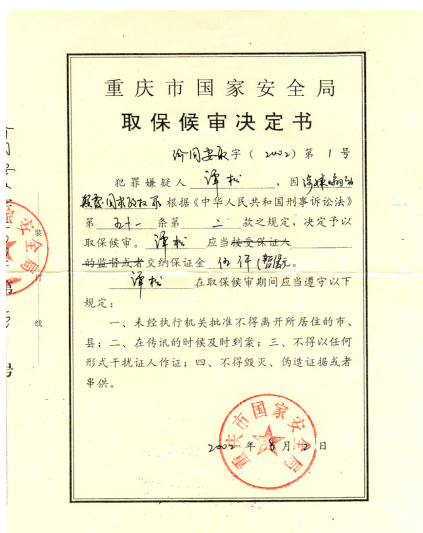
我很想照张像，纪念我的丑陋。

在理发店剪洗掉“罪犯”的痕迹后，我又被带到那个赭红色宾馆。在这儿，我领取了“取保候审决定书”（一年），聆听了他们的法律指导：“刑事犯五年之后犯罪不算累犯，你不同，要终身追究，一旦再犯，即是累犯……你要是再搞长寿湖，新帐旧帐一起算……”

我一心想回家，已经毫无斗志。但是我知道自己容易犯“好了伤疤忘了痛”的错误。果然，后来我睡了几个好觉精神恢复后，又开始手脚发痒蠢蠢欲动。亲友们焦急万分，分析原因，认定是我吃苦不够：既没伤及骨肉，又没有触及灵魂，“伤疤”都没有，当然吸取不了“痛”的教训。

想来也是，国安局是彬彬有礼，看守所属“万豪酒店”，提审不过15次，前后只有32天，既没有尝过公安提供的“麻辣鸡腿”，也没戴过犯人赠与的“金、银、铜”勋章，牢狱之灾中居然出现一片晴朗天空，真是这片土地上的奇迹。

我其实很幸运！



当天晚上，同妻女团聚后，我整个人松弛下来，突然觉得头痛欲裂。妻子遗憾地说：“家里没有头痛粉”。

我一听，头更痛，大叫一声，倒头便睡。



令人头痛的“头痛粉”

## 在押人员行为规范

### 一、立场坚定 爱憎分明

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严格遵守国家法律和监舍纪律，同一切违法行为作坚决的斗争。

### 二、端正态度 服从管教

看守所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机关。看守民警代表政府依法对在押人员实行管教；执勤武警依法对在押人员实施警戒。在押人员必须端正态度，服从管教，严禁顶撞看守民警和执勤武警。

### 三、认罪伏法 是非分明

积极检举揭发他人的犯罪行为，不准交谈串通案情，策划对抗审讯，抗拒交待问题。

### 四、文明礼貌 整洁卫生

保持良好的监舍秩序和内务整洁。不准高声喧哗、唱歌跳舞，未经允许不准进行文体活动。不准在监舍内随意走动，在门窗处站立，以及私自聚堆。不准乱刻乱画，乱堆乱挂衣物，损毁公私财物。

### 五、认真学习 痛改前非

严格遵守学习制度，认真学习，努力改造世界观。不准传习作案伎俩，传播反动、下流言论。不准打架斗殴、喊话闹监、搞流氓活动。不准策划、组织越狱逃跑、装病、绝食和自伤自残。不准拉帮结派，称王称霸，辱骂殴打他人，强吃强占他人财物。

### 六、违禁物品 禁入监舍

严禁制作、私藏刀具、铁器、绳索、玩具等危险物品，以及现金、有价证券。信件必须通过邮局并经管教干部审查后方可收发，其内容不得涉及案情和反监管言词。不准利用一切机会托他人或为他人传递口信和信件。

### 七、保质保量完成生产任务

积极参加看守所组织的生产劳动，认真负责、保质保量完成生产任务。不准消极怠工，毁损原材料。

八、——出狱后，我打算凭记忆写出八条监规，写了几条后，实在不愿再写，如此断断续续，最后，再也想不起第八条。

## 十六、后记

——记被重庆市国安局关押的日子

整理完右派王开泰的文字，又是那体验过多次的“不堪重负”。

一个人三天两头倾听悲剧，长年累月“品尝”血泪，他要有一颗多么“坚硬”的心，才能不“不堪重负”？

我一向痛恨国人的麻木和冷漠，然而此刻，我似乎能理解了——面对重叠深重的苦难、上告无门的冤屈、四处横行的酷吏贪官……不麻木、不冷漠，怎么活？

第四次从王开泰家出来，是2003年12月25日夜晚。从五一技校到石油路车站，有长长一段路，我独自走在寒冷而黑暗的天空下，眼前晃动着王开泰同他可爱女儿的合影，感同身受地体会到“家破人亡”的痛。

路边，电视里传来一阵阵歌唱毛泽东的颂歌。

仿佛有一种说不出的绝望，同夜黑一起，“不堪重负”地压上心头。就在这段路上，我决定，不再采访新的右派，让这一切尽快结束吧。

于是，匆匆写下这篇——

### 后记

从2001年4月6日开始采访第一个右派黎民苏，到前几天采访完右派王开泰，近三年的时间过去了。一路上走走停停、跌跌绊绊、躲躲藏藏，到今天，总算敲打出40多万文字，收集到约300幅照片，把一段即将沉匿入时空长河的历史打捞出一鳞半爪。

此刻，心中有各种情感交织——

### 感激

能够编排完这部采访录，我心中充满了感激。

首先感激所有接受了我采访的人，没有他们的接纳和倾吐，便没有这些文字和图片。

特别感激那些给我的采访提供了巨大帮助和支持的长寿湖老人，其中尤其是黎民苏、李宁熙、王义珍、郑汉生、刘曼若、李正、向光棣、高志长、陈英、刘淑明等。黎民苏四处为我联系，提供信息，并说服那些不愿接受采访的右派；李宁熙前后六次陪我进岛，爬坡越岭，一一指给我当年右派的劳改地、自杀处；郑汉生和盘捧出“右派联络图”；刘曼若慷慨提供自己的手稿……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这部书一定残缺不堪。

其次我对我的高中同学傅达芸充满感激之情。2001年下半年，当她得知我在采写长寿湖，立刻提出帮我誊抄、打字、复印。这部文稿的大部分文字是她一字一字敲打出来。

在我被国安局抓获后，她不顾一切地保护我交给她的资料，并抢在国安局“拜访”她家前把那四盒光盘进行了复制。在我被抄缴得全军覆灭之后，如果没有傅达芸抢救的这几盒复制品，“长寿湖”至少是看不到有关照片了。在最紧张最恐怖的日子里，她也惊慌过（国安局曾说过，作为同案犯，完全可以拘留她、提审她）。但是，她没有犹豫，没有退缩。后来，在我“取保候审”的地下活动期间，她也一如既往地帮助我，没有躲避。我问她怕不怕，她回答：怕！一怕失去公职，二怕失去自由。不过她说，看了这些文字，觉得无论怎样害怕，也要把资料保留下来。

我还感激我的父母和我的妻子，他们的理解和支持给了我极大的安慰。我获释后第二天赶到医院看望父亲，我对他说，长寿湖是他留给我的一笔遗产，为它坐牢，不后悔。父亲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默默无语。突然，他挣扎着坐起来，说：“我只给你四个字——‘谨言慎行’。”说完，泪如泉涌。从那时到现在，父母没有埋怨我一句，只是为我担心。

妻子王青在我被关押期间天天流泪，我出来时，她已哭得双眼模糊，看不大清楚文字（长寿湖右派李建钰的母亲为儿子哭瞎了双眼）。这灾难来得意外、突然，对她打击极大。我获释回家后，不思悔改，继续从事“颠覆”，她尽管心惊肉跳，但从没横加阻拦。她的“合作”，对我是极大的支持和安慰，否则，我将承受更大的心理和精神压力。

还有，在这两年多里，先先后后有不少朋友给我鼓励和支持，我衷心地向他们表示感谢。

## 遗憾

望着打印出的手稿，在长长吐出一口闷气时，也感到一串长长的遗憾。

书中的好多右派、历反，我都只浅浅地采写到一个轮廓。20年的悲欢离合、20年的爱恨生死、20年的心路历程，一定回肠荡气，血肉饱满。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没能深入，那些最感人的生活细节和内心活动，本书无法展示了。

在本书上百名被采访者中，只有6个右派子女，这远远未能揭示“下一代”的遭遇。更遗憾的是，我未能采访到一个“上一代”——右派们的父母。当我听到金践之的母亲走到太阳下曝晒，以感受儿子劳改的艰辛；陈英的母亲哭坏双眼，60多岁被迫出去打工时，我多么渴望能见到他们，亲自倾听他们的讲述。可惜，岁月已把他们全部淘汰，只留下想象——那些母亲们的泪水有多么苦涩！

不少老人在讲述时，或慷慨激昂、或泪流满面、或手舞足蹈表演当年的情景、或细语低声沉缅于无限的哀思……我非常渴望能把这些生动的场面录制下来，就像专题片《重庆大轰炸》一样，让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在电视上看到那一辈人的讲述，听到那一段逝去的历史。可惜，我没能做到这一点。

（注：六年后，2009年，我悄悄找了一些幸存右派，摄下了他们的讲述，并在七年后，2016年，与丁然同学一块将视频制作成六集纪录片《长寿湖》，算是勉强补上了这一遗憾。）

至于这些右派们的头像照片，也是一个遗憾。由于我不便在他们讲述表情最生动时抢拍（书中绝大部分都是在采访结束后正襟危坐时的成像），因此失却了那一份丰富。尤其遗憾的是，扫描照片时我正忙得起火，为了省时间，只扫了很低的精度。后来照片

全部被抄走，现在就只能看到这些不大清楚的相片了。

老人们虽然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条理比较清楚，但毕竟是口述语言。我在整理时，对时空顺序、段落层次、词汇语言都作了相应的一些调整。因此，文本虽是第一人称口述形式，但并不是照相似的一一全录。这也许是一个可以理解的遗憾。

还有一个也许是可以理解的遗憾，就是我隐去了一些人（主要有两类）的名字。

一类是讲述者提到的其他某些右派。长寿湖有一个令人痛心的事实：一些右派是惨死于同类直接或间接的迫害，一些右派是因为同类的压迫使生存更为悲凉。对此，虽然可以归咎于“以右治右”的专政恶毒，归咎于“你死我活”的生存无奈，但是，在灾难、恐怖、迫害面前，有人性的高贵、尊严、坚守，也有人性的卑劣、萎琐、自私。每一个人，都应对他的选择和行为承担责任。可惜，我几乎没有见到任何深刻的自责与忏悔。这是另一个层面上的不幸，灾难之后没有灵魂的拷问，便难以有精神的复活与人格的重建。但是，他们毕竟也是受害者，应当同情他们所遭受的不幸。

另一类是那些作恶者。就我本意而言，我很想让他们“青史留名”，为的是警示后人。但本书中我大多都隐去了名（用X代替），只保留了姓。这一是应讲述人的要求（如高明辉），二是我觉得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那个时代的牺牲品，三是不愿扯入官司中（虽然这可能很难避免）。

长寿湖前前后后接纳了600多名各类“分子”，其中大约100余人永远长眠在那儿（饿死、自杀、累死、病死、打死）。我很想把所有分子的名字和简历一一落实，可惜，还没来得及专门做这项工作，我便被抓、被监控。我不敢公开求证，不少老人更害怕了，不再多说。不过，即使没有这个原因，也未必能做到准确详尽。几十年过去了，右派们也老了，有些事（尤其是发生在他人身上的事）不一定记得准确。例如，李宁熙告诉我莫德仲同他女朋友逃亡的事，我据此整理出来。没多久，王义珍说，不对，莫是同肖顺伟等三人一块逃亡的，没有他女朋友。后来，问到肖本人，才得知，莫是独自一人，肖并未“同谋”。短短100多字，就“改正”好几次。又如，有人告诉我，饥荒年有个文艺团体的右派倒毙在回新滩的路上，但不知姓名。我为此四下打听，最后有人说，当年捕鱼队的李渝知情，我找到李，李说，该右派叫曹亚琪，是教师，哪所学校不详，也许高志长知道。我又赶到高家，高出示了25中的信，这才最后落实了曹亚琪的情况。

在此书中我共分类列出了近400名我未能采访的各类“分子”，我无法逐一像对莫和曹一样反复求证或找到实物证据，虽然我尽了最大努力（比如找了一些我认为“最坚定”的右派一一核对，其中黎民苏看不见，是我逐一读给他听。），但是，我不敢保证其中没有差错，至于遗漏则是肯定的，眼下，只能指望有一天此书见天日时，知情者来修正这种差错，也弥补这一遗憾。

可是，什么时候能“见天日”呢？还在采访期间，十余名右派就悄然作古了。其他右派们能等到那一天吗？多么希望他们在有生之年能拿到一本记录他们血泪的“长寿湖”啊。前年为电视剧《重庆大轰炸》采访当年的受害者、幸存者时，那些老人们渴盼的目光给我很深的印象。幸而共产党恩准了该剧的播出，使重庆那段悲惨血泪史，在沉潜60年后见了天日。

我们还要等多少年，才能像揭露日军的暴行一样揭露我们自己的暴行？



想到不少接受和未接受我采访的右派们注定等不到那一天，我感到非常遗憾。

还有一一

重庆在1958年发配到长寿湖的右派属于“轻刑犯”，而“重刑犯”（极右们）则被押往位于大凉山的峨边等地。那儿劳改环境极其恶劣，专政手段非常残酷，右派们成千上万地死亡（重庆著名的大右派董时光和著名作家刘盛亚就死在那儿）。据说，死人最多时，已无法掩埋，只得把尸体往山沟里一扔了事。四周的农民受不了臭气，不得不搬家。我曾经产生冲动，在采写完长寿湖后专门去采写峨边，那是一幕更为血腥、更为惨烈的悲剧，不能让岁月淹没！

但是，我现在只能说，这是一个遗憾了。

这类遗憾还少吗？

重庆沙区公园有一个占地约两亩的“文革墓”，里面埋葬有400多个在文革中被打死的红卫兵和工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十六、七岁的中学生。2000年11月，我接触到这些死者的故事，那个年代的荒唐、残酷，带着它特有的腥味扑面而来。我一心想挖掘那段往事。可刚开了个头，“有关部门”就打上门来，把“不稳定的因素”扼杀在了萌芽之中。

还有，2003年3月，我为《中华手工》杂志只身前往三峡库区采访，在采访那些古楼残院的手工艺艺术时，也听到一个又一个血泪故事：有土改时民兵用钢条捅女人（所谓地主老婆）下身，害死无辜的；有文革时用细麻绳栓住“分子”胸乳，活活拉掉乳头的……

库区的江水漫上来，一寸寸吞噬了沿江石刻、千年古镇；岁月的江水也漫上来，一点点淹没了腥红记忆、千古罪恶。我内心强烈拒绝这种吞噬和淹没，手中的笔非常渴望在这“光明”（注）的天空中写下血红的真实。可惜，力不从心，纵然悲歌长啸，撼不动“三峡大坝”一根钢筋。

一年多前，我在“谭宗旭”的采访后记中写道：“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中，在高楼林立的辉煌下面，编织有一张细细密密的苦难蛛网，正像索尔仁尼琴笔下的《古拉格群岛》”。现在，面对这张蛛网，我束手无策。即使没有“取保候审”、没有“扼杀在萌芽之中”，我也难以把这“密密麻麻”一一梳理、一一记录。目睹“峨边”们的渐行渐远、“文革墓”的凋落颓败，正如目睹江水一寸寸吞噬云阳石林、峡江古迹，心中是说不出来的遗憾，也是说不出的悲痛。

（注：国安局提审时，多次指责我说：“你太偏激！专门搜集社会的阴暗面。你为什么看不到光明的东西？”他们的话让我反省、检讨。的确，这些年我怎么像个令人讨厌的苍蝇，专门追逐“血腥”？可是，看到那么多人、那么多作家都在歌唱“光明”、赞颂“伟大”，而那么多血泪、那么多真实无人理睬，我只得选择后者。这辈子就破罐子破摔吧，我甘愿作一颗老鼠屎，坏你那一锅“明亮”的汤。）

## 选择

2001年3月，我彻底失去公职，同月，又失去了家中的几乎全部积蓄，也是在这一

个月，我遇到了长寿湖右派李春华。李春华衰老的容颜和气喘吁吁的讲述让我沉思浩叹，同时也十分冲动。

是先找一份稳固工作，挣钱养家，还是立马采访，“抢救”老人？

我犹豫了十多天，选择了后者。

出发前，我写了一篇文章，副标题是“谨以此文献给不幸嫁给了我，又决定‘嫁鸡随鸡’的贤妻”，其中的一些文字，可以算作我为什么要作这种选择的原因。

“三八”妇女节那天，我送上一个“下岗证”，现在又要去做“赔钱的事”（当时还没想到这不仅仅是要“赔钱”）。很多人都指责我“太不实际”，这个年代了，不寻一份好工作，去求什么“内心的自由”、“精神的力量”？

可是，我觉得身不由己……

我和我们那一代人，从小深受一种崇高的精神力量的感召：“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在这种力量的激励下，我们不仅甘愿忍受物质的贫困，而且还充满了“抛头颅、洒热血”的壮烈情怀。我永远记得当仰望飘扬着的队旗，在《少年先锋队队歌》的旋律中，将手高高举过头顶，宣称“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时所产生的那种庄严崇高神圣的美感。那是一种透彻心灵的美感，一种物质的光辉无法替代的美感。

不幸的是，独裁者和专制集团利用这种崇高和神圣，干尽了伤天害理的坏事，用西德尼·海特曼的话说，就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最为人道，最为理想的主义之一，遭到了可悲的歪曲，并被用来为整个历史上最为残酷的暴虐制度之一服务”。

我们不得不承担的后果是：当作恶者造就的现实苦难和血腥尸体最终撑破了意识形态大厦后，随着大厦轰然倒塌（或者说作为陪葬）的，便是人类精神世界里那种美丽、崇高和神圣。“为劳苦大众谋幸福”的崇高理想被饱受欺骗的劳苦大众当作笑料。信仰破碎了、理想消失了，精神世界里是洪水消退后的满目疮痍，一片凄荒。

这时，被压抑的物欲在“设计师”“先富起来”的进军令中，踩着地上被撕得稀烂的精神旗帜，以横扫千军的狂热，将十多亿人民推到了另一个极端。

信仰破灭、道德沦丧的时代，不再有精神的日出了吗？因为神圣被利用，崇高被亵渎，理想被欺骗，便不会再有神圣、崇高和理想了吗？只剩下功利的社会，只剩下物欲的人生，能够重构生存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

1996年，我正处在异常孤独和苦闷中时，读到威廉·华莱士的一段话。当时，英格兰大军压境，华莱士和他弱小的部队面临生死抉择。一些人害怕了，打算掉头逃命，华莱士挥舞长剑，振臂高呼：“我们抗御暴政，为自由而战，打，可能会丧命，逃跑，可以苟存生命。但是，你们是否愿意用这些苟且偷生的日子来换一个机会，就是回到这里，来告诉我们的敌人，他也许能夺去我们的生命，但永远不能夺去我们的自由！”

我被华莱士面对死亡的这段话深深打动！

后来，又陆续读到英国托马斯·莫尔在狱中为信仰的最后坚守；读到意大利萨沃纳罗拉为自由和改革的慷慨赴难……

坍塌的精神废墟中，冉冉升起了新的旗帜，它同几十年前，我把手举在头顶上仰望队旗时的神圣美感是同一深层结构。

为人类的解放事业奋斗并没有错，创建一个没有压迫的社会并没有错，为劳苦大众谋幸福并没有错，不能因为世上有几个恶魔利用神圣的旗帜干尽坏事，便从此拒绝神圣；不能因为崇高被亵渎而从此远离崇高，不能因为信仰大厦的坍塌便任凭精神世界一片荒寒。

……

2000年11月，我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游览了半个多月，那友善的人与人关系和田园美景，让我十分沉醉。新西兰的罗托鲁阿镇，落红铺地、空气含香，美若天堂里上帝的后花园。我痴痴注视着天边透明的夜空，仿佛置身于一个美妙的童话世界，心中充满了小时候读《白雪公主》时的那种单纯宁静与美好。

我不由生出强烈渴望：不回去了，留在这儿！这和谐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上帝的关系，原本就是我一直追求的生存环境。

当夜，我久久不能入眠，独自披衣步出旅社，走到外面的草地上。

四周一片宁静，夜风凉悠悠地送来花香，我抬起头，凝视南太平洋那繁星闪烁的深邃夜空。

我蓦地感到一阵悲伤——那冥冥浩宇中的上帝，你为什么这么不公平？在同一个地球上，你将苦难、丑恶、暴力、谎言、仇恨、贫穷、冷漠集中在那一个名叫CHINA的地方；而将和平、友善、真诚、美丽、洁净、宽容、富裕，集中在这名叫NEW ZEALAND的地方。

足踏着这块库克船长一百多年前才进入的南太平洋岛国，遥想着我那拥有五千年文明的苦难大国，心中百感交集。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世界上有多少民族像我中华民族一样遭受了那么多苦难和不幸？

我想到被“开发”得千疮百孔的大好河山，被“改造”得面目全非的亿万民众；想到无神论带来的狂妄，唯物主义带来的贪婪；想到铺天盖地的假冒伪劣，无处不在的谎言、冷漠；想到“人民公仆”的巧取豪夺，“制服们”的威武恐怖；想到从小就目睹的一幕幕惨烈悲剧，一双双欲哭无泪的眼睛……

我感到一种强烈的感召——苦难的感召！仿佛苦难催生了一种深沉悲壮的情怀，唤起了内心金戈铁马般的冲动。这种情怀和冲动，无法在新西兰田园牧歌的风情中得到释放，无法在澳大利亚洋房别墅的华美中获得满足。正如江南桃红柳绿的沉醉，不能取代大漠孤烟的苍凉、长河落日的悲壮所唤起的那种深层感动和震颤。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个荒唐人的梦》中说：“正是由于这里出现了不幸，我才更加热爱这片土地。”

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里说：“如果我们能以自己的见证为下一代留下我们那个时代分崩离析的真实情况，哪怕只是一星半点，也算我们没有完全枉度一生。”

阿赫玛托娃在《安魂曲》中说：

“不，既不是在异国他乡的天底下，  
也不是在他人的卵翼之下，  
在我人民遭受不幸的地方，  
我与我的人民同在。”

茉莉在瑞典说：“为了天空不再黑暗，必须先揭露黑暗！”

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我没有选择“实际”、没有选择“叛逃”，而要选择“长寿湖”的原因之一吧。

## 恐惧

一写下这两个让我刻骨铭心的字，眼前就鲜鲜活活闪现出一张张惊惊惶惶的面孔、一双双躲躲闪闪的眼睛。

经历了九死一生的右派老人们，此刻，走到生命的迟暮，最恐惧的仿佛不是死神的迎候，而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驾临。

王开泰是我 2003 年采访的最后一位右派老人。在山城寒冬阴沉沉的天空下，他数次紧紧抓住我的手，蹙紧眉头说：“小谭呀，你没有经历，那个整人，那个专政，家破人亡，可怕得很呐！”

我们这一代生长在“新中国”的人，怎么会没有“经历”？

在看守所时，看守刘 XX（大约 30 多岁）曾把我叫到他办公室，问：“谭松，你是哪个反党的？”我告诉他，文革爆发时我正读小学，停课后的两年里，我夏天每天到长江游泳，那些日子几乎每天都看见十多具甚至几十具尸体漂流而下。有的被挖掉眼睛、有的被割去乳房、有的被铁丝洞穿锁骨、有的被剃去阴茎，两腿间一个森森的血洞……我夜夜做恶梦，惊出一身冷汗……正是由于恐惧，我开始思考，觉得这个社会出了问题。这也许就是我“反党”的根源之一。

其实，就在采访王开泰时，恐惧，也像幽灵一样跟随着我——会不会又被“专政”发现？他们本领高强，无孔不入。

还有，在 2002 年底和 2003 年初，国安局频频找我问话（共产党召开十六大，为了“稳定”，又大抓“异议人士”，其中竟有 20 来岁的女学生——“不锈钢老鼠”刘荻），我感到恐惧包围着我。

为了让“长寿湖”在我万一又出事之后能完整地保留下来，我发起了一次唐吉珂德式的悲绝冲锋——日夜整理、修改、编排、打印。那些日子，一听到有人敲门，我就一阵心惊肉跳。有一天，咚咚门声之后，进来几条汉子，其中两人身着制服，我顿时脸色发白，手中的笔，索索直抖。

虽然是一场虚惊，但那恐惧，却是实实在在刻骨铭心。

还有，就在我写下这篇后记时，“专政”又推出了新一轮恐怖。罗永忠、李志、颜均、何德普、郭庆海、姜立钧、欧阳懿、杜导斌等网络异议人士一个个前赴后继地落网。他们的罪名同我所享受的一样：“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看到网上征求申援他们的签名，我本能地产生冲动，本是同一条战壕的难友，怎能坐视？

然而我退缩了。我在专政恐惧的阻吓下退缩了。

想来，共产党在这 50 多年来最“伟大”的治国韬略之一就是：它成功地把一张铺天盖地的恐怖大网严严实实地笼罩在神州大地上，让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恐惧中。久而久

之，外在的恐惧幽灵内化为奴性的行为自觉。在这张大网中，传统的侠义消失了、古老的血性消失了、慷慨悲歌消失了、舍生取义更消失了。偌大一个民族，变成暴君和奴隶、奴才互动的两极，社会在这种互动与共谋中“稳定”地一天天坠落。

就在我面对那一张张恐惧的面孔时，听见江泽民大义凛然地向国际社会宣称：“我们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一切形式”是否包括共产党推行 50 多年的“国家恐怖主义”？在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中，国家恐怖主义是不是最恐怖的恐怖主义？

告别“旧社会”的芸芸众生，在国家恐怖主义中无孔可逃。

进入“新中国”的中华民族，在国家恐怖主义中整体“精神阳痿”。



长寿湖的“守墓人”李宁熙和谭松  
在同心岛（2003年7月）

我知道自己不是一条“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梁山好汉，但我也知道自己手中的笔已经吸满鲜血，在那谎言和暴力堆砌的恐怖魔宫里，将出现一个最令它恐怖的词汇——真相！

## 罪恶

长寿湖在那 20 多年里究竟死了多少人？有人说 100 多，有人说 200 多。我试图一一落实，有名有姓地记录下来。然而，由于湖广岛多，右派们来自不同的单位，劳改地点又太分散，更由于当时死个右派如同死条狗，上上下下没人在意，另外，也由于我行动不自由，无法像调查日军细菌弹罪恶一样公开求证，因此，直到今日也没能准确统计。

一个小小的长寿湖尚且如此，那么，“新中国”成立以来，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在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中，又有多少人“非正常死亡”了？

上个月，到李普杰家中去核实“长寿湖分子”名单时，他告诉我，廖伯康（李普杰当年在团市委的领导，后曾任重庆市委书记、四川省政协主席。）正在写一部书，其中有一个统计，即四川省在“三年自然灾害”中饿死了至少 1000 万人。李普杰说，他协助廖伯康查了各种资料，进行计算后得出这个结论。

二战期间，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焚尸炉浓烟滚滚，近 200 万犹太人“非正常死亡”。据统计，希特勒法西斯共消灭了 600 多万犹太“异类”。

如果把毛泽东共产党在“新中国”这 50 多年来消灭的“异类”一一统计出来，我相信，一定会让奥斯威辛焚尸炉的火光黯然失色！

不过，令人感到沉重而又悲愤的，并不仅仅是因为这种数量上的类比。

在采访期间，有一个感受，不少老人依然保持着眼下这个社会已经十分稀缺的东西：正直、善良、诚信、良知、仗义、同情心、安贫乐道等等。其中，尤其是在一些年近

80，或80岁以上，也就是说在“旧中国”、“旧社会”生活得久一些、在传统文化中浸润得长一些的老人身上，这种现象更为明显。

“旧社会”究竟是怎么一个社会呢？传统文化到底是怎么一种文化呢？

我刚刚来到这个世界，就传来“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胜利完成”的喜讯。我一口一口吸着共产党提供的狼奶：斗争、专政、揭发、告密、改造、批判、仇恨、暴力、大义灭亲、痛打落水狗……。我不知道什么叫气节、怜悯、宽容、良知、童叟无欺、敬天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那些年，听得最多的革命口号之一是“不破不立”、“打翻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

我们为这个口号热血沸腾、冲锋陷阵。

数十年南征北战厮杀归来，回首一看：我们“破”了什么，又“立”了什么？

“破”，我们把“翠绿的森林”——良知、道义、善良、诚实、正义、侠义、同情——砍伐，投入像奥斯威辛焚尸炉一样可憎的“土高炉”；“立”，我们把“翠绿的森林”整体焚烧，炼出一坨坨牛粪般丑陋的“钢铁”——虚伪、奸诈、暴虐、投机、钻营、欺骗、凶残、贪婪。

这个过程是怎么完成的呢？想来主要分为两个阶段：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年代和邓小平开创的“先富起来”年代。前者用斗争、暴力、“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剿灭人性中的真善美，后者用发财、享乐、“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激起人性中的贪欲、卑鄙、邪恶。而贯穿这两个阶段的是同一条主线——一党专政下的暴力镇压和暴力掠夺、谎言欺骗和利益收买。

前者，统治者用虚幻的崇高、神圣、理想、精神，消解了物质欲求，挑起疯狂仇杀，使亿万民众在极度贫困中斗得死去活来；后者，统治者煽起狂热物欲，消解了道德、良知、精神和真正的崇高、理想，使全民族为了发财不择手段。

一会儿是可怖的血水，一会儿是有毒的糖水，中华民族的脊梁在这两者的交替浸泡中酥软萎缩，传统文化的精髓在这两者的先后打磨中丧失殆尽。天上没有上帝，人间缺乏爱心，心中没有敬畏，眼里只有金钱。于是，正如何清涟说的，我们生活在“一个日益痞子化的社会里”。

奥斯威辛焚尸炉吞噬数百万肉体生命自然是滔天罪恶；“新中国”的“土高炉”在吞噬数千万肉体生命的同时又毒害了整个民族的心灵，这是怎样的罪恶？！

1957年数得出的是55万多知识分子家破人亡，数不出的是整整一个民族开始大步走向谎言和残暴。奥斯威辛仅仅烧毁了肉体生命，共党极权还烧毁了生命中的“本来的世界”（即哈维尔说的“the natural world”）——人性中原始的真善美本性。这种罪恶如果不进行揭露、清算和批判，即使共产党寿终正寝，我们这个民族也不能真正“站立起来”。

“必须把颠倒的世界颠倒过来”，恢复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本来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确实是个“颠覆犯”。

这，也是我不顾一切要采写出这些文字的原因之一。

## 绝望

2003年7月的一个黄昏，为给本书封面拍照，我租一条船，偷偷摸摸驶入同心岛。

夏夜酷热，蚊虫猖獗，转眼工夫，腿上密密布满几十个红疙瘩。我离开湖边的那家农舍，爬到一条船上，郁郁躺下。

依然热汗淋漓，蚊虫追逐。

我索性跳入水中，往深处游去。

没有月亮，深邃的夜空里缀着几颗疏星，诡诡秘秘，惨惨淡淡。黑黢黢的山岳死气沉沉浮在水面上，从四面八方给我一种威压。哗哗的水声在夜半的寂静里揽起一串惊恐，仿佛声响会惊醒蛰伏的鬼怪，招来杀身之祸。

我停下来，静静躺在水中。

没有声响，连一丝风也没有，世界一片死寂。我翻身埋头，朝水下潜去。

一股寒气从下面墨黑的深处扑面而来。我一惊，骤然感受到另一个世界，脑子里冒出一串张牙舞爪的字眼：死神、窒息、地狱……

恐惧，像一只巨鹰劈天而降，一把揪住了我的心。我慌忙向上冲出水面。

岸上，那家农舍的灯光传出巨大的诱惑和温暖，我立马产生了强烈的挣脱湖水、挣脱冷寂、挣脱黑暗、挣脱恐惧，走向灯光的渴望。

一个人要绝望到何种程度，才会拒绝岸上的灯光，坚定不移地扑向寒气森森的黑暗？

30多年前的那些黑夜里，右派杨惠云、宁振笃、卢蕴伯、陈遥之……一个个坚定不移地这样走了。

他们在最后一刻想了些什么呢？他们在沉入黑暗时回头望过岸上的灯光吗？尤其是杨惠云，身后的湖岸上，还有她心爱的丈夫和两个幼小的孩子。

我慌慌张张游到岸边，脚踩上坚实的土地。

我不再惊恐。然而，悲愤涌上心头。

同心岛，这儿沉积了多少冤魂？山那边的浩浩大地，又埋葬了多少无辜？知道的，不准采写，不准揭露；不知道的，永远沉寂，永远消亡。几十年前杨惠云们的夜晚疏星惨惨鬼影憧憧，几十年后一党专政的天空黑暗依旧腐臭依旧。看世界民主潮流浩浩荡荡摧枯拉朽，而足下的土地依然是千里冰封岿然不动。那一小群自封的“代表们”，强占一切权力、强占一切资源，为了自家的利益和既得利益，顽固拒绝民主，竭力剿杀自由，不惜把整个国家和民族拖向灾难的深渊。我等得焦急，岁月哗哗流逝，“戈多”久久不来。在尸体加尸体的开幕与落幕中，在一代又一代“领导人”的登场与下台里，绝望，像夜黑，包裹了我日渐衰老的生命。

农舍的灯光熄灭了，夜风吹起来，水波涟涟，野草摇曳，天地间有飒飒瑟瑟的哀鸣。我呆呆伫立在冷冷湖水边漫漫夜黑下，觉得自己渺小得很、无力得很、无助得很、孤独得很。我的悲伤能抚慰脚下那早已被遗忘的累累白骨？我的愤怒能撼动专制帝国一块砖石？



2009年7月2日，谭松第八次进岛考查

悲与愤的交织，爱与恨的厮杀，渴望与无奈的冲撞，凝固成一滴沉甸甸的晶莹。  
我赤裸裸水淋淋扑倒在这伤痕累累的土地上，洒下无声的热泪……

## 墓碑

我决心建一座墓碑。

我把它安建在此书的最后。（注：这本是一种无奈的选择。长寿湖大大小小 200 多个岛子，容不下一块墓碑，正如 960 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容不下一个文革博物馆。）

跌跌绊绊走了近 1000 个日日夜夜，终于来到它的面前。

没有花圈、没有松柏、没有经幡、没有香火、没有人踪、没有哀乐，只有一大堆被遗忘的、毫无生气、甚至也毫无意义的名字：

曹亚琪 周人文 方 田 熊莞君 张 樾……

卢蕴伯 焦光复 王明范 鄂启德 崔永禄……

遗忘，让被扼杀的生命又遭受一次不幸——一种比肉体生命消亡更深刻的幸。

我把这些名字一一拾起，希望“在通往苦难记忆的路上，荒草不再生长”；

我把这些名字一一拾起，渴盼在苦难记忆的坟地上，长出永恒的善与爱的花朵。

那逝去的、我未曾相识的生命，在冬夜的寂静里吐出鲜活的声音；那永恒的、美丽而高贵的灵魂，在墓地的上空发出金色的光辉。我真真切切看到了他们，听见了他们——他们，不是一个个陌生的、逝去的名字，而是一个个熟悉的、血肉饱满的生命。

我把这些名字一个个镌刻在墓碑上，拒绝冷漠、流失与遗忘；

我把这些名字一个个镌刻在墓碑上，召唤哀悼、祭奠与思考。

每刻一个，火花乱溅，悲风四起；

每刻一个，烛光摇曳，圣歌低回……

就在我一个又一个镌刻时，身边传来起一浪高一浪的祝颂：欢庆毛泽东 110 岁诞辰。

而同时，遥远的地方，传来暴君萨达姆落网的消息！

天地间，正义之神仗剑驰骋，目光如炬。

然而，等得太久，这块僵冻的东方大地！

我注视着冷寂的墓碑，心中涌动着热切的渴盼：

我们民族的后来者们、那已出生和未出生的同胞们，当那一天自由的阳光终于照耀着这片浸润着无数父兄前辈鲜血的土地时，你们能够来到碑前，用你们的目光和哀思，抚过一个个无声的名字，然后以你们的才华和良知，将这些逝去的无声的名字，变作鲜活的有声的视频，让千千万万的人、让说中文和说外文的人，看到这片东方土地上的一段千古悲歌……

此时，我只有手扶墓碑，垂首祈祷——为足下这血泪斑斑而又令人魂牵梦萦的土地，



为天上那伤痕累累而又美丽高贵的灵魂。

.....

新年的钟声响了，又是一轮欢呼和企盼。

最寒冷的冬天到了，希望的春天会来吗？

我跪倒在这无声的墓碑前，泣血顿首，举手向天——

——让黑色的墓碑成为我们民族苦难的终结吧！

——让爱和自由的阳光照耀着这片古老的大地！

谭松 2003 年岁末



日落之后，会有朝霞穿破黑夜。长寿湖，为你虔诚地祈祷。

（谭松摄于 2003 年 7 月）

## 十七、墓碑

以下 135 人（其中长寿湖“分子”95 人），未能等到 1979 年“改正”昭雪，他们鲜活的生命，在最黑暗的日子里，消殒在“阳谋”的祭坛上。

邓 林	颜北岩	帅左瑶	宁振笃	胡尔勤
贾厚友	陈遥之	孙毓澄	邬启德	文 英
陈 珽	杨惠云	康中清	杨正木	郑永康
刘 犁	张 樾	谭希文	陈 援	回恩浩
杨昌林	封世泽	张典范	卓松岱	李南力
李华伟	刘光明	焦光复	高龙生	廖忠观
傅绍清	胡泽先	罗 宇	熊建文	崔永禄
王 衡	张万金	胡咸中	王 健	乔明鑫
王明范	陈嘉行	李彦辉	何泰贵	曹亚琪
顾祖鏢	熊 丰	黄一模	黄力威	姚述隐
李受之	黄静瑜	庄 湛	张 健	张光育
卢蕴伯	马成敏	周建龙	吕声拯	潘广桂
曾 容	肖伯志	成世忠	董延安	肖扬军
张泽光	廖西台	郝士风	李立明	周正林
黄幼林	张 骏	聂承奎	梁耿发	张 晓
刘辛稼	曹岳霖	周怀笛	王谦湘	邢 风
王钦福	沈汉兴	徐惠玉	宋 朴	朱汝鳌
陈普安	赖金泉	冯瑞勇	刘跃荣	刘迪先
谭范旗	杨启祯	李 露	尹 新	尹平宗
唐成淼	曹绥志	胡道成	蔡观强	张宗明
赵师明	宋菊珍	熊莞君	朱伯封	王大虎
陈适情	齐东野	董时光	刘盛亚	徐季正
田际昌	王相成	杨 林	谢 予	童 铸
徐 和	陈 英	黄贤俊	叶仲矾	周人文
李岑西	杨子绍	方 田	王松桥	刘克彬
马正仪	伍加林	方大提	刘纯武	许 霞
黄汉超	陈金蓉	石洪志	景处仁	周远达

让这些无声的名字，在民族苦难的记忆里燃烧。

让这些无声的名字，在民族苦难的记忆里**燃烧**。

林 林 顾北岩 傅忠管 刘盛亚 廖忠管  
李南力 刘 梨 张 德 封世泽 胡泽光 陈廷情 陈万全 蔡晓强 王 衡 陈建之 康中渭 杨建云 孙健迎 尹平宗 胡建龙 姚远勉 李琴西  
杨昌林 傅绍清 刘光明 廖西白 曾 谷 李授之 张光育 董延安 陈 焜 王明苑 卢璠伯 宋菊珍 张宗明 潘广桂 齐东野 方 田 黄溪俊 王天虎  
黄幼林 张 德 封世泽 胡泽光 陈廷情 陈万全 蔡晓强 王 衡 陈建之 康中渭 杨建云 孙健迎 尹平宗 胡建龙 姚远勉 李琴西  
张 德 封世泽 胡泽光 陈廷情 陈万全 蔡晓强 王 衡 陈建之 康中渭 杨建云 孙健迎 尹平宗 胡建龙 姚远勉 李琴西  
封世泽 胡泽光 陈廷情 陈万全 蔡晓强 王 衡 陈建之 康中渭 杨建云 孙健迎 尹平宗 胡建龙 姚远勉 李琴西  
胡泽光 陈廷情 陈万全 蔡晓强 王 衡 陈建之 康中渭 杨建云 孙健迎 尹平宗 胡建龙 姚远勉 李琴西  
陈廷情 陈万全 蔡晓强 王 衡 陈建之 康中渭 杨建云 孙健迎 尹平宗 胡建龙 姚远勉 李琴西  
陈万全 蔡晓强 王 衡 陈建之 康中渭 杨建云 孙健迎 尹平宗 胡建龙 姚远勉 李琴西  
蔡晓强 王 衡 陈建之 康中渭 杨建云 孙健迎 尹平宗 胡建龙 姚远勉 李琴西  
王 衡 陈建之 康中渭 杨建云 孙健迎 尹平宗 胡建龙 姚远勉 李琴西  
陈建之 康中渭 杨建云 孙健迎 尹平宗 胡建龙 姚远勉 李琴西  
康中渭 杨建云 孙健迎 尹平宗 胡建龙 姚远勉 李琴西  
杨建云 孙健迎 尹平宗 胡建龙 姚远勉 李琴西  
孙健迎 尹平宗 胡建龙 姚远勉 李琴西  
尹平宗 胡建龙 姚远勉 李琴西  
胡建龙 姚远勉 李琴西  
姚远勉 李琴西  
姚远勉 李琴西  
李琴西

让黑色的墓碑，刺破你血红的天空！

以上110人，未能等到1979年“改正”昭雪，他们鲜活的生命，在最黑暗的日子里，消殒在“阳谋”的祭坛上。



封底：

每当想起那惨烈的 1957 年，我就会痛彻心腹，不由自主地痉挛起来。真的，甚至听到、看到、或提到那个年份，都会使我条件反射地感到巨痛。这是一个染满中国知识界和青年群之血泪的惨淡悲凉的年份。假如说在此之前，处于暴政下的中国知识界还或多或少有一些正气的流露，那么，在此之后确实是几乎被摧残殆尽了。

——林昭在狱中用血书写

这场以摧毁国人的良知为代价的政治运动所采用的种种卑鄙手段，已经成为下流无耻的同义词。就像数学领域里的哥德巴赫猜想一样，反右运动给后来的人们留下了许多难解之谜，由于这些谜过于违反人类的常理，所以，一些后来的人甚至不愿相信：难道这一切不可理喻的事情都曾经真正发生过？

——陈仁德（重庆作家）



日落之后，会有朝霞冲破黑夜。长寿湖，为你虔诚地祈祷。